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八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 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8)

ISBN 978-7-5098-0128-4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史料—1937—1943 ②共产国际—关系—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史料—1937—1943 IV. K265.1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536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8)

书 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译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318千字

印 张:12.875

印 数:1—1200册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128-4

定 价:258.00元 (共四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82517687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霍海丹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б)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V

ВКП(б)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ПК
В ПЕРИОД АНТИ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Ы
1937 — май 1943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А. И. КАРТУНОВА,
И. КРЮГЕР, Н. И. МЕЛЬНИКОВА,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3)》。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12年2月
于京北宝盛里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两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卷(即最后一卷)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2007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收录自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期间有关档案文件及在时间上超出这一时期但在内容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档案文件共300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其中有任弼时于1938年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首次派出代表向共产国际直接详细汇报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活动情况、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还有周恩来于1939年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阐述了当年统一战线的状况和特点、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各自的政策以及群众运动的状况等。同时卷中也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这两个报告分别作出的决议,对中共实行的政治路线作出了评价,并对中共以后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此外还有些文件记

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与中共代表一起就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以及中共在统一战线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主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的会议记录。引人注目的是,本卷发表的文件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的电报,特别是自1940年10月下旬至1941年4月间围绕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冲突的增多、皖南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严重的破裂危险往来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处理皖南事变问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些文件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战争时期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在新疆帮助中共创办军校培训军事技术干部,在督办盛世才改变对共产党人态度后帮助中共解救驻新疆工作人员等的情况。也有些文件涉及中共党内状况、延安整风、王明与中央领导之间矛盾等问题,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本卷最后集中发表了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和中国其他党派对此提议作出的反应的文件。

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更具体地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为了及时将本卷译介绍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2007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

权,并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卷中译本(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8、19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9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中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正文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在注释中则注明其名和父名的缩写字母。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A. И. 卡尔图诺娃教授,以及H. И. 梅利尼科娃、И. Н. 索特尼科娃高级研究员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在此我们特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

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

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本第五卷是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为总名称的系列文件集^①的最后一卷,本卷所收录的文件,阐明了从1937年8月至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本卷还收录了虽然在时间上超出这一历史时期但在内容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6个文件作为附录。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开放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档案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文件集和著述,其中完整地或部分地引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本文件集编者还决定将一些已经发表的文件收录其中,希冀提供全面的历史情景,也考虑到许多文件是在不同国家和用不同文字发表的^②。

① 见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季塔连科、郭恒钰主编;第2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莫斯科1996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莫斯科1999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莫斯科2003年版(两册),季塔连科、莱特奈尔主编。

② 见《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索菲亚1997年版;《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册(1941年6月22日以前),H. C. 列别捷娃、M. M. 纳林斯基编,莫斯科1994年版;同上第2册(1941年6月22日以后),H. C. 列别捷娃、M. M. 纳林斯基编,莫斯科1998年版;《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1919—1943)》文件集,Г. М. 阿基别科夫、K. M. 安德尔松、K. K. 希里尼亚编,莫斯科2004年版;《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1934—1943)——来自苏联档案中的信函》,亚历山大·达林和F. I. 菲尔索夫编,纽黑文和伦敦2000年版。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主要文件表明,共产国际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与中共代表们^①一起制定国共两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各阶段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在国共关系出现危机的形势下共产国际也在为使这一合作不致遭到破坏而斗争。

本卷收录的新的档案文件,特别广泛地展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同中共之间,以及季米特洛夫同毛泽东之间的密电往来,其中含有许多新的东西。

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题目在史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阐述得相当广泛。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开始出版一些利用以往鲜为人知的文献的著述。^②

收入本卷文件的特点之一是,其中不包括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这个主要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只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上就策略问题发生过,对此本卷编者只是从中国论述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得知的,而我们对中共党史也不完全熟悉。

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以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除了通过有关给共产国际活动拨款、开展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其他一些非常事件的决议以外,再没有就共产国际政策问题通过决议。通过重大决议的全权正式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然而在实践中,每个重要决议都是与联共(布)中央政治

-
- ① 1937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王明、王稼祥和康生)回国后,在1938至1940年间,周恩来和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回国后,中共代表空缺。1942年Л.Л.弗拉基米罗夫(弗拉索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从苏联派往延安。在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后,南方局工作人员就直接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人员,必要时与大使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就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 ② 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北京2002年版,第1卷第1—2册;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北京2004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1999年版;《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1997年版;郭德宏、刘晶芳等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海南2001年版,第1卷。

局或者斯大林协商的。^①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一切内外政策活动,这一点也反映在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中。这一点尤其可以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中和他给斯大林的信中清楚地看出。^②

中日战争中的主要事件在国内外的著述中已有详尽的阐述。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人提出了实际控制华北广大地区的要求。7月30日和31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北京)和天津,9月和12月占领了上海和南京,1938年10月又占领了广州和武汉。至此结束了战争的第一阶段,常规战线长期稳定下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

为了不使大部分部队“困住”在中国而使其解脱出来去实现“向北”(反对苏联)或“向南”(占领印度支那)的侵略计划,日本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同时一直在最后通牒式地要求中国政府投降,保持日本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日本、中国和满洲国实行经济“合作”,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随着中国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的恶化,这些“和平建议”加强了国民党内及其军队部分领导人中的动摇,他们认为抗日是没有前途的。

在国民党领导层内部,有以汪精卫为首的公开亲日派,积极支持日本的要求,把这些要求称为“体面媾和”的建议。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随着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1941年至1945年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以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点既反映在中国的内部政治局势上,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动摇上,也反映在共产国

^①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15页。

^② 同上。

际执委会书记处考虑到新的紧急情况而对中国工作重心的变化上。

在我国的著述中,详尽而系统地探讨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新的政治方针的演变,也探讨了国共两党代表在1937年上半年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接触的简要经过。^①

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就号召组织全民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②,抵抗日寇的侵略。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其中阐述了以下目的:(1)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动员人民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恢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建立民权基础上的制度,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和规定救国方针;(3)保障人民稳定的财产收入,发展国防经济。

宣言中又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特区的政府和实行民权政治;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③然而蒋介石只是在两个多月后才允许发表这个宣言,并发表自己的声明。

1937年6月开始后又中断的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在庐山的会谈于7月恢复。7月17日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组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特区政府,以及中国红军改编为隶

①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2册,第868—896页。

②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91年版,第11册,第274—275页。

③ 宣言的全文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1980年版,第76—78页。

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民族武装力量八路军。

1937年8月10日召开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对于确定中共因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变化而提出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发言(第1号文件),说王明的报告是“有点鼓动性的”。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急剧转变中共干部的思想意识。要完成这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共干部在十年内战期间受到的是苏维埃思想教育,一直把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当作主要敌人来与之对抗。

根据这一方针,此时需要在党的政策上、党的策略上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正是这些干部,不是另一个党,不是另一些新人,而正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必须实行另一种政策。季米特洛夫为中国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现在不是搞苏维埃化,而是使中国人民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吞食”。中共的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使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季米特洛夫说,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是同共产国际七大的总路线一致的,也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的。

与此同时,季米特洛夫还表示担忧,这些干部能否顺利地执行新的政策。必须培养新的干部,新老干部都必须学习,避免党和党的干部因实行新的政策而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苏联的对华政策在推动蒋介石采取进一步实际步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以及在激励他下决心抗击日本侵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署了苏联和中华民国互不侵犯条约。^①这一条约的签订便于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1937年9月14日,作为这一条约的补充,双方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军人装备而其费用由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支付(第一次贷

^① 条约全文见《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161—162页。

款 5000 万元)达成了协议。同时特别附带说明,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武器援助应由南京政府拨给共产党军队。^①

中国从苏联得到了按当时来说十分可观的贷款(1938 至 1939 年为 2.5 亿美元,总共为 4.5 亿美元)和武器装备(战争头几年为 24 个师的装备)。^②此外,苏联军事顾问(至 1939 年年中,在中国工作的有 3665 人之多^③)和空军志愿飞行员也给中国军队提供了援助。^④

在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即 1937 年 8 月 22 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由三个师(115、120 和 129 师)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并开赴山西前线。1938 年 9 月,又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⑤

1937 年 10 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由中共主力开往西北后留在华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新编第四军(为人所知的新四军),由叶挺领导,他的副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新四军部队集中在安徽和江苏省南部(长江以南)和安徽省东部(长江以北)。^⑥

1937 年 9 月 22 日,蒋介石允许发表中国共产党 7 月 15 日的宣言。9 月 23 日,蒋介石就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对报刊作了口头声明。他试图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说成不是两党面对中国有被日本侵吞的威胁而作出的妥协,而说成是共产党人承认自己政策的错

① 《中国近代史(1928—1949)》,莫斯科 1984 年版,第 149 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莫斯科 1988 年版,第 17 页。

③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 190 页。

④ 关于苏联对华援助和苏联顾问的活动,详见《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军事援助》,莫斯科 1975 年版,第 49 页;B. A. 鲍罗廷:《苏联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莫斯科 1965 年版,第 140—173 页。

⑤ 见《朱德选集》,北京 1983 年版,第 406 页;彭德怀:《元帅回忆录》(中文版《彭德怀自述》),莫斯科 1988 年版,第 307—334 页。

⑥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 150 页。

误和国民党的正确。^①

中共宣言于1937年9月22日的发表和蒋介石9月23日的声明,是国共两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确立合作的起点。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化。中国的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到随后的整个时期都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稍后,在1939年12月,当统一战线已存在两年半时,周恩来就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说了以下的话:“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共同纲领,也没有各党的联合组织,就是说在法律上中国的统一战线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又极其广泛。在抗日战线上,中国各阶级的分子都参加了……”(第84号文件)

国共合作和中国统一战线的另一个特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领地,诚然,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例如,当时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只有特区(陕甘宁边区)和华南、华中的游击区。

统一战线建立后,与实现统一战线有关的一切重大决定通常都是通过中共代表直接与蒋介石谈判来作出的。那个时期建立了所谓的国共两党委员会。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统一战线的协商机构。委员会中的中共代表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国民党的代表是陈立夫、张冲、康泽和刘健群。^②1937年9月初,通过了重新审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命令。此后,开始从监狱中释放共产党员。尽管在许多地区,在命令通过后仍在逮捕共产党员。

为了根据新的策略制定中共的方针及其具体任务,1937年8

① 见蒋介石:《抗战与重建:中国抗战六年期间文电(1937—1943)》,纽约1943年英文版,第20—21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27页。

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县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①会议讨论了确立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方针问题和实行持久战的方针问题。^②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也对会议作了总结。

毛泽东在报告中建议在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不受国民党的制约,并提出如下任务:(1)创建根据地;(2)在适当情况下不断消灭敌人;(3)与国民党军队(“友军”)配合作战,主要是在战略方面,而不是在战役上;(4)保存和扩大中共的军队;(5)争取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至于共产党军队的行动,那必须由党的决议来确定。^③

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表示赞成在保持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为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

会上还就中共的军事策略与国民党军队的配合行动、正规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另一些看法^④,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战争阶段自然会出现的问题。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除了提出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抗击侵略者的任务以外,还指出,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已开始倾向于实行抗战,但只实行‘片面抗战’,不愿让

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37页。洛川会议经过及决议详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第2册,第600—607页;《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1卷,上海1982年版,第200—205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冯怀璧等编,天津1984年版,第129—132页;《中国共产党历程》第1卷,第285—287页。

② 毛泽东早在1936年7月就提出了抗日战争持久性的思想,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下册,第644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1卷,第201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第2册,第601—602页。

人民群众参加”。此外，会议还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①：(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②

在当前中国的史学著述中，对洛川会议评价很高，认为它是中共历史上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制定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第一次会议。特别强调了党在游击战中独立自主策略的意义。这个策略实际上中共一直保持到与国民党合作结束。

1937年9月，八路军开始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八路军部队开赴前线是国共合作道路上的重要步骤。115师(师长林彪)部队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晋东北)歼灭了敌军一个旅。这是中国军队自战争爆发以来取得的第一次作战胜利。^③

在日本侵略者不断进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10月3日发出号召，组织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国际运动(第3号文件)。1937年10月10日，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第5号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共在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推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事业时期的行动计划。决议中说，必须通过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办法使中共在所有国统区的行动合法化，在各大城市出版合法的群众性报刊，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自己变成全国的政治因素，面向全国的劳动者，在全国主要城市建立自己的组织。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重新教育老干部和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1卷，第201—202页。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将这个文件以《抗日救国纲领》的名称在洛川会议前发表。

② 纲领全文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41—344页。

③ A. Я. 卡里亚金：《沿着陌生的道路前进——一个军事顾问的札记》，莫斯科1979年版，第57页。

选拔新干部。

决议还号召提高警惕,加强同托洛茨基分子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斗争。为了加强保卫中国的国际运动,决议建议中共与国民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中国其他一些组织,向国际工人组织、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一切反战反法西斯组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声援和援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1937年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派王明和康生回中国帮助中共中央实行新的方针。^①

在他们动身前夕,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第7号文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对中国来说,现在主要的是“溶入全民的战争,参与领导”。他还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口号只有一个:“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为了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占领者而进行必胜的战争”。令人注意的是斯大林的这种说法:“中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同外敌作战,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才会出现他们彼此之间要使用什么方式作战的问题。”

斯大林说,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那时就谁也战胜不了它,斯大林答应在飞机生产和坦克生产方面给予援助。在谈到八路军的问题时,他说,它应当在人数上大约增加9倍。

至于作战策略,斯大林考虑到八路军没有大炮,认为它的策略应该不是直接的进攻,而是吸引敌人深入,从敌后进攻。

鉴于中共准备在1938年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指

^① 在王明动身回中国前,季米特洛夫大概预见到了王明可能遇到的困难,嘱咐他说:“回到中国后,您应该同中国同志搞好关系,您不大了解中国的同志们。如果他们提出由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您不要接受这一建议。”见《苏联与中国革命》,北京1994年版,第446页。

示中共领导说,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理论上的争论是不适宜的,应把它放到晚些时候,放在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指出,现在谈不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正发展着”。

王明回到中国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193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团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第10号文件)。

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筹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两个决议都是12月13日通过的)。^①

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主题报告。当代的中国史学家说,报告人强调的是加强国共合作。王明认为,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应当着手建立以国民政府为基础的国防政府,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建立民主制度。因此,国共两党应该建立真正统一的指挥,应该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武装,统一的供给和统一的作战计划。两党必须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作战,相互帮助。

同时,王明批评了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方针。例如,他认为,在会议的决议中和工作中没有完全意识到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国防政府的作用,及其军队起到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他还认为,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反对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王明在报告中援引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03—404、405页。

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斯大林同志的意见”。^①

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前中共的迫切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首先是加强国共合作。张闻天还强调指出,在目前阶段,主要是实现“抗日第一”的口号,而民主和民生的要求应当服从这一口号。中共应该避免犯“左”倾病,对同盟者进行友善的批评,通过群众的压力促使它进步。张闻天实际上不指名地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说法表示不同意,指出必须把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起来,因为只靠游击战是不能战胜日本人的。

张闻天指出了由于许多党员没有深刻理解统一战线策略,党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而造成的中共工作的薄弱,并强调了为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斗争的必要性,因为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先决条件,他强调必须对共产党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国论著中说:在政治局内意见没有统一。许多人不加考虑地接受了王明的报告,因为他援引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12月11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就王明提到的所有问题捍卫了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方针。^②

中国史学家们还认为,在有些问题上,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没有统一的意见:“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调的问题上,即在全国人民的团结,国共两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共产党自身的团结上,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没有意见分歧。但是在

^①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1—652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1卷,第208—209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第142—143页;《俄共密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八次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哈尔滨1988年版,第497页。

如何实现抗日中的团结,如何加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这里就有分歧。至于保持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分歧在于如何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①

尽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对于一些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按其内容来说还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依据的。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就与会者发言中表述的不同意见展开讨论,也“没有就王明发表的意见提出看法。会后,中共中央继续工作,执行以前的政治路线”^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中共中央地区局:武汉的长江局(当时是中国的临时首都)和中共中央东南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到了武汉,领导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国史学家们的看法,他“在实际工作中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这也反映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从中国史学论著中可以得出,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为了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统一和团结,当时没有批评王明。

然而,根据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1937年)和1938年2月27日—3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他在武汉的实际活动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中共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现时情况。^③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8年3月作出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让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里进行会谈,“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统一战线状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并征求共产国际的指示”^④。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2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2—653页。

④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6页。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第18号文件)。这是抗日战争九个月以来中共向共产国际提交的第一份详细报告,说明中共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活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党尚未解决和面临的任務。

关于抗日战争九个月来的总结问题,任弼时说,中共中央认为,领土和城市的丧失只是暂时的损失和挫折。“谁战胜谁”的问题只能在持久战中决定。

谈到国共在统一战线中的合作问题,任弼时说,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发起的,早已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全国的影响和威望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任弼时承认,在两党的合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他把当时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立场概述如下:“国民党一方面表现得高傲自大,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可能夺取它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从而妨碍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任弼时向会议通报了蒋介石在1937年提出的一种合作方式:由国共两党成立一个共同的党,每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都可以参加这个共同的党。由两党选出对等数量的党员组成最高委员会,由他蒋介石任主席并享有最后决定权。两党的活动应服从最高委员会的决定。共产党不应与共产国际保持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要通过最高委员会来进行。中共拒绝了这一建议。

随后,蒋介石企图“吞并”共产党,建议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一个派别,但这个想法也被共产党拒绝了。

任弼时说,共产党不仅愿意在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合作,而且也愿意在战胜日本以后共同建设新中国。

还应指出,报告中一方面对国共双方的力量作了实际的对比,而两党的力量是无法相比的,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又要求

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

报告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报了 1937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扩大会议的决议。

报告的最后部分阐述了根据 1937 年 10 月 1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建议的精神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党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的领导。

就任弼时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 1938 年 6 月 10 日通过了三个文件（第 21、22、23 号文件），这三个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6 月 11 日会议上得到批准。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所作的决议》（第 23 号文件）中，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于中共在其今后活动中的领导工作极其重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请中共注意，在今后贯彻“这一正确路线”时，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第 21 号文件）中提出的任务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例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在政治上或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

中共面临着新的任务：在实行全面义务兵役制、建立新的军队和动员全民参战方面给予国民政府以积极的帮助；竭力促进国防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适应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

还指出，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有义务在贯彻孙中山的进步原则方面对国民党施加影响。

还提请中共注意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共产党的必要性。重复了 1937 年 10 月 1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的共产党的任务（第 5 号文件）：必须在全国领土上建立党组织，首先在大城市，在战略要地，在军事工业的工人中，在铁路员工中建立党组织，使共产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共产党必须建立地下组织。这是一项艰巨的、对于

共产党所处的工作条件来说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还号召中共“加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能力,制止想要孤立这两支军队的任何企图,发展与中国其他所有部队的亲善和友谊”。

在特区,共产党人必须进行组织民众反日斗争和地区民主化的工作,使这一地区成为全国民主政权的典范。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第22号文件)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反对法西斯总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切民主和平力量有必要和有义务来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第21号文件)中,对统一战线的状况作了过高的评价:“现在已经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实现整个国家政权和中国所有军队在蒋介石统领下的联合”。

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王稼祥召回中国,他在共产国际作为中共代表的工作由任弼时担任。7月初王稼祥离任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弼时,接见时指出,在中共中央内,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担当领导者的角色^①。季米特洛夫的这段话对于加强毛泽东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领导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不在计划时间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已经过去十年),而是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第六次全会。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58—659页。

中共中央扩大的第六次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①。他还作了总结^②。参加全会的大约40人。本卷编者除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外没有掌握其他发言人的文稿。

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这样一个论点：战争正在进入长期力量对抗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在敌后组织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方面，在敌后独立自主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全会考虑到北方建立根据地的初步结果，决定采取“巩固北方，发展华中”的方针。

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国民党限制群众运动，不愿采纳共同政治纲领的情况下，这一口号就意味着片面地服从蒋介石。实行这样的口号，那就是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口号是：既统一，又独立。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在领导游击战中，没有以公开的形式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一些正式文件和声明中，中共承认蒋介石的最高领导。但是在发展自己的军队，进行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中共是使蒋介石面临既成事实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谈到了许多重要问题。如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说：“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斗争的利益依然存在，因此在战争时期，如果不相应地解决民主和民生的问题，就不能动员民众去抗日。

① 毛泽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7—524页。

② 结论于1938年分两部分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和《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68年中文版第2卷第502—505、506—521页。

他还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的问题。“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①。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来的某种脱离的形式。

毛泽东在结论中谈到的一个论点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他还展开地论述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接着强调指出,“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③

全会就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决议(第25号文件),完全赞同政治局在报告涉及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全会的决议中还明确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必须长期合作的方针。

决议提出了整个中华民族“在目前时期”的15项具体而迫切的任务,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全会采取了全力扩大党的队伍的方针。同时要求在接纳新党员时提高警惕性。

全会决议中提出国共两党两种合作形式。中共认为六中全会提出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加入国民党和青年团的共产党员名单将交给国民党领导机构,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1968年中文版,第5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4页。

中国共产党将不靠吸收国民党员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来充实自己的队伍。提出的第二种合作形式是组建由两党各级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决定与两党合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这对改善两党关系和保证两党合作具有极重大的意义(第 25 号文件)。

然而,蒋介石没有接受任何一种合作形式,他担心会加强共产党的影响。

六中全会通过了改组中共中央长江局并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南方局的决议。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领导中原局的工作,由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工作^①。

中国史学家高度评价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会及其决议的意义,指出这些决议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方针,更加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②。

1937 至 1938 年,尽管国民党对中共不断挑起反共摩擦,但毕竟是统一战线相对积极发展的时期。1937 至 1938 年间,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还达成协议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建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在国统区出版和发行中共的报刊杂志。

1937 至 1938 年,蒋介石多半是在中共要求的影响下,采取了一些改组政府和军队的措施,以加强领导的集中制和有效性。他决定恢复军队中的政治部和部队中的政治代表。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主任,任命郭沫若为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了文学家和艺术家、工人和职员、教师和学生的抗日联合会和协会,出版了宣传全民抗日思想的杂志和小册子,还成立了到部队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 1 卷下册,第 662 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天津版,第 148 页。

② 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第 1 卷,第 219—220 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第 1 卷,武汉 1981 年版,第 143、145、147 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天津版,第 148 页。

演出的戏剧艺术团^①。

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举行的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部分地反映了中共关于建立民意机构的建议。大会决定成立协商机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让各党派代表参加。在各省和一些城市成立国民参政会分会。有七位中共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与建国纲领决议案》,明确了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承认“各种民众力量团结统一”对于总动员的意义。代表大会还通过了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将其作为国民党的后备力量。中共向代表大会发了贺电,其中谈到,上述《纲领》中所表述的方针是与中共提出的战时政治纲领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同时,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代表团在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就发表声明说,国民参政会还不是表达民意的机构。^②

1938年,国民党领导成立了开展游击活动的中央局。为培养相应的干部开办了短训班,聘请著名的共产党员军事首长作为教练员。

从1937年底起,八路军部队开始在敌人后方建立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1937至1938年,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省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在山东省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区。新四军在皖南、江苏省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1938年1月建立了晋冀豫地区的临时行政委员会,中共、国民党和一些爱国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该委员会。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区,建立了中共的党委会和党组织,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增加了。此后中共的根据地和武装部队继续得到发展。在1939至1940年间,根据中共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

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61—71页。

② 同上,第72—81页。

方针，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开始积极行动，反击在北方的“扫荡运动”，建立和扩大先是华中后是华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①。

在根据地进行了税制的改革(废除附加税，实行累进土地税，将税赋的重担加在有产阶层肩上)，降低了租金和高利贷利息。这一政策随着经验的积累并根据当地的条件不断加以完善和改变，但总的说来保证了中共得到广大农民阶层和乡村部分有产阶层的支持。^②

在这些年里，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许多大城市里的办事处和联络点在国统区中共党员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③。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办了中共的《新华日报》。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的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第32、36号文件)。

影响中国政治局势的内部因素是：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线；中共党员人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活动的武装力量增加；国民党分裂，表现在以国民党中执委副主席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领袖们公开转向日本。

由于中共武装力量人数的增长，国民党领导采取了竭力限制中共的发展及其影响扩大的方针，利用了各种思想运动和直接军事压力。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1938年1月21日至30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恶化了。全会很关注与中共的关系和统一战线：“实际上问题在于如何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同时减少中共在沦陷区的影响，削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人数。蒋介石在闭幕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正是谈的这一点。”^④全会以后，国民党领导制定了一系列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676—680、683—688、688—689页。

② 详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211—222页。

③ 《国共第二次合作》，北京1984年版对第292幅地图和第293、294幅照片的说明。

④ A. Я. 卡里亚金：《沿着陌生的道路——驻华军事顾问札记》，第287页。

针对共产党的文件(第43号文件)。1939年4月制定了秘密文件《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了军队的部署，以封锁特区，要求撤销特区政府，派国民党部队去华北以对抗共产党在敌后的影响。为了破坏中共的力量，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同上层干部进行谈判，对中下层干部进行残酷迫害，把年轻人吸引到国民党方面来。随后又发布了新的法规：《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和《运用保甲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①。

为了遏止这场运动的势头，中共代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39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②，其中第一次提出必须分清“真假三民主义”的论点，必须从真三民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反对假三民主义，强调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反对国民党想要把它变为反共旗帜的企图。

1939年国共两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由于国民党竭力不让共产党扩大敌后的根据地，在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间常常发生摩擦。1939年初起，蒋介石部队开始封锁特区。1939年春，在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之间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③。

1939年夏，两党部队在敌后活动的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如在山东和河北的一些地区。在河北、河南和湖南发生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联络站和后方机关的袭击事件。同年，国民党当局限制中共组织的活动，在国统区暴露的地下支部遭到破坏^④。结果，共产党以前的“团结和独立”的口号被新的“团结和斗争”的口号取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哈尔滨1981年版，第4卷，第606—609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海1985年版，第143页。

② 指1939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4—64页。

③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195页。

④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114页。

代,以前“以自卫方式的摩擦对摩擦”的方针开始变成“以摩擦防止摩擦”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利用中共负责人在莫斯科的机会,决定成立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其成员有莫尔德维诺夫(组长)、切贝金、徐泽芳、曾秀夫、切尔科夫、师哲、谢廖金、什维佐夫、林彪、王松、科甘、罗斯托夫斯基、程道南,任弼时作为顾问参加了研究小组(第41号文件)。

决定将小组工作集中在四个主要问题上:(1)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防止投降;(2)需要如何加强抗日战争;(3)需要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共;(4)如果国民党投降并与之分裂已成事实,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第47号文件)。

莫尔德维诺夫建议大家坦率地发表意见,不要害怕提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第53号文件)。

本卷收录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该小组的一组会议记录(第41、44、47、48、53、54号文件)。

在会上发言的有:1939年7月5日任弼时(第47号文件)和林彪(第48号文件),7月8日莫尔德维诺夫作了报告(第53号文件)和毛泽民(第54号文件)。

小组的工作以莫尔德维诺夫于1939年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便函的形式作了总结(第63号文件)。其中主要表述了作者的个人意见,对中共的一些行动进行了批评。本卷编者不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这份书面报告的反应。

但应该指出,小组的工作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能采取的唯一一种办法。

自1939年9月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向德国宣战以后,众所周知,联共(布)领导错误地认为这场战争是“双方的帝国主义战争”,并确认,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意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领导转达的这种估计(第68号文件),在一段时间里给中共对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态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亲英美派是与倾向于向日本投降的一派相对立的。结果是国民党内反对中共的所有主要派别都准备投降。汪精卫投向日本后,从1939年初起,中共在反对投降倾向的斗争中,广泛地使用了这样一种论点:反对共产党及其力量的行动,就是准备投降。

这些评价,以及对中共不断施加的压力(1939年底对特区加强封锁,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停止供饷)加强了党内和领导层内的反国民党情绪。

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的这一时刻,美国记者斯诺于1939年10月21日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对毛泽东的访谈录。其中谈到,毛泽东似乎说过:“目前在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地区,在行政事务方面不受制于蒋介石政府”,“在国民党独裁没有消灭、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民主政府取代它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第73号文件)

当这一消息传到共产国际的时候,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供访谈的确切内容。实际上这是提醒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不要发表这类谈话,因为它可能被曲解并用来破坏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第73、74、77号文件)

1939年11月12日至20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在全会上,就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问题本来是要使八路军增长的数量和它扩大的活动区域合法化。在报刊上发表的全会决议中对国共之间的相互关系只字未提。

当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成为直接危险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处在危急的转折关头。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中共,莫斯科需要详细的通报和对统一战线状况的分析。

鉴于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和定于1940年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者也应弄

清业已形成的局势。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第84号文件)，而在1940年1月17日和19日的会议上，主席团听取了他的报告，并听取和批准了就这一报告起草决议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第90号文件)。

在业已发表的部分报告中，周恩来谈到了统一战线的现状和特点，国共两党的关系和两党的政策，群众运动的状况等问题。

周恩来说，如果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得到增强，而中共的武装力量得到发展并给以积极的影响，这就“可能促使统一战线的进展并具有决定性意义”，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

国民党上层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但在战争过程中，在有些地方，在地方政府的成员中出现了进步人士和年轻干部，他们不顾保守派的反对，亲自组织群众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

蒋介石主张与苏联结盟，但反对共产主义。他同意与中共结盟，但要中共以国民党的精神“加以改造”；他不承认与中共的合作，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向他所理解的三民主义屈膝投降，尽管在战争过程中，他实际上不得不承认特区的存在和八路军的扩大。

周恩来也报告了国民党对中共发展的态度的详细情况。“主要是国民党一心想消灭中共，但因为这实际上是不可实现的，所以蒋介石提出了改造中共的理论。而实际上，他们(国民党人)采取了两种办法：限制和阻止中共的发展，企图缩小中共活动的地区，或者彻底根除中共。”

中共承认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并以此出发“基本上”支持他，力求对他施加影响，通过国民参政会及其周围的进步人士提出各种建议。但坚决拒绝他对中共提出的无理要求和想要对中共进行迫害和施加压力的企图。

报告的内容令人信服地证明：两年半以来，中共为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斗争，用周恩来的话说，统一战线“正处在矛盾的发展中”和“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中”，党得到了加强，数

量上增加了(根据报告,近两年来几乎增加了六倍,到1939年7月,党员有498115人)。同时,中共在许多大城市恢复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党组织,尽管在敌人占领的城市里工作很困难,但掌握了与国民党进行复杂的合作的策略。

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在华北八路军活动的地区以及在新四军的根据地和活动的地区得到了发展,主要是靠农民,他们在党内构成了绝大多数。报告人指出,在特区机关,在短训班以及在地方党委下属的党校中,在培养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说“党需要的不是几百,不是几千,而是成千上万的新干部”。报告中指出,在党的工作中,最大的不足是对新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能令人满意。

八路军人数增加了(在建立初期大约是5万人,到1939年初增加了5倍),新四军也有了很大发展(1938年初军内只有4000人,到1939年8月已达3万人)。敌后游击根据地的数目也增加了。

报告中指出了党的工作中的主要不足:在组织广大群众方面,中共还没有广泛的基础;在一些党员中间还没有彻底消除对抗日统一战线意义的理解,结果在他们的行动中发生同国民党的不必要的摩擦。

周恩来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周围开展了广泛的游击运动,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工农青妇的群众性组织。同时,在敌人占领的城市里,工作做得不够。这里的主要障碍是国民党的政策。只要国民党一发现在社会组织中有共产党员,他们就将其解散。

在战争条件下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妨碍了职工运动的发展。只有在特区才有4.2万人的工会组织。在根据地有工人“救国”组织。

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一切服从

抗战，抗战高于一切。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目前，国民党采取的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改良的三民主义。这样民权就变成了一党治国的制度，并被用来镇压其他政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持久战，反对投降和分裂，为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中共制定了在统一战线中的战略方针：反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投降派；推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进步；支持进步势力以压制保守势力；发展共产党；争取民主化和改善民生；在边区建立民主管理和改善民生的示范点。

周恩来在谈到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时，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讨论至今尚未解决。

应该指出，在周恩来的报告中，也和任弼时的报告（第 18 号文件）中一样，都没有提到中共在游击战中“独立自主”的论点。

由于报告中提出一些重大问题，它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内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940 年 1 月 29 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第 92 号文件），附上了周恩来报告的简要内容。信中谈到：“由于中国的局势和共产党特别复杂的斗争条件，中共中央需要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上得到建议：

（1）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什么样的措施。

（2）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采取迫害共产党、消灭特区和八路军的政策，为了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什么样的措施。”

季米特洛夫对斯大林说，这些问题正在由主席团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和中共代表一起进行讨论，“恳请”斯大林作出建议和指示。

但是，斯大林因工作繁忙未能阅读给他送去的报告，也没有就中国问题接见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在电话交谈中对季米特洛夫

说：“您自己决定吧，我们会给予援助的。”这里说的是给中共拨去3000万美元。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了帮助中共加强内部，作出了两项对中共来说重要的决定，即2月8日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定(第95号文件)和2月26日关于中共中央下设中央监察委员会合理性的决定(第103号文件)。

而在1940年3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了(第112号文件)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的五个文件(第106、107、108、109、111号文件)。在第一个文件，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它在中日战争期间在动员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给予了高度评价。文件还指出，最近时期中共在发展自己队伍方面取得了成绩，成为了国内巨大的政治因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建议共产国际各支部开展“最广泛的”运动，来声援和援助中国人民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以《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基本政治方针》为标题的文件(第107号文件)主要阐述了中共在目前的危急和转折时期的任务，这个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已成为主要的直接的危险，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

文件指出，“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地出现了”最大的投降危险，不是公开的叛徒，而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以口头上忠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作掩饰，实际上从内部破坏统一战线，唆使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之间制造人为的摩擦和冲突，竭力企图消灭边区和解散八路军。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来消除这一危险。

在这个文件中，主要的政治方针是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共

中央 1940 年 1 月 6 日给周恩来和任弼时的关于用国民党军队反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电报(第 87 号文件)制定的,实际上也包含对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答复(第 92 号文件)。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来制止投降。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为了尽快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现存的争议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议首先应以抗日斗争的利益为准并顾及到 1937 年的协议,因为该协议是国共两党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就此共产党声明,它愿从自己方面尽一切必要努力消除误会和冲突,与国民党军队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但中共认为,不能接受导致消灭和孤立边区及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条件。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赞成用防止分裂的方针来对抗国民党所采取的危害抗日统一战线生存的反共行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第 108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在中国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决议(第 109 号文件)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动员中国青年的决议(第 111 号文件)把在基本政治方针中所阐述的论点具体化了。

季米特洛夫在 1940 年 3 月 17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告知中共中央,“周恩来会亲自向你们通报我们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一切情况。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完全独立地作出最后决定。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速告我们并说明理由……”(第 113 号文件)。

中共于 1940 年 5 月 10 日答复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由周恩来和陈林[任弼时]向我们转达的你们对政治、组织和其他问题的所有指示。只是对个别一些问题,如对新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议,我们觉得尚需仔细考虑”(第 118 号文件)。

1940 年是国共关系上发生一系列矛盾事件的一年,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两党关系的急剧紧张。

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山西省阎锡山的“旧军”和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第88号文件)。“旧军”支持国民党军队,“新军”则支持八路军部队。到1940年春,在阎锡山让给“新军”晋西南一些地区的基础上,冲突得到了解决(第110号文件)。在中国史学界,这次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

尽管中央政府军和八路军之间冲突不断,倾向于继续抗日的蒋介石,特别是日本人在南京宣布成立汪精卫傀儡政府(1940年3月)以后,不愿把与共产党的关系弄到很大冲突的地步。

1940年6月初,周恩来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重庆,为调解国共之间争端进行谈判。他向中央政府提交了所谓的1940年《六月建议》,其基本点是建议国共之间举行谈判。^①

经过谈判,1940年7月16日拟定了协议,据此协议国民党承认由18个县(中共要求由23个县)组成的特区;确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范围(河北、察哈尔、山东北部和山西北部,即几乎整个华北)。允许八路军拥有六个师和几个团,新四军拥有两个师。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国共两党接近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②。但在谈判和签署协议之后,从1940年6月底到10月,国民党江苏省部队和新四军、八路军在敌后不断发生冲突,江苏省省长企图将新四军、八路军排挤出省,但遭到失败。

周恩来从重庆回来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目前不可能向日本投降;由于出现英日协议^③和法日协议^④,以及中国西南方面对外联系的中断,蒋介石试图与苏联接近,因为只有得到苏联的飞机和武器,才有可能继续抗战(第125号文件)。

① 详见 A. C. 潘友新:《大使日记》(1939—1944)。

② 见《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198页。

③ 1940年7月17日,英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声明关闭滇缅公路交通。

④ 1937年秋,法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停止通过印度支那向中国运送武器。

“百团大战”(8月20日—12月5日)是1940年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八路军指挥部(首先是朱德和彭德怀)的方针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积极行动。在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和贺龙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有115个团,30万到40万人参加了这次战役。这是1945年8月以前,八路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一次规模如此巨大的战役。这次战役的进程,它的结局和意义,各个阶段中共领导对它的评价,在史学界都有广泛的阐述。^①

从1940年10月下旬至1941年4月,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要爆发危机的问题,几乎使抗日统一战线濒临破裂,这从本卷发表的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为一方向以季米特洛夫为另一方的频繁的电报往来中可以看出(第133、134、135、138、142、145、146、151、152、153、156号文件)。

危机的加剧是从1940年10月19日发表何应钦和白崇禧的电报开始,然后12月8日又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部提出要求,让其部队撤到黄河以北。^②

1940年10月29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认为国共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派面目,并与国民党决裂。周恩来把电报的内容给苏联大使潘友新看了。大使回答说,他本人“不同意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决裂的决定”^③。1940年11月7日,毛泽东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发去一份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准备投降,最近授意发起广泛的反共活动”。他要求将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在华中和山东省撤到华北——河北、察哈尔、山

① 据彭德怀回忆,在战役开始前他没有向中央提出要求给予指示。只是在战役之后他才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得到赞同。见彭德怀:《元帅回忆录》,第324页。“百团大战”后来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目前中国史学界认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724—725页。

③ A. C. 潘友新:《大使日记(1939—1944)》,第113页。

西。“如果他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就要开战,并围剿我们”(第135号文件)。

据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防御应采取先发制人的“反攻”行动,“以粉碎他(蒋介石)的围剿部队和设防地区”。中共领导的军事计划是,留下大部分部队(约35万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与日本部队作战,拿出部分辅助部队和突击部队(约15万人)在河南和甘肃省打击敌围剿后方(第135号文件)。

季米特洛夫在1940年11月15日的电报中写道,“你们做好准备是应该的,但请毛泽东等一等再作最后决定”(第136号文件)。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商量后于11月23日给毛泽东作出一个详尽的答复。莫斯科不支持这个计划。在电报中建议“尽量争取更多的时间。特别重要的是,你们无论如何不能首先对围剿军发起攻势,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战统一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他想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约的企图辩解”。同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没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已“最终决定向日本人投降”(第138号文件)。

1941年1月6日至14日,在中共和国民党武装力量之间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冲突,即闻名于世的新四军皖南事变(或称“第二次反共浪潮”),这次事件是有可能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实际危险。事件的“实质”是:当新四军约一万人的纵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长江以南地区转移到以北地区时,被包围并被消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逮捕而受审,副军长项英牺牲(据有些材料说,他是被自己的卫士杀死的)^①。在1月18日的电报中谈到,“在德意日缔结同

^① 关于新四军领导人被害事件的材料,详见A. C. 潘友新:《大使日记(1939—1944):中国》第116—120、122—126页;A. M. 列多夫斯基:《苏联和斯大林与中国之命运(1937—1952年事件参与者提供的材料和证据)》,莫斯科1999年版,第253—254页。《答周恩来和叶剑英问》,见A. C. 潘友新:《大使日记(1939—1944):中国》。

盟(《反共产国际同盟》)后,日美之间斗争加剧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到了极点)。(第146号文件)。

1941年1月1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拜访了苏联全权代表潘友新。他们说,接到延安的指示,向苏联大使和苏联总顾问朱可夫了解他们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他们还说,中共中央指示要发表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信,并命令中共的所有武装力量在10天内奋起反击进攻新四军将领们的军队^①。1941年1月14日和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向季米特洛夫报告了新四军军部纵队在皖南被歼灭的情况(第145、146号文件)。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发了“亲启”的重要信息,说蒋介石请莫斯科把皖南事件看作是“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传”。这里,蒋介石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季米特洛夫请毛泽东告知中央政府对八路军和特区的行动以及中共将采取的措施(第148号文件)。

然而,从中共中央1941年1月21日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第149号文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绝没有此种善意。电报上说,蒋介石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将叶挺交由法庭审判。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蒋介石决定破坏国共合作”的证据。电报上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将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政治上,中共准备“彻底揭露蒋介石在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方面的反革命阴谋”。

在军事上,中共决定“目前暂时进行防御战,今后如有必要将采取反攻步骤,向甘肃和四川两省突破”。在电报上说到,蒋介石

^①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200—201页。

的计划是要对中共的军队予以各个击破,先是新四军,然后是八路军。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认为一旦有必要,要关闭重庆、西安、洛阳和兰州的四个八路军办事处。这项措施是由下列原因引起的: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桂林办事处已被驱逐,其他地方的办事处也已受到蒋介石的重重压力。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转入地下。

电报中还请告知中共中央,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什么政策,并转告斯大林,请他权衡中国的局势,“能否在今年秋冬或者明年春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

194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说“自从国民党发动新四军事件以来,到处都在逮捕共产党人”(第150号文件)。

奉苏联政府之命,苏联驻重庆大使潘友新于1941年1月25日拜访了蒋介石,并对他说:苏联政府很关心一个问题,他蒋介石是否还继续同新四军和八路军进行武装斗争,也就是说他是否发动内战?同时潘看到,进攻新四军会削弱中国人的力量,而这有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于中国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蒋介石对潘友新的说法感到“非常紧张”。潘友新不得不再三重复自己的问题。最后,蒋介石说,他将尽他的一切努力来和平地解决事件,不让内战爆发,并请就此报告苏联政府^①。

但在这些事件以后,即1941年1月底至2月初,毛泽东没有相信蒋介石。在他1941年1月29日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谈到,共产党拟从让步的策略转向“全面抗击蒋介石”的策略。今后,要么是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而中共不应害怕这种决裂,因为这是蒋介石挑起的(第151号文件),也就是说中共中央的出发点是,在执行这一策略的过程中,冲突的任何一种结局,缓

^① A. C. 潘友新:《大使日记(1939—1944)》,第126—127页。

和或者加重甚至破裂国共两党的关系都不会导致共产党失败的局面。毛泽东将这一策略报告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从事件开始到统一的最终破裂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来作全面的准备，使破裂的结果对我们有利。同时，我们在想方设法拖延彻底破裂的时间。但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毛泽东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意见，在彻底破裂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第 152 号文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人们认为蒋介石不会向日本投降，而共产党必须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分裂。例如，季米特洛夫 1 月 4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份电报不知什么原因于 1941 年 2 月 4 日才发出，电报中说：“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请重新考虑你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将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第 153 号文件）。

看来，在莫斯科对上述问题的意见的影响下，毛泽东稍稍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41 年 2 月 13 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并提出了中共新的立场。这一立场的实质是，中共不怕分裂，坚持共产党提出的善后办法 12 条，扩大宣传，决不让步。但是，同时保持与蒋介石的协商，而在军事方面采取防御策略（第 156 号文件）。

中共发表的善后办法 12 条（第 156 号文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中共对支持 12 条的许多小党派的代表们做了工作。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进攻立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结果，蒋介石“采取了表示他可以作出让步的态度”，请周恩来寻找平息事件的方法。2 月 1 日，蒋介石派飞机送叶剑英去延安转达他关于平息事件的意见（第 156 号文件）。

毛泽东认为，反共浪潮似乎开始趋于缓和（第 167 号文件）。具体证明这一点的是，1941 年 3 月 14 日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谈。

会谈的目的是“缓和气氛,同时也可能解决一些小的问题,因为解决大的问题还不到时候”(第166号文件)。

1941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作出政治指示:尽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将停止对共产党的进攻,但仍要“坚持我们的进攻行动,直到我们的初步要求被确实承认:扩充我们的部队,承认我军的活动区域,停止向《新华日报》施压,停止在跟踪途中拘捕[我们的]人员”(第169号文件)。

1941年4至5月,中共领导对半年来中国局势的发展作了总结,对国共两党“现时的”状况作了评估,并考虑到蒋介石的“让步”制定了对国民党的策略,就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进行了详细的通报(第168、174号文件)。在这里,共产国际没有干预中共在国共两党关系新阶段上的策略,只是担心不抵抗日本人的进攻(第175号文件)。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侵犯苏联。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了。苏联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场战争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解放性质。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新阶段的开始。

德国人对莫斯科的进攻迫使苏联领导人于1941年10月中旬紧急将重要的机关和组织撤离首都。10月15日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撤到了乌法,一部分撤到了古比雪夫(今萨马拉),季米特洛夫本人也在那里。德国人在莫斯科近郊被击溃,并且前线形势稳定后,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大部分书记及其亲密助手才得以于1942年3月回到莫斯科,而很大一部分机关仍留在乌法,直到1943年夏天。^①

自从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开始直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解散,联共(布)领导要求共产国际开展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① 《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部,1941年6月22日以后,第23—26页。

组织欧洲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①以便把人类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出来。共产国际向反法西斯战略，向工人统一战线和广泛民族阵线的转变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也与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相适应^②。

在法西斯德国向苏联进攻的当天，季米特洛夫就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说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提出了奋起反对中国反动军阀的任何反苏计划，“在国际统一斗争战线的旗帜下开展群众运动，保卫中国，保卫受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保卫苏联”的任务（第 176 号文件）。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一些措施，于 6 月 23 日发表了《关于反对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指示信（第 177 号文件）。其中向全国范围内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项主要任务：1.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2. 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各种反苏反共活动，必须坚决反抗；3.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尽管在苏德战线上苏联的形势极其困难，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 1943 年 7 月 3 日通过决议，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00 万美元，用来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第 180 号文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项援助是对中共中央 1941 年 5 月 16 日请求的答复（第 172 号文件）。

关于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在中国（以及在西方）史学界往往与莫斯科给国民党的援助加以比较。实际上，苏联在抗日战争中援助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中国人民。

①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 18 页。

② 《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 14 页。

本卷收录了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战争时期给中国共产党经费资助的一些文件(第 65、126、140、157、180、198、202、217 号文件)。根据本卷公布的材料,在 1937、1938、1940 和 1941 年,中共总共得到 3852394 美元的资助^①。这是多还是少呢?根据当时的情况,这项援助不能完全满足中共中央在党和军队开支上的需求,但它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除了苏联给予中共的资助以外,本卷还有一些关于党得到各种器材的材料(第 28、57、69、94、116、124、157、173、202 号等文件)。

苏联对中共一项不小的援助还表现在,1937 年在乌鲁木齐建立军校,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到 1939 年 10 月在该校学习的学生有 400 多人。那里成立了炮兵班、航空兵班、装甲兵班和驾驶员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第 70 号文件),由苏联专家授课。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和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下的任务,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逐渐有所改变。1941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来,中共避免与国民党摩擦,“在这个时期,我军与中央政府军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降到了最低限度。这个时期是全年最平静的时期”(第 190 号文件)。

总的说来,从 1941 年秋到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第 285 号文件),国共之间在统一战线中的关系上,依然是“紧张缓解”时期被紧张时期所取代,但没有到发生危机的地步。

1941 年 6 月和 9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领导向中共中央发出呼吁,请求在苏日战争爆发时派正规军和游击队去南满作战。

1941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答复苏联领导的请求。电报中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坚决用一切可能的办法

^① 根据中国史学家杨奎松的统计,共产国际和苏联在 1937、1938、1940 和 1941 年给中共的援助是 350 万美元(《中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 232、264、265、266 页)。

援助红军的斗争。但由于敌人占领华北已经四年,在大城市、铁路线、矿区等地修筑了大型工事,敌人的技术装备比我们优越,而我们的人力、物力、活动区域、弹药等面临耗竭,情况日益困难。因此,一旦日本进攻苏联配合作战的意義不会很大”。电报中接着谈到一些想法:“如果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牺牲采取行动,不排除出现这种可能性:我们会被击溃,长期不能坚持敌后的游击基地。这种行动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巩固敌后的游击基地,对日寇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还要和日本占领者打持久战,以赢得时间。电报中实际上还包含一项要求:“一旦我们从弹药、机枪、大炮和炸药方面得到充实,那么我们行动的效果就会大得多”。

电报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决定对否?”“还请向苏联国防委员会转告我们的意见”(第 186 号文件)。

在评估中共上述立场时,应该考虑到,1941 至 1942 年间,日本指挥部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消灭中共根据地的进攻行动。结果是:1941 至 1942 年间,八路军人数从 40 万削减到 30 万,新四军人数从 13.5 万削减到 11 万,抗日根据地的居民削减了一半,从 1940 年 1 亿人减少到 1942 年底的 5000 万人。朱德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这是在战争时期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来说最困难的形势”^①。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飞机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1941 年 12 月美国参加对日作战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状况和财政状况。早在 1941 年,当美日关系尖锐化时,美国向中国提供了 1 亿美元^②的贷款。

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形成,美国开始更加关注中国,要求中国积

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 191 页。

② A. N. 杨:《中国与外援(1937—1945)》,剑桥 1963 年版,第 56 页。

极与日本作战。1942年3月,签订了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的协议。在中国的西南部为美国空军建造了机场。美国的飞机、飞行员和技术装备来到中国。同年,美军分队开进中国领土^①。租借协定通用于中国。

美国在中国存在的加强体现在国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相互关系的相对稳定上。在华的美国代表们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消极态度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国共之间的冲突,更不用说内战,会削弱国民党军队及其进行抗日战争的能力。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情况。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由于中国政府的缘故,苏中关系逐渐恶化。从1942年年底起,国民党当局停止了通过新疆与苏联的经济联系。苏联顾问们的处境极端困难,他们的活动遭到了国民党指挥部的阻挠。苏联飞行员早在1941年就已回国。1942年3月,苏联政府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从中国召回苏联顾问^②。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

1942年5至7月间,共产国际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通报:周恩来和苏联驻重庆大使潘友新的电报。1942年5月,周恩来报告了近三个月来蒋介石加强反共措施的情况:在报刊上加强反共斗争,对共产党人进行跟踪和监视,对中共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逮捕共产党员(在成都,四川东部,云南省,袭击重庆的党组织)。共青团的办事处已被关闭。在军事方面,进攻湖北东部的新四军。胡宗南的军队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潘友新在电报中也谈到,国民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反共宣传,政府军在中国西北部集中大批兵力,可能在适当的时候被国民党用来武力压迫中共,等等。潘友新在报告中指出了周恩来的错误行为,说“周恩来(可能还有中共的另一

①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205页。

② 《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205页。

些领导人)不是去巩固中国的统一战线,同蒋介石接近,而是去恶化同他的关系。因此,蒋介石……已经有7个月没有接见他了。”潘友新还指出,完全不能排除,周恩来一直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的(第234号文件)。

1942年6月15日,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说了自己的意见,“目前的局势绝对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第235号文件)。形势很快得到了扭转(第237、244号文件)。1942年7月21日,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依毛泽东看来,其原因是英美苏之间签订的协议^①,中国人民经受的困难和与中共中央的协商政策。

本卷收录了1938年、1940至1942年间有关新疆督办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大约20个文件。这是与新疆在中国抗日战争年代起着重要战略作用有关的。苏联给中国的军事供应通道是经过新疆的。此外,新疆也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重要通道。在乌鲁木齐有中共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人在盛世才的一些行政机关中工作,因为盛世才实行的是不受重庆制约的亲苏和亲共的政策。

然而,在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盛世才开始改变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苏联工作人员的政策,开始迫害和逮捕共产党人。本卷收录了中共中央和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疆撤离到苏联问题的来往电报(第238、239、240、242、251—255号文件)。

蒋介石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改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实行这一政策的很重要原因是美国 and 英国当时反对中国打

^① 指的是1942年5月26日苏联和英国之间签订的关于联合作战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同盟者的条约及关于战后合作互助的条约和1942年7月11日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签订的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的原则的协议。

内战的立场,1942年8月18日,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他打算去西安,希望在那里会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就此问题征询季米特洛夫的意见(第248号文件)。在共产国际内,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私人会见和谈判是“很需要的”(第249号文件)。在重庆的周恩来则认为,会见为时过早,最好在谈判初期阶段由林彪或朱德来进行,为以后的谈判铺平道路(第250号文件)。

从1942年10月6日至11月下旬到达重庆的林彪同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在内,进行了一系列会见(第262号文件)。如果谈判取得成功,毛泽东打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第266号文件)。

1942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同林彪的会谈中说:“我很关心中共问题的解决”(第267号文件)。这种关心反映在国民党十中全会关于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决议中(第263、264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决议的评价包含在中共中央发给地方组织并于1942年12月28日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第268号文件)。根据中共中央的评价,国民党十中全会决议谈到了建立国共两党正常关系的愿望,指出目前形势开始好转(第268号文件)。

1941年至1943年,中共党内开展整顿党风、党的工作和党的文艺的运动^①。正如中共中央说明的,整风运动是要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旨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今后更加深入地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第291号文件)”。

早在1940年,原计划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在1945年召开)的代表们到了延安。他们都参加了“整风”的学习。实际

^① 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813—830、831—847、849—880页。

上,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解决了中共在承认毛泽东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团结的任务。在当今,中国史学界,对整风运动的成果评价很高,认为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中国共产党^①。

共产国际得到情报,说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在特区的共产党领导层中出现了紧张的局面(第280号文件)。然而,共产国际认为这场运动是中共的内部事务,并没有加以干预。

共产国际得知王明在延安的困难处境及其病情后,季米特洛夫于1943年1月18日询问了王明的情况(本卷编者不了解此文件),毛泽东在1943年1月30日答复了季米特洛夫的询问,他第一次对王明的政治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毛泽东写道,自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就“在政治和组织方面采取了与[中共]中央相对抗的立场”(第270号文件)。与此同时,王明仍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本卷收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与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②,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提议,关于中共中央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解散共产国际提议的决定(第291号文件)等问题的来往电报。

在中共中央1943年5月26日的决定中,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写

① 关于这一问题,详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第788页;《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1卷,第387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天津中文版第174页。

②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第一次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是斯大林在1941年4月20至22日期间。4月21日,斯大林在讨论时提出“关于在近期内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党领导机关的活动,给予各国共产党完全独立,使之变成该国真正民族性共产党”的问题。在1943年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讨论时斯大林说:“在共产国际成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并认为我们可以领导各国的运动。这是我们的错误”,见《俄共(布)、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文件集(1919—1943)》,第812—813页。

道：“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决定对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包括六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援助，作了应有的评价：“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

在中共中央的决定中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文件中指出，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团没有再干预中共的组织事务。

中共中央的决定最后确信，尽管在党的前进道路上存在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完成摆在党面前的任务。

共产国际是在红军取得标志着卫国战争出现转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美国军队在夺取太平洋诸岛的斗争中取得头几次大的胜利的情况下解散的。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开始坚定这样的看法：摧毁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作用将属于苏联和美国。因此确定了这样的方针：避免进行大的战役，为即将到来的为中国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积蓄力量。

从总体上评估该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作用时，可以说它们在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的一贯立场对于抗击侵略者的事业是富有成效的，对于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只要举出以下事实就足以说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作用：1940年底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阻止了中共领导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冒险主义计划；1941年1月，和平解决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尖锐冲突，这些冲突都孕育着双方“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这既会给抗战事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也会给中共及其军队造成悲惨的结果。

毫无疑问，维护统一战线和继续抗击日本侵略是符合苏联的民族利益的。但是，苏联的民族利益在这个时期也是与中国的民

族利益、与中共的利益相一致的。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 1990 年)编辑出版的。有些文件因篇幅很大不是全文发表。在发表文件时使用了现代的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一些城市和县城的传统名称。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惯用的并收入词典的缩写(如党委、师长、政治机关等的缩写)。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历史学博士、教授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历史学博士 A. И. 卡尔图诺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教授 M. Я.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 A. Л. 霍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H. Л. 马马耶娃,哲学副博士 Л. 格拉韦娃,高级研究员 A. Л. 韦尔钦柯,以及马贵凡教授(北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 Л. A. 卡尔洛娃和 E. E. 基里洛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术信息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主任馆员 B. Л. 茹拉弗廖娃和高级馆员 Л. B. 勃柳姆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图书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对本卷工作提供的帮助。

本卷前言由 A. И. 卡尔图诺娃和 M. Л. 季塔连科撰写, A. M. 格里戈里耶夫参加。书目索引由 A. И. 卡尔图诺娃和 K. B. 舍维廖夫编纂。人名索引由历史学副博士 И. H. 索特尼科娃编纂, B. H. 谢契林娜和安东诺夫参加。

高级研究员 H.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E. K.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Н.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А. 图莉娜。

本卷责任编辑 А. И. 卡尔图诺娃。本卷工作副领导人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责任秘书 Н.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 言	1
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	1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179(A)号记录(摘录)(1937年8月10日)	5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99(A)号记录(1937年10月3日)	6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204(B)号记录(1937年10月10日)	8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书记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937年10月10日)	9
6. 王明和康生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10月21日)	12
7. 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简要记录(1937年11月11日)	13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1937年11月15日)	16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216(A)号记录(摘录)(1937年9月21日)	17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1937年12月12日)	19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6 号记录(摘录)
(1937 年 12 月 12 日) 20
12. 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代表参加国防委员会一事
给斯大林的信(1938 年 1 月 9 日) 21
13.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谈话的
简要记录(1938 年 2 月 2 日) 22
14.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
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 年 2 月 2 日) 28
15. 安德里阿诺夫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
(1938 年 2 月 3 日) 31
1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王稼祥和邓发的电报
(1938 年 2 月 4 日) 38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8 年 3 月 23 日) 40
18.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
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
(1938 年 5 月 8 日) 41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 22 号记录
(摘录)(1938 年 5 月 17 日) 87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24
(A)号记录(1938 年 6 月 11 日) 88
2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1938 年 6 月 11 日) 90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
声明的决议(1938 年 6 月 11 日) 94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
报告通过的决议
(1938 年 6 月 11 日) 97

-
24.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
电报(1938年11月5日) 102
 25. 关于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
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1938年11月6日) ... 104
 26.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中国西部)总领事馆
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12月9日) 114
 27.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负责人
奥夫季延科谈话记录
(1938年12月21日)..... 118
 28.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9年1月8日)..... 122
 29. 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3月5日)..... 123
 30.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13日) 124
 31.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3月17日) 125
 32.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27日) 126
 33.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28日) 128
 34.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4月2日)..... 130
 3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4月7日)..... 131
 36.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5月7日)..... 132
 37.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
电报(1939年5月17日) 134
 38.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5月21日) 136
 39. 季米特洛夫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5月21日) 137
 40.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5月21日) 138

41. 古利亚耶夫给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报告
(1939年5月23日) 140
42.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
电报(1939年5月25日) 142
4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6月4日)..... 143
44. 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
(1939年6月5日)..... 146
4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6月24日) 149
4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
电报(1939年6月25日) 151
47.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第二号记录(摘录)
(1939年7月5日)..... 153
48. 林彪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9年7月5日)..... 178
4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1939年7月5日)..... 191
5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7月6日)..... 192
51. 林彪与马明方的谈话记录(1939年7月6日)..... 193
52.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7月7日)..... 201
53. 中国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1939年7月8日)..... 202
54. 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发言的
简要记录(1939年7月8日)..... 225
55.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7月15日) 237
5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1939年7月17—30日) 238

-
57.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7月28日) 243
58.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8月1日)..... 244
5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8月2日)..... 245
6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8月7日)..... 246
6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8月11日) 247
62.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
(1939年8月18日) 248
63.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给
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19日) 250
64. 毛泽民关于中共党员人数的书面报告
(1939年8月20日) 277
65. 普罗斯库洛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8月22日) 280
66. 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9月8日)..... 281
6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9月8日)..... 283
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9月8日)..... 284
6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9月21日) 286
7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10月3日) 287

7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0月8日)	289
72.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10月12日)	290
73.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 (1939年11月10日)	291
74. 莫尔德维诺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11月13日)	292
7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1月15日)	293
76.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1月16日)	294
7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9年11月21日)	295
78.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 (1939年11月26日)	296
7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7日)	297
8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7日)	298
81.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15日)	299
82.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 (1939年12月15日)	300
83.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12月21日)	301
84.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 中国问题的报告(摘录)(1939年12月29日)	302

-
8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31日)..... 342
86. 古利亚耶夫和莫尔德维诺夫关于组织对中国的
医疗援助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
(1939年12月) 343

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①

1937年8月10日于莫斯科

季米特洛夫：王明^②同志的报告有点鼓动性，并且是乐观的。他深知，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党的处境是十分严峻的。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交谈过，因为我是较直接管中国党的。

你们可知道近两年来发生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红军的领导者，正在作出根本性的转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任何一个支部处于这种状况并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几年间对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作出如此根本性的转变。它曾为建立中国的苏维埃和苏区而斗争，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军队，并为苏维埃化而从蒋介石军队中夺取了部分军队，等等。

党的干部，党的经费，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100%，也可以说是95%集中在这些苏区的。在反对南京的武装斗争中，对干部进行了教育，干部成长起来了，那是一批优秀的干部，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

① 文件已发表。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版，第274—277页。

② 原名陈绍禹。报告的基本内容和对其讨论的结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已有表述。见《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1937年第17期；《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7年第8期。

但此时需要在党的政策上,党的策略上,从这一发展方向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所以,正是这些干部,不是另一个党,不是另一些新人,而正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必须实行另一种政策。

这一政策是否正确呢?是正确的。它的实施是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①总路线的,是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的。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必须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保障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而在这方面党应该(它基本上也是这么做了)转到不是为争取中国苏维埃化而斗争的立场上,而是为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的立场上。

而现在正在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对话,进行谈判。我们党对此已做好准备,并已经着手进行切实改造,把苏维埃地区从苏区改建成民主区,把那儿的苏维埃政府改组为特区政府,把红军改成不是苏维埃的红军,而是全国反帝军队的一部分,等等。

由此对我们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中国党产生很大的困难和危险,这就是蒋介石的手腕和权术,是他的包围策略。不难设想,在我们党的面前会出现怎样的危险。这里需要援助,即人力援助,从内部加强中国干部。要帮助中国共产党,使它能够在国统区组织自己的力量,加强它在国统区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要知道,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的比例很小。就是在党内这一比例也不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国的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政治派别的影响之下,以便共产党不仅能够依靠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能以某种形式依靠国统区以及上海、广州和中国其他中心大城市的工人

^① 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

阶级。

这样的干部在国外有。他们可以帮助党。特别重要的是向华北输送干部。这是应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可能更加详细一些地分析研究中国党的文件,则还可以指出一些方针,含有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的危险性,并可能导致某种涣散。这里需要纠正某些东西。我们从这里纠正的可能性十分有限。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中央本身也需要帮助。尤其是在战争进行的时候,而它现在在进行,将来也会进行。这不是仅仅以侵占华北而告终的一个插曲,一个事件。不是。

王明同志在这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即使在这方面有一段喘息时间,那么这次侵占也意味着为日本军阀在华的进一步进攻加强了阵地,更不要说针对苏联的前哨阵地了。

关于党中央,它的组成人员,它的机构以及它周围的人还能否进行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这里确实需要赶紧尽一切可能来加强党的领导,保护党中央的积极分子,在党中央与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将和中国同志一起在小委员会上单独讨论。应该制定具体的建议,但不要抱太乐观的态度。情况是不错的,但困难要注意到,要考虑到,而不要把希望建筑在沙堆上。这无论对中国同志还是对我们都将是坏事的。

另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做什么工作?日本国内在发生什么情况?难道国际无产阶级就找不到机会对日本国内的群众情绪施加影响,利用日本国内毫无疑问存在的反战情绪吗?这也是个具体问题,它的解决将有助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阀的斗争。我们从可靠的消息得知,日本国内存在财政困难,日本政府时时刻刻都在努力争取借款。它在英国寻求借款,由于德国要缔结反苏(联)条

约,钱是不会给的……^①在伦敦得不到借款,就会在巴黎、纽约作出尝试。难道我们作为国际无产阶级就不能发起一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借款给日本军阀来对中国人民宣战或使这种行为成为不受欢迎的吗?这样的运动是可以发起的。在法、英等国都有大的报刊。要动员舆论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的著名代表在国会里和在报刊上提出问题,使向日本军阀借款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这一点和一些其他举措可以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

我认为,所有这些具体问题需要在专门委员会提出,而王明同志的这个不错的报告应改写成一篇文章,但要把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东西补充进去。应该把这个报告改写成国际报刊的一篇文章,以便动员群众来保卫中国人民,但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为走向中国抗日人民阵线一切都会百分之百地顺利。而要经常不断地为此而进行斗争。如果说在西班牙我们把斗争拖延得很久,并且目前还看不到它的结束,据说,西班牙共和国最具决定意义的保卫战将在春天进行,那么就可以设想,中国将是什么情况,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持续多长时间,将在多大范围内进行。

让我们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吧。^②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215,第 860—861 页。

经季米特洛夫亲笔修改的打字稿,原件。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见第 5 号文件。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 第 179(A)号记录

(摘录)

1937年8月10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689.)——关于中国形势的通报。

报告人:王明^①、季米特洛夫。

决定:成立由季米特洛夫、方林^②、康生、库西宁、莫斯科文^③、唐列^④和王明(负责人)等同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在5天内制订出具体建议^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215, 第 14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陈绍禹。

② 邓发。

③ M. A. 特里利塞尔。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王稼祥。

⑤ 见第 4、5 号文件。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199(A)号记录

1937 年 10 月 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714.)——关于保卫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国际运动。

决定:1. 责成尤利乌斯^①同志的委员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指示^②加紧落实大力加强保卫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国际运动的各项措施。

2. 责成尤利乌斯委员会通过派遣有关同志或通过各支部的代表将书记处的指示告知共产国际美国支部和欧洲各支部。

3. 责成尤利乌斯委员会定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运动进展情况。

4. 为改进保卫西班牙招募运动以及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其成员有:多列士、杜克洛、路易斯^③、克列曼^④、柯纽。由路易斯负责。

5. 责成尤里乌斯委员会定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

① 丑. 阿尔巴利。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77—284 页。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丑. 费利德。

报招募运动和政治运动进展情况。

(飞行表决于[19]37年10月3日进行:季米特洛夫、弗洛林、哥特瓦尔德、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马尔蒂、莫斯克文^①、皮克、王明^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225, 第 5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M. A. 特里利塞尔。

② 陈绍禹。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 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204(B)号记录

1937 年 10 月 1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721.)——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 1937 年 8 月 10 日(见第 179 号记录)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建议^①。

决定:批准专门委员会的建议^②。(飞行表决于[19]37 年 10 月 10 日进行:季米特洛夫、弗洛林、哥特瓦尔德、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③、皮克、王明^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1226, 第 22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 号文件。

② 见第 5 号文件。

③ M. A. 特里利塞尔。

④ 陈绍禹。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 (书记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①

1937年10月10日于莫斯科

绝密

1. 全中国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行动的开始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事业的顺利推进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新的变化了的形势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强大的全中国的政治因素,并使之面向全中国千百万劳动者日益增强的实力。为此,党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干部和经费,以便在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领导和组织的方式方法,使党能够精力充沛地进行工作和在劳动人民的各个组织中施加影响。

2. 在政治、军事方面和在新的工作方法上重新教育老的干部,从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中,而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的干部,这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3. 应当争取通过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施加影响和通过群众运动使党在所有国统区的活动合法化,并要特别重视在大城市创办合法的大众刊物。

① 文件标题。文件已发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81—282页。决议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通过并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10月10日会议批准(见第4号文件)。文件上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的签名。

4.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特别加强在工人和工会组织中的工作,尽一切力量吸引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民族统一战线。

5. 在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全国军队一部分的条件下,必须采取措施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团结一致和绝对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增加它的人数并通过其作战行动表明它是全国军队中最先进、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并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在其他军队中的影响。

6. 特别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力全面加强这一战线,把它看作是战胜日本军阀的一个最重要条件。

7. 目前,敌人通过分化互解,挑拨离间,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手段更加加强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破坏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不断地审查干部和党机关周围人员,坚决清除党内和红军内部的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方面党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待托派像对待一个政党或一个派别那样,是完全错误的,在[中共]中央去年的宣言中提出了能否让托派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应当尽一切手段加强同充当日本军阀代理人的托派的斗争。

8. 为了尽一切努力加强保卫中国的国际运动,让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全国民族救亡联合会^①、工会组织和中国的学生、妇女、文化等组织一起向所有国际工人组织,即共产国际^②、社会党

① 以宋庆龄为首的全国民族救亡联合会成立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上。

② 共产国际是将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19年。1943年停止活动。见第285号文件。

国际^①和阿姆斯特丹国际^②,以及所有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组织发出呼吁,号召它们声援和援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这是合适的。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226,第 25—26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社会党工人国际是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923 年 5 月成立于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② 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国际工会组织,1919 年成立于阿姆斯特丹。1945 年停止活动。

6

王明和康生给斯大林的信

1937年10月21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最近我们要去中国。临行前我们恳请您接见我们，以便得到您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①。这不仅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活动和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王明^②）

（康生）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81，第 4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7 号文件。

② 陈绍禹。

7

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 克里姆林宫谈话的简要记录

1937年11月11日于莫斯科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的谈话

(参加者):季米特洛夫、王明^①、康生、科穆纳尔^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决议已经过时^③。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东西!”

“用一切手段加强同托派的斗争”(决议中的话)。“这是不够的。应当追捕、枪毙和消灭他们。他们是全世界的挑衅者,是最可恶的法西斯代理人!”

(1)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的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参与领导。

(2)现在最主要的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不是没收土地。

(必须规定捐税以满足战争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① 陈绍禹。

② 王稼祥。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37年10月10日的决议。见第5号文件。

“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必胜的战争”。

“争取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占领者”。

(4)中国人应当用什么方法与外部敌人进行战斗,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场战斗结束时,就会出现他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进行内战的问题!

(5)与我们在 1918 至 1922 年间的情况相比,中国人处于更为有利的条件下。

我们的国家由于进行社会革命而分裂了。

在中国,进行的是民族革命、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在把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

(6)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一定会胜利,是对的。只需在业已开始的战斗中坚持住。

(7)为此必须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

航空业生产。

飞机是容易生产的,但是运输很难。

(制造飞机的材料我们可以提供!)

要搞好飞机制造。

还有坦克的生产。

(生产坦克的材料我们可以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战胜它。

(8)八路军^①应该有 30 个师,而不是 3 个师。

这可以通过组建预备团来充实现有师的形式做到。

必须组建新的团。这些团应该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① 指的是中国红军,它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命令改编成拥有三个师(第 115、120 和 129 师)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在 1937 年 10 月改编成第十八集团军(见《朱德选集》,北京 1983 年版,第 406 页;彭德怀:《元帅回忆录》,莫斯科 1988 年版,第 307—334 页)。

(9)既然八路军没有炮兵,他的战术就不应该是正面进攻,而应该是迷惑敌人,诱敌深入,从后方袭击敌人。应该炸毁日军的交通线、铁路桥。

(10)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中国战胜。它们出自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害怕中国取得胜利。中国的胜利会对印度、印度支那等国产生影响。它们希望战争结束后日本变弱,但它们不允许中国站立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用链子拴着的狗,用来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一样,然而它们不希望这条狗独吞猎物。

(11)在中国党的代表大会上^①,不宜进行理论上的争论。理论问题应该[放到]较晚时期,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与过去相比,现在很少有机会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

(要知道,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在发展!)

(12)关于建立民族革命同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乌鲁木齐需要有合适的八路军代表和党的代表。

《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年3月9日—1949年2月6日)》,索菲亚1997年版,第129—130页。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①

1937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的领导

(1)鉴于米夫同志不能保证在教育干部方面正确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解除米夫同志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职务,调归联共(布)中央任用。

(2)任命科捷利尼科夫同志临时行使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职务。

(3)责成科捷利尼科夫同志立即着手接职,而米夫同志立即卸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的工作。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1227, 第 33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上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的签名和一条批注:“摘录送安德烈耶夫。1937年11月23日。”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 216(A)号记录

(摘录)

1937年9月2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 (736)——关于让王明^①同志休假的问题。

决定:1. 让王明同志自1937年11月19日起进行为期一至一个半月的休假治疗。

(1937年11月19日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弗洛林、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②、皮克)。

听取:2. (737)——关于让康生同志休假的问题。

决定:2. 让康生同志自1937年11月19日起进行为期一至一个半月的休假治疗。

(1937年11月19日飞行表决:季米特洛夫、弗洛林、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皮克)。

听取:3. (738)——关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临时代表问题。

① 陈绍禹。

② M. A. 特里利塞尔。

决定:3. 同意李约翰^①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临时代表。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 卷宗 1227, 第 43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王稼祥。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①

1937年12月12日于延安

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②、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共]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中共中央认为,代表团]完成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1,第 12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标题如此。决议已发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 11 册,第 402 页。

② 陈绍禹。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56 号记录**

(摘录)

1937 年 12 月 12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48. ——关于中国

1. 允许苏联红十字会执委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汇去 10 万美元为日本军事行动受害者购买药品。

2. 不反对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领事馆在中国公民中进行中国《国防公债》的认购工作,不反对在中国公民中募集捐款以援助抗日的中国军队。

抄送:斯托莫尼亚科夫、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22,第 90,10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2

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代表 参加国防委员会一事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8年1月9日于莫斯科

致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以下电报：

“1. 目前国民党没有收到共产党人关于参加政府的任何请求。国民党表示希望请共产党人派自己的人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群众运动和工会,但就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

2. 国防全会,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在战争时期以有限的形式表达人民的意见。

请速答复,如果我们收到邀请,能否参加这一机构。”

就参加政府的问题以前我们告知[中共]中央不参加^②。至于参加国防全会的问题,我们倾向于答复:可以参加。

请您就这个问题谈谈您的意见和指示。

致同志的敬礼!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4,第 4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上有批注：“已通过波斯克烈勃舍夫同志告知,可以参加国防委员会。1938年1月10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文件没有找到。

13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 书记张闻天谈话的简要记录^①

1938年2月2日于延安

绝密
附件二

同中共中央书记洛甫^②谈话的 简要记录

最近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尽管政府的组成人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改变,但我们掌握了这样一些实际情况,如改组国民党军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每个军区成立政治部,邀请我们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几乎在所有的师都成立指挥员和大学生学校,学习进行游击战。这一切都证明,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允许他们积极参加同日本人的武装斗争。

目前,成立了军事动员委员会,其任务是监督群众运动,但实际上现在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在像长沙、汉口、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建立什么监督。群众运动不受它的监督,打出的不是它的口号,而是我们的口号。实际上,对我们的书报检查几乎已经不存在。可

① 该文件是安德里阿诺夫关于中国特区之行报告的附件。报告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3,第12—22页)。

② 张闻天。

以公开发表关于八路军的材料^①。仅在汉口一地就有 40 到 60 种报纸经常刊登关于我们的消息。在全中国有 200 多种报纸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一些国民党人士指责我们把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八路军薪饷用到宣传上和支付那些刊登关于我们的材料的报纸的费用。实际上,报纸编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利用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来保证他们报纸的销售。

在武汉、汉口经常在学校和俱乐部举办有关游击战的讲座。在那里我们的演讲人大受欢迎。

八路军的徽章使它的佩戴者在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都会受到了欢迎。

云南、四川省省长^②请求我们派干部到他们那里去。

所有师、军指挥员都请求我们派干部、送书籍,以便学习如何进行游击行动。

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能够在我们地区以外工作的干部都派出去了,但对他们的需求仍在增加。

革命运动的浪潮在迅速发展,而国民党却落在了后面。

哲学家梁漱溟曾到过延安,他说:“全中国青年的心都向往西北”。

在国民党和我党联合委员会^③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人没有讨论我们提出的纲领,而在第二次会议上请求我们…向苏联提出要求,让它对日宣战。总之,由于国民党不愿意讨论对于两党和国家的生存来说真正重大的问题,联合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几乎停止不前。

① 见第 14 页注①。

② 分别为:龙云和刘湘。

③ 指这一时期成立的国共两党委员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协商机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委员是王明[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代表国民党的是陈立夫、张冲、康泽和刘健群。

强迫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在国民党中广泛流传。几乎所有国民党报纸都报道说：“如果苏联不对日宣战，则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而日本就会战胜我们。”

现在可以断定，联合委员会是对付共产党的。

蒋介石的态度是：先是同意我们的一切建议，然后是不为实现这些建议做任何事情。

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目前还很强大。在同我们的斗争中，他们和托派结成联盟。例如，由“黄埔”集团^①(原蓝衣社分子^②)出版的《扫荡报》刊登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大加赞赏，对我们则进行猛烈攻击。

托洛茨基分子提出的口号是：“现在应该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而只有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才是这唯一的政府，国民党军队才是这唯一的军队，国民党才是这唯一的政党，蒋介石才是这唯一的领袖。其余的都应该取消。”

这个口号得到反动的国民党分子的广泛支持。在这个口号下，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出要求，要监督报刊，取缔其他政党，清理思想战线，等等。

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党的发展的任何数据。但是，如果考虑到战前我们的组织，如在上海，几乎被彻底摧毁，而现在党委会到处都在迅速重建，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党在迅速发展壮大，虽然或许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种速度。

目前在武汉、长沙、广州、广西、上海已经重新建立了党委会。

如果说，过去华南是我们薄弱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党在那里

① 指“黄埔”集团，其核心由1924至1927年间在黄埔军校活动的教官和毕业生组成。

② 原文如此。指“复兴社”(或称“蓝衣社”)。于1932年3、4月间在南京正式成立。该组织具有半秘密性质，以对知识分子和所有不受“领袖”欢迎的人进行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是“复兴社”特工部的头目戴笠。蒋介石企图通过这个组织把军事情报机构和青年军官掌握在自己手中。

取得了很大成绩。

我们建立了中央长江局及隶属它的东南局——书记是项英同志(“新四军^①”政治领导人)。

东南局领导我们 12 到 13 个老游击区和“新四军”的党组织。

现在 we 和以下老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1. 闽东——福建东部，那里有 1000 到 2000 人。
2. 闽北——福建北部，有近 1000 人。
3. 闽西南——福建西南部，有 1800 人。
4. 闽赣地区，有 300 人。
5. 湘南地区，有 300 人。
6. 湘赣地区，有 300 人。
7. 瑞金—金州地区，有 350 人。
8. 赣北(原方志敏同志地区)，有 300 人。
9. 湘鄂赣，有 1400 人。
10. 浙闽，有 600 人。(原刘英同志地区)。
11. 湘鄂皖，有 1400 人。(原张国焘地区)。
12. 鄂豫，有 700 人。

与其余地区的联系目前尚未恢复。我们得知，在贵州和四川我们的人有近 1.1 万人，但目前我们与他们没有联系。

在驻山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有山东省委、河北省委和山西省委。山西省委目前又分出晋冀察、晋绥、豫鄂晋省委。而这个山西省委还设有晋西、晋西南和晋南委员会。

在陕西省(特区除外)建立了陕西省委员会，它领导着 1200 名

① 新四军是由中共主力撤离到西部，后又到北部以后留在华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937 年 10 月 12 日签署命令建立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详见：M. Ф. 尤里耶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20—40 年代)》，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217—220 页。

党员。

在特区有陕甘宁省委会。在兰州和榆林成立了党委会。后者领导着驻扎在北线的傅作义、邓宝珊和 86 师部队中党的工作。

可以得出以下总的结论：我们的力量在北方强于南方，尽管那里的组织也在迅速恢复。

对党来说最困难的是缺少很多高级领导干部。尽管也缺少中下级干部，但党感到缺少中下级干部的程度比缺少高级干部的程度要差些。

我们建议在延安(肤施)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①。

补充政府和党的经费的唯一来源是蒋介石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居民的援助。

我们每月从蒋介石那里总共得到 50 万墨西哥元。这些钱是这样使用的：25 万元用于前线需要，其余 25 万元用于后方需要、党务工作、报纸和杂志的经费，等等。

为党和军队培养干部的工作是在延安的以下学校进行的。

1. 党校，有 300 名学员。此外，不久前提前毕业并派往地方的有 300 人。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我们打算把学员扩大到 1000 人。

2. 抗日军政大学^②，有 1500 名学员。是为所有中国公民创办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入学申请。在 1500 名学员中有 800 名不是从过去的红军中招收的。学习期限为八个月。我们打算将学员扩大一倍。

3. “陕公”——青年政治教育学校。共有 1000 名学员，其中 200 名是共产党员。学习期限为三个月。

在三原(位于西安以北)有青年政治教育小组，由我们的青年

① 见第 15 页注①。

② 1936 年成立于延安。

组织“青年国民先锋队”(过去的共青团)领导。

谈话由上尉主持并记录(安德里阿诺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3, 第 32—36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4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 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 谈话的简要记录^①

1938年2月2日于延安

绝密
附件三

在与国民党签订统一战线协议^②之后,我们的一些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减少同特务和异己份子向我们队伍中的渗透作斗争的注意力了。

这些同志没有考虑到一点,即正是现在,当进入我们的地区比过去特别容易的时候,阶级敌人将会利用这一情况。有中国任何一个省政府的文件都能保证任何一个中国人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地区来,并能在那里居住。同志们忽略了,根据这一点,敌人将会不断地向我们派出奸细。特别是日本人将会利用这一点,还有国民党,尽管有协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对我们进行侦察。当我来到特区时,我看到保卫机关的工作几乎处于收缩状态。无论是我

① 文件标题如此。文件是安德里阿诺夫关于中国特区之行报告的附件。报告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3,第12—22页)。

② 指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9月22日发表)和蒋介石1937年9月23日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合作的声明。见《周恩来选集》,北京1980年版,上卷第76—78页;蒋介石《抵抗与重建:中国抗战六年期间文电(1937—1943)》,纽约1943年版,第20—21页。

们的政府,还是[中共]中央,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保护。我们不得不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恢复半解散的国家保安局,建立保卫部队,等等。目前,政府和[中共]中央由专门挑选出来的加强机枪连来保卫。

现在我们经受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实际上,我们党,特别是军队的发展速度尤其受到了这种情况的抑制。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经费的希望很小。我们地区的老百姓很穷。他们自己的粮食只够用到4、5月份。在八路军^①占领的地区,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的钱也有限。因为第一,老百姓深受敌人掠夺之害,而第二,现在我们不能继续使用没收地主和富农财产的老办法,因为这会违背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

蒋介石拨给我们用来养活八路军的款项更加不够用,因为军队增加了一倍,而军饷总数依然如故。

在我们动身来这里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应拨给我们150万美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答应给我们拨款3万美元用于治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而这些钱我们还没有收到,尽管把这些钱送到这里来已非常简单,您第二次到这里来^②就是证明。

我们需要资金用来扩充我们的军队,购买武器装备,建设我们的国防工业,支付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开支以及办报的经费。

必须考虑以下三个实际情况:

1. 目前时机非常便于把美元兑换成中国元,因为商人们有强烈的愿望用美元持有自己的资本,他们很愿意进行兑换。

我们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里设有办事处,这就保证我们不易被察觉并迅速地进行兑换。

① 见第15号文件。

② B. 安德里阿诺夫于1937年11月26日至30日第一次到中国特区。

2. 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和日本人半占领的地区,老百姓拥有足够数量的武器,他们很愿意把这些武器以不太贵的价格出售。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并经过验证,我们所需要的武器只要有钱就能够迅速买到。

3. 由于日本人占领了许多城市和从那里撤走了兵工厂,现在可以购买需要的设备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国防工业。而从这些来源也可招募熟练的劳动力。

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组织对我们干部的治疗。目前我们特别尖锐地感到干部的不足。而我们的老干部经过了地下工作和牢狱的严峻考验,他们当中有一大批病号。

我们干部的主要灾难是肺结核。

例如,党校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学员患有肺结核病。但是,我们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钱去组织治疗。我请您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让同志们考虑向我们提供这方面帮助的问题。如果说给我们送药和钱的事不会使我对其容易实现产生任何怀疑的话,那么给我们派有经验的医生将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可能是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渠道在欧洲或美洲招募忠于我们的医生。

一些外国医生到我们地区来不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任何抗议。

在药品中,我会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我们寄来“盘尼西林”,目前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药用来恢复我们生病同志的体力。

谈话由上尉主持并记录(安德里阿诺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3, 第 37—39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5

安德里阿诺夫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①

1938年2月3日于延安

绝密
附件一

问：国民革命军八路军^②的斗争情况及其发展前景如何？

答：目前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共有8万到10万名战士、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不包括游击队和驻扎在特区土地上的所谓后方部队。而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只不到4万人。当时我们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战士配有步枪。这种比例一直保持到目前。这样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军队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武器上都增加了一倍。

我可以断定，与日本人作斗争的条件和同他们作战，对我们来说要比我们过去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更容易些：

1. 日本人对战场的熟悉程度要比国民党人差得多，他们既得不到支持，又没有同老百姓的联系。而我们有老百姓的广泛支持和同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

2. 日本人不像中国部队那样勇敢，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低落。

我们截获了大量书信，日本士兵对他们的亲人说，他们是被强行抓来参加这场战争的，他们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等等。

① 文件标题。文件是安德里阿诺夫关于中国特区之行报告的附件。报告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3，第12—22页）。

② 见第14页注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日本人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很注重掌握技术,而不重视建立自己军队的政治稳定性。

3. 一系列战斗证明日军作战能力很差。在山地战争条件下,日本人无法运用他们的技术。日本部队很不乐意采取刺刀战,通常在刺刀战中我们总是取得胜利。

4. 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控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后面这两个情况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也总是考虑到这些情况并在我们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加以利用。

我还想讲讲我们对日本人采用的战略战术。

我们认为,作战的最好办法是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

在这三种方式中我们认为最有力的是运动战。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部队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的消极防御。

我们建议国民党:

1. 建立由 20 万到 30 万部队组成的突击兵团,把他们编成 4 到 5 个军,进行运动战,以便于在对我们有利的方向上形成优势,并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敌人消灭。

用其余部队进行阵地战以牵制敌人来保证我们运动部队的行动。

2. 游击战必须作为进行运动战的辅助手段来加以利用,尽管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挑选 8 万到 9 万名战士,除了八路军以外,由他们组成 20 到 30 支强有力的游击队,把他们分布在杭州^①到包头一线,北上到敌人后方去。

国民党没有接受我们的这些建议。

我们认为,在八路军的作战行动中必须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但是,我们作战地域的广阔不允许我们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然而,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力量有足够的壮大,那么我们将采取运动战。

我八路军部署如下:

由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指挥的第一兵团部署在四条铁路间的地区:石家庄(保定以南)、北平、大同、太原,该部队已经开赴平汉铁路以东。这个地区共有24个县,1200万人口。日本人从六个方向向该地区的进攻被我们击退,现在这个地区是我们抗日斗争的最主要堡垒,因为从那里我们可以进攻所有四条铁路线并威胁北平和天津。这个地区称作晋察冀地区。这个兵团约有3万正规部队和2万游击队。

由贺龙同志指挥的第二兵团部署在太原、大同、包头和黄河流域之间的地区。这个地区称为晋绥地区。我们的武装力量有三万多人。

由刘伯承同志指挥的第三兵团部署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任务是在这两条铁路上作战。兵团有两万多人。

我们还有一万人的部分兵力隐蔽在太原以南,其任务是一旦日本人向南进攻,则从两翼予以打击。

八路军的总任务是进行游击战,而如果出现有利的条件,就建立一支5000到10000人的兵团来进行运动战。

除了八路军以外,在其区域我们还有由它领导作战的约4万游击队员。后方的武装力量连同游击队员约有2.7万人。

这样,迄今为止,我们武装力量的总数为10万到12.5万人。

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缺少资金和武器装备。不缺少人力。

从蒋介石那里我们每月得到50万墨西哥元,仅养活4.5万人。因此,我们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平均每月每个战士的开支只有4到5个墨西哥元。这太少了。从蒋介石那里我们得不到一支步枪和一挺机枪,更谈不上大炮了。我们从蒋介石、阎锡山和其

他人那里得到的弹药总共只有 300 万发子弹。

蒋介石实行的方针是不给我们一支步枪和除上述拨款外不多给一分钱。

我们从南京得到的军服只有 4.5 万套,其余的由老百姓供给我们。而现在是无处可取。

按照国内的普遍看法,八路军的纪律与国内其他军队相比居于首位。由于这一点和我们取得的胜利,我们的威望也很高。就连国民党的军队甚至警察对我们也持有这种看法。

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全中国的年轻人都渴望参加八路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就能迅速地再建立几十万武装力量。但是我们没有钱供养他们,我们拒绝了所有愿意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但他们还是攒钱,变卖衣物来支付路费,成批成批地到我们这里来。

载有关于我们的消息的书刊很快就卖光了。一位美国人写了一本《毛泽东传》^①,一下子就卖出了很多册。朱德同志的两篇文章我们用小册子出版了。编写并出版了关于八路军和游击战的几十本小册子。如果人们想把报纸或小册子卖出去,那就在其中刊登有关我们的材料。

来自延安(特区首府)的记者博得了很高的赞许。

我们的人在全中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好评。

项英同志到南昌时政府要求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

全国各地纷纷向我们索要关于如何进行游击战的材料。请求派遣我们在这方面的教员。在汉口有一所学校上游击战课。如果那里是我们的人在讲课,那么大厅就会爆满,而如果是国民党的人在讲课,那么大厅就会空空如也。

国民党内有一个反对我们的派别出版了报纸《游击行动》。第一天报纸很快就销售一空,但当民众看到报纸上登载着反对我们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 E. 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伦敦 1938 年版。

的材料,而不是关于游击战的材料,他们就痛打卖报者。

我们的杂志《自由》^①在西安被国民党查封,数量达十万份。我们要求归还给我们,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杂志已被市民悄悄地买光了。一些流氓黑势力分子利用我们的声望,背着八路军说为八路军募款,向信任和热爱我们的人要钱。

在从太原撤退时,一些国民党部队从无序撤退的士兵那里抢夺枪支,称自己是八路军部队。

中国人民对待我们的态度非常好。群众爱戴八路军。他们按自己的喜爱程度把全国军队分为三部分:第一位是八路军,第二位是蒋介石的军队,第三位是其他军队。

在我们的部队路过村镇居民点过夜时,居民们要求每一户至少住一名我们的战士。在我们部队还没到达的地方,房子上就写着中文字:八路军将来这里,八路军战士将住在这栋房子里,因此这里就再没有地方了。

我们建立了由志愿者组成的运送伤员的专门担架队并向他们提供袖标。这就保证他们不被其他部队强行征用。

这一切都是我们军队的纪律性和它对居民的态度大大好于其他军队的缘故。

我们同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协同作战方面。我们有可能以我们的纪律性和战斗经验对其他军队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全中国的军队中我们拥有许多朋友。很多部队要求我们派遣政工干部,寄材料,等等。

问:刚刚组建的“新四军”以及它的活动地区是怎样的?

答:“新四军”是由活动在华南我们老区的原 13 支游击队组建而成。蒋介石规定它的人数为 1 万。据此,他每月发给它薪饷 6 万墨西哥元。

① 原文如此。指《解放》杂志,1937 年至 1941 年在延安出版。

我们任命叶挺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员(国民党已批准),虽然叶挺尚未恢复党籍,但我们认为可以使用他。任命项英同志为他的助手(对此国民党尚未同意,尽管项英同志实际上已经工作)。

这支军队由4个旅组成:

1. 高敬亭部队的任务是在安徽省蚌埠地区的津浦铁路线上活动。

2. 陈毅部队现在位于豫鄂赣南部地区。任务是在南京到芜湖地区和在杭州铁路线上活动。

3. 张鼎丞部队现在位于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任务是一旦日军进攻汕头、漳州,就在这些地区活动。

4. 张云逸部队在福建、浙江和江西东北部,任务是在杭州以南活动。

“新四军”总部设在南昌。

这些部队现在正准备开赴前线。张云逸部队已在指定地区活动。

这支军队很有发展前途。如果蒋介石不发给它枪支,它也能在同日军作战中获得。

问:您如何评价日本人在鄂尔多斯(绥远省)修建机场之事?

答:日本人修建这座机场的目的是准备占领定边城(陕西省)和宁夏城(宁夏省),以此来为自己建立对付甘肃和新疆的基地,而最主要的,是为袭击乌鲁木齐—兰州线路创造条件。

我们给定边地区的任务是,一旦日本人发动进攻,就给予反击。日本人何时发动,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断定,已经开始积极做准备了。我们认为,将要在这里作战的是来自满洲的日本关东军部队,因为他们已开始向这个方向转移了。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另一方面行动是相应地改造马氏将军^①。

^① 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见:A. Я. 卡里亚金:《沿着陌生的道路——在华军事顾问札记》,莫斯科1979年第二补充版。

马步芳将军同我们和同蒋介石的关系很不好。现在他害怕苏联飞机,但只要日本人切断航路,苏联军队到不了兰州,他就会立即站出来支持日本人。

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将军对待我们和对待蒋介石都不错。我们与他们有联系。但目前他们会摇摆不定,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坚持不住,因为日本人已经在建立对宁夏的包围圈。

由此可见,定边以北 200 里(100 公里)的这个空军基地对兰州是个威胁。我请求转告伏罗希洛夫同志,让他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因为随着日本人占领宁夏,兰州的形势将是很危险的。我们这方面将从定边派遣骑兵队去摧毁日本人正在修建的这个空军基地。如果能从空中对他们施加影响,那是很不错的。

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蒋介石打算把胡宗南的 8 个师调到西北,让它们担负以下任务:

1. 保卫同苏联的交通联系。
2. 切断我们地区与苏联的联系。
3. 掩护四川省,因为蒋介石正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基地。
4. 一旦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部队出动,就镇压并消灭它们。

胡宗南的这 8 个师将驻扎在汉中、天水、兰州、肃州(今酒泉)。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我请您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转达我们的请求。请求是:

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和最不可避免的是两个问题,这就是钱和武器。如果伏罗希洛夫同志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恳请他给予帮助。

谈话由上尉主持并记录(安德里阿诺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3,第 23—3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 王稼祥和邓发的电报

1938年2月4日于延安

致李约翰^①和方林^②同志
转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今天收到王明^③、周恩来和博古^④的电报。

电报内容如下：

“1. 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收到你们的钱，那么我们就能够买到相当数量的机关枪、步枪、毛瑟枪和子弹。请尽快把钱寄给乌鲁木齐方林同志以便他寄给我们。

2. 最近，国民党不止一次地，尽管是非正式地，提出中国统一党的问题。据一些消息说，近期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中国统一党问题。目前国内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人主张解散除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另一些人主张解散所有的政党，即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重新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党。再一些人则主张建立各党派的全国联盟，即各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加入

① 王稼祥。

② 邓发。

③ 陈绍禹。

④ 秦邦宪。

一个共同的组织,但各党仍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

当然,我们不能同意前两种观点。

考虑到人民群众要求把全国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呼声日益高长,请你们就把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的第三种方法作出指示。我们可否同意将各党派联合起来的这种方法?请于近期给我们指示,最好在这个月,因为,否则国民党全会向我们提出这种问题时,我们将难于作出明确的原则性答复^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1,第 1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7 号文件。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8年3月23日于莫斯科

我们认为,争取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组织在抗日民主纲领基础上建立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民族解放联盟是合适的。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88, 第 13 页。

打字稿, 副本。

18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①

1938年5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报告的基本内容已经以书面形式阐述过了^②，现在我只谈几个主要问题。

一、中国抗战总的形势

(一)关于中国抗战的发展过程

自去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③以来，中国开始抗日自卫战争已经9个月了。

战争具有全国的规模，包括华北和华中。今后它还将进一步扩大。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估计到中国长期和顽强的抵抗，它试图占领平津，迫使中国屈膝投降。随后，在进攻华北和上海时，试图以毁灭性战争摧毁中国的抵抗，实现其占领华北的目的。但在占领上海、南京、太原^④以后，看到中国不打算投降，日本就开始实施其第二个进攻计划，目的是向汉口和西安方向推进，同时利用“以

① 报告是在1938年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的，见第19号文件。

② 文件未公开发表(见全宗495，目录2，卷宗267，第32—59页)。

③ 指的是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平以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边挑起的军事冲突。

④ 分别为：1937年11月12日、12月12日和11月8日。

华制华”的老办法,利用汉奸、亲日派组织和托洛茨基匪帮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放弃武装反抗,借德意法西斯的帮助,使中国接受它的条件。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仍站在坚决抵抗的立场上。抗日力量在逐渐加强和扩大。因此,日本正遇到顽强的抵抗,在实施其第二个进攻计划上遇到了困难。

抗战9个月来,中国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立场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到上海战役^①。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武装抗日的坚定立场。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还不想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自卫战争,他们希望通过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他们认为,全国全面抗战需要不少于五年或至少两年的准备。尽管他们把自己的军队开到华北,但同时宋哲元在与日本进行媾和谈判。日本侵略者利用谈判时机,派军队占领北平^②、天津^③,并准备进攻上海。

第二个时期是从上海战役开始到南京和太原陷落。上海战役开始后,在日本进攻的压力下,在我党坚决武装抗战的号召下,在人民群众和一些部队的要求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了全面武装抗战的路线;召开了国防会议^④,动员部队去前线,划分了作战区域。从那时起,无论在华北,还是在上海,都开始了激烈的战争。

第三个时期是从上海、太原和南京陷落到目前。

① 1937年8月13日。

② 1937年7月30日。

③ 1937年7月31日。

④ 原文如此。指的是最高国防会议,是为在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条件下协调整个政治军事行动而成立的机构。成立于1937年8月。1939年1月改组为最高国防委员会,由11名常委组成(见《中日战争史(1937—1945)》,台北1971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者企图以占领南京来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和约。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①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下条件：

1. 把中国纳入反共协定，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
2. 将中国军队从许多城市和地区转移出去。
3. 中国、日本和满洲国实行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应聘请日本顾问。
4. 赔款^②。

中国军队在上海和太原保卫战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影响了它们在保卫汉口时的坚定信心。当时蒋介石对下一步抗战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缺乏足够的信心。虽然蒋介石拒绝了德国驻华大使提出的协议条件，但政府内部的妥协派还是相当活跃的。

当时中国正处于严峻的时刻。我党尽一切努力支持继续武装抗战。

1. 我们建议蒋介石坚守阵地，并提出一系列进行武装抗战的具体方案。

2. 我们采取了措施，来影响战地长官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人坚决站在继续抗日的立场上。

3. 我们提出一系列巩固和加强全国军队的措施。

4. 我们提出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的措施，并建议由陈诚担任全军政治部主任。

5. 我们建议并协助建立军工企业，并同国民党就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和开展抗日民众运动进行了谈判。

6. 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将过去的红色游击队迅速集结到新四军中^③，并将其派往南京、杭州和上海前线进行游击战。

① 陶德曼。

② 见《中国现代史(1928—1949)》，莫斯科1984年版，第152—153页。

③ 见第15号文件。

7. 党中央发表了宣言,号召进行武装抗战,直到最后胜利^①。

由于这些活动,各个阵地得以保住。蒋介石也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发表了宣言,强调将抗战进行到底。中国中央政府迁到了重庆,蒋介石召开了战区长官、参谋人员和政工人员等会议。政府采取了措施来加强纪律,枪毙了韩复榘,并对其他不坚定的指挥官进行了惩处^②。此后,政府内妥协派的活动销声匿迹了。第二时期的自卫战顺利地开展起来。

(二)九个月抗战总结

在九个月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军事方面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华北、华中地区的一大片领土被日本人占领;一系列大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太原、天津、济南、武汉等陷落。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居民遭到了日本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蹂躏。中国军队丧亡人数不少于80万。但是日本人为占领中国的这些领土和城市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据日本人自己公布的材料,到今年1月日本军队的丧亡人数达20万。而目前则达25万到30万。日本为这场战争耗费了大量资源,每月3亿到4亿日元。在日本士兵中,反战情绪和不愿继续作战的情绪在进一步发展。战争拖得越久,日本军队的困难和损失就越大。

中共中央认为,领土和城市的丧失只是暂时的损失和失败,绝不决定中日战争的结局。“谁战胜谁”的问题只能在长期的持久战中决定。

尽管中国遭受了暂时的失败,但是它在自卫战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巨大胜利。

① 指中共中央1937年12月25日发表的宣言,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8年第4期,第109页。

② 见马仲廉《抗日战争史话》,北京1985年版,第42页。

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①、1856至1857年与英法的战争^②、1884年与法国的战争和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③、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发生的战争^④中都遭受了失败,中国政府对外国侵略者总是采取妥协和投降的政策,造成了所谓的“恐日症”。但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激发了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勇气,消除了“恐日症”。这次战争唤起了整个民族进行争取生存和独立的斗争。

在自卫战争过程中,中国取得了以下显著成就:

1. 抗日斗争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内部团结。中国自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以来经历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和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此外,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一直进行着政治斗争。抗日自卫战使一切政党团结起来,使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亲密起来,改善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2. 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变。如果说过去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和投降的政策,而在国内则采取一党专制和向红军进攻的政策,那么现在,政府的政策从投降日本转向了抵抗,从进攻红军和共产党转向了与共产党合作。这个政府开始起着国防政府的作用。它采取了一些国内民主化的措施,例如:释放政治犯,废除非常法,给民间团体以某些自由,召开国防会议,成立国民参政会,同叛徒和其他在战时渎职的官员作斗争。

① 指1840至1842年的中英战争,使中国开始成为半殖民地。战争结果签订了1842年的南京条约。

② 原文如此。指1856至1860年的中英法战争,英法强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

③ 战争结束时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赔款。

④ 原文如此。指1899至1901年华北发生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根据“辛丑议定书”,强迫中国接受屈辱性条约;到1940年前支付巨额赔款和其他屈辱性要求。

3. 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中国军队过去是军阀手中争夺领地和进行内战的工具。地方军队不服从中央的指挥。抗日战争开始后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军队。各省的军队被动员到前线作战(青海和宁夏的马氏将军^①除外),并服从中央的指挥。他们在前线都英勇作战(在前线的中国军队达100万)。在枪毙韩复榘以后,地方当局和中央指挥部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

由于中国内部统一并坚决抗日,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了。若是不进行抗日自卫战,这期间取得上述成绩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暂时失利和损失有以下原因:日本作为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占领中国作了长期的军事准备,而中国是一盘散沙的半殖民地国家,军事装备和自卫准备很差。此外还有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性质的错误和缺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央政府下决心武装抗战的时间太晚了,以至使敌方有可能在中国本土上集结自己的军队。而中国军队由于政府摇摆不定,一直没有被动员起来开赴前线。结果是北平和天津未经特别激烈的战斗就失陷了,而敌人在占领北平和天津这些战略据点后,一直向西和向南沿着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和平绥铁路进攻。

其次,中国指挥部还犯了一个错误,它没有把主要力量投到华北战场上,以便在开阔的领土上打击和消耗敌人,而是将自己的主力集中在上海地区,同日本人决战,这对中国是不利的。上海地区的战场很狭窄,在那里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上海沦陷以后,中国着手保卫南京,但也是损失惨重。在华北战场上,各省军队作战能力很差,军队不是单一的并难以掌握,因此在退却时也遭到巨大损失。

中国军队在过去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采取两翼出击的积极防御和运动战,而是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在技术装备上较差的

^① 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

中国军队不可能只用阵地战来对抗有着最新军事技术(坦克、大炮、飞机)的敌人的进攻,并不得不退却。

在政治上,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把亲日派和妥协派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吸收坚定的进步人士。这一切都影响了武装抗战,同时一些战时动员方面的具体措施和法令不能贯彻实施。政府和国民党还害怕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影响的加强。因此,他们企图阻挠民众运动的发展,这对销售国防债券和实行全面义务兵役制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总之,中国这个工业比较薄弱的国家,很难避免在自卫战初期遭受军事失利。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缺点和错误,那么中国可能取得巨大成就和巨大胜利,前线的形势也会比现在更好。

(三)在日本人占领南京后的战争第二阶段我军取得一系列新成绩

最大的成绩是:

1. 中国军队在战术和战略上得到改善。以往的经验使前线指挥部改变了自己过去单纯防御的方式。现在除了战场上采取防御以外,也在敌人两翼和后方采取运动战的方式,同时还采取游击活动。中国军队得以阻止了敌人向津浦铁路以北和以南的推进。不久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胜利就是改进作战方式的结果。在山西省,中国军队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留在黄河北岸。因此,尽管日本人已经到了黄河岸边,也不敢越过黄河,因为有 30 多万中国军队留在日本军队后方,不断地进攻它们和袭击它们的交通线。

2. 游击战在最近一个时期,无论在靠近前线地带还是在敌后都有广泛的发展。政府和军队都重视组织游击队,从正规军中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敌后,在当地居民中开展游击运动。

因此,游击运动不仅在北部战线八路军活动地区得到广泛开展,而且在山东、江苏、浙江也广泛开展起来。由于游击队的袭击,对铁路和公路交通线的破坏,日本人一直感到巨大的威胁,不得不

把大量部队留在后方来对付游击队。^①

3. 中国军队在加强政治和技术装备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指挥人员和士兵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在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工作，纪律有了提高和改善。统一指挥更为加强，军阀部队的习气逐渐消除，军民关系得到改善，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由于利用内部资源和在国外购买武器而得到提高。例如，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正在恢复和加强。

所有这些成绩为中国军事形势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并使日本侵略者感到日益困难和遭到损失。

(四)中国抗战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迅速的歼灭战对于日本来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财政和政治上都是有利的。战争拖得越久，对日本来说越不利。相反，对于中国来说，战争拖得越长，就越能组织自己的力量，对敌人的打击就越大。因此，持久战对于取得对敌的胜利，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基础方针。

持久战方针对于中国来说有以下有利条件：第一，虽然中国军队在技术装备上不如日本，但是中国有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虽然敌人占领了大片领土和许多重要城市，但是中国还有可能不断地进行武装抗击，而敌人由于人力资源有限，只能掌握铁路沿线的狭窄地带和大城市，即使这样也是不稳固的。地方上地形的复杂使中国有可能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开展游击运动。中国作为防御方可以更加提高居民的积极性，更加加强自己的内部团结和创造新的力量来进行持久战。

第二，日本虽然是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它的人口和资源有限，它的掠夺政策没有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战争进行得越久和越广泛，它就越感到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不足。它在中国的军队越

^① 见第15号文件。

分散,它的困难就越大。战争拖得越久,日本的经费消耗就越大,内部矛盾越大,居民中的反战情绪和士兵中的厌战情绪越增长。

第三,中国目前的国际形势与1925至1927年时的国际形势有所不同。那时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而比较孤立,而现在世界帝国主义正经历着全面危机,民主阵线和平阵线的力量正日益扩大。此外,日本侵略加剧了日本与美、英、法等国的关系,这使中国得到外部的巨大支持。

上述一切对中国进行坚持不懈的武装抗日是有利条件。对于这种坚持不懈的、胜利的武装抗日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前提是国内的团结,是把国内一切力量动员起来。但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困难,它在斗争过程中没有暂时的失利。

中国在这场自卫战中的困难和危险是:

1. 缺乏国家体制的必要改革^①。政府成员中还有许多亲日派和妥协派。蒋介石和国民党目前还不决定把他们赶走。这些人的活动目的是动摇政府的立场和阻挠动员力量起来自卫。但应该指出,这些亲日派和妥协派目前还没有武装力量。

2. 中国政府正经受着一些财政困难。中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很快就要耗尽,而外债又难以取得。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武器需要现金支付。

中国的军事工业基础薄弱,此外,它在战争时期遭到了损失。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武器缺乏。中国军队可以补充自己的人员损失,但武器,不要说轻重机枪,就连步枪也很不足。

政府在建立军事工业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很缓慢,政府认为,由于中国缺乏钢铁,建立军事工业很困难。

3. 政府和国民党虽然给予群众运动以一些自由,但是它们害怕群众运动的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由于群众运动发展薄

^① 原文如此。

弱,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不够,此外,政府采取强制征兵的办法,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目前实行的征兵制只能补充军队的缺失,还不能在建立新的师和军方面取得成就。

由于财经的困难、武器的缺乏、人员的损失和建立新部队的缓慢,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武装抗战的胜利缺乏信心,有些人甚至在敌人更加残酷进攻的条件下,表现出束手无策和绝望情绪。

敌人在台儿庄失败后,组织对徐州新的进攻,调动新的兵力,企图实现原先制定的进攻汉口的计划。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取得新的胜利并把西安和汉口较长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中国就能组织起新的军事力量,建立起军事工业。这对持久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日本人占领徐州和海州^①到西安的铁路,并威胁到汉口或西安,即使在短期内占领(在我出发前,中共中央估计到当时的形势,认为汉口可能在战争两三个月后失陷),那么这可能引起政府在武装抗战立场上的动摇,因为汉口和西安的失陷可能造成以下的形势:

1. 汉口是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目前是把华南、西南与西北、华北联结起来的据点。汉口是北部和中部战线的基地,而西安是中国西北部的中心,对外联系的据点。

如果汉口被敌人占领,那么敌人的北部战场和中部战场可能联结起来。那时中国就分成两部分:西北和西南,两者之间没有铁路联系。如果西安被敌人占领,那么中国和外界的联系就很困难。此外,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会遭受更大损失,补给条件建立新的力量就会比现在困难得多。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失败情绪的增长。

2. 在新的困难条件下,在汉口和西安陷落后,亲日派、汉奸和托派的活动将会加强,破坏政府武装抗战的政策。

^① 海州系江苏连云港市旧称——译者。

3. 在日本占领汉口后,它可能会重新提出和谈的条件,这些条件表面上^①可能会更温和些,以便让中国政府接受,例如,在3月初,日本人向蒋介石夫人^②提出的媾和条件要比在南京陷落后提出的条件温和得多。三月条件的内容如下:

(1)在黄河以北的领土上成立特区,邀请日本顾问参加该地区的政府。

(2)日本有权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驻扎自己的军队。

(3)中国赔款3亿美元。不提出中国加入反共产主义同盟和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经济合作的条件。

(4)日本因害怕中国的持久战,可能邀请英国作为调停人,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条件;由于英国在对外政策上的转变和向侵略者投降,英国的这种调停是有可能的。

所有这些困难,如汉口可能陷落,亲日派的活动,日本的媾和条件和英国的调停,都可能影响中国政府的抗日政策并引起它立场上的严重动摇。

我们正面临着这些困难,但今天形势的特点是,抗日力量超过了妥协派和投降派的力量。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和妥协派是以张群(执行院^③副主席)为首的“政学系”^④。熊式辉、汪精卫、何应钦等,目前还没有武装力量,而军队首领和国民党元老,两广军队的领导人,中央军领导人和阎锡山(关于撤销阎锡山职务的消息目前还不可靠),都还站在坚决武装抗战的立场上。四川和云南的部队在整编中取得巨大成就。张学良的旧部,湖南、山东和陕西的部队虽然不起重大作用,但还是主张武装抗日。总之,9个月的战争带来了

① 原文如此。

② 宋美龄。

③ 原文如此。应为:行政院。

④ 政学系是一个没有固定组织机构和政治纲领的政治派别。

巨大损失,但中国军队的军事首领们没有丧失信心。像满洲事变^①时期整个部队投向敌方的现象还没有发生。

国民党元老孙科、冯玉祥、林森等人主张坚决抗战。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不掌握武装力量,他们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在政府中起决定作用的蒋介石,目前还主张坚决武装抗战,国民党的多数普通党员也要求坚决抗战到底。

上述一切说明存在困难、危险和可能发生的动摇,尤其是在汉口陷落时。但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的胜利表明中国军事形势开始有了新的转变。

这次胜利提高了部队的信心,使有可能取得新的胜利。

如果说中国军队还不能取得对敌的一些胜利并阻止敌人的进攻,那么武装抗战今后可能成功地发展下去。即便汉口丢失,在对我们军队、军事首领和政府的影响和作用下,那我们即使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够继续进行抗战。

由此可见,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主要的任务是竭尽全力防止和克服政府在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立场上可能发生的动摇。

这一任务的主要环节是帮助和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竭力加强河南、汉口和西安的防御,加固徐州和津浦铁路南部的中国阵地,以阻止日本军队推进和渡过黄河到河南和陕西省,粉碎日本侵略的新的进攻计划。

即使日本人占领了汉口和西安,我们党也应该协助政府和军队继续进行自卫战,因为中国在西南和西北还有大片领土可以用来继续进行胜利的抗战。

在保证长期武装抗战和中国军事形势发生转折方面,最主要的任务是建立和培植新的武装力量;为此,我们党应该帮助政府和

① 指1931年9月日本军队占领满洲。

国民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新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以便使我军的技术装备和实力得到更大的提高。

为了防止和克服政府在武装抗战上可能发生的动摇,提高军队和民众中胜利的信心,须要同各种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观点和情绪作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问题上的最主要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些。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状况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状况和中共在统一战线中所实行的方针

由共产党发起的民族统一战线早就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但国共合作只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①以后才得以具体化,此后中国内战停止了。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②以后,在其内外政策上开始发生转变。1937年9月,我党发表了两党合作宣言。^③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苏区改为特区。此后,我党逐渐取得了自己活动的合法化,过去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一一被释放。

国共两党经过残酷的十年流血战争后又重新走向合作。我党在全国的影响和威望得到了非常迅速的扩大和提高。

去年年底,国共之间出现了一系列摩擦,例如:袭击我们的《新

① 指以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军长杨虎城为首的军官集团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事件,蒋介石于1936年12月12日到达西安后被逮捕。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中共一开始就支持这一行动,参与了和蒋介石的谈判(12月25日蒋被释放),以便和平解决冲突,这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

②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

③ 指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15日发表的宣言,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6--78页。

华日报》^①，限制我们的活动，甚至以逮捕汉奸为名逮捕共产党员，攻击八路军，散布八路军不服从总指挥的谣言，禁止建立游击队，禁止八路军在当地征粮，取消八路军战士家属的各种优惠，以限制八路军的扩大，等等。

这些摩擦的发生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一方面，国民党高层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及其力量的日益增长，对共产党人抱有一定的仇恨，因而限制和破坏他们的活动，而另一方面，我党内部对国民党的转变，对国共合作的长期性不够理解，过分强调民主权利和改善民生的要求，以及在工作方法上的其他严重缺点，也是发生这些摩擦的原因。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1937年)^②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③，在王明同志回国^④后，详细检查了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并认为，我党为争取统一战线的号召和斗争，在国共合作中，在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政治局指出，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武装抗敌胜利的中心的和基本的前提条件。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长期的性质，抗日战争的任务和动力与苏维埃时期革命的任务和动力不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⑤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国内的封建主义残余，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

① 《新华日报》，1938年1月至9月在武汉出版，以后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

② 会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详见：《日本侵略时期的中国(1937—1945)》，莫斯科1988年版，第42—43页；《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171—173页。

③ 见第1号文件。

④ 王明(陈绍禹)于1937年11月回国。

⑤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的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举行。

革命的动力是工农。

现在抗日战争的任务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清除国内的亲日派,实行国共合作并建立民主共和国(它将不具有非资本主义性质)。参加这场新的战争的不仅有工农,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不仅是党的策略的改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

其次,各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一切抗日力量可以也应该进行合作。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实行民主和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要求应该服从抗日这个主要任务。这些要求不应提得过高。

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还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应该在共同的纲领下协同进行斗争,不应互相削弱,而相反应该互相帮助,共同领导和负责,虽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无法消除但应尽量避免和缩小。

各党应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但批评应该是善意的,而不是敌对的。会议指出,同其他党派的合作,一方面应反对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应反对宗派主义。

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些原则教育自己的党员,同时也在党外宣传这些原则。

在去年的十二月宣言^①中,中国共产党指出,国共合作具有长期的性质,这种合作不仅适用于抗日时期,而且也适用于战胜日本以后共同建设国家。因此,国共合作基本上已取得了某种成功,例如:成立了两党委员会^②,允许我党合法存在和在武汉出版日报^③,周恩来被邀请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等等。

① 指1937年12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

② 见第23页注③。

③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至9月在武汉出版,以后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

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外,中国还有人数不多的其他政治派别,如:第三党^①(不到100人),民族主义派^②(400—500人),国家社会党^③(几十人),这些党过去都是受到国民党的排挤和压制的,现在他们对我们很好,并参加了统一战线,但由于他们人数很少,不受国民党重视。

此外,还有一个“政学系”,它是政客、官僚、买办的组织,有几十个人。他们的领导人是亲日派。

(二)国共新的合作的性质,这种合作中的困难和障碍

十年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1925年至1927年),建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后,进行了十年武装斗争,现在又重新建立了合作。第一次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

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现在的合作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只是在广东有不很坚固的政权和少量的军队,受着内外敌人的压迫,而现在它有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强大的军队和全国的报刊。

在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没有独立的政权和军队,但党在全

① 第三党不是党的正式名称,而说明它倾向于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中间立场。至于中华革命党,它的纲领既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也不同于国民党。该党成立于1928年。1936年11月10日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干部会议上确立了该党的政治纲领。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2月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是章伯钧。

② 原文如此。指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上。1929年以前是“秘密的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国家联合会曾起过对外合法组织的作用。从1924年起,党的活动中心移到中国。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③ 原文如此。指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于1934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8月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国有相当坚固的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领土,在全国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比较薄弱。

过去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同北方的军阀进行斗争,现在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过去是内战,现在则是同外敌——日本侵略者作战。

在第一次合作和第二次合作之间的时期里,在十年流血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地方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军队,实行了土地革命。

国民党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权,有强大的军队,有长达十年的一党统治,但十年反动统治的结果是国民党丧失了人民的同情和信任。它有同共产党斗争的经验,但过去和现在都害怕共产党成长壮大。与1925至1927年革命时期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党的布尔什维化和领导的加强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一因素不能不对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加强具有决定性意义。

国民党一方面表现得高傲自大,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和可能夺取它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从而影响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它竭力要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由此在两党的合作中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

在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班(卢沟桥事变前不久创办)的政治教材中谈到,“如果说国民党现在有100%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将消耗50%,那么还有50%。共产党现在有50%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将消耗30%,就只剩20%了,而如果苏联援助它10%,那么它有力量将等于30%。国民党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并能同苏联进行平等的谈判。如果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消耗,加上苏联援助的10%,共产党的力量将有60%。那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就不得不听从莫斯科,这将是很糟糕的。”

由此可见,国民党上层害怕共产党,试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阎锡山说:“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山西像点燃了十支蜡烛,晋绥军只点燃了一支蜡烛。中央政府军只是像点了一盏油灯。但共产党有一个弱点,它没有故乡,因此1932年德国共产党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还是被希特勒镇压下去了”。接着他说,“山西省的政权掌握在我手里,还可以做点事”。

国民党上层企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表现在它不愿正式承认国共两党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了。他们拒绝共同发表关于在战争中合作的宣言^①。在我党发表的宣言中,国民党删除了“国共合作”字样,代之以“两党友好会晤”。在报刊上禁止使用“国共合作”术语。国民党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企图在自己的掌控下联合各党派,企图逐渐削弱和溶化共产党。去年他提出一种合作方式,即由两党成立一个共同的政党,每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都可以加入这个共同的党。由两党相等的党员人数选举组成最高委员会,由他蒋介石担任主席,并拥有最后决定权。两党的活动必须服从最高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不应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必须通过最高委员会。我们拒绝了 this 建议。

然后他又企图“吞并”共产党,使其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理由是:两党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冲突和摩擦。他说:“你们共产党一直讲策略,如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发展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在国民党内成为最革命和最有能力的派别,难道这是不好的策略”。他说,“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名称,取消所有其他的党,使之加入国民党的一个派别,在党内可以存在各种派别”。

^① 指中共中央1937年7月15日发表的宣言,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6—78页。

“复兴社”^①上层与托派一起,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利用“统一”的术语和我党九月宣言^②中所说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的话,来反对我党和八路军。在他们的机关报《扫荡报》上提出一个口号,在中国只能有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一个领袖。还举了苏联和德国一党专制的例子。因此,中国现在应该推崇国民党为唯一政党并推护它的领导。他们说,“中国联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合作,另一种方式是统一。合作方式的联合不仅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巩固,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分裂。统一方式的联合,由一个大党吞并小的党派,把它们溶入一个党内,不会引起分裂。因此,谁赞成联合,谁就应该赞成溶合”,还说“根据 1924 至 1927 年的教训,在实现这种溶合之后,就不能允许在国民党内组织共产党团,并在国民党外保持组织上的独立”。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③,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中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还说,“在中国存在着两种危险的势力,一种是封建主义,另一种是反动势力。封建主义势力口头上抗日,实际上不作战。反动势力按游击方式行事,而不去进攻。如果这两种势力不加以消灭,那么中国就很难联合”。他们说的反动势力是指我们党和八路军。他们借托派和流氓之手,在汉口袭击我们《新华日报》编辑部。因此,今年 1 月武汉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

“复兴社”上层和托洛茨基匪帮在过去和现在都企图以国家统一和联合为借口,提出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要求。他们利用那些仇视共产党和不谙政治希望中国联合的国民党分子的同情,盲目

① 见第 24 页注②。

② 指中共中央 1937 年 7 月 15 日的宣言,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76—78 页。

③ 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于 1923 年底至 1924 年初形成的政治纲领。

而天真地认为,取消各种党派并使他们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中国变得更加团结,在抗日斗争中更具战斗力。

为答复“复兴社”分子想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想要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一个派别的图谋,毛泽东同志代表共产党就所有这些问题发表了谈话^①。毛泽东同志解释说,苏联存在一个党是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那里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德国和意大利,虽然存在法西斯一党专制,但那里也存在和活动在其他的地下党。这完全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只存在一个政党。其次,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及其他国家存在着几个政党,这绝不破坏统一国家的状况。这一点也由以下事实所证明,国民党在十年武装斗争期间企图消灭其他政党已遭到失败,而今天的国共合作使中国联合起来,实行武装抗日。以国家统一为借口想要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实际上是使中国回到各种内部力量联合以前的困难境地。最后,毛泽东同志引用孙中山的话说,“民生主义也是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仅不能说,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是敌对的,相反它们是好朋友,谁赞成民生主义,谁就应该深刻研究共产主义”。这也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相容的。我们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而斗争,也决不放弃自己多年的共产主义信仰。

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部分国民党老党员、多数年轻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认为,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他们担心,“复兴社”首领和托派分子的活动可能引起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可能导致两党分裂,因此他们对“复兴社”利用托派匪帮搞的活动表示不满。其中一些人建议除其他政党之外成立“三民主义

^① 指1938年2月10日王明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谈话是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决议并由毛泽东签字发表的。见《中国作出反击》,顿河罗斯托夫1938年版,第111—112页。

青年团”^①，其他政党的党员也可加入。一些人认为应该保持现状，另一些人同意我们提出的合作的组织方式，而第三种人则建议恢复1925至1927年间大革命时期的合作方式。

蒋介石也声明，“不能取消共产党，只是要意志统一，思想自由”。他说，“复兴社”的观点不能代表整个国民党的意见。此后，关于“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说法销声匿迹了。蒋介石下令禁止讨论各种党派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同志的谈话有两点表示不满：第一，毛泽东同志不应该发表谈话；第二，不应该涉及过去十年的事，因为他本人准备就此发表谈话，现在在毛泽东同志发表谈话以后就不便再发表了。

我们党提出了各党合作的组织形式是民族联盟，即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形式；由各党派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组成中央和地方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将根据共同纲领进行活动。每个党应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这种组织形式没有得以实现，是由于“复兴社”和托派反对国共合作的破坏活动，也是由于蒋介石没有完全放弃共产党与国民党溶合的企图。国民党最近的非常代表大会^②没有就这一问题通过具体决议。目前正通过两党委员会和通过同蒋介石及其亲信的会谈在进行谈判。代表国民党参加两党委员会的有4人：陈立夫、张冲、康泽、刘健群（其中二人是“复兴社”的积极领导人）——因此谈判没有取得具体成果。

至于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我们党准备支持它成立，因为这个组织可能吸引广大青年阶层，影响国民党的改组和进步。国民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全国青年团的决议。

① 关于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是在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汉口举行）上通过的。于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

② 指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

(三)国民党的状况及其进步倾向

国民党的主要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但国民党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国民党起着革命作用时,它靠近小资产阶级,也接近工农大众,逐渐将地主和军阀排挤出自己的队伍。例如,在1924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及许多工人和农民加入了国民党,而军阀被排挤出其队伍。国民党那时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联合组织。当国民党脱离革命时,它就靠近军阀和封建势力,排挤小资产阶级和工农大众。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后就是这样,那时国民党走上了反革命道路,走上了与共产党斗争的道路,与军阀和地主结合在一起,后者在国民党内逐渐起了主导作用,而工农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从反动立场又回到了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立场上。既然它希望扮演革命的角色,它就应该在革命群众中寻找支柱,接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大众。

总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走上了进步的道路。它的政治威望逐渐提高了,而由于它目前对内政策的转变和同共产党的新的合作,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及部分进步人士逐渐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组织上的弱点。他们清楚,组织工作不做改进和改革,国民党不可能满足战时形势的需要。普通的国民党员也对组织上的弱点、国民党内的腐败和缺乏民主表示不满并要求国民党进行改革,因此蒋介石最近提出了复兴国民党的问题。最近的非常代表大会也就改革国民党问题作出了决议。

我们对国民党的评价是这样:它在今后长期的抗战中无疑会进步,但是由于存在许多障碍(国民党内保守派占统治地位,它害怕群众和共产党等等)这种进步的速度会是很慢的。保守派分子将会阻挠国民党的进步行动。我们不仅愿意在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合作,而且也愿意在战胜日本后进行合作,以便共同建设新中国。为此必须改组国民党,因此我们党在支持国民党复兴和进步发展

的同时,应该采取措施来扩充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清除腐败的封建分子,实现国民党内部的民主,以便扩大国民党进步派的力量,使其能起到推动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批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这样我们就会推动国民党走上进一步加强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根据苏联报刊的材料可以看出,今年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在内外政策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而在组织改革方面也是这样。代表大会声明要进一步抗击日本侵略;在对内政策问题上,代表大会采取了一些民主的措施,例如关于成立由各党派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国民参政会有权签订和约、宣布战争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决议,条件是不损害抗日战争。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成立民族革命青年团和国民党进行改革等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将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但毕竟是进步的措施。我们党对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采取了促其切实贯彻的立场,据塔斯社报道,我们的《新华日报》已经就召开国民参政会会议及其权利、任务和职责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目前国共合作的条件与1925至1927年间中国大革命时期合作的条件不同,现在共产党拥有红军和苏区,这是与国民党成功合作的极重要条件。然而,我军的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相比较还很小,我们在国统区的党组织今天还很薄弱。由于共产党拥有军队、领土、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军事经验,我们才得以与国民党合作,影响它内外政策以及军事政策的改变和进步,但我们的力量还比较小,在全国人民大众中的组织力量还薄弱,因此我们还不能用群众的力量来迫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党的党组织沿着迅速进步的道路前进。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刚刚开始,保守分子还在阻挠它,因此今天国民党和共产党还不能以平等的党互相对待。由此也会造成国共合作道路上的许多困难和障碍。

然而,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合作将会得到加强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必然会促使中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这对国共合作来说是比较过去合作时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进攻的情况下,如果国民党确实想要斗争到底的话,那么它应该走进步的道路,应该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这些客观条件会保证国共合作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我们希望加速两党合作的加强和发展,那么为此我们就必须在各个方面更加发展我们的力量——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游击战、群众运动和党的组织。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力量会更加提高我们的威望,更加加强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

(四)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当前任务

共产党认为,为了争取彻底战胜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长期进行艰苦的斗争,这里我们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和挫折。团结中国的一切力量是争取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条件。事实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合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抗击并战胜日本侵略者。如果两党分裂,那么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在抗日战争中遭到失败。日本、亲日派、汉奸和托派千方百计要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团结,首先要破坏国共合作。特别是由于最近的一次失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会更加极力要破坏中国内部的统一。因此,加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

尽管国共合作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中共还是竭力说服国民党及其领袖抛弃想要“吞并”共产党的企图并建立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的紧密合作。中共中央正在拟定合作的共同纲领草案并继续与国民党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谈判。

共产党认为,目前统一战线主要是从上面实行的,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作为统一战线的坚强基础。因此把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来,是加强和发展统一战

线极重要的迫切任务之一。

自抗战爆发以来,以地方政权和地方军队为一方与以中央政府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居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由于中央政府拒绝向地方军队供应武器和补充人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中央政府采取的不当措施(如强行征兵,强行摊派公债等)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所有这一切都应加以纠正和协调。

在国共两党顺利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党和政府实行进步的措施,逐步改革现时的政治制度,将亲日派、汉奸和托派分子清除出政府,吸收进步分子参加政府,加强政府的防御能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刻不容缓的工作。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及其当前状况

(一)八路军的措施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过去的中国红军部队组成的,在十年中中国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的所有讨伐。它在连续不断和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受到锻炼。正因为如此,它拥有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但这支军队的武器还是在以往的战争中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来的,因此比较陈旧而且多种多样。它没有重武器,甚至没有山炮,更不用说重炮、坦克部队和空军了。

在战斗中它主要依靠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依靠灵活的战术和巧妙的指挥,依靠每个成员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决心。

去年,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八路军立即发电报给中央政府,要求派它去前线与日本作战,同时开始把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但当时,蒋介石还不允许我们开始进军,因为他害怕八路军开往前线后会扩大影响。此外,蒋介石那时还在战与和之间动摇,害怕因八路军开赴前线而扩大战事。当时,蒋介石还不允许八路军设立自己的总司令部。他只允许建立几个师,这些师应服从他的直接

指挥,并派往不同的战场。

去年8月,当华北战事吃紧的时候,蒋介石才同意由我们的三个师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成立八路军司令部,此后将它调往陕北地区,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8月,八路军从陕西省调到山西省西北部。八路军开往前线引起了全国军民的普遍关注和热情。

八路军到达前线后,在自己的军事行动和工作中制定了以下原则:

第一,进行运动战、游击战,放弃当时国民党军队都采取的只进行阵地战的战术。从侧翼和后方给敌人的打击。在敌人后方和大后方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线,给敌人增援部队以打击,以便把自己的行动同其他中国军队的行动结合起来。八路军的所有这些措施,其目的是以自己的成功行动来影响国民党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进步。

第二,加强组织和武装当地居民的工作,建立敌后游击战根据地。开展群众的游击行动,以便把自己的行动同正规军的行动结合起来。这项工作的成功应该证明,只有动员和组织群众,只有开展人民群众的游击战才能保证长期的抗日并战胜日本。我们以此来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加强对组织群众和开展游击战的注意。

第三,加强在八路军中的政治工作和瓦解敌军的工作。与当地居民建立密切联系,以便推动其他部队改进政治工作,并同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

总之,八路军的工作和作战原则可以归结为:在各个方面给中国所有军队起到先进的模范作用,以便影响今后胜利开展抗日自卫战争。

由于我们采取运动和游击战术,我们取得了平型关的胜利。平型关的胜利是抗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我们击溃了日本最精良的师团——第五师团。消灭了该师团约一个旅。此后,我军进入敌后和敌人侧翼,截断了敌人在山西省北部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作战,而我们在敌后作战。在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时,我们缴获和摧毁了敌人 1000 多辆汽车、21 架飞机。这样敌人在忻口地区(太原以北)4 万多人没有一颗炮弹,没有汽油和粮食。敌人的大炮和坦克停止了活动。敌人只能借助飞机得到一些粮食和弹药。因此,在忻口地区持续 20 多天的顽强战斗中,敌人处于极其危急的境地。

我们的这些胜利和成功迫使敌军改变他们通常对中国军队所运用的包围战术,因为敌人人数不多的包围部队常常被我们突然的侧翼进攻所消灭。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办法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交通线。

我们的胜利和成功提高了中国军队在对日斗争中的信心。他们说,八路军能以最差的武器装备战胜日本部队,因此他们也能与敌人决一死战。这种情况甚至对那些在日本军队进逼下退却的部队采取坚定的行动有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胜利和成功也促使国民党军队逐渐弄清阵地战与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因此国民党军队也开始改进自己的战略战术。最近台儿庄战役^①的胜利和在津浦铁路线南段的胜利正是国民党军队改进战略战术的结果。

在山西省北部作战期间,八路军丝毫没有削弱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八路军作战地区,经过一两个月的加紧工作建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自卫队和其他群众组织。还从当地居民中建立了许多游击队。八路军派了一大批富有从事游击战经验的干部去领导这些游击队。游击队的武器装备部分是由居民从过去中国军队丢在农村的旧武器和步枪中收集起来

^① 发生在 1938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6 日。

的。这些游击队也是靠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当然,游击队的武器装备还远远不够。游击队是从当地居民中取得粮食的。为了解决物资供应的问题,他们在为了抗日动员物资和财产资源及人力的口号下,从富人、当地居民中征集了粮食和钱财。不用说,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冬天他们没有棉衣。药品对他们来说是最短缺的物品。

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有些游击队逐渐集中起来,组成了规模较大的部队。例如,在晋察冀边区,从游击队中成立了几个师,每个师有5000到6000人。那里还成立了军区,设立了领导这些游击队的统一的指挥部。这个游击区是在敌后建立新部队的榜样。这些游击队经常出现在北平郊区,切断平汉铁路线。他们也出现在天津及其以南地区以及津浦铁路线地区,并给日军以打击。

在晋察冀边区,现在有40多个县五六百万人口掌握在游击队手里。那里现在恢复了中国的政权,成立了该地区的政府。这个政权是由我党领导的。在这些地区,到处都成立了群众组织和党组织。由于游击队频繁袭击铁路和警备队,日本人不得不动调八个纵队的力量,企图包围和消灭这些游击队,但游击队成功地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些地区现在是敌后游击战的主要基地。八路军动员了最广大的群众,成立了许多游击队,在敌后建立游击队根据地——这使敌人无法巩固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使敌人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八路军的工作和活动的成果之一是:中国政府和军队开始注意在敌人后方和作战地区开展游击战。他们组织了许多训练班来培养游击战的领导人。他们请八路军给他们派去教员讲授游击战战术。由于这一切,敌后游击运动近来得到很大发展,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战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八路军早在红军时就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这个传统至今

还完全保留着。现在在战士中正在进行系统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问题的教育。八路军战士的政治水平远远高于其他中国军队的战士。八路军战士懂得,为什么要同日本进行斗争,并且只有长期抗战才能战胜日本。在八路军的所有部队中,在行军时和作战时都进行政治工作。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在日常生活中,战士们能够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始终是积极向上的。官兵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同志关系。

党组织起着先进的领导作用。部队中开小差的现象很少发生。在作战时官兵们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我们部队的积极性和内部团结引起了其他中国军队对它们的尊敬。有一次,一家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来到八路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德同志。回去后他写了一篇长篇文章发表在《大公报》^①上。他写道:“当我走近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大门时,我看见一位穿着战士服装的老头。这位老头战士戴着眼镜在看报。当我走进司令部时,司令部一位长官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朱德同志。当我得知这就是朱德时,我为他的朴素和真诚而感到惊讶。他和我一起吃了午饭(吃的午饭和所有战士吃的都一样)。我既和战士们聊天,也和八路军伙夫聊天。我得出一个结论,八路军有这样一个特点:从总司令到战士、伙夫和马夫,都是一个样子。我钦佩八路军的团结一致和所进行的教育工作。”

除了在自己的部队中进行政治工作以外,八路军还特别注意瓦解敌军的工作。用日文、中文、蒙文和朝文出版了许多传单和小册子。通过政府的飞机或通过游击队,由当地居民和武装宣传队在日占区散发这些传单和小册子。所有官兵都学会说几句日本话,以便在作战时可以向敌人士兵进行宣传。

我们对被俘日本士兵采取了较好的态度,并在他们中进行教育工作。我们散发的传单对日本士兵起了一些作用。在搜查日本

^① 《大公报》为日报,于1937年至1938年在汉口出版,1938年至1945年在重庆出版。

被俘士兵和日本阵亡士兵时，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散发的传单。有过这样的事，一些日本兵在作战时被我们包围，在我们的鼓动影响下，他们自愿携带武器向我们投诚。有些被俘的日本士兵现在帮我们写日文的传单和小册子。此外，他们还要求留在八路军工作，请求允许他们的家属到中国来，以免受日本政府的迫害。

八路军和当地居民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八路军有很严格的政治纪律。在占用当地居民的住房前，必须征得房主的同意。一旦发现有损坏物品时，他们要付钱赔偿。总之，八路军不做一件有损群众利益的事。不管我们的部队到哪里，群众总是让出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住。当地居民还送给各种物品。

对其他中国军队的态度就不同了。当他们来到村庄时，群众常常就逃走了。特别是在作战开始时，一些中国军队的纪律很糟糕。常有这样的事，士兵抢劫居民，强奸妇女。他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怒。在有些村庄，居民们自己作出这样的规定：当其他军队的部队来到时，听到村长敲三声钟，全村居民就跑到山上去。而当八路军部队来到时，就敲一声钟。群众不但不逃跑，反而准备茶水和其他食品来慰劳他们。我们的部队得到群众的支持。在作战时，群众来帮助我们抬伤员并把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从前线搬到后方。当地居民还修路，以便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道路来转移。在和平环境下，当地居民帮我们搬运粮食和弹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

八路军在自己部队内部进行的政治工作、进行的瓦解敌军的工作和对当地居民的工作，引起了所有参加抗日解放战争的其他中国军队的极大注意和兴趣。他们想起了北伐时期(1925至1927年)^①，那时部队里进行政治工作，部队得到了居民的支

① 指的是在中国政治统一、民主化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进行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开始于1926年7月9日。

持。因此他们重新要求恢复北伐时期那样的政治工作。结果在中国军队的总司令部设立了政治部,主任是陈诚将军,副主任是周恩来同志。在所有部队中开始政治工作。目前,在各个部队中吸收了许多大学生,他们在进行培训,然后就担任部队的政工人员。在阎锡山部队中,根据八路军的范例建立了政治部,并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

红军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产生并逐渐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在同国民党部队的十年残酷斗争中,它取得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丰富经验。它的优点是灵活机动,能吃苦耐劳。八路军的大多数军官都练就了独立作战的技能并富有首创精神。他们具有特殊的战斗素质。八路军可以集中自己的力量进行大的战役,但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分为许多部分进行游击战。它可以用少数力量勇敢地击溃敌人的优势兵力。

八路军在山西省的对日作战中常常以少数力量进攻日军的优势兵力。在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以三个团的力量从侧翼进攻日本的一个师。由于敌人不大注意保护两翼,我们的部队就能完全接近敌人并对它进行攻击,那时敌人才发现我们的部队。因此,我们以突然进攻的方式使敌人遭受重大失败。在这种战斗中,我们的损失很小。我们派去的游击队通常以很小的力量进攻敌人的大部队。我们的每次突然进攻都给敌人带来巨大损失,要比我们的损失多好几倍。有一次,我们的两个连在敌后作战,敌人有3000多人,一天的战斗结束后,敌人消耗多发炮弹,伤亡400到500人,而我们的伤亡不到60人。另外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连同敌人作战,敌人有500到600人,结果敌人伤亡50到60人,而我方没有任何伤亡。还有一次,我们一个30到40人的排彻底消灭了敌人一个140到150人的连,缴获了他们的所有武器。还有这样的事:我们一个营夜里袭击由强大敌军守卫的机场,我们的营得以潜入机场内,摧毁了那里的21架飞机。他们同机场卫兵进行刺刀战,

结果营长和其他几十名战士被杀死。但敌方损失了 21 架飞机,许多士兵伤亡。总之,敌人的损失超过了我们的损失。八路军在山西省的对日作战中,由于运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造成很多次惨重失败和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人在山西省同八路军的 8 个月战斗中大约伤亡 3 万人,而八路军的伤亡人数不到敌人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种战术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战术。在我们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的日记,他写道:“当我们碰到八路军时,我就头痛,因为八路军神出鬼没,难以跟踪它的去向。”

在对敌作战中,我们采取这样的战术,即:在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竭力避免巨大伤亡,迅速退却,以便把敌人拖入运动战并消灭它。敌人非常了解其他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但很不了解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八路军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是永远不清楚的。他们很难把我们拖入决战。

八路军在战略战术方面。在群众的政治工作方面和游击作战方面,都起了模范作用,在各个方面都是其他中国军队的推动力。蒋介石也逐渐开始相信八路军的战斗能力及其指挥的才能。最近蒋介石将 7 个师和 1 个旅交给八路军指挥。尽管如此,八路军由于缺少重武器,如大炮、坦克、飞机等,今天还不能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持久的阵地战。因此,八路军在同日本军队的决战中还不能在其他中国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的内部状况

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是国民党极其害怕的。去年,汪精卫说:“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存在着两个不同政府和两支不同军队的国家,任何地方都只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在法国,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但它没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统一战线,那它应该取消红军和苏区。”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蒋介石允许从红军部队中建立三

个师,并给这些师发军饷。他要求我们不建立自己的总司令部,把这三个师交给他来直接指挥。他要求朱德和毛泽东去国外,或者在中央政府工作。他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削弱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他希望任命副师长、参谋长、副政治部主任。他要求我们的军队干部到他的部队去工作,美其名曰交流干部,交流工作经验。他要求我们的政工干部到南京去,在那里进行培训,然后才能回八路军工作。他要求八路军实施的教育和供给制度也和其他中国军队一样,等等。

当时红军的人数超过了三个师所必要的人数,但为避免争论起见,我们同意建立三个师。在对日作战开始后,蒋介石给了正式的名称,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建立该军的司令部。而蒋介石的其他要求被我们坚决拒绝。最近我们同意接受蒋介石派到八路军中来的四名参谋官(各师一名参谋官,司令部一名参谋官)。但这些参谋官只起联络作用。当然,蒋介石竭力利用这些参谋官来探听八路军的内部状况,并进行瓦解我们部队的工作。我们对他们非常客气,但一刻也不放松监视他们的行动。

当蒋介石的要求被我们拒绝后,他拒绝扩充八路军。他希望在抗战中八路军耗尽自己的力量,以后不可能再恢复。为此他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他拒绝扩充八路军,并采取了一些限制我们扩充的措施。第二,他拒绝供给我们武器。第三,他不增加拨款,并下令禁止部队用当地的粮食供给自己^①。此外,他还试图收买八路军干部。但问题是八路军会打仗,因此这股力量还是有必要的。因此,蒋介石也不能不继续供给我们必要的弹药和一定数量的装备等。

如上所述,蒋介石的一系列要求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八路军虽然现在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它完全保留了我们红军的制度。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用当地居民的粮食。

完全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我们向国民党正式声明,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不能放弃或者削弱对八路军的领导。现在在八路军团以上单位都建立了坚强的政治部。在营里有政治教导员,连里有政治指导员,在团、旅、师里有政治委员。营以上的政治和军事干部完全是共产党员。90%连和排的指挥人员是共产党员。在所有连队里都有共产党支部。开往山西省的八路军部队45%的指战员是共产党员。这是开始的时期。现在,由于共产党员伤亡很多,由于军队扩充,共产党员只占全部的20%。

在八路军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中享有最高的威信和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八路军的社会成分和过去一样多半由工农组成。工人、手工业者和雇农占八路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贫农和中农约占三分之二。此外,八路军里有少量的知识分子。在八路军部队中经常系统地进行党的政治教育。虽然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损失了不少有生力量,虽然它还不能得到政府方面的补充,也由于中央政府设立的现有限制措施而不能扩充自己的队伍,但是八路军仍能像过去一样进行招募新兵的工作。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仅是补充自己的伤亡,而且是扩充和增加八路军的人数。

由于八路军同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也由于招募新兵工作的丰富经验,我们在作战过程中成立了许多由干练的干部和战士组成的队伍来在作战地区进行招募八路军新兵的工作。为八路军招募新兵的运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支持。山西省的工人和农民志愿积极地参加八路军队伍。群众说:“如果我当兵,我一定要当八路军的兵”。在八路军中不存在体罚。政府是用强制方式进行征兵的,因此它很难招募新兵。相反,这种征兵在群众中引起愤懑。而我们征兵时,群众很乐意并大量地加入我们的队伍。过去,政府和其他部队招募新兵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要求接受他们加

入八路军队伍。

因此,关于补充兵员的问题对于八路军来说没有任何困难。1937年三四个内,在山西作战的八路军部队不仅补充了损失,而且扩大了两倍的人员。只是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在去年底停止了招募新兵的工作。如果武器装备和经费问题得以解决,那么八路军就能很容易地完成今年扩军10万的任务。

由于八路军部队的迅速扩大和我们干部的一些伤亡,目前八路军严重感到军政干部的缺乏。不久前刚参加八路军的许多新兵还没有服装。冬天他们没有棉衣。虽然规定了战士的薪饷(每月一元钱的零花钱),但由于经费困难,我们连这样的零花钱也不能按时发放。虽然也规定了伙食费每月五元钱,但我们不能完全兑现。至于我们的干部,他们的生活也和所有普通战士一样。曾经规定,连长和排长的薪饷每月三元,团长每月四元。师长和军长每月五元。但由于经费困难,这样的薪饷我们也不能完全发给。经济状况比起其他军队领导人员的经济状况要困难得多。例如,在其他军队中,一个连长每月得到的薪饷是100多元,师长是800元,军长是每月1000多元。

我们的武器很不够。许多新战士参加作战,要么带手榴弹,要么赤手空拳。当然,他们可以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部分地武装自己,但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往往不是都能用的,因为敌人在失败时常常破坏自己的武器,因此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有时根本不能用。

除八路军以外,还有新编第四军。

第四军是由华中和华南各苏区,即江西、福建省苏区、闽浙皖、赣湘、赣湘鄂、鄂豫皖边区等以前的游击队组成的。在这些地区存在游击队,它们是在三四年前,当红军主力西进的时候,留在这里的。这些游击队三四年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国民党部队作战,并在这些战斗中取得了丰富的游击经验。

在这些游击队中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在这些游击队中有很好的政治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不愿把它们改编为独立的部队,而想把它们分编到各部队中去。只是在经过漫长谈判后,国民党才同意成立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

第四军集中在不同地区。大部分部队现在作为游击队在南京、芜湖、上海、杭州等地区活动。另一部分深入日本军队的后方,现在正向长江以北推进,即安徽省北部。近来,在南京和杭州地区激烈地展开了游击战。显然,这正是新编第四军在活动。

(三)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军事任务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能够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巨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党必须克服各种困难,继续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这意味着,八路军不仅要增加自己的人数,而且也要使我们的所有部队在技术素养上提高自己的水平,使其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样才能在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最强大的突击力量。

这不仅是为使敌人遭到惨重失败所必要的,也是为推进自卫战事业所必要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十分注意提高现有干部的技术素养水平,培养掌握新军事技术的新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其次,游击战在抗日事业中可能起极重要的作用。在中日战争日益扩大情况下特别是在汉口和其他城市落入日本人之手情况下,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地理和其他条件,游击战的作用和意义将会更加提高。游击战可能成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极重要力量。晋察冀边区游击战的经验表明,游击战是我们赖以在敌后建立强大武装力量的手段,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应该竭力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以便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中起主要的领导作用。最近,中国共产党选派一部分干部到敌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去,以便在那里建立像晋察冀边区那样的游击战基地。

考虑到国民党仍企图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者、汉奸和托洛茨基匪帮将会同以往一样竭力破坏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我们部队里已发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是在我们最近扩大八路军的运动时潜入到我们中间来的),考虑到目前的斗争形势要比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复杂得多,外人对我们部队的影响比较容易渗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我们部队中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原红军在十年斗争中取得的光荣传统,提高我军战士的政治水平,提高我们部队中的警惕性,以便使异己的敌对影响不能渗入到我们的部队中来,使托洛茨基匪帮、汉奸不能干他们可耻的勾当。这一切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己军事力量方面的极重要任务。

四、群众运动的状况与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

9个月来,中国人民英勇地参加了抗日战争,但群众运动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这是由于国民党害怕它的发展并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它。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5至1927年)教育了中国人民仇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尽管战争带来了惨重的牺牲,但中国人民决不愿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而是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开展自己的活动。各地游击战的开展足以鲜明地表明了人民大众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最残酷和最野蛮的战争手段,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并向他们的意识中灌输对战争的恐惧。日本军队在他们占领的地区烧毁房屋,残暴地枪杀和平居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到处轰炸中国的和平居民。日本军队由于害怕和平居民参加抗日斗争和对付游击队就烧毁整个的村庄和城市,枪杀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和平居民,特别是在发生游击队和中国军队袭击日本

军队的地方。例如,在山西省的一个只有 3000 人的小县城里,就杀害了 2000 多人。甚至杀害了两三岁的儿童。在另一个有 100 多人的村庄里,那里农民们起来反对日本人对妇女的强暴,日本军队就包围这个村庄,把所有男女老少都剖腹并焚烧。在南京陷落后,他们枪杀了 4 万多和平居民。强奸中国妇女和姑娘是普遍现象。日本军队认为这是合法行为。至于掠夺财物,那也被认为是平常的行为。从上海、南京、太原掠夺来的财物整车整车和整船整船地运往日本。

在和平居民中,许多人死于空袭轰炸。枪杀和平居民,强奸妇女,掠夺财物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因此在靠近前线地带和在敌占区,居民们自发地起来抗日,采取了各种斗争方式。

在整个中国正在开展保卫祖国的群众运动。国民党试图控制这个运动。但群众运动如此广泛地开展起来,以致国民党难以控制。此后,国民党就开始自己组织群众,目的是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和监督之下。

工人阶级在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中起着先锋作用,尤其是运输业和军事工业中的工人。他们不顾危险和牺牲,修复被日本炸毁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事运输的畅通。

敌占区的工人,上海、山东、北平和许多铁路线上的工人,都独立地组成了游击队,参加群众性的武装组织。上海工人在上海保卫战时,组织了支援军队的队伍,积极帮助军队保卫上海。

靠近前线地带和敌人后方的农民们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他们在靠近前线地带,承担了巨大的和重要的军事义务,如供给军队马匹和大车,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修筑工事和道路,参加武装组织,等等。敌后的农民们大批地参加游击队和其他武装组织。(然而农民运动,除了一些省份如广东、广西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外,还不够开展。)

大学生、知识分子在抗日运动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大学生除了参加救国团体以外,还进行鼓动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战争进行9个月以来,许多大学生参了军。现在省和中央的军队吸收了许多大学生,在进行强化的军事政治训练,把他们培养成军政干部。许多大学生是作为普通战士参军的。不少大学生参加游击运动。城市贫民,特别是在敌人占领的城市,处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大批地参军。

妇女甚至儿童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成立了许多支前队,流动的话剧组,他们经常到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和文化工作,在敌后则收集赠品,对伤兵进行医护救助。例如在上海,由工人、贫民的孩子和年龄从8岁到18岁的学生组成了儿童剧团。他们不顾危险到前线去,为部队和当地居民演宣传鼓动性活报剧。

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阶层是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积极的力量。工人和农民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在日益提高。

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了抗日斗争的立场上。它希望战胜日本,但它对彻底战胜日本信心不足。由于一些大城市的陷落,它失去了许多企业。目前它虽然也希望战胜日本,但它根据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害怕共产党掌握抗日运动的领导权,所以也害怕群众运动的发展。这种心理反应在国民党限制群众运动发展的政策中。

地主阶级在抗日斗争中占有什么地位呢?部分大地主和豪绅被日本人用来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组建傀儡政府。中小地主看到日本人的残酷的野蛮政策,目前还表示同情抗日战争。例如在游击地区,他们给游击队供应部分粮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占领区实行统治,要在地主、豪绅、官僚、旧军阀和游民中寻找社会基础。因此,我们的政策是不激化对地主的斗争,不把它推到日本方面去。而同汉奸和日本侵略者走狗进行斗争,但不把汉奸和所有地主画等号。进而我们可以使地主保持中立,至少不让他们去直

接帮助日本侵略者。

这场抗日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积压的民族仇恨,因此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中国军队尽管比日本军队的技术装备要差,但在保卫上海、汉口、忻口等激烈的战斗中的自己的鲜血和英勇牺牲抵抗了日本的进攻。所有中国军队遭受了巨大牺牲,例如,桂军在开赴前线的24个团中现在只剩下7个团,由4个师和1个旅组成的粤军只剩下1个师和1个旅。在北线,经过激战3万多战士只剩下5000到6000人。这些损失大部分是伤亡,被日本人俘虏的很少(在汉口近郊的战役中,一个团坚守着重要的开阔阵地,结果这个团全部牺牲。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时只留下一个营(约800名战士),准备牺牲自己来保卫一幢大楼作为掩护撤退的主要据点。中国军队从上海撤离后,这个营被敌人包围,坚持战斗了一个多星期。最后这个营的多数战士英勇地突破了包围。一位曾在空战中受伤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向日本士兵人群中,他自己牺牲了,但杀死了几十个日本兵)。

类似的英雄主义事迹在普通居民中也有许多,例如:上海工人组织了支援军队的队伍,尽管缺乏作战经验,他们在战斗的紧急关头还独自首先投入了对敌人的进攻。有一支队伍(约一个营)牺牲了三分之二人员,但夺取了机枪阵地。

(由工人支军队伍中抽调出来的军事训练班学员100多人投入战斗,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只有5人生还,其余全部牺牲。在天津,日本人抓获了一名中国司机,日本人强迫他开车,他却不顾自己的生命,把车开到了河里)。群众找到了许多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新方法。例如:山西、河北省的农民换上妇女的衣服,把日本士兵引诱到自己队伍设伏的地方,把他们活捉,或者用酒把日本士兵和军官灌醉,杀死他们或把他们缴械。

游击队在敌占区的这种英勇斗争事例,可以举出很多。

中国后方的工人和职员每月都减薪支援抗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公民捐献自己的全部财产)。一名人力车夫捐出了自己三年来全部几十元的积蓄。在美国和南洋群岛的华侨积极为祖国捐献。

总之,中国人民不管战争造成的重大牺牲,将坚定不移地进行武装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不管国民党的种种限制,民众的抗日运动在日益扩大和深入。毫无疑问,抗战持续越久,群众在抗日斗争中的力量就越大。

(二)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党组织的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广大群众中享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威望。我们党出版的报刊在广大群众中很受欢迎。我们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的发行量达到3万份。今年1月份开始发行我们的《新华日报》。到2月份,该报的发行量已超过2万份。据苏联报刊的最新消息,《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已达5万份(这就是说,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报纸)。在汉口出版的《群众》^①周刊发行量为2万份。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开始出版《前线》周刊,至今发行量达1万份。除了我们出版的报刊以外,还有诸如文化世界组织^②和救国会^③在大范围出版的其他小册子。这些报刊和小册子都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在上海直到沦陷前,有53家各种杂志,其中49家处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目前在汉口出版40家各种杂志,其中有38家处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此外,在广州、长沙、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还出版为数众多的报纸和杂志。其中许多报刊是同情我们或者处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许多出版社主动地出版关于八路军的小册子,或者搜集我们党报刊上的文章,然后以小册

① 《群众》周刊于1938年1月至9月在武汉出版,随后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全国抗敌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

③ 原文如此,指全国民族救亡联合会(见第10页注①)。

子的形式单独出版,因为他们知道,载有我们的文章,载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领导人文章的小册子可以很快销售出去。因此,许多出版社虽然抱着投机的目的,但也在为我们做宣传方面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我们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威信的极大提高引起了一些国民党的不安。他们诽谤说:“共产党把政府拨给八路军薪饷的十分之九用来进行宣传。”实际上,我们没有花自己的经费来出版这些通俗的小册子。

由于根据我们的倡议建立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取得了合法或半合法存在的可能。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由于在内战时期(十年间)我们在国统区的工作和组织遭到国民党恐怖的破坏,我们只有在建立统一战线后才能开始恢复自己的工作和组织。山西省的党组织在西安事变后逐渐恢复起来了。在西安和山西省^①已经奠定了我们组织的基础。在西安市和省的其他县里的许多群众组织(救亡团体)都处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国民党下令解散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西安市救亡团体)。我们现在正采取一切努力,以便使群众团体得以合法存在,并和国民党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最近半年来,山西省的党组织在八路军的协助下有了巨大发展。它们在游击运动和群众组织中起非常巨大的领导作用。山东省和河南省北部的党组织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它们现正在竭力组织和领导游击斗争。上海市的一些党组织在上海保卫战时已恢复,并有些发展。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许多同志不得不离开上海,而党的工作又处于困难的境地。

已派工作人员去山东、湖南、湖北和四川省恢复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结果在这些省恢复和重新建立了一些党组织,但党员数量暂时还不大。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陕西省。

我们的同志现在在国民党允许的群众组织中工作,如救国会、学生会、妇女组织等。应当指出,我们党在工人中的工作还依旧很薄弱。

在作战行动开始后,国民党只允许成立抗日促进会作为合法的组织,并从国民党地方组织中选派人员去领导这些团体。此外,在城市工人和运输工人中有国民党以前建立的工会。但这些组织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群众运动方面,我们党现在在实行统一的政策。在工人运动方面,我们党在号召工人们参加国民党的工会,而不是成立独立的工会。过去存在的红色工会现在也加入国民党的工会。在没有工会的地方,我们利用国民党允许的工会组织形式来建立这样的工会。我们的任务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合法存在的组织,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扩大这些组织内部民主和我们的影响。

在敌后被我们恢复重建的地区,我们享有很大的流动自由,因为在这里国民党不能限制我们的活动场所,因此这里的工作以迅速开展。在这些地区,我们也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敌后中国政权恢复的地方,各种政党和派别允许合法存在。在同他们的合作中,不仅恢复了政权,而且建立了群众工作。在这些地区,我们党起着领导作用。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群众武装,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在群众斗争方面,我们应竭力在可能范围内改善劳动大众的物质条件,但我们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和口号。我们应该利用合法的形式来实现群众物质状况改善。我们不应不加思索地号召群众采取直接行动,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是不合时宜的。

总的说来,国统区党的工作还处在恢复的时期。党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是大的,但是有组织的力量还落后,特别是在工人运动中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但应该注意到,解放战争的进程会创造条件来恢复和展开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善于实行正确的政策,那

么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就可以和将会迅速地发展。最近党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①，将详细讨论群众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问题。

特区的状况

现在的特区即过去的苏区有着相当辽阔的土地，但那里的人口很稀少^②。这个地区的人口约有 100 万，是山区。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不多。特区的土地早已分配给农民。地主已经消灭。在特区，党有着坚固的基础。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

我们党在特区的政策是：要把特区变成统一战线的示范区。同时特区应当成为最民主的地区，以推动全国走上民主的道路。最近我们允许在特区建立国民党的支部和组织。在特区实行政府机关的彻底民主选举。允许所有政党参加政权机关的选举。我们允许国民党在特区合法存在和工作，代之我们也争取我党在国统区合法存在和合法活动。

在特区，我们正在加强军事动员工作。在整个地区建立了自卫队，人数超过 10 万。建立了青年近卫队，有 5 万多青年参加。现在正在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必要时这些队伍的成员可以补充到八路军中去。特区政府在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如播种运动，目的是增加粮食生产的播种面积。去年由于这项工作增加了 10 万亩播种面积，粮食生产增加了 20%。

特区的工人有自己的工会，会员有 3.5 万。特区有像印刷厂、兵工厂和缝纫作坊这样的企业，所有企业都属于政府。其余的工人是手工业者。

除了工会以外，还有救国青年团^③，有 6 万多团员。有儿童团

① 见第 15 页注①。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应为“青年救国团”，是 1938 年 2 月在青年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主席是刘建。

组织,大约有7万多儿童。

国民党想派中抗委委员丁惟汾到特区来担任政府主席。我们当时拒绝接受他。后来我们同意他的任命。但至今他也没有来,而中央政府也没有正式承认特区政府为合法政府。

(三)中国共产党在党建方面的任务

近两年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威望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团结中国其他军队对日斗争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将会更加起到领导作用。中国抗日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取决于共产党的政策有多么正确。国内外敌人很清楚共产党在救国方面的作用,自然,他们将会不断地企图破坏我们党。

因此,加强我们的党组织及其领导,提高全体党员的警惕性,堵住日本和外国间谍、特务和托派分子潜入我们党组织的一切途径,揭露和清除党的队伍中的异己分子——这些就是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

另一项极重要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建立党组织。为此首先必须在重要的大城市,在产业工人和运输业工人中,以及在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地区和日本占领的地区建立党组织。应该广泛地吸收工人入党,以便提高工人在党内的比例。还应该吸收贫苦农民和进步学生入党。因此我们党必须加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加强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中的领导是党的主要任务。

考虑到刚入党的党员中农民成分占了多数和很大比例,党内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所有党都深刻和正确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此外,托派分子和其他各种敌人都利用这一弱点来破坏党的能力。因此,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详细解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高党员的理论

政治水平是摆在党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才能加强党的能力和组织,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托派分子和其他各种敌人不能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党,并保证党的统一。

培养能够独立工作并在地方上担任领导的干部,深入研究统一战线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建立地方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机构,这些就是迅速提高和加强党在抗日斗争中的能力的极重要环节之一。

为了对最近十年来的工作和斗争作出总结并保证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议程上提出了以下问题:

1. 十年来斗争的基本总结和目前斗争的主要任务。
2. 如何组织和保证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
3. 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4. 新的工作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
5. 选举党的领导机构问题。

目前党正在进行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指导和指示,并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891, 第 3—66 页。

打字稿, 原件。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 第 22 号记录

(摘录)

1938 年 5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关于中国共产党。

报告人：陈林^①同志。

决定：采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建议：责成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来讨论和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季米特洛夫、坎贝尔、李约翰^②、弗洛林、加尔兰奇^③、科普列宁、科拉罗夫、库西宁(负责人)、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④、洛佐夫斯基、陈林、契契特金娜、瓦尔加。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267,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任弼时。

② 王稼祥。

③ 格利耶科·鲁德日罗。

④ M. A. 特里利塞尔。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 第 24(A)号记录

1938 年 6 月 1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31)——关于中国共产党。

决定:批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1938 年 5 月 25 日^①)成立的委员会^②起草的下列文件:

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③。
2.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的决定^④。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作出的决议^⑤。

(飞行表决于[19]38 年 6 月 10 日进行:季米特洛夫、弗洛林、库西宁、科拉罗夫、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莫斯科文^⑥、米哈

① 原文如此,应为 5 月 17 日。

② 见第 19 号文件。

③ 见第 21 号文件。

④ 见第 22 号文件。

⑤ 见第 23 号文件。

⑥ M. A. 特里利塞尔。

依尔·沃尔弗^①、瓦尔加、茨哈卡亚、皮克)。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269, 第 3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米哈依尔·法尔加什。

2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①

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

秘密

给予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全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读了以下声明：

1. 中国共产党及时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不会仅限于占领满洲，而将企图吞食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族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国，从自己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结束十年内战，并同国民党达成友好合作。这些愿望也对国民党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②，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代理人策划的谋害蒋介石生命，指望在中国挑起新的内战的卑鄙图谋之后。从那时起，国共之间开始接近，后来导致双方的合作。

2.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1937年秋开始侵占华北和华中大片土地，原指望迅速而轻易获胜，指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指望以华制华，但他们大大失算了。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没有像东京统治集团所期待的那样投降，而是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反对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奋起进行不愧为伟大人民的英勇斗争。不久以后，武

① 标题原文如此。声明于1938年6月10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飞行表决通过并在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得到批准。（见第20号文件）

② 见第53页注①。

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遭到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给日本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犯变成了对他们来说艰难的持久战。这场战争日益要求日本付出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而战争拖得越久,日本的困难也越多,它强盗般侵略行动彻底失败的日子则越近。

3. 但在近期,中国人民还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要求作出英勇的努力。进行反对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卫战,这是对我国人民一切有生力量的巨大考验。只有团结我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才能保证我们取得胜利。但最近几个月来的经验已经表明,正是这场解放战争在强有力地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那些造成国家分裂的旧的千年壁垒被打破,一个把我们四万万人民结成一股力量,结成一个真正统一的民族的伟大进程正在完成。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就在于此。

4. 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中国整个国家政权和所有军队统归蒋介石指挥的局面已在实现。这些因素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形成紧密战斗团结的基础。但这个统一战线还不够广泛,不够巩固。**它的扩大和加强是中国进行胜利自卫的决定性条件。**抗日民族战线应该包括中国一切抗日党派和政治团体。还需要参加这一战线的各方真正紧密的接近,实行国民政府的正确政策。需要充分的相互信任。需要完全安排好的共同工作和共同责任。

5. 中国劳动群众组织性的薄弱,阻碍和延缓了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的工作。为了克服这一弱点,必须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大力着手吸引劳动者参加业已存在的和新成立的各种组织,从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牢固的基层群众基础。首先要组织工人参加工会,把现时存在的工会变成真正广泛的群众性组织,使之成为民族抗日斗争中特别重要和特别可靠的堡垒。在日

本人占领区,最好是以相应形式建立一些不大的工会运动据点。

6. 占中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没有他们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长期的战争。为了提高收成和引起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以及保卫国家的各项工作的兴趣,必须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还应注意在农民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在日本人占领区,农民要组织游击队,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7. 同时,面临着的一项任务,是要激发青年在保卫祖国的各个方面,在前线,在后方,在生产中的全面积极性;不仅要帮助青年学生,也要帮助青年工人和农民组织各种社团,参加伟大的救国事业。首先,共产党要支持国民党成立的全国青年团^①,协助它发展成为真正的中国青年统一的组织,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工作,包罗青年一代的广大群众。

还需要进行广泛的工作,吸收千百万中国妇女群众有组织地参加保卫祖国的事业,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自由,进而也为中国妇女争取自由和光明的未来。

8.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害怕的莫过于中国人民的团结。他们在前线发动进攻,而且在中国后方进行不断的破坏工作。他们的特务间谍在中国各政党之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调唆紧张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托派走狗特别阴险地企图散布不信任,挑起国民党员对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新的敌意。因此,中共认为,共产党人和中国所有正直的爱国者必须警惕地注视日本法西斯分子及其中国代理人旨在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改善日军在前线的处境的卑鄙阴谋。必须迅速揭露和坚决消灭阴险敌人的所有恶毒的暗中代理人。

与此同时,党正在加强自己的队伍,清除那些反对抗日统一战

^① 原文如此,指“三民主义青年团”(见第61页注^①)。

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原中共中央委员张国焘，他是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逃兵和叛徒。党还将在今后无情地对待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我们伟大人民利益之上的人。

中国共产党深信，全面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将保证我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胜利。我们党不认为，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合作是一年半载的事情，而准备在战后，在建设伟大、自由、民主中国的事业上继续与他们合作共事。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269，第 53—57 页。

打字稿，原件。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①

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

1.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取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争。

2. 主席团认为将原党中央委员张国焘开除出党是正确的,他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事业,效忠于中国人民的敌人。主席团相信,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不仅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而且也会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真诚拥护者中遭到彻底谴责和蔑视。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激起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同情。整个进步人类意识到,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仅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之免遭野蛮的暴力,而且也在保卫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和平事业,使之免遭野蛮的

^① 决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于6月10日飞行表决通过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6月11日的会议上得到批准(见第20号文件)。文件的删节本发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83—284页。

暴力。如果野蛮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一旦征服中国人民,那就意味着法西斯侵略不仅在亚洲、太平洋,而且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异乎寻常的加强和扩大,而中国的胜利则将是对一切法西斯侵略者的侵略计划的一个有力的打击。由此看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整个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切民主和和平力量必须也应该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西班牙人民的援助。这种国际支援现在还组织得不够:它的规模远没有达到对中国人民普遍同情的广泛规模。应该在各地把这些同情变为积极的行动,并把事情组织成这样:

- 第一,不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支持和援助中国;
- 第二,加大日本军阀在中国实行侵略方面的困难和障碍。

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国际无产阶级,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向一切民主和和平的真诚拥护者呼吁,号召他们首先完成以下任务:

(1)大力加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运动;在国际报刊上和整个运动中,必须比迄今为止更加有力地一方面反映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另一方面反映中国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英勇精神;

(2)开展广泛的抗敌运动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强盗行径,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等,并把群众的愤怒也引到反对资本主义各国被收买的亲日报纸上;

(3)组织和扩大对日本侵略者的群众性制裁(抵制日货运动,工人拒绝装卸日货和向日本运出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等);

(4)加强为中国募捐及运送药品和救护用品工作;

(5)克服一切困难帮助日本劳动者大力开展反法西斯和反战工作;

(6)按照与中国政府的协议,从各国派遣权威代表团去中国,以便加强支持中国人民的国际运动。

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民主力量切实支持中国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必将彻底战胜日本军阀的野蛮行径,并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它将是全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堡垒。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269,第 71—73 页。

打字稿,原件。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就中共中央代表^①的报告通过的决议^②

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取了关于中共活动的报告后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所灵活实行的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致使国共两党重新进行合作,使各民族力量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在用来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贯彻这一正确路线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筹备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③的情况下,必须在对中共中央代表的声明^④中所提出的任务作出补充时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其他抗日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目的。任何这种企图只能导致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和对中国人民武装抵抗力量的破坏。为全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所接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保障]民生。忠实地实现这个三民主义是进一

① 任弼时。见第18、19号文件。

② 文件标题。决议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于6月10日飞行表决通过并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得到批准(见第20号文件)。

③ 见第15页注①。

④ 原文如此,应为报告。

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政治条件。孙中山学说所要求的民主首先是要尊重共产党以及其他忠实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政党的独立性。共产党方面则应大力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执行为胜利进行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共产党人应该真诚地支持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共产党人应该以自己在保卫祖国事业上的忠诚、坚定、英勇、诚实和始终不渝精神为全体中国爱国者作出表率。

2.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贯彻执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新的军队和动员全国人民参战方面；在加强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和纪律、加强各中国军队之间及其与居民之间的友谊方面给予国民政府以积极的帮助。共产党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一切能力来进一步开展敌后的游击运动，并根据光荣的八路军^①在山西省活动地区的范例来帮助建立一些游击运动的基地。

3. 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竭力促进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使整个国民经济适应民族解放战争的需求；争取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有一定的改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系统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纪律性和组织性。

4. 中国共产党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方面要真诚而忠实地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这不排除而是首先要求不断地反对亲日派和妥协派企图投降和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及企图分裂民族统一战线。同入侵国家腹地的外敌所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发展，民众对日本野蛮行径的仇恨和民众救国运动的普遍高涨会为向日本投降和妥协的可能性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 and 间谍，特别是托派分子，始终在企图利用政党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遗留下来的不信任来煽起内部斗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险计划。有鉴于此，必须使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密切关系，共同揭露日本的

阴谋诡计,消灭日本间谍、汉奸和托派分子,孤立亲日派和蓄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人。

5.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在政治上是建立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同进行民族自卫战的必要性基础之上的,它使共产党人有责任在切实实行孙中山进步原则方面对国民党施加影响。无可争辩的进步是:国民党上层领导放弃了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摇摆政策,毫无疑问,武装抵抗的继续促使国民党在坚持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方面和在使国家实行民主化及满足人民大众物质和社会需要方面都走上了继续进步的道路。但同时,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队伍内,还存在保守倾向,大大阻碍着国家的民主化,阻碍着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及提高他们的组织性和开展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

因此必须友好地说服国民党的领导人、党员及其拥护者,使他们相信在战争环境中实行进步的民主政策不仅可能,而且这是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的利益所直接要求的。

6. 大胆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排除,而且首先要求全面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共产党本身。党的加强、党的独立性和团结正是进一步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进而胜利地继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保障。然而,在特区和游击区以外的中国广大土地上建立党组织的工作还很薄弱。因此必须在全国,首先在大城市,战略要地,在军事工业的工人中,在铁路员工中建立党组织,使共产党成为全国的强大的群众性组织,与党已经拥有的广泛政治影响相适应。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必须建立灵活的和坚强的地下党组织。

7. 在工会运动方面,共产党人只应在合法的(国民党的)工会中工作,使红色工会所有遗留下来的人员都参加这些工会,普遍招募工人加入这些工会,始终维护工会运动的统一。共产党人应致力于扩大这些工会中的内部民主,使它们变成真正广泛的群众性

组织,以便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8. 在农民工作方面,为了提高农民对自卫战的关切和积极性。必须争取改善他们极端贫困和无权的状况,竭力帮助农民组织和建立自卫队和其他合法组织,特别是在前线附近一带和战略要地。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必须把农民组织成游击队,并采取与日本强盗作斗争的其他形式。

9. 在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人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方面,必须开展广泛的工作,因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他们中间进行蛊惑宣传和挑拨离间的工作;必须帮助蒙古人和穆斯林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生命,反对日本侵略者。

10. 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强和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在这些部队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技术训练。共产党人应该努力使八路军和第四军以其对人民事业的忠诚,英勇精神,巧妙的作战行动,高度的纪律性和模范的政治工作,表明自己是全国军队中最先进的突击部队。应特别注意克服一切想把八路军和第四军孤立起来的企图,发展它们与中国其他所有军队的密切关系和友谊,以便向它们传授自己的斗争经验,使它们走上进一步加强战斗力、提高政治觉悟和纪律性的道路。

共产党人在继续大力组织敌后游击队和游击区时,应该本着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政策精神和承认中央国民政府政权的精神来进行这项工作。在各地要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战俘组织政治说服工作。

在特区,共产党人应该实行始终不渝的政策和做以下方面的工作: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并使地区民主化,以便显示出它是全中国最民主的组成部分的典范。

11.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以及自己队伍内的铁的纪律。敌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加强其

在中共内部的破坏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党的干部和党员,清除党内的可疑分子、伪装的托派分子和其他敌人,并采取特别措施防止这些分子潜入党的队伍。

应该特别注意国民党内的日本代理人和反共分子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同志和干部中制造分裂和混乱,采用各种阴谋诡计和其他方式方法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保持党和八路军领导的团结,是贯彻党的政策,加强同国民党的合作,进一步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极重要条件。

在加强党的工作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重新教育老的干部和培养从群众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并不断根除一切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倾向的残余。

12. 共产国际执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将原中共中央委员张国焘开除出党是正确的,他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卖身于中国人民的敌人。主席团相信,张国焘的叛卖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内,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所有忠实拥护者中间将会遭到彻底的谴责和蔑视。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会为开展党的整个工作提供新的动力,从而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起着光荣的作用。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269,第 13—19 页。

打字稿,原件。

24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给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

1938年11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发自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①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导师斯大林同志和世界革命司令部——共产国际的舵手季米特洛夫同志致以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斯大林同志，您是伟大的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过去和现在都给予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作出许多极其宝贵的指示。

季米特洛夫同志，您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②上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特别是给予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和帮助。近三年来的世界事变，特别是中国的事变过去和现在都表明，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们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四亿五千万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你们的领导和帮助下，在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的英勇斗争中实

^① 全会于1938年9月2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② 见第2页注^①。

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过去国内各党派之间、军队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斗争转到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结果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所实行的政策有了改变，十年内战结束了，神圣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开展起来了。尽管在16个月的艰苦抗日自卫战中，我们遭到了一系列军事失利，特别是目前，失去了武汉和广州，尽管抗日自卫战处在特别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们党，经过1925至1927年的革命，经过苏维埃运动，经过长期战时生活的磨炼，已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政党，决不会向困难投降。它将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冷静和理智来克服这些困难，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以鼓舞英雄的工人阶级、伟大的中国人民去进行坚决的抗日斗争，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争取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彻底解放中国人民。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表明了我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同心协力地讨论了抗日斗争的目前形势并制定了具体任务——实行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坚定不移地进行长期的抗日战争，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摆脱这种困境，阻止敌人的进攻，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进行反攻，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建立独立的幸福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而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

陈林^①

全宗495，目录74，卷宗291，第25—26页。

打字稿，副体。

^① 任弼时。

25

关于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①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938年11月6日于延安

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②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党在政治局领导,全党同志努力,和全国军民拥护之下,在极艰难复杂的条件之下,顺利的完成了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从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政权对立的局面,转变到提出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于抗战基本趋势的分析,对于目前抗战形势的估计和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以及其他事项,扩大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同时扩大的六中全会一致指出下列诸项,以为全党同志努力奋斗的准绳:

① 标题原文如此。(此文件为中文原稿,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册(1936—1938),第746—759页——译者)。

② 见第102页注①。

一、中华民族十六个月抗战的基本总结

日本法西斯军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武装侵占我东北两省之后,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来,更实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来进攻我国北部、中部及南部各省。其目的是全面灭亡我中华民族,吞并我整个国家。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对日实行民族抗战政策的结果,由于共产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的坚持的奋斗,由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已经掀起了伟大的英勇的民族自卫战争。十六个月来的抗战,是我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伟大事件,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团结和进步;长期受外敌压迫的民族抬起头来了,分裂的国家政权统一起来了,对立的党派携手合作了,互相斗争起的军队变成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了,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了,穷苦的民众大批的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了,在敌人后方空前规模的游击战争发动起来了,中华民族的英勇苦斗已为全世界所同情所钦佩了。在抗战烈火中,旧的阻碍进步的和分裂国家的屏障是在破坏着,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为一个统一力量的过程和民族自强的新生命是在生长着。

十六个月的抗战,虽因敌我力量的悬殊,损失了许多的大城市与铁路,牺牲了数十万的英勇战士,全国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灾难。然而我们打破了日寇的速战速决的计划,消灭了敌人数十万兵力和数十万万经费,增加了敌寇内外的困难,博得了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对敌谴责和对我同情。十六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有着抗外寇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然而求得速胜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这是因为,敌是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比较发达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但敌为小国,人少兵少;其进行的战争是野蛮的侵略战争,违反本国人民的利益,遭受世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是在死亡的道路上下发展。我是半殖民地国

家,工业与军事技术比较落后。但我为大国,人多兵多,地大物博;其进行的抗战是进步的民族自卫战争,合于全民族利益,和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在抗战中的中国是在解放、自强的道路上向上发展。因此敌在长期战争中愈战愈难,愈战愈弱,一直到最后失败。我在长期抗战中将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在敌方为进攻—相持—退却,在我方为防御—相持—反攻。在第一个阶段中,我国的统一团结与进步建立起持久战的必要基础。但因敌我力量的悬殊,使我不能不在正面采取防御的战略,在敌后则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敌人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与消耗。这种坚持的结果,将迫使敌人停止其战略上的进攻,而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在我力量准备完毕时,我将配合日寇的更加困难与国际的有利条件,实行反攻,以达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最后胜利。战争的长期性,要求我中华民族长期的艰苦奋斗,要求我国共两党和一切抗日党派长期的亲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保证抗日持久战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

二、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

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与将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一方面我国的困难加多,另一方面我国更加团结与更加进步。武汉广州相继不保,大工商业的丧失,主要铁路的被占领,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的被分割,主要海道的被割断与外援的暂时减少,以及财政经济交通的困难,军火供给的不易,这些都是目前抗战形势及将来相持阶段中感兵力的不足与分散,离开海岸铁路大河的山地战斗,将给日寇以更大的困难,敌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陷敌人于到处受击,忙于应付,消耗疲惫的境地。日本在华南的行动,势将引起美日、英日、法日关系的更加尖锐化。日本坚持侵略

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日本人民处在长期战争的威胁中，而日益增长其反战反法西斯运动。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客观有利条件，而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中心关键，就在于进一步团结我全民族，强固我国共合作，坚定我抗战信心，增长我新生力量，以进行长期的艰苦的百折不挠的民族自卫战争。诚能如此，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无疑的是能够实现的。

三、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上述的总结与抗战形势的估计，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在此基本原则下，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学、文化界、妇女、

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日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十三)团结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日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上述各项,实为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具体的任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相信,由于这些任务的执行,中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之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四、国共长期合作,保证抗战建国大业的胜利, 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

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须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热望,而且是我全中国人民

和一切中国朋友的希望。抗战建国是长期的事业,抗战时期的合作,造成战后合作的基石。强敌的存在,三民主义之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党十余年来的相互关系所给两党党员及全国人民的深刻的教训,全国军民对于两党长期合作的切望以及为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共同目标。所有这一切,就使两党长期合作的事业,具有坚定的科学基础和理论根据,因此就能够把希望变成事实。为此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再一次恳切的责成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互助互让和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党独立性的立场,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这不仅是为了减免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不仅是为了改善和加强两党合作的关系,而且是为了达到两党长期合作的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谨向国民党总裁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六中全会认为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

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中国的内部环境(以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

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公布,国民参政会的召集,省市参政会召集的实现,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的取得,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的逐渐实现,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及敌后方抗日根据地中民主之实施,民生之改善,——所有这一切,都是抗战以来国家制度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具体证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将与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过程相因相成。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实现民族独立的时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奠定其基础的时候。这一新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建立,将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上的空前进步,将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起着光前裕后的伟大作用。

五、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的儿女,以满腔热忱和无限英勇参加反抗日寇保卫祖国的事业,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国际主义战士应有的态度和必需的工作。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自卫战争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模范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应该是在最能打击日寇的地方——前线和敌后方。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根据民权主义的精神,在政治上组织上尊重各党派的独立性,应该成为尊重国民党和各抗日党派的独立性的模范;同时,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队伍中,应该成为智勇善战,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建立优良的官兵一体、军民一体与争取敌军的政治工作的模范。对于这一点,全会特别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全体指战

员,政治工作人员及战斗员,在抗战中已经起了极光荣的作用,以后应该更加发扬这种作用。共产党员在行政工作中,应该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与他人友谊的民主合作的模范。在对待一切非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应该是真诚和尊重合作的模范。因此,广大的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塞维克的政党,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本身的迫切任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广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的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更加改进《新华日报》^①、《解放》^②、《群众》^③等的内容,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等。必须建立和加强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培养在党、政、军、民各种工作中有声望有信仰的领导人才。同时,必须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去反对危害党、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目前“左”倾关门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他们不了解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同时,在于他们不认识抗战形势而产生的左的急性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他们在困难前面失望从而发生对抗战形

势及前途的悲观主义。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当然,各级党部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因不了解和无经验而犯错误的同志们,应当加以耐心的说服和细心的教育,乱给同志加“左”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错误,必须严格的纠正。同时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最后,六中全会特别唤起全党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锐敏的注意力去严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以布尔塞维克应有的党性来揭发和反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采取两面派方法的)反党的和危害党的分子。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是全党的最高领导,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六中全会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干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团结和统一,是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巩固和扩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也是争取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和实现建国大业的最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死敌,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敌,同时又是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先进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与全体先进人类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坚决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我伟大中华民族,在全民族团结,国共长期合作的条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条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在持久的艰苦的奋斗中,进行反对日寇的胜利的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光明的前途已见曙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中华民族的。

《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苏中关系(文献资料集)(1937—1945年)》,莫斯科2000年版第4卷第2册,第362—370页。

26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中国西部) 总领事馆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①

1938年12月9日于乌鲁木齐

秘密

参加谈话的有：督办，外交部驻新疆全权代表王宝强(音)，总领事馆负责人奥夫琴柯和总领事馆翻译瓦西科夫

记录：瓦西科夫

谈话中督办谈到以下两个问题：

1.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支部和组织的问题。
2. 关于在新疆输入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问题。

1. 督办说：这里的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提出建立支部和组织的问题。这一方面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走狗在新疆居民中散布挑拨性谣言，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工作的分散和不必要的误会。督办提请注意这些情况，并告知最近发生的具体事例。

新疆学院出版了印有毛泽东、朱德、孙中山、蒋介石和督办照片的歌曲集，以便在代表中间散发。督办向学院副院长林^②(共产党工作人员)下令以善意的借口没收这些歌曲集，并出版不带任何照片的新的集子。但林没有立即执行这项命令。孟^③(教务长)也

① 文件标题。文件的附信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阅。[19]39年5月10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持同样的立场。督办在与方林^①的会谈中,方本人告知,林和孟到他那里请示如何对待督办的命令。方林告诉他们,应该服从督办的命令。

在这以后,督办的命令才得以执行。接着督办谈到以前同黄^②发生的一件事,等等。

其次,方林告知督办,在他那里集合一些共产党工作人员讨论党的事务。督办对此没有加以反对。不久,督办从莫斯科回来后得知,大批共产党工作人员每星期都到方林那里集合召开党的会议。由于都知道方林和一些工作人员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代表,所以其他工作人员经常在他们那里聚会可能引出不必要的挑拨性谣言,只会给新疆政府和顺利实行六大政策^③带来损害。在督办和方林谈话以后,这类经常集会停止了。接着督办说,他一直知道存在一些党的组织,他不反对这一点。但是近来有一种加强党的工作、组建支部的趋向等,这在新疆目前的情况下会导致破坏工作上的协调,造成某种双重政权,当共产党员认为决策性的机关不是政府,而是自己的党组织时,这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走狗们散布各种挑拨性谣言,这不仅危害新疆政府,也危害抗战中的团结一致。督办指出,蒋介石在某些闲言碎语的影响下担心八路军的增长和加强。如果他得知,新疆共产党员在开展党的工作,而同时不允许国民党员开展党的工作,那么毫无疑问,这会使他产生动摇,结果中国抗战中的统一事业将受到危害。另一方面,这也会给帝国主义者提供口实来散布各种挑拨言论和对苏联的攻击。根据王明^④对督办作出的声明,无论过去和现在到新疆帮助工作的中共

① 邓发。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盛世才的六大政策是:反帝、和平、建设、亲苏、清廉、各民族一律平等(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新疆的活动》乌鲁木齐1996年版第9—10页)。

④ 陈绍禹。

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要完全服从六大政策的要求。过去中共党员(布尔什维克)来新疆帮助工作时,他们都有莫斯科的明确指示,即不建立自己的组织,完全服从政府的指令,避免公开化和给新疆政府及苏联带来危害。过去在这里的中共党员,特别是新到这里来的中共党员,对新疆的特点没有很明确的概念,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社会关系的落后有关。督办说,在与方林的会谈中,他表示愿意召集在这里的中共党员工作人员并和他们谈这个问题。方林不同意这样做,答应亲自去进行解释,但至今也没有进行。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分歧和不协调,为了顺利实行六大政策(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公开方式),必须对这个问题加以明确。督办答应再与方林谈一谈,了解一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方针是否来自中国共产党。如果这个方针是地方性的,那么问题可以在当地解决。而如果这个方针来自中国共产党,那么必须给它发一份说明性的电报。督办最后说,无论如何,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遵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2. 近来,在新疆的书店里,开始从中国输入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这种情况,加上禁止发行三民主义书籍^①,可能导致出现各种挑拨性言论和产生对六大政策的怀疑。考虑到新疆目前的社会状况和实行六大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出于这种考虑,只允许可靠的经过审查的人员直接使用马列主义书籍(在这里督办引证了与孟^②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由于过去没有如此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输入新疆,这个问题也就不具有如此大的意义。而现在,由于大量书籍的涌入,就出现了发行的可能性和发行方式问题。考虑到新疆的情况,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要么公开发行

① 原文如此。

② 何人不详。

马列主义书籍,要么半公开或者秘密地发给相应的^①经过审查的人员。

督办请总领事分析和讨论以上两个问题,然后告知他的意见。
奥夫琴柯答应考虑督办提出的问题。

核对无误^②

1份存档

1份送季米特洛夫

1939年5月7日

全宗495,目录74,卷宗301,第11—14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可靠的。

② 签名字迹不清。

27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 负责人奥夫季延科谈话记录^①

1938年12月21日于乌鲁木齐

绝密

1. 从莫斯科回来后,督办^②根本没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接受他人党的请求。

本月18日,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学^③校长林彪赴莫斯科治病,经过乌鲁木齐时,与方林^④一起拜会了督办并提出以下建议:

“我林彪,受中国共产党之命向督办转达以下情况:

(1)在目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⑤上,召集了各省的共产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明^⑥、康生、朱德等同志。会上作出了关于秘密接受督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正式决定(上述同志作出的决定)。

(2)请盛世才同志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的组织并正式参加党的(工作)生活。”

督办在答复上述建议时,向林彪和方林提出以下问题:

① 文件标题。文件附函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阅[19]39年5月10日。Г.季[米特洛夫]”。

② 盛世才于1938年8月访问莫斯科。

③ 原文如此。指的是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在延安成立。

④ 邓发。

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⑥ 陈绍禹。

(1)是否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①?

(2)苏联政府是否知道?

林彪回答说：“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都不知道这个问题”。

督办说：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过去都不同意我在目前形势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没有批准。”

接着督办问：

“您(林彪)到达莫斯科后是否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这件事?”

林彪回答说：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我暂时不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这件事”。

督办说：

“这件事不报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是不合适的，因为五年来我对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没有任何保密的事情，所以我不应该有任何对他们保密的事情”。

对此方林说：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将来，中国共产党在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督办加入共产党之事以前，首先要通知督办，以便督办自己能先行将此事报告苏联。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将不把此事告诉共产国际，那么我们希望，督办也不要把此事告诉苏联”。

林彪说：

“督办在这件事情上不应感到有任何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承担全部责任。当共产国际和苏联知道这件事情时，那么督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不让他讲这件事并承担全部

^① 见第39号文件。

责任”。

这就是林彪、方林同督办进行的第一次谈话。第二天督办要求再次就上述问题同林彪和方林进行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督办主要想谈三点：

督办将谈：

(1)“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有对共产国际保密的事情，而督办也不应该有对苏联保密的事情。如果这样做，也就是说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保密，那么由此只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损害。这种损害可能引起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好感情和不满情绪。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非常好的、真挚的感情(态度)的表露”。

(2)督办接着将谈：

“目前我不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的组织并做党的工作，因为新疆目前的形势不便于这样做，因为这样可能造成这种危险，即南京政府、蒋介石、帝国主义者以及新疆落后的伊斯兰部族，如维吾尔人等，可能知道此事。此外，可能造成对中国抗战有害的危险性”。

(3)督办下面要谈：

“我上面所说的话绝不表明我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因为我现在没有正式办理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

关于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的原因，督办有如下的揣测：

1. “从莫斯科回来后督办根本没有提出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那么由于什么原因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这个老问题：

(1)可能因为方林向中央汇报说，督办已不像过去那样善意地对待在乌鲁木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因为督办反对共产党组织在新疆公开进行党的工作,反对在乌鲁木齐的秘密共产党组织召集会议。

(3)根据上述两个原因,他们认为,如果督办秘密加入(当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那么,他就不会反对她(不会与她对抗)并且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就会是好的。然而,这些推测都是错误的,因为督办进行了批评并表示了不满,因为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工作中有错误,而不是因为他没有被接受入党。其次,督办反对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公开地和秘密地工作,不是因为他没有被接受入党,而是因为中央政府、帝国主义者和新疆的落后部族将会知道这件事,这会引来很大的误会”。

谈话时上面所说的同时用俄文和中文作了记录。俄文文本同中文文本作了校对。没有任何差别,为了确认它,督办在俄文文本上盖了他的个人印章。督办记录的中文文本在督办那里。

参加谈话的有:督办盛世才、总领事馆负责人伊万·哈里通诺维奇·奥夫季延科和总领事馆翻译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瓦西科夫。

记录—瓦西科夫
核对无误^①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301, 第 7—10 页。

打字稿, 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签名字迹不清。

28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39年1月8日于莫斯科

秘密
亲启

致伏罗希洛夫同志

根据我们的请求,米高扬同志拨给我们 15 吨各种军用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①和中国特区的需要。

请您指示奥尔洛夫同志将这些货物转运给八路军使用。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308, 第 1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见 14 页注①。

29

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3月5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1)你们为我们募集的钱都用光了。兑换时没有遇到困难，也没有引起怀疑。(2)目前日本侵略者在加紧进攻华北。日本人占领了多数大城市。国民党仍限于为我们军队募集食品。国民党纸币的汇率跌得很厉害。国民党提供给我们的50万墨西哥元已经不值那么多了。(3)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大量工作，需要大量开支。特别是用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支增加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扩大了，因此供给我们干部的经费来源就缩小了。(4)上述困难的一部分我们将自己解决。请您提供资金上的帮助。

方林^④ 斯克沃尔佐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2(1939 年收文)，第 4 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文件上有批注：“给我寄一份副本来。[19]39年3月8日。Г. 季米特洛夫”。
-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3月7日收到文件的。
- ③ Г. 季米特洛夫。
- ④ 邓发。

30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3月13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电报：寄给我们的药品已全部收到。这些药品寄来的正是时候。谢谢。武汉和广州失守^④后很难搞到药品，现有的已经用完。在敌人进一步在华北推进的情况下要搞到药品是不可能的。请按现有清单给我们寄来多出一倍多的药品。转寄药品没有障碍。国民党当局不干预。目前，西安和兰州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请寄来药品。

方林^⑤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2(1939 年收文)，第 7 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哈列夫和陈林(任弼时)同志阅。[19]39年3月15日。Г. 季[米特洛夫]”。
-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3月14日收到文件的。
- ③ Г. 季米特洛夫。
- ④ 分别为：1938年10月25日和10月22日。
- ⑤ 邓发。

31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9年3月17日于莫斯科

绝密

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和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②正在这里进行翻译并将寄给你们。

已通过方林^③寄给你们1万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

弼时^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6(1939年发文),第9页。

手稿。

① 文件上有批注：“文件是根据陈林(任弼时)的请求由季米特洛夫同志于[19]39年3月16日批准的。[19]39年3月17日。”

② 见《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10—21日)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9—38、46—48、282—310、647页。

③ 邓发。

④ 任弼时。

32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3月27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第33号文件续)

4. 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1)国民党已命令国民党地方组织禁止共产党积极活动,如有必要,把他们赶出辖地。(2)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已下令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和西部特派员把游击队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军队赶出山东。

5. 托派分子的活动。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信说:中国抗日斗争的前景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军队已被打败。中国军队在向云南和贵州撤退,无力进行反攻。所有大城市已被日本人占领,并且资金是有保证的。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不发生大的事件,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取胜的。中国无产阶级退到了30到40年以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发展壮大,但基本群众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我们中国托派组织目前的行动策略不是促进中共发展壮大,所以应当改变工作方针。

6. 据传,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已在香港与日本人信野^④取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哥特瓦尔德同志。[19]39年3月29日。Г.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3月29日收到文件的。

③ Г.季米特洛夫。

④ 此人身份不详。

得了联系。据说,蒋介石也和汪精卫有秘密联系。

方林^①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12(1939 年收文), 第 18—19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邓发。

33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3月28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

1. 华北的敌人正在进攻。激烈的战斗在进行。八路军^④已无法取得弹药补充以便在华北和西北与日本进行长期战争，我们在华北和山东游击区的所有基地建立了兵工厂，生产步枪，子弹和炮弹。机器和材料我们还可以搞到，但是我们缺少专家，因此，请您给我们派来4、5名，或至少2、3名专家，帮助我们制定计划和给予指导。

2. 可以用塔斯社记者的身份给我们派来这些专家。派塔斯社记者到华北和云南待上一年，不会引起不良舆论。

3. 这些专家到达华北和云南后可以不公开身份，秘密流动地工作^⑤。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和陈林[弼时]同志阅。[19]39年3月31日，Г.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3月31日收到文件的。

③ Г.季米特洛夫。

④ 见第7号文件注④。

⑤ 原文如此，意思是：无派驻地。

方林^①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12(含 1939 年), 第 50—51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邓发。

34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4月2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好。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可否开始工作。请复。

毛泽东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2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哈列夫同志。[19]39年4月3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4月3日收到文件的。

3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4月7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

印刷厂的新闻纸快用完了。这对党的宣传和出版工作有很大意义。这里不可能搞到。请寄来5000包新闻纸，并请派徐杰即陈潭秋同志到中共中央来工作。

小李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12(1939年收文)，第59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陈林(任弼时)和苏哈列夫同志。Г. 季米特洛夫 1939年4月10日。”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4月9日收到文件的。

③ Г. 季米特洛夫。

36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5月7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电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发出密令,要地方党部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以下措施:(1)只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放弃共产主义。(2)破坏共产党的威信。(3)让地方当局、军队和警察逮捕和镇压共产党人。(4)国民党中央公布一个文件,其中说,三民主义从抗日战争和建国时起就是唯一的学说;输入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5)西安“生活”书店^④被警察查封。大量书籍被没收。书店工作人员被逮捕。(6)张慕陶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保护下来到陕西。他说,他的任务是在华北建立文化联盟。(7)张慕陶被释放,被任命为某军区少将顾问。(8)据说,近卫已抵达上海与汪精卫^⑤会见。

① Г. 季米特洛夫、任弼时于1939年5月10日看了此文件。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5月9日收到文件的。

③ Г. 季米特洛夫。

④ 指“生活书店”。1941年2月因国民党干预停止了活动。

⑤ 汪精卫于1939年5月7日到达上海。1939年6月4日他与国民党其他人士离开上海飞往东京,就成立“中央政府”的计划与日本领导人进行直接谈判。(见G. E. 蓬克尔:《和平密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1937—1941)》,剑桥英文版,第130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158页。)

小李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12(1939 年收文), 第 68 页。
打字稿, 原件。

37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1939年5月17日^①于延安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中共代表陈林^②同志

1. 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③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政治形势。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同志将参加这次会议。

恳请你们给予指示。

2. 在随后的电报里^④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恳请你们也指定专门同志编辑关于以下问题的通报材料并定期寄给我们，这些问题是国际形势、苏联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及其主要支部的活动情况、国际无产阶级和我们的兄弟党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日本发生的事件和局势，等等。这对我们将是

①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5月19日收到文件的。

② 任弼时。

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④ 见第43号文件。

很大的帮助。

3. 请告知,尼古拉耶夫是如何破译这份密电的,你们对电报的理解是否都正确?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2(1939 年收文),第 9—10 页。

打字稿,原件。

38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5月21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请告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地点及大会日程^②，还有预计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哪些组织，大会的准备情况^③。

陈林^④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1939 年收文), 第 13 页。

俄文手稿^⑤。

-
-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 ② 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 ③ 见第 46 号文件。
 - ④ 任弼时。
 - ⑤ 电文是 Г. 季米特洛夫亲笔起草的。

39

季米特洛夫和任弼时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5月21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考虑到新疆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

1. 接受盛世才入党是不合适的。
2. 暂时不要在该省建立党组织。

[中共]中央可以在乌鲁木齐成立党的三人小组,该小组将通过中国共产党系统与负责同志保持联系。

3. 可以同意盛[世才]的建议,把中文版马列主义书籍只分发给比较可靠的政治人物^②。

4. 如果方林^③与盛世才的关系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极其紧张,那就要考虑派另一位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季米特洛夫 陈林^④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年发文),第 14 页。

季米特洛夫俄文亲笔签字。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② 见第 26 号文件。

③ 邓发。

④ 任弼时。

40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5月21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中的投降派^②。

迫害共产党人,这是准备投降的组成部分。迫害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准备投降。共产党应该有所准备并使群众准备好给予这方面的任何阴谋和背叛行为以及时的和坚决的回击。

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共合作以便进一步抵抗日本的侵略。为此,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

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该给人提供破坏民族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明注的。

② 周恩来就这个问题起草的材料没有发表。(见: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13,第 5—29 页。)

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关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前景问题,请遵循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①上的报告。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的通报将于近日寄去。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 年发文),第 15 页。

经季米特洛夫修改过的手稿,亲笔签字。

^① 见:《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 年 3 月 10—21 日)速记记录》,第 9—38 页。

41

古利亚耶夫给曼努伊尔斯基 的书面报告^①

1939年5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请批准由下列人员组成的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

1. 莫尔德维诺夫——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2. 切贝金——共产国际执委会后备高级顾问。中国党校校长。
3. 张[绥山]^②——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顾问。
4. 契尔科夫——王明^③书记处顾问。
5. 卡尔斯基^④——中国党校翻译(联共(布)党员)。
6. 希巴诺夫^⑤——外国工人出版社翻译。
7. 谢廖金——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档案馆高级顾问。
8. 什维佐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翻译部部长。
9. 林彪。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莫尔德维诺夫同志”和“同意。曼努伊尔斯基。”

② 曾秀夫。

③ 陈绍禹。

④ 师哲。

⑤ 徐泽芳(音)。

10. 王松^①。

11. 科甘——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

12. 罗斯托夫斯基——殖民地和附属国历史部^②研究人员。

13. 斯塔卡诺夫^③——王明书记处顾问。

委托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领导小组工作,陈林同志^④作为咨询专家参加小组工作。

为了深入研究某些问题要吸收鲍罗廷、卡拉—穆尔扎同志以及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问题和熟悉该组将要研究的某部分文献资料的其他共产党员参加该组的咨询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 古利亚耶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5a, 第 34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刘亚楼。

② 原文如此。指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

③ 程道南。

④ 任弼时。

42

中共中央书记处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1939年5月25日^①于延安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
及中共代表陈林^②同志

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处于危急状态。我们的钱已全部用完。国民党已不止一次地威胁八路军^③要停止财政援助^④。但是,即使按照原来每月从国民党那里得到50万中国元来说,这一数额也只能满足八路军每月开支的百分之二十。此外,从6月份开始,党的工作、报刊、学校、医院等等都没有任何经费。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节约经费,提高产量,但是这些不可能迅速产生效果。此外,在我们地区目前正发生旱灾,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因此,恳请你们向我们提供紧急的财政援助。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1939年收文),第12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5月25日收到文件的。

② 任弼时。

③ 见第14页注①。

④ 1939年底国民政府停止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粮食、弹药、药品和军费。

43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1939年6月4日^①于延安

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第1号通报

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侵略的合作目前基本上还在继续,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②以来,国共关系在日益恶化,因为国民党七中全会^③不仅公开拒绝我们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建议,而且通过了关于所谓预防共产主义危险直至溶化共产党即消灭共产党的秘密决议^④。为了与共产党人作斗争,国民党成立了以陈立夫、陈铎(音)、康泽、徐应、张冲为代表的

①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6月5日收到文件的。Г. 季米特洛夫和陈林[任弼时]看了文件。

②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举行。

③ 原文如此。应为：五中全会。

④ 可能指的是1939年4月制定的秘密文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按照该文件,限制所有非国民党社会组织政治积极性,但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抵制中共影响的措施上。不久,又下达了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新指令(见第45号文件)。详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哈尔滨1981年版第4卷,第606—615页;《中国革命史资料》,北京1984年版第2卷,第531页。

专门小组。

最近几个月来,国民党中央向其地方组织、政府机构^①和部队发出了一系列秘密指令,要求必须加强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特区的斗争,并且在国民党中央此政策和亲日投降派挑拨离间的基础上,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一些地方发展到有地方武装自卫队和正规军参加的武装冲突的地步,例如,在湖北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以及山西和甘肃的一些县^②。

国民党在华北的政策与其说是旨在反对日本人,不如说是反对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强占八路军在与日本人作战中夺得的土地,解散民众在与日本人的斗争中并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建立的地方抗日政权,阻挠并禁止老百姓向八路军供应和出售粮食,秘密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武装袭击敌后与日本人作战的八路军部队,等等——这就是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在华北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手法,而这些手法国民党也用在同华中第四军的斗争上。在特区的所有边境县里,西安事变^③后根据蒋介石和我们达成的协议,驻有八路军部队,但最近几个月来几乎每天都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直至逮捕和扣押我们的工作人员、学生、共产党员和战士,地方自卫队和军队对我们的部队进行突然性武装袭击,等等。

国民党对我们特区的口号是:从外部进行包围并部分切割,从内部进行破坏工作,以达到完全消灭作为共产党根据地的特区。禁止传播共产主义书籍、频繁逮捕和杀害我们在国统区地方上的同志,现在正成为通常的现象。当然,所有这一切首先可以并且应该用日本代理人 and 亲日投降派,即公开的和隐蔽的汪精卫追随者、

① 原文如此。

② 见:《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5)》第114页。

③ 见第53页注①。

在蒋介石周围和在地方上活动的反共分子以及一小撮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和进行的挑衅来作解释。但罪魁祸首毕竟是蒋介石本人。他自始至终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并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①。蒋介石在去年年底同王明^②等人进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公开宣称,他的终身任务是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他将死不瞑目。尽管蒋介石今天在继续实行抗日和反汪精卫的政策,但恰恰是他的这一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有利。

同日本人和投降派的挑衅和阴谋作斗争,以及同国民党反共政策作斗争,这是刻不容缓的和复杂的任务。你们关于同投降危险和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指示以及关于巩固和扩大民族战线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和及时的^③。对于投降派和反共派的各种阴谋,我们在给予相应的抵制。根据你们的指示,我们将通过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反对日本侵略、拯救中国人民使之免遭殖民奴役的唯一斗争手段,来更加加强同国民党和反共派的投降危险所作的斗争。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14—18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蒋介石是在 1939 年 3 月 10 日会见中共代表时第一次提出这种建议的, 见《中国现代史(1928—1949)》第 154 页。

② 陈绍禹。

③ 见第 40 号文件。

44

中共中央文献资料 研究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①

1939年6月5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曼努伊尔斯基、陈林^②、莫尔德维诺夫、切贝金、张[绥山]^③、斯塔卡诺夫^④、王松^⑤、卡爾斯基^⑥、希巴诺夫^⑦、契尔科夫、什维佐夫、谢廖金和科甘。

问题：1. 小组工作计划。2. 题目分工和工作期限。

关于第一个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同志报告了小组的工作计划^⑧。

什维佐夫同志：工作计划中必须补充关于中国目前形势和关于国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合作的题目。

陈林同志：除了民族统一战线状况和国共合作问题，必须把研

① 文件标题。文件上有批注：“送克鲁什克夫同志。莫非您认为中共中央的历史应该由该小组在莫斯科进行研究吗？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今天的任务。在这方面，这里的工作对中共中央将具有辅助性质。该小组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上。Г. 季米特洛夫。”

② 任弼时。

③ 曾秀夫。

④ 程道南。

⑤ 刘亚楼。

⑥ 师哲。

⑦ 徐泽芳(音)。

⑧ 见第47号文件。

究国民党的组成、政治派别和内部斗争的任务列入计划。应该把小组工作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①准备材料的工作结合起来。

科甘同志：必须把国共在 1925 至 1927 年革命时期的合作这个题目的研究和与合作破裂的真正原因的研究与对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结合起来。

在研究国民党时可利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

谢廖金同志：为便于小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档案馆里要腾出专门的房间，在那里集中所有需要的材料。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应该同意莫尔德维诺夫同志制定的计划。在完成这项计划时，主要任务是：

第一，消除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的有害后果。

第二，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撰写方法和它的丰富思想内容相联系并在其基础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历史。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英勇斗争的范例，推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民英雄和将领，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工作落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把它的英勇斗争提高到更高的思想水平，第三，在分析研究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小组应该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些重要指导文件。

关于第二个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建议，他提出的小组任务的第一项和第三项^②的工作期限为两到三个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需要更长的期限。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吸收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东方研究所和殖民地研究部^③的汉学家科研人员参加，并把

① 指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② 见第 63 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指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纳入他们的计划。

被批准的小组计划及题目分工附在记录上^①。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5, 第 1—2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4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6月24日^②于乌鲁木齐

绝密

致伊万诺夫^③同志

中共中央通报：1. 最近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它对共产党的策略的以下决定：(1)所有组织及国民党当局要对共产党人加强监视。要搞到每个人的照片。(2)采取的方针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人要用欺骗和各种手段将其吸引并溶化到自己队伍里来，对共产党的中层人员要采用各种严厉的法律手段，而对基层工作人员则要实行逮捕、绑架、暗杀、收买和威胁，使他们成为国民党的代理人。(3)也要采取袭击手段，必要时诉诸军队。据传，最近曾参与同八路军后方部队作战的国民党维持内部秩序的队伍已经换上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的服装。最近这些部队的人数增加了。

3. ^④国民党中央在召开全国军以上高级指挥官会议和单独的预备役高级指挥官会议。这些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对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解决特区地位问题。

4. 在宜昌(湖北省)《新华日报》^⑤分社被查封，负责人被捕。

① 文件上有季米特洛夫的签署。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6月24日收到文件的。

③ Г. 季米特洛夫。

④ 原文如此。没有第2项。

⑤ 见第54页注①。

同时在宜昌还查封了“生活书店”^①，共计六处。

小李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12(1939 年收文)，第 92—93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1941 年 2 月“生活书店”因国民党干预停止活动。

4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 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电报^①

1939年6月25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1. 我党代表(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选举工作不会早于8月1日结束。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召开^③。根据[中共]六中全会^④的决议,代表人数共350人,而现在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已增加到450人。

2. 各地区的代表人数是根据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条件、局势以及与相应地区相联系的条件决定的。代表选自华北、东南、华南、华中地区、山西、陕甘宁特区、满洲和海外以及八路军和第四军^⑤的党组织。

3. 代表的组成如下:工人—20%,妇女和青年—10%。所有代表都应该是政治上忠诚、党龄不少于一年、能够代表相应地区组织和工作的干部。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陈林[任弼时]同志阅。[19]39,6,28。Г. 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6月26日收到文件的。

③ 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⑤ 见第25页注①。

所有党组织都应该保证代表的好名声^①,不让阶级敌人——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参加代表大会。

4. 因此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我们作出指示。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21—22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原文如此。

47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第二号记录

(摘录)

1939年7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莫尔德维诺夫：希巴诺夫^①同志要对近期的《大公报》^②作补充简评。

他讲完之后，我请同志们就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的实质发表意见。

在与同志们的交谈中出现了两个问题，我还请同志们对这两个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个问题：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③决议中写道：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另一方面，在这些决议中还写道：我们承认，国民党是在中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我们承认，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这里有没有矛盾呢？

要知道，在三民主义中谈到，在训政时期应该存在国民党专政。根据三民主义，国家政权形式应该有三个发展时期，即军政时期、准备时期或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国民党认为，他们已经在

① 徐泽芳(音)。

② 见第69页注①。

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1927 年度过了军政时期,现在他们正在经历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是国民党专政时期。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解放战争阶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改革,意味着从专政时期向宪政时期的过渡,但在这个过渡时期国民党的专政仍然存在。既然国民党专政是存在的事实,那么,在六中全会上否定这个事实,就未必有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加强。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国民党专政,看来,不会与中共和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相矛盾。而且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建立在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个问题:在中共六中全会决议中写道,需要停止我们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这表明,中共以前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过这种工作。

国民党五中全会^①拒绝接受中共六中全会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鉴于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决议,一些同志,其中包括陈林^②同志,提出一个还应加以考虑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应当放弃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

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有四个问题,这就是:

1. 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制止投降?
2. 需要如何加强抗日战争?
3. 需要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
4. 如果投降和与国民党决裂成为事实——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在这里获得的全面信息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小组会议上同志们将说出自己的意见,但如果可能的话,我

① 国民党五中全会于 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0 日在重庆举行。

② 任弼时。

请同志们提出书面建议,因为没有速记员,我们的记录是不会完整的。小组不会也不可能通过什么决议,但是小组的所有材料和同志们的建议将汇总呈送给领导[……]^①。

莫尔德维诺夫:陈林同志发言。

陈林:我们小组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重要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里提出的这四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当前的形势比较严峻,而且不完全有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形势对于抗战而言是很紧张的。最近国共之间经常发生各种摩擦,但最主要的是,最近在中国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恐怕是主张停战和向日本投降的运动。如果这种危险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形势将会更加复杂。这种危险的存在基于下列因素:

1. 在两年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比较多的战绩,占领了一些土地,但同时,在两年的战争期间,日本的力量也大大削弱了,继续目前的战争对日本是不利的,也是危险的。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团结,迫使中国投降,企图尽快地结束战争。日本通过其代理人加强了活动。汪精卫集团更加紧了其叛变活动和媾和运动。汪精卫在其《南华日报》^②上写道,中国今天还有权与日本进行媾和谈判,中国现在还有资格成为媾和谈判的参加者,如果现在不签订和约,那么,中国必然会向日本投降,因为丧失的领土还会增加,到那时日本将要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到那时中国就没有权利和可能进行媾和谈判了。换句话说,汪精卫是想说,现在转向日本还为时不晚。此外,媾和运动不仅在国民党外进行,而且在国民党内也在进行。

^① 以下删去了希巴诺夫对《大公报》的简评。

^② 《南华日报》于1939至1940年间先在南京后在香港出版。

2. 英国在远东的政策。

在两年的抗战期间,英国给予中国不少援助。为什么英国援助中国?因为日本在对华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是把英国的利益排挤出中国。英国知道日本人的这种企图,想借中国人之手削弱日本。现在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本人的力量也有所消耗。英国人也害怕中国的真正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真正团结。然而,如果日本保证英国人在华南的利益完整无损,那么,英国就可能向日本人让步、投降。最近在天津和其他城市发生的事件都说明,英国可能向日本人作出让步。如果英国向日本作出很大让步,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将是危险的。英国人的投降可能对蒋介石产生影响,因为英国人会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3. 中国国内的形势。

在中国有不少人不相信抗战会取得胜利,国民党上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士、买办阶级、封建官僚和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的一群人应归入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这些人为什么想尽快与日本媾和呢?因为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损失,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害,而且,这些人也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进行抗战。他们说,日本的媾和条件并不特别苛刻,因此,他们主张立即与日本签订和约。

这三种力量正在把中国推向投降。因此,在中国,主张媾和谈判的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对中国是否会走向投降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为了回答中国是否会走向投降、抗日战争是否会以媾和而告终的问题,需要了解中国将在解放战争中所依靠的中国力量。我不否认,中国有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些条件可以使中国将自卫战争进行下去,也就是说,这些条件可以使中国把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这些条件是:

(1)中国的武装力量。中国的基本武装力量还在,并没有消耗

殆尽。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还在。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的所谓中央军,虽然在上海和南京附近遭受某些损失,但是它们已经补充了新的力量,仍然有很大的作战能力。现在在前线作战的基本上不是蒋介石的军队,而是粤军和桂军,或者还有别的军队。这些军队也得到了不断的补充。此外,整个中国军队在两年自卫战争期间获得了很多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如果说,在战争初期一些中国士兵,甚至一些指挥官,一听到敌人飞机的轰鸣声,就立即不顾一切地向后逃跑,那么,现在这种现象已经看不到了。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已经清除了贪生怕死分子。这些部队变得更有作战能力了。中国军队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现在中国的指战员都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在军队中已安排政治教育工作,当然,还不是在所有部队。为了得出中国军队作战能力提高的概念,可以举出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的伤亡对比表:战争初期是1:5,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是1:3。而现在在4月的反攻期间,正如莫尔德维诺夫同志在这里向我们通报的,是1:1。

(2)中国虽然失去了不少领土,但是中国仍然拥有广阔而可靠的后方。中国西北和西南人口众多,这就意味着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军队能够得到不断的补充。尽管现在与国外的联系不如以前,但是中国仍然拥有通往缅甸、印度支那和经新疆通往苏联的通道。

(3)中国游击队的力量。目前,在全中国范围内还在广泛开展游击运动。我们仍然拥有广泛组织游击运动的可能性。应该说,日本人建立傀儡军的可能性还是有限的。他们无法把中国农民吸引到他们方面。尽管我们在组织游击队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游击队在数量上也会增加,在作战方面会积极行动。

(4)中国人民的情绪。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还是抗日的,并准备同日本人作战。虽然一部分中国人遭受了战争之苦,但是应该考虑到,中国人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中国人进行的内战已不止十年。

中国人很敌视日本人,仇恨日本人。这种仇恨从1931年^①起加深了。虽然中国人民厌恶战争,但不能说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如此。我认为,只是在作战地区遭受战争苦难的一部分中国人,表现出某种消极性,而多数中国人仍然在与日本人积极作战。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也没有被动员到抗日战争中来,所以动员民众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些遭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基本上居住在交通线经过的地区,或者在发生过战争的地区,但是在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上还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我说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也没有被动员起来。

现在,我不分析日本人的力量及其困难,而想谈谈中国本身的困难。有人问,中国有什么困难吗?有。

(1)中国的主要困难是在财政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项目大大减少了。据我们所知,主要的收入项目是关税。而现在关税完全没有了。其次,国内的税收也不能全归中国中央政府支配,因此,现在的收入基本上来自出口和外国贷款。

(2)武器装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有很大的困难。虽然中国现在在努力组织国防工业生产,但是成效还不大,所以当前获取武器装备的来源还是在国外。

(3)由于海路阻断而与外部世界联系困难。主要的海港已被日本人占领。这就使中国无法从海外获得大量援助。陆路交通很不方便。没有铁路干线,而且在这些线路上建设干线也很困难。这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经过缅甸的道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不过在这里我应该指出和强调,即便英国投降,如果我们拥有有组织的力量,那么中国还是有条件借助于苏联继续进行自卫战的。

^① 指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

我认为,蒋介石将会继续同日本人作战。他在最近的声明中表达了抗日的决心。今年4月17日,他就近卫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①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若是拿近卫的声明作为媾和条件,那在词典中就可以删掉‘投降’一词,而用‘媾和’一词取代。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于保卫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在没有达到此目的之前,我们的斗争一天也不会停止。

如果没有发起抗战,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议论,但既然战争已经开始,那就应该将它进行到底。即使中国的全部领土都被日本人占领,那我們也有信心,并相信,我们能够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我们的全部领土,并恢复我们的政权,因此今天分析抗战形势时,就不能认为,丧失几个省或省城就是整个抗战的彻底失败。

谈到投降倾向时,蒋介石说:在目前形势下绝对没有媾和的余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傀儡和汉奸的任何理论和说教都不能动摇我们整个国家的坚定决心。这些无耻的汉奸在道德方面已经以其声明宣布了自己的死刑。如果还有人企图说明,近卫的声明不是奴役中国的条件,而是与中国媾和的条件,那么,这种人难道不是汉奸和叛徒,又是什么呢?

蒋介石4月17日声明,是他最近的一次声明,此后他没有再公开发表声明。当然,他的话不能完全相信,但他在声明中始终表示出了坚定的立场。我想,他会继续同日本人作战。他之所以会作战,是因为他有力量,他从国外获得援助,人们还服从他。但是,如果他遭受挫折或失败,那他就会表现出动摇。他在抗战期间已经显露出动摇的事实……^②

① 详见《太平洋战争史》,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卷附录,文件第350—364页。

② 下面删去对汪精卫的一篇关于讨论与日本签订和约问题的文章的叙述,文章中指出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立场。

目前,蒋介石对抗日斗争表现得非常坚定,不过,这取决于蒋介石自己的实力和外国的援助。如果蒋介石周围的人和英国人压^①蒋介石投降,那蒋介石还会表现出动摇。

现在中国正面临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能够继续进行自卫战的。现在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我们应该消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目前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是要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抗战,并让蒋介石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坚强的,还能继续进行战争。要使蒋介石意识到,即使英国、法国和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中国自己还是能够将这场自卫战争进行到底的。《新华日报》编辑部通过自己的报纸发起的培植和锻炼中国自己力量的运动,具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为了压制失败主义情绪和投降派,我们应该发展中国自己的力量。继续坚决抗日,我们就能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在此我结束对第一个问题,即需要如何为继续抗战而加强斗争的问题作出的答复。

第二个问题——加强国共合作。最近,国共之间发生了摩擦。现在仍存在这种危险,但需要不让国共合作破裂。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摩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中共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相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就是为巩固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的过程。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给自己提出杜绝摩擦,避免摩擦的任务。从前我们也

① 原文如此,意思是:推动蒋介石投降。

有过摩擦,但是在日本人加强进攻的情况下这种摩擦减少了。当日本进攻减弱时,这种摩擦又出现了,并且加强了。现在日本人没有加强进攻,因此这种摩擦就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了。而且应该说,现在的摩擦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放任这种摩擦自由地发展,那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威胁。近来摩擦的加强有哪些军事方面的原因呢?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1. 日本由于自己兵力的消耗要求尽快缔结和约。因此它现在派遣诸如汪精卫一类的代理人去做挑拨工作,旨在为媾和创造气氛和大力开展反共宣传运动。

2. 英国对日本奉行的投降政策,必然推动国民党加强反共斗争,破坏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3. 在国民党的党员中还存在所谓的反共顽固派。国民党顽固派特别害怕中共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他们还记得,共产党人过去曾在苏区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对他们当然很不利。国民党内外的一些分子,虽然也怀有抗日情绪,但同时也惧怕中共的力量和影响。这些顽固派既反对日本的侵略,又主张消灭中国共产党,怕中共在战胜日本人后建立苏维埃政权。

4. 在抗日斗争过程中,由于动员工农参战,中国的基本民众要求自由、民主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不能不引起下层人民群众与上层之间的摩擦,这也反映到国共关系上,并因此产生了摩擦。

5. 我们党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正确的工作方式。一些同志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宗派主义倾向在我们党的队伍中仍然存在。这同样会加强我们与国民党的摩擦。

由于这些情况,国共之间的摩擦就具有更加严重的形式。目前的摩擦较之以前发生的摩擦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另一方面,反共分子在加强做工作和制造各种摩擦。这些反共分子是些什么人呢?在中国人中有以下三个反共集团:

(1)汪精卫集团。该集团公开主张消灭八路军、特区和整个共产党。在《南华日报》上可以看到(在这里已对该报作了简评^①)，汪精卫集团是如何反共的。

(2)同情汪精卫但仍然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里的集团，该集团在进行与汪精卫集团同样的工作。属于这个集团的有以张君勱为首的国家社会党。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张君勱写道，为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和战胜日本人，中国共产党应该取消八路军和特区，还应该暂时忘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张君勱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的要求的实质，是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的要求一样的。

(3)国民党顽固派。这些分子知道，消灭八路军、特区和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工作。顽固派知道共产党的坚定立场，没有给自己提出争取使共产党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然而他们千方百计限制中共的活动，不让中共发展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前不久这些人发布了秘密通令^②，在通令中说，决不能让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军队和到军校学习。他们千方百计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由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这些反共活动，国共之间发生一些武装冲突。还发生过国民党分子活埋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队伍里的20到30名战士的事件。如果共产党人从某个据点里赶走了日本人，并在那里恢复了中国政权，他们就不承认该政权是合法的。具体说，李宗仁将军就不承认我们在以前被日本人占领而后被我们占领的地区所建立的政权。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在限制我们的活动，企图缩小我们边区的地域。在甘肃省这些分子向我们的地区发动进攻，企图解除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的武装。而当国民党军队进入边区的时候，我们的部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其实，我们当然不

① 简评没有找到。

② 见第43、45号文件。

必解除他们的武装,我们应该避免冲突。

国民党顽固派并不公开地反共,在秘密指示中,他们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地反共,而相反,要秘密地进行,给他们以沉痛的打击。这些人将其力量用在破坏与中共的合作上。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合作。

蒋介石与这些顽固派不完全一样。我把“蓝衣社”^①、“中央俱乐部”^②成员列入顽固派。“黄埔派”^③的一部分人对我们的态度要比上述集团好些。“黄埔派”中的很多人是八路军指挥员们的朋友,因为他们不论对过去红军的战斗力,还是对现在八路军的战斗力都很敬佩。

在这里,我还要对上面所说的作个补充,一些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的人还受到了汪精卫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汪精卫集团根本不可能得到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因为该集团已经是公开的汉奸集团,但张君勱集团更危险,因为它还在民族统一战线内。该集团借口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各种损害中共利益的要求。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对于我们党和民族统一战线来说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但是要问,民族统一战线会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能否巩固国共合作?我觉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第一,中国人都希望巩固国共合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要求抗日,因此希望巩固国共合作。中国人民认为,只有在保持这两个政党合作的情况下,才能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没有这种合作,

① 见第 24 页注②。

② 指 CC——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这是 1929 年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国民党内组织的一个集团,该集团曾控制过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的工作。

③ 原文如此。见第 24 页注①。

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会失败。

第二,国民党的基本群众也希望巩固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这些群众希望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抗战过程中开始有新的进步分子和真正的爱国者加入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爱国分子补充到国民党队伍中,会加强国共合作。除了国民党下层群众外,其上层,当然不是全部,如孙科、于右任、宋庆龄、张群、白崇禧、李宗仁、冯玉祥、陈诚、蔡廷锴、陈铭枢、张发奎、阎锡山等也积极主张继续战争,保持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有8人和汪精卫一起逃走了。这些汉奸曾经隐藏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未能也不会对这些叛徒采取果断措施。因此,这些汉奸逃往日本人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现在在国民党队伍里没有这些叛徒了。在这里已经对《大公报》作出简评,《大公报》是代表国民党基本群众的利益,它的意见可以被认为是蒋介石的意见。同志们在这里已经谈到,蒋介石害怕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队伍,这方面情况,《大公报》上写了。蒋介石从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中得知,不能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关于组织国共联合委员会之事,无论在《大公报》上,还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中,都只字未提。^①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如果国民党有很大进步,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在目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日本人和英国人都可能为自己的目的加以利用。科甘同志在这里引用了林语堂的文章^②。我认为,林语堂在这篇文章中代表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利益。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这些居民阶层要求战胜日本人,希望巩固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综上所述,我可以这样说,目前出现的摩擦是可以消除的。紧张的

① 见第23页注③。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局面是可以缓和的。在承认目前摩擦的严重性的同时,我认为,改善国共关系、巩固国共合作是可能的。

在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事业中,我们党的任务有以下几点:

第一,消除在巩固国共合作事业中的一切困难和障碍。我觉得,如果国民党和蒋介石继续抗日,那么,国共合作就会继续下去;如果蒋介石想与中国共产党继续合作,那么,国共关系就会得到改善;如果国共合作得到加强,那么,这种合作就会影响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如果蒋介石转到日本方面并背叛民族解放事业,那就根本不能巩固国共合作。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国共合作。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继续抗战和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

第二,我们党应该公开声明并指出,反共的人都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敌人,都企图打击我们的民族。我们应该向所有人说明,在中国,反共就是帮助日本人。反共就是准备投降的第一步,就是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得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①

第三,在我们的工作中,大家知道,犯过错误并且存在缺点。因此,为了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我们应该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在某些地方作出一些让步。我认为,国共关系的恶化,基本上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且还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取决于汪精卫集团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活动。共产党可以公开与国民党就改善合作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是执政党,然而在我们的《新华日报》上,常常将蒋介石的名字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提及,也就是把毛泽东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当然,对此蒋介石是不满意的。我们承认,国民党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

^① 对这一段的批注:“提纲不够充分,需要补充。”

大的政党，它拥有大量军队，拥有政权。在这里我想顺便回答一下中国一党专政问题。

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中说：“中国的内部环境（以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这一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去打下基础和抗战胜利后去发扬光大的。”

在这个决议中并没有说，在现阶段不允许有一党专政，而是说，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我强调说是历史阶段，不能建立一党专政。我们应该为怎样的共和国而斗争呢？我们应该为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为新式的共和国而斗争。如果承认国民党专政，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将会被赶入地下，也就是说，在中国出现了现在在意大利和德国存在的情况。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情况下，任何其他政党都不能合法存在。至于莫尔德维诺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实现三民主义的三个时期，我想说，按照国民党的看法，他们已经在经历第三个时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经过了军政时期、准备时期或训政时期，转入了第三个时期，即宪政时期。国民党已经公布了宪法草案，而在宪政时期是不允许一党专政的。

我们应该帮助国民党实行民主化。我们应该尽可能帮助国民党在国民党内部和在政府机关中建立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应该推动先进的和进步的分子加入国民党队伍，以便让这些人去推动国民党走向进步，并从国民党队伍中清除顽固派。在1925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们曾经这样做过。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不能像1925至1927年时期那样急着去做。

为了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我们应该加强自己的力量。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从这一点出发，

我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边区的存在，或者是需要取消它呢？为了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指出以下几点：

1. 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边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它面临着什么任务呢？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在决议中说：“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和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克服各种困难，在全国起模范与推动的作用。这就是党在边区的任务。”

2. 在建立合作的初期，国民党不止一次地提出取消这个边区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同意，与此同时，我们在边区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地主和资本家参加选举。在实行这些民主措施之后，国民党同意让边区存在下去，而且决定任命老国民党员丁惟汾为边区政府主席。一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国民党的任命，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接受丁惟汾作为我们边区政府的主席。这是1937年年底的事。但是后来我们同意了丁惟汾的任命，并请他到我们这里来，但为时已晚，他已经不想来了，所以至今他没有来。现在，国民党知道，取消边区是不可能的，已经不提这个问题了。不提这个问题，还因为国民党知道，这个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只有100万人）而且是山区，所以就不再提取消边区的问题，何况现在日本在加紧进攻这个地区。如果日本人占领它，那国民党认为，这个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3. 目前这个地区还在我们手里。在法律上国民党不承认它，但是实际上是承认的。例如，国民党政府向边区政府拨款20万元^①，用于救济难民；国民政府的通告也发给边区政府，边区警备区司令员与中央国民政府之间有电报往来。在孙中山逝世纪

^① 原文如此。货币名称不详。可能指的是墨西哥元。

念日^①，蒋介石派人给延安送来了有他题字的花圈，蒋介石驻西安大本营的代表出席了悼念大会，等等。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国民党实际上是承认边区政府的。现在国民党不提取消边区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想这样做。

我们还从自己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边区的每一个县现在都有国民党的组织，我们在帮助它们发展。在边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平等地参加选举，我们吸收国民党人士到政府机关来工作。在这里我们展示出民主政权的范例。

国民党不提取消这个地区的问题，但企图缩小我们的领域。

4. 边区存在着好处和坏处。好处是：在边区有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一系列党的机关、学校、军事学院、文化机构，等等。除此之外，正像《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在这里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扩大耕地面积 60 万亩。这个计划正在顺利地完成。此外，边区还起着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各省的代表来这里参观络绎不绝。甚至两广的代表也来这里参观，他们来这里是要看看边区是如何工作的。我认为，这个边区在政治上对全国的生活是有影响的。

我们在自己的报纸和杂志上说明了边区的政治制度，我们说，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或惊人的地方。在这个地区正在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这就是边区存在的好处。坏处是什么呢？坏处有下面一点：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诸如汪精卫、张君勱之流，正在利用边区的存在进行各种挑拨离间活动。当然主要是围绕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制造各种挑拨离间活动。他们说，共产党在边区建立自己的“王国”。我认为，日本的这种宣传鼓动对人影响很小，人们不相信它。因为大家都知道，汪精卫的宣传就是日本的宣传。至于说到国民党顽固派，他们总是要破坏我们的事业，他们也不会

^① 孙逸仙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逝世。

停止宣传鼓动。因此,对这些人来说,即使边区不存在,反共也是他们第一位的任务。至于说英国、美国和法国对边区的态度,我觉得,这些国家对边区没有太大的兴趣。在英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议论,这个地区在经济上很落后,人口稀少,但同时还可以读到这样的看法,这个地区是先进的,是进步的。

最后是保留这个地区还是取消这个地区呢?如果取消边区,我们能够换得国共合作的巩固、中国政府中亲日派的清除、中国国家制度的民主化、一系列民主法律和宣言的颁布,那么,我就同意取消这个边区,因为用这些取代边区,我们可以获得整个中国的进步,获得自己行动的更大自由。但是要问,在目前的形势下取代边区,我们真的能够获得这一切吗?我认为,不能。因为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边区,而在于八路军和共产党。

如果我们取消边区,那么,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我们取消八路军和我们党。我觉得,取消边区,根本不会改变这个方向,而相反,只会增加我们的困难。首先,这种困难就表现在,我们党中央将无处安身。我不同意让党中央位于八路军驻扎的地区。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党中央不在固定的地方,就不能对整个中国的生活发挥影响。最主要的是,如果党中央位于敌后,那就不能对全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施加影响。过去的经验已经教育了我们。位于中央苏区的党中央,不得不放弃一系列工作。满洲党组织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困难也是因为它处于敌后,与我们没有联系。

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归还给地主和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可能,国民党不会立即这样做,但是它会逐步这样做的。

取消边区后,我们的党中央迁往何处?重庆?更不合适。如果国民党更进步并与我们有更加密切的关系,那当然可以。要知

道,在武汉时期^①我们的中央就与中央国民政府都在武汉,甚至还召开过两党的联席会议,但现在是一种情况。我知道,在重庆,在西安,他们没收了我们的报纸,查封了我们的书店,等等。昨天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告诉我,有情报说,《新华日报》编辑部被国民党查封了。

我们的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在那里不能保证自由。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们离开边区,那我们就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因此,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必须取消边区的时候。同时我也认为,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使国民党不觉得在边区有什么特殊。例如,需要这样做,使人们可以自由地到特区来,既不进行严格的检查,也不进行搜查,国民党的军队也可以在边区驻扎,就像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国民党地区驻扎一样。当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我们地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对他们施加某些影响,例如,在延安驻扎一个宪兵队,我们就对他们施加某些影响。我认为,在边区我们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例如,现在那里存在双重政权,也就是说,在一个县里有两个县长:一个是共产党的县长,另一个是国民党的县长,后者仅拥有在城市管理邮政和电报的权力,而我们的县长拥有在农村的管理权,也就是说,实际的政权掌握在我们的县长手里。我觉得,可以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我同意让国民党员当县长,但他要成立实际上由我们掌握的政治会议。现在在延安就有一个姓马的国民党县长^②,实际上他什么事也不做。

一句话,我不是说,原则上不能取消边区,但如果国民党还在进步,那我也不反对取消边区。至于说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

① 这里所说的是 1925 至 1927 年中国革命的武汉时期,即从 1926 年 12 月 13 日到 1927 年 7 月中共与国民党破裂。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知。

军队,我觉得,这些军队不是用来对付边区的。现在那里驻有国民党军队的16个师,其中的5个师由胡宗南将军指挥。这些军队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补充兵员和休整,就像在中国其他省所见到的那样。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是保护运输线,不让马氏将军们^①反对国民政府,第三是从苏联顺利获得武器装备。总的说来,这些军队所追求的目的是保持西北的秩序,当然,他们并不想消灭或进攻边区。进攻边区只有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才有可能开始,即使很不幸,这种合作中断,他们还是无法消灭边区。

边区地盘很小。我们保卫它很容易。那里也便于伏击。整个边区都是山区。进攻的敌人很难深入。早在建立统一战线之前,我们在几年间使它免遭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了消灭边区,以前国民党曾经向那里派出几十万军队,但是最后国民党军队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地区无法供养很多军队,所以不便防御,同时进攻的敌人也会感到困难,因为不能向那里派遣大量军队。

现在谈谈我们的党员去蒋介石那里参加政府工作的问题。

抗战之初,即1937年7月至11月,我们党把争取使先进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得很高。但在1937年12月我们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②,要求我们必须回避参加政府工作,因为这会引起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关于国民党共产化的议论。因此,从1937年12月起,我们就不再盘算夺取政府中的席位了,然而我们认为,必须参加协商机构的工作,例如国民参政会^③,以及国防机构^④或敌后的政府机构。本着这种精神,去年(1938年)年底,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出了

① 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4月7日由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成立,1948年3月28日停止活动。

④ 见第12号文件。

决议。

这样,从1937年12月起,我们就没有再坚持谋取国民政府中的席位了。关于任命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①副主任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国民党不止一次地请求我们委派周恩来同志担任这一工作。蒋介石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同中共中央代表谈到这件事。他还通过陈诚将军和郭沫若三次请求委派周恩来同志担任这一工作。当时我们想,国民政府确实希望改善军队的政治工作,所以我们就同意了,并派周恩来去政治部工作。如果需要撤掉周恩来同志的这一工作,以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误会,那我也同意,因为周恩来同志实际上不管政治部机关,而只出席政治部工作人员会议。由于这种限制,周恩来同志实际上不能开展自己的工作,因此,我不反对撤销周恩来同志在政治部的工作。

现在谈谈第八集团军司令员朱德同志。事情是这样的:在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期间,一开始蒋介石就坚持由红军组建三个师,而且每个师都直接隶属于蒋介石。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在我们的力量被分割的情况下,蒋介石就能彻底消灭我们的军队,因此我们主张组建一个总的集团军。因此就任命朱德同志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员。鉴于朱德同志无论在年龄方面,还是在学识方面,都高于其他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员,因此蒋介石就授予朱德同志上将军衔,并任命他为第18军团司令员,由此有了“第18军团”的名称,也称八路军。朱德同志不仅是原红军部队的司令员,而且国民党还拨出三个师和一个旅归他指挥。此外,朱德同志还被任命为山西战区副司令员,取代卫立煌将军。近来八路军已经扩编。原来的三个师实际上已经扩编成三个军。我们就组建三个军而不是三个师的问题同蒋介石进行了谈判。蒋介石口头上已经答应,但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教部。

还没有发布书面命令。这次谈判是在武汉陷落时^①进行的。

至于八路军同其他国民党部队的关系,我应该说,八路军与其他国民党部队的关系,要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好得多。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国民党的将军和士兵都尊敬八路军,钦佩他们的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知道,红军过去很善战,曾经战胜过国民党军队,而在现在的抗战中八路军也在战胜装备精良的日本人。此外,在八路军中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军队也想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做法。还有,例如川军来到山西的时候,或者滇军来到山西的时候,它们的许多指挥员都是朱德同志过去的学生,所以,这些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员就邀请朱德同志去他们那里讲课,讲游击战问题。当然,在朱德讲课的时候,他不只是讲游击战问题,他还向国民党士兵讲其他别的东西,讲一些政治问题。

我想在这里说明,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人提高了朱德同志的地位。我不认为国民党人专门为恶化同英美的关系而不断提高朱德同志的地位。

现在我想详细谈谈,如果出现最坏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今天我们当然希望事态不向坏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继续抗战,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的合作。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转向日本人方面,那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不仅会破裂,而且整个民族统一战线也会瓦解。我觉得,即使蒋介石转向日本方面,也还会有一些国民党部队继续抗日。例如,广西的军队,阎锡山的军队,广大的人民群众,毫无疑问都会继续抗日。我觉得,我们八路军不应该撤出山西,而应该留在那里继续抗日,组织

^① 1938年10月25日。

这些抗日力量同日本人作斗争,要依靠自然条件,即山西、陕西、绥远和察哈尔的山区,其后面接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当然,就像莫尔德维诺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主力不能调往绥远省的北部,因为在蒙古地区人烟稀少,在那里要走 80 里路才能取到水。在这个地区不是到处都有水井,那里也没有粮食,所以不能把主力调往那里。也不能将八路军撤往边区。如果八路军不能再驻扎在现在的地区,那我认为,川陕甘豫边区是八路军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这个地区是山区,而且很富庶。在那里我们可以建立根据地,以便继续抗日和组建新的部队。

现在我来谈谈党和八路军的问题。

首先,谈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党还是应该吸收新党员。我们还是需要发展党的。现在 70% 的党员是农民。我们应该改善我们党的社会成分。因此,党今后的发展应该靠吸收工人、雇农和贫农以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会有一批新人在成长,都会涌现出一批有觉悟的分子,我们应该把他们吸收到我们的党里来。我们应该依靠这些人来改善我们党的社会成分,提升我们党的党员质量。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在华北,在游击区,即在党的组织已经很庞大的地方,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但是不应该把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的工作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对立起来。这两项工作可以同时进行。今天,还没有提出停止充实我们党的队伍的工作。我认为,党还需要发展,同时也需要加强党员教育工作。如果停止发展党的工作,那么,在一些地区就根本无法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在那里没有我们的组织。

现在谈谈群众工作。

我们应该这样在群众中间开展工作,要使我们的工作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中华民国的法律。如果已经存在国民党组织或由国民党建立的群众组织,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与其并列地建立自己的组织,而要到目前的组织中去做工作。如果我们再建立自

己的组织,那国民党是不会承认的。

我认为,今天八路军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大,而是加强其战斗力。八路军在数量上已经很大,但其质量需要提高。我绝不是想说,八路军的组成不需要充实。每次减员之后,都应该充实新的力量。

游击队及其基地需要发展和巩固。如果敌后的游击基地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它们。

在国民党投降的情况下,当八路军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么,八路军就应该以师为单位逐渐集中,也就是说,每个师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区。

既然国民党现在继续抗日,那么,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军队中进行地下工作。为巩固与国民党的合作,需要这样做。如果国民党转向日本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的军队中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还应该加强和活跃这项工作。

这就是我对这里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看法。

切贝金:希巴诺夫同志在这里谈到国共合作委员会,即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谈到的联合委员会,但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中却只字未提。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再次向国民党提出这个问题吗?

陈林:是的,可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科甘:青年团的情况怎样?

陈林:我们已经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前,蒋介石就说过,共产党员可以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①。共青团已被取消,被改组为“救国青年团”^②。

① 见第 61 页注①。

② 见第 84 页注③。

卡爾斯基^①：请您讲一讲，在中国，所有群众组织都使用同一个名称，还是使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是否有集中的群众组织系统？

陈林：没有。每一组织都有自己的名称，在全国范围内没有集中的组织。当然，我们在努力建立统一的群众组织系统，并把它们集中起来。

卡爾斯基：现在如何解决劳动纠纷？

陈林：我们邀请双方代表，即企业主和工会代表。在会议上我们说服双方代表互相做出让步，现在在八路军各师的驻扎地区，就这样解决劳动纠纷。而在国民党地区如何解决，我不知道。

卡爾斯基：是否存在类似苏联红军之家那样的文化机构，国民党军人和八路军战士可以在那里聚会？

陈林：现在还没有。

卡爾斯基：能建立这种机构吗？

陈林：是的，能建。但要考虑到，现在部队总是处于行动中，部署在作战阵地上，但类似的文化机构会建的。

切贝金：现在是否存在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

陈林：直接的这种危险还不存在，但在一些地方，根据国民党中央机关的指示，在逮捕共产党员，在查封我们的报纸和书店，甚至还发生一些武装冲突。还有过活埋我们共产党员的事件。蒋介石漠视这一切，他并没有公开地反对这种迫害共产党员的事件。

莫尔德维诺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公开反对国共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陈林：是的，他站出来了。他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限制共产党员活动的委员会。

莫尔德维诺夫：最近国民党用金钱把八路军的指挥员吸引到自己方面。怎么发生了这种事？

① 师哲。

谢廖金: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中共在大城市,在日占区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在那里开展了什么工作吗?

陈林:现在我这里还没有具体材料,但在六中全会决议中写道,在大城市要进行地下工作,但不建立大的群众组织。

希巴诺夫:我有两个问题:您今天所讲的是根据什么材料?这些材料是新的还是旧的?蒋介石帮助八路军吗?

陈林:材料是新的。蒋介石只向八路军提供弹药和给养,但不提供步枪和其他武器装备。

莫尔德维诺夫:您如何评价阶级力量的格局,哪些阶层和阶级怀有抗日情绪,哪些站在日本人方面?

陈林:我想,目前只有大资产阶级的上层、多数买办阶级以及那些与日本人有关系的人和旧官僚支持媾和运动。至于说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主,他们未必会站在日本人一边。但在被占领地区,部分地主已经转入日本人营垒。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则坚决主张进行防御战,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莫尔德维诺夫:您如何评价在日本推行“甜饼”^①政策情况下地主的情绪?

陈林:日本人只是在被占领区没收抗日地主即抗日参加者的土地,所以居住在非占领区的中国人还不了解“甜饼”政策。

记录:张绥山^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10,第 33—80 页。

^① 指日本人实行的笼络政策——译者。

^② 曾秀夫。

48

林彪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1939年7月5日于莫斯科

秘密

李进^①同志的发言(简要记录)

莫尔德维诺夫^②同志提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考虑到,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怎样的情况。有促使局势好转的积极方面,但也有导致局势恶化的消极方面。这两个方面都要具体地指出。党应该根据情况变换其旨在使局势好转的策略和政策。一些事实说明,今天所形成的局势恶化了,但我们应从这种恶化的局势中找到出路。

陈林^③同志已经在发言中详细地讲述了所有这些问题,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的建议^④也是对的。

我想详细谈谈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至于妥协势力的活跃,陈林同志已经指出了他们的具体表现。

① 林彪。

② 见第47号文件。

③ 任弼时。

④ 见第47号文件。

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立场在促进中国内部妥协势力的活跃。虽然中国在军事、物质、财政以及在动员民众方面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存在着继续抗战的可能性。应该全面考虑实际情况,我们能够找到这种可能性。

虽然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倾向于让中国向日本投降,但暂时还没有对中国施加这种明显的压力。即使它们不再援助中国,中国会很困难,但它仍然能够继续抗战。

敌人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怕。在全面地分析问题之后,我得出结论,在1937年7月7日制造挑衅事件^①时,日本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遇到中国人民如此顽强和如此广泛的军事抵抗。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丰富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军队力量的不足。日本拼命地增加兵力,但仍然感到不足。

在华北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的军事行动(游击战),根本不同于东北各省(满洲)义勇军的行动,因为义勇军的行动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也没有这样顽强。此外,他们也不善于如此广泛地动员群众,而在目前的被占领区却在进行。所有这一切都会给日本人的推进造成困难。然而,日本人还是能够向前推进的,他们能够占领福州、长沙、延安……^②但是他们在占领这些城市之后怎么办呢?到那时日本人的兵力将会更加分散,战线会拉得更长,而困难也会更多。

我们在前线的时候看过一些文件,从中可以断定,日军士兵中间的反战情绪多么强烈,自杀和逃跑事件多么多。

在战争初期,我们曾遇到过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日本部队,很难打败它们,但是过了半年,他们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了。

① 见第41页注③。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敌人占领武汉^①之后,几乎再没有向前推进,当然,不是他们不能前进,而是因为他们陷入了绝境,可以说,他们“骑虎难下”。今天日本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日本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力求签订和约。这说明它的虚弱。

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胜利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总之一句话,日本人困难越多,他们就越想媾和。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加强媾和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在推动中国继续抗战。

英国的投降政策是倾向于媾和的原因之一。中国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英国的援助。不过应该指出,苏联在积极援助中国。

英国和美国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吗?根据他们过去的行为判断,他们是不希望的。例如,在武汉、广州陷落^②后,他们还向中国提供贷款,所以说,如果中国像以前一样继续抗战,那么英国和美国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政策。

从国内外的形势看,中国是可以继续抗战的。

无论在军队、政府中,还是在国民党内以及在一部分居民中,蒋介石的主导作用都是巨大的。近10年来,蒋介石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谁能够取代他,而在这场战争中,他的地位更加强了。但是,他会继续这场战争吗?他基本上是主张继续抗战的。这可以从一系列实际情况中看出。例如,武汉、广州陷落后,他仍表示决心继续抗战,并且这是他的唯一出路。他的基本力量保存了下来,中国拥有物资资源,这些促使他走这条道路。这一点他本人也不止一次地作出过声明,当然,对他的话不能百分之百

① 1938年10月25日。

② 1938年10月22日。

地相信。

其次,蒋介石主张继续抗战,而汪精卫逃走了,这说明,蒋介石不会再走汪精卫的道路。这是中国官僚的一个特点,一个人走向一个固定的方向,而第二个人就有意不想跟随了。不管怎么说,汪精卫和蒋介石所走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政治立场取决于他们所占有的地位,但是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例如,在第一次大革命中(1925—1927),汪精卫站在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一边,而蒋介石则站在大资产阶级一边。汪精卫的逃跑并没有吸引蒋介石跟着跑。这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中国就是有这种奇怪的现象。

在战争期间,在拥有实际兵力的人中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每一个军阀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现在,由于不同省份的军队调往不同的战场,他们的军队分散了。因此,现在没有一个人拥有实力,能够起来造国民政府的反。甚至连最落后的省份,如四川、甘肃、青海等省,也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中国目前战争的特点之一还在于,迄今还没有发生大部队转到日本人方面的事件,至少还没有营以上的部队转到日本人方面。这是普遍现象。而傀儡政府的军队,正相反,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转到中国军队方面。这种现象在满洲没有发生过。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上层领导还表现过动摇,但现在这种现象也没有了。

马步青、马步芳和马鸿逵将军确实与日本人有勾结,但是,如果他们造反,消灭他们并不是很困难。即便别的什么部队起来造反,也能很容易战胜它。一句话,国内外的形势都表明,必须继续抗日战争。但是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不过,直接的威胁暂时还没有。可以说,中国人民总的倾向是继续抗战。我们应该克服投降倾向,主要手段就是顽强地继续抗战。

关于汪精卫的活动。他能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害呢?在我看

来,他不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当然,不能过分相信在满洲出版的和汪精卫亲手出版的报纸的报道。此外,在国内,甚至在国民党内,他都没有大的影响。确实,一个时期他曾经与拥有实际兵力的张发奎将军关系密切,但是现在张所指挥的军队不是他自己的军队,而是别人的军队,所以今天一切都取决于蒋介石,他决定一切,尽管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派别(CC派^①,黄埔派^②……^③),但是它们不受汪精卫的影响,不是他的力量。和汪精卫一起逃跑的他的追随者有8人,现在他们中的一人已被击毙,一人受了伤。至于说汪精卫的投降活动,这早在南京陷落^④前夕就可以看出来。汪精卫的逃跑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在于,中国国内或者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减少了,中国人议论说,汪精卫的逃跑,就像托洛茨基逃离苏联和张国焘逃离中国共产党一样。消极方面是,日本人得到了一个好的傀儡。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会认为,汪精卫的逃跑是中国团结的破裂。汪精卫的逃跑表明,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的政策。傀儡政府能取代国民政府吗?当然,不能,因为汪精卫是中国人民的叛徒的公开代表。

我们面临着同投降势力作斗争及扩大和加强抵抗力量的任务。中央政府以及国民党就此问题通过一些决议,其中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执行,但是部分决议的执行还取决于国民党,而我们的任务是在于推动他们去执行这些决议。在执行这些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做出表率。我们应该大力提高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人的信心。这个任务我们能够完成,我们拥有真正的力量。同时共产国际应该给予全力支援,我们还期待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

① 见第163页注②。

② 见第24页注①。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④ 1937年12月12日。

已经给予我们的援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我想,曾经在西班牙战场上厮杀过的那些战士,现在可以前往中国援助我们。

在巩固统一战线方面,当然,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但是有时也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摩擦反摩擦。否则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进攻我们。他们会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所以,有时以摩擦反摩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莫尔德维诺夫问:请举例说明。

这在山东发生过,一支由省政府主席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是地主的武装民团)不与日本人作战,而专门找我们打仗。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

我认为,如果他们提出某种理由,我们就让步,那就会没完没了。我们应该明白,他们在进攻我们党,因此他们说边区是“封建割据”,如果我们撤出边区,那他们就说,我们是“逃跑”。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取消陕北边区,那么,随后他们就会要求我们取消其他区域。

我们能彻底根除摩擦和冲突吗?不能,因为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政党。说实在的,这种摩擦来自哪里呢?这种摩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的影响在扩大,我们的力量在加强,我们的边区也在扩大。除此之外,统一战线是怎么建立的呢?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我们与国民党进行十年武装斗争^①的结果,国民党想消灭我们,但却没能做到。所以,有中国共

^① 1927年7月—1937年8月底。

产党,就会有团结,有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会有团结。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

为了避免发生摩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我们严格遵守国民党的决定,采用他们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名称,但内容应该是我们的。同时我们不应该违反国民党的决定,对每次冲突事件我们都应该加以研究,分析其起因。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让步或不让步的决定,在什么问题上我们能够让步,在什么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如果抗战将继续下去,那么,国民党就需要我们,我们应该争取做到这一点。要争取使国民党不敢对我们采取行动,并争取出现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对我们采取行动。关于两党合作的问题,已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决定^①解决了。这些决定谈到,我们将支持蒋介石,拥护孙中山的学说,支持进行抗战的军事领导人,拥护抗战总方针以及一些有益的训令。同时我们应该同反动派和顽固派作斗争,并且要争取处于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在中国的环境下,一些人士之间的个人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个人关系,但是很遗憾,这部分工作我们还做得不够好,因为在10年间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环境中,对这种活动已经不习惯了,我们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和党的关系,而私人性质的关系已经没有了,可是现在这种个人关系我们很需要,例如,我们的财政工作者林祖涵^②,他同时又负责我军武器装备的供给工作,由于他曾是国民党员,有一些熟人,现在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就获得许多优待。按照限额应发八路军50万发子弹,

① 可能指1937年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包含的建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件,莫斯科,2003年第4卷,第2部分,第1079页]和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的电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7—158页),该电报成为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声明的基础(见《周恩来选集》第1卷第76—78页)。

② 林伯渠。

但这批子弹是由林祖涵领取的,由于他认识一些国民党员,他领到的子弹就不是50万发,而是100万发。而且他们说:我们知道,八路军不分配^①子弹。他们相信,这些子弹将会用于抗日斗争。也是由于林祖涵同志的关系,八路军常常首先领到军装。

陈林同志插话说:朱德认识卫立煌将军,同他进行了交谈,结果得到了3000枚手榴弹和30万发子弹。

就是这种个人关系有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实际上正是由于同一些国民党员认识和有个人关系,我们才得到了多于给我们的限额的弹药,而如果依靠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那么国民党可能就不会给我们那么多了。

我们和哪些部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呢?各种不同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政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好得多。例如,蒋介石的军队、阎锡山的军队、川军、滇军等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好的。第一,他们确信,我们部队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他们还确信,我们的战士勇敢、善战,常常援助他们。我们收容他们部队的残余,保护他们,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教育。在华北作战的川军和滇军部队中,朱德享有很高的威望。朱德不止一次地被这些部队请去作游击战法报告。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有不少黄埔军校学员,在我们的部队里也有不少黄埔军校学员,这样一来,他们彼此间就相互交往。他们这样做是公开的。我个人就不止一次地访问过晋军部队,并且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兵员补充方面我们没少帮助他们。其他军队的军官和我们指挥员之间很少发生冲突,或几乎不发生冲突。他们并不像他们的政工人员那样反共。那些所谓的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指导员特别反共,但他们不掌握实际的兵力。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们也对这些政治指导员不满,因为政治指导员企图

^① 原文如此。根据文义应为:配发。

控制这些军官们的活动并干涉他们的事情。因此,国民党军队的很多军官试图培养自己的政工人员,甚至有过这种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政工人员。蒋介石、阎锡山和卫立煌的部队都向我们提出过这种请求(这是在1938年)。我同这些部队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援助过他们,这种援助巩固并发展了我们的关系。

不管是否会发生摩擦,都必须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力量。我想,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我们的力量:第一,在那些还没有国民党兵力的地区,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可以避免摩擦。第二,不要提出很高的要求,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就行,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在遵守国民党决议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活动,第三,我们将依靠自己的供给,在军事和其他方面发展自己的力量。

我同意陈林同志关于边区命运的意见,我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摩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如果随着边区取消之后他们接着要求取消第四军和八路军以及共产党,我们能满足他们这些要求吗?反动派仇视边区,对他们来说这个边区没有带来益处,然而却给群众带来了好处,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摩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反动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问:边区帮助八路军吗?

互相帮助。第一,边区提供干部,组建医院,第二,在敌人进攻边区的时候,八路军支援边区,在敌后采取行动。大量军队进攻边区(陕西)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没有粮食,没有道路,而小股部队很容易被我们消灭。因此,对我们来说,边区是很好的后方。例如,在国内战争期间,张学良率数万大军进攻这个地区,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边区是个辽阔的地域,进攻它要比保卫它难得多。边区对我们很有益处,不能简单地取消它。党的机关、教育机

构和其他机构很难迁往敌后,因为在那里我们必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边区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关于八路军。在险恶和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应该在何处活动?应该怎样活动?它能否向陕北,或者甘肃、青海撤退?在中国,这种情况不是问题,当然,如果看一下地图会得出,八路军似乎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而实际上,八路军活动的地域是个很辽阔的地域,那里有大片的山区,光是陕西的一个边区就比原江西苏区大几十倍。我们可以利用山区地形,实施进攻、退却和防御。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居民同我们有着良好的关系,那里有抗日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这是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诸省的广大地区。值得指出的是,黄河的河道在这里改变了方向,大大南移,现在这个地区扩大了很多。在这些地区总共有1亿多人口,所以补充人力问题不会遇到困难。与国内战争相比,在对日作战中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在国内战争时期,敌人同地主武装配合行动,现在敌人没有这个优势。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的敌人要比国内战争时期的敌人更强大。然而,如果敌人动用大量兵力,那我们可以避免与之作战。因此,虽然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继续自己的活动。例如,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五台山地区发动攻势,出动7、8个纵队,但是结果失败了。不仅这一次,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不能将八路军与东北各省的义勇军相比。八路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有接近、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方法。这些特点是满洲的义勇军所不具备的。八路军可以与全国的其他部队配合行动,此外,八路军还拥有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满洲的义勇军没有这个优势。华北的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满洲的义勇军也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八路军不应该向陕西、甘肃或青海撤退,因为那里没有物质条件,此外,八路军也会丧失政治威信。一句话,八路军能够在华北活动,这就使得它能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同第四军建立协同作战关系。根据地的变化、八路军的行

动都取决于国民政府的供给,如果提供给养,那八路军可以向南转移,否则它就向北转移,那时它会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援,如果八路军得不到这两方面的支援,那它还会留在这些地区并向南发展。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问:

1. 怎样评价第 69 军和第 80 军以及八路军同它们的关系?
2. 蒋鼎文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
3. 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等去哪里?

第 69 军军长是王靖国,他有 4000 到 5000 人。这是阎锡山的旧军。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问:有消息说,这支军队有 1.2 万人?

可能,这支军队不久前得到了补充。我不能确切地说。至少它的战斗力是很低的。

现在同我们并肩作战的阎锡山军队的主力,是傅作义的部队,其次是部署在晋西的陈长捷部队。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说:请说明发生冲突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力量在发展。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新的冲突,那我说得不具体,但是这些部队都是属于旧军,此外,那里有托洛茨基分子在做工作,顺便说一句,托洛茨基分子也在山西省政府里做工作。

问:据说,国民党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游击委员会?

国民党有这样的决定。显然,他们怕共产党员活动扩大。看来,他们想以此来阻止我们的活动。不过,这是新的现象。一句话,第 19 军和第 69 军这两支旧军对我们不好,而重新组建的部队,即傅作义的部队以及阎锡山的军队,对我们较好。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问:八路军能否自由地购买武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

能。在国民党军队退却的时候,留下不少步枪和机枪,现在的

问题不在于武器,而在于子弹。不过,如果八路军能够获得武器装备,那我们自己就能生产子弹。

第80军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与我们打过仗并遭到了失败,所以它既恨我们,又怕我们。该军的鲁大昌将军同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有勾结。他是最老的也是最落后的将军之一,把他调到西安来,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的行动。

至于说到王靖国,这是个腐化分子,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进行赌博,是一个无能腐朽的人,他不是我们凶恶的敌人,但也不同情我们,与胡宗南将军相比,当然,他更有害。最近胡宗南多少改善了对我们的态度。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问: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等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谢列金同志问:在第四军和八路军占领的地区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策,也就是说,富人应该出钱,所以很少要求他们出人力。现在他们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并开始在政府中工作,不过我们在尽力把富裕分子中的优秀人士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希巴诺夫^①同志问:您说,各大将军的主力已被调往各战场,但是,正像莫尔德维诺夫同志所通报的,在各战场上作战的只有桂军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

除了三马外,其余的将军们都派出了自己的军队上前线,甚至像云南、四川这样的省份,以前未派出过一兵一卒,这次也往前线

^① 徐泽芳(音)。

派出了装备有现代武器的精良部队。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记录：卡尔斯基^①

全宗 515, 目录 1, 卷宗 910, 第 114—132 页。

经修改的打字稿, 原件, 无签字。

^① 师哲。

4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9年7月5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共中央书记处

回复你们的电报^②，现告，问题是我们将把给党中央的一个重要包裹送到乌鲁木齐。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59，目录 184，卷宗 3(1939 年发文)第 21 页。

手稿，亲笔签字。

① 电报为季米特洛夫在第 478 号电报上的批示(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5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7月6日^②于延安

秘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周恩来的右上臂下部骨折。在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很难治愈。因此,我们请求您:第一,确实寄来这种治疗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包括拍摄x光片子的机器;第二,如果您为这种治疗寄来的某些材料还不够,那就请允许用飞机把周恩来送到莫斯科去治疗。

能否用您为治疗周恩来的伤病而派来延安的飞机把你们的重要包裹带给我们^③,以避免通过其他途径寄送可能遇到的许多困难,我们很希望您能用这种办法把这个包裹送来。

中共中央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46 页。

打字稿, 原件。

-
-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哈列夫同志, 请与普罗斯库罗夫谈谈。(请看一下所附电报。)1939年8月7日。Г. 季米特洛夫”。
-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7月7日收到文件的。
- ③ 见第49号文件。

51

林彪与马明方的谈话记录

1939年7月6日于莫斯科

秘密

李进同志同马洛夫(马明方)的谈话

张绥山^①在场

李进：现在共产国际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小组。目前小组正在研究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制定一些措施，减少国共之间的摩擦，加强两党的合作^②。

众所周知，陕甘宁特区引起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最多。的确，共产党的任何力量，哪怕是特区或者八路军，或者共产党本身，常会引起国民党的不安和国共之间的摩擦，但同时也能避免一些摩擦。

为了消除国共之间不必要的摩擦，需要对特区的组织结构做些改变。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决定，小组委托我和张绥山同志来同您这位熟悉特区情况并在特区政府中工作过的人谈一谈，以便对实际情况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请您谈一谈这个地区的行政机构、县级管理机构建设和国共之间的关系。

马洛夫：在边区，或者正像您现在所说的，在陕甘宁特区，共有29个县。这29个县，按照管理方法或政权归属应该分为三类。第一类县是只有共产党人统治和管理的县。在这些县里没有双重

^① 曾秀夫。

^② 见第44、47、48、53号文件。

政权,而只有共产党人的政权。遗憾的是,这样的县目前只有两个,这就是安塞和保安。在这两个县国民党既没有自己的县长,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因此,我认为第一类县是共产党的县。

第二类县是既有国民党的县长又有中共的县长的县,也就是说,在这些县中存在着同一个区域的两个政权。需要附带说明的是,国民党的县长只拥有县城管理权,而共产党的县长却拥有全县管理权。这样的县共有5个,这就是延安、延川、延长、甘泉、靖边。为使您更了解第二类县,即县内双重政权的情况,我来谈谈延安县即边区首府的具体情况。在共产党人进入延安城之前,这里仅存在国民党政权,并有县长。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国民党自然重新派来了自己的县长,而我们又不能拒绝他。我们不得不接受国民党的县长,但同时我们通过普选,推举自己的人当县长。我们的县长拥有管理全县的全部权力。他接收居民的纳税,分配本县管理机构的收入和支出,判决诉讼案件,实施逮捕,一句话,全县的全部权力实际上都由他这位共产党县长掌握。延安县城的国民党县长做什么事呢?他没有什么权力,他接收陕西省政府的某些指令,并将其转交给我们的县长,例如,如果陕西省政府下达关于建设桥梁、修筑道路、树立电线杆等方面的指示令,那么,国民党县长就将这个指令转交给我们的县长,他们就一起讨论执行这个指令的具体措施。国民党的县长虽然也住在县城,但他没有管理该城的任何权力,因为在县城里设有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城管会。我们不发给国民党的县长一分钱。他直接从陕西省政府领取经费来维持自己的机关。一开始每月发给他800元^①,然后是600元,而最近已减到400元。他的管理机构由三个科组成,在管理机构工作的有10多人,由20人组成的宪兵队负责他的警卫工作。这个宪兵队无权逮捕人,尽管名义上它拥有这种权力。国民党的县长

^① 原文如此。没有指明货币种类。可能是指墨西哥元。

无权收税,无权审理案件,无权作出判决,等等,一句话,国民党的县长只是名义上的。他没有任何权力。在第二类县里,国民党没有任何地域;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只有形式上的县长,他没有任何权力,只从国民党的省政府领取相应数目的款项来维持自己的机关。

第三类县是一部分区域属于国民党而另一部分属于共产党的县。这样,第三类县不仅存在双重政权,而且每一政权都拥有自己的区域。以前的县由于存在共产党人的政权,被分割成了不同的部分。例如,横山县,在共产党人进入之前,是一个县,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县长,但是共产党人进入之后,这个县就被分成两个县,即出现了国民党的横山县和共产党的横山县。这种局面现在仍然存在。换句话说,每个第三类县都有两个县,即共产党的县和国民党的县,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政治机构。第三类县共有 22 个,这就是:靖边、定边、横山、安定、甘泉、鄜州、环县、淳化、旬邑、华池、合水、镇原、宁县、正宁、固临、庆阳、盐池、绥德、清涧、吴堡、府谷、宜川、米脂。

如果说共产党进入陕北之前,这 22 个县确实是 22 个,那么,现在,在共产党进入那里之后,这数字 22 就翻了一番,成了 44。这样一来,取代行政区划法规定的 22 个县实际上是现在的 44 个县。即使一个县的十分之一区域属于共产党,共产党还是要在这个区域组建自己的县级管理机构,任命自己的县长。这十分之一区域已经算作一个县。国民党也这样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自己的每一个县建立自己的制度和政权。

如果说在第一类县里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那么,在第二类县里就经常发生各种摩擦,而在第三类县里摩擦就更多。第三类县里的摩擦常常发展成为武装冲突。国民党的县长有时派出自己的官员去共产党人管理的地区收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

把国民党的官员赶出自己的区域。在这方面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在第三类县中，国共之间经常发生各种冲突。而由于这些县的问题，两党之间也常常发生各种摩擦。

现在我来谈谈建立边区政府的问题。边区政府在形式上得到了蒋介石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承认，但实际上是不承认的。在关于边区政府问题谈判的初期，蒋介石就不想批准建立这个政府，也不想派自己的人到这个地区当政府主席，但是后来蒋介石同意了并任命丁惟汾为边区政府主席，可是被我们拒绝了，他也没有来延安。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同意任命丁惟汾为边区政府主席，但丁惟汾已经不想来延安了。直到现在边区政府都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丁惟汾也没有来延安。最近，确实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通告下发给边区了，但没有一份官方文件承认边区政府。

由国民党任命的边区第二类县和第三类县的县长，不向边区政府呈送通报或报告。他们也不向边区政府报告工作，而只向国民党的省政府报告工作。由此可见，边区政府实际上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

现在在延安的边区政府首脑是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边区政府设有以下一些部门：

秘书处

民政厅

财政厅

建设厅

教育厅

检察厅

保安处

宪兵管理处

计划委员会

边区政府主席是林祖涵^①，在六中全会^②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副主席是高自立，他还兼任民政厅厅长。秘书处处长是曹力如。财政厅厅长是张慕尧。建设厅厅长是刘景范，陕西省保安县人，军人。教育厅厅长是周扬，作家，过去做过教师。

检察长是雷经天。保安司令是高岗，原第26军政委；副司令是周兴，还兼宪兵管理处处长。以前他在政治保安总局系统和中央苏区工作过。计划委员会主席是曹力如。

所有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的老工作人员。在边区政府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党员。

我觉得，在一个县内存在双重政权的情况和在一个县内建立两个县，是不正常的。我认为，第三类县应该取消，第二类县中的双重政权也应该取消。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在这方面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在这些县里发生过哪些冲突和武装冲突，但冲突是相当多的。因此，我建议消除现在的这种局面。

我的建议有以下几点：

(1)如果在第三类县中过半的区域属于中共管辖，那就应该建议国民党把他们那一部分区域交给我们，如果第三类县中不足一半的区域属于我们管辖，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部分区域交给国民党。这样，谁也不会觉得难堪，而在第三类县的区域内就不会再发生摩擦了。

(2)对于存在双重政权的第二类县，我同意取消双重政权。但同时，不能允许国民党在第二类县中任命自己的县长。一般说来，任命已经不是民主了。我们可以同意让国民党的县长经过我们的选择。在这里我想说，既然我们希望在边区的区域内做出民主管

^① 林伯渠。

^② 指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次中央全会，1938年9月2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理政权的榜样,也就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一个主义,那我们就不能废除普选制度,也就是说,不能任命县长。换句话说,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3)我不反对改变“边区”的名称,但要想出另一个名称,使这个地区的实际政权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李进:我不太同意马洛夫同志的意见,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没有说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改造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说明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分给农民的问题,这是在建立统一战线之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做过的事情。由于马洛夫报告存在这种缺点,更确切地说,由于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主要的方面,他是在纯粹机械地对待问题。我认为,马洛夫所提出的建议是不适用的。需要考虑到在我们的地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即没有了地主的土地,例如,在我们的县,即在存在共党政权的地方,地主的土地已经被没收并且分给了农民,而在国民党的县里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把国民党按照马洛夫的建议交给我们的地区的土地分给农民,那么,这个地区的农民就会责骂共产党,说共产党在它管辖的地区建立不同的制度。而如果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那又意味着违反统一战线的原则,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相反,在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的地区,农民分得了大块土地,并且已经忘记了地主,如果按照马洛夫的建议,再建立国民党的政权,那么被分的土地就要归还给国民党的地主,那时农民就会不满并可能起来造反。所以,我觉得,马洛夫同志的建议是不可取的。我的建议如下:

(1)同蒋介石商定重新划分区域,使同一个区域不存在两个政权。这就意味着,要按区域属性原则来划分区域。如果这个区域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是归国民党管辖的,那就把它还给国民党;如果这个区域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是归共产党管辖的,那么在那里就只建立我们的政权。至于在这个地区需要如何组织我

们的政权,我在下面谈。

(2)在国民党地区,即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属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我们不应该去建立自己的政权,也不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县长,一般地说,我们不应该与之有什么接触。应该像对待国民党其他地区那样,来对待国民党的这些地区。

(3)如果在第三类县中我们的区域不足一半,那就要把这个区域并入我们相邻的县,并且用相邻县的名称来称呼这个区域。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再增加县的名称,而相反,可以减少,但实际控制的区域不是以前的。如果边界走向是环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区域处在国民党区域的包围之中,那里就可以建一个县或隶属县的一个区。在中国存在着这种现象,比如,在四川省中就有贵州省的一个区域。确实,最近已经进行了区域交换。我们也可以向国民党提出这种制度,但是不能交换。

(4)在我们的县里可以允许任命县长。我觉得,马洛夫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他认为,在民主问题上是不能作出让步的,即不能任命县长。我建议让任命制仍然有效^①。为什么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呢?因为县长最好是由国民党任命的人。国民党的县长不可能选举产生。你们自己想想,到这个地区来的一个新人,当地居民既不了解他的工作能力,也不了解他的人品,他怎么能够当选呢?他决不可能当选。因此,需要这样做,使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但是县长这个职位要由国民党员来担任。摆脱这种局面的实际出路在哪里呢?我建议,让国民党任命县长到我们的县里来工作,而在县长下面成立一个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政治委员会,让我们的人进入该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实际掌握政权。

(5)我同意取消“边区”的名称,并以“州”取代之。组建“州行管理局”,取代“边区政府”。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这种管理局在

^① 原文如此。

每省都存在。州行政管理局的局长最好是我们的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让我们的人当州行政管理局的局长,那就要请他任命他自己人中一个不反共的人来当局长。在州行政管理局成立一个政治委员会,让我们的人选进该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实际上掌握政权。

中华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边区”的名称。而“州”这个名称中国法律却有规定。每个省都有省政府,每个省又划分为若干州,而每个州里都设有州行政管理局,而州划分为一些县,县里设有县长。行政结构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遵循这种结构。在实现我的建议过程中,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基本上仍然如故,而正是在这个地区驻有我们党中央、我们所需要的机关、学校等等,但同时也要符合中国的法律。

我觉得,我的建议从为我们保存这个地区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的意义上说是适宜的。

谈话记录:张绥山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10,第 133—144 页。

打字稿,原件,曾秀夫亲笔签字。

52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9年7月7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从我们在兰州的一位工作人员^③那里收到的报告称,康生向他提出了资金援助的请求,因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司令部的财政困难已经达到了极限,7月份甚至连小米都不能发放。他请求将此事告知您。

普罗斯库罗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07,第 7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阅。1938年7月9日”。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③ 何人详。

53

中国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①

1939年7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出席：陈林^②、希巴诺夫^③、李进^④、奇尔科夫、张绥山^⑤、谢列金、科甘、斯塔卡诺夫^⑥、周全^⑦、格拉西莫夫等同志。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

根据指导的任务，我们小组应转入研究中国当前的形势。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摆在我们面前有以下四个问题：

1. 如何防止投降的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
2. 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
3. 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4. 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国民党投降和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破裂将成为事实，如何继续抗战？

我应该预先向同志们说明，这最后一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直接面临着破裂和投降的威胁。相反，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但是这一

① 文件标题。

② 任弼时。

③ 徐泽芳(音)。

④ 林彪。

⑤ 曾秀夫。

⑥ 程道南。

⑦ 毛泽民。

胜利只有在—个条件下才能取得,那就是保存民族统一战线和它的支柱——国共在孙逸仙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合作。

现在中国的内外困难伴随有投降倾向、摩擦、对中共的镇压和八路军与国民党部队武装冲突的加剧。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客观地搜集—切事实材料,揭示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从争取中国最后胜利的必要性角度来思考摆在我们面前的四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对于—个问题,必须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人,总是应该从健康的乐观主义精神出发来制定我们的计划,但同时也必须是无所畏惧的,并考虑到最坏的危急情况,以便不致惊慌失措。

在过去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们对小组的工作做了分工^①,谁应该做什么:委托卡尔斯基^②同志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对《南华日报》^③(汪精卫的机关报)作简评,希巴诺夫同志对《大公报》^④(国民党的机关报)、张绥山对日本的《大北新报》(估译)^⑤作简评;谢列金同志和斯塔卡诺夫同志对《新华日报》^⑥(中共的机关报)作简评;我负责汇总这些简评及英文和日文报刊的资料翻译,并和奇尔科夫同志—起根据实际材料准备关于中国情况或形势的信息通报。

每一位同志都要报告,做了什么,搜集了哪些材料,还需要做什么,然后我请所有同志认真地谈谈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曼努伊尔斯基说过,要为事业操心,应该热爱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不要怕自己所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在自

① 见第 44 号文件。

② 师哲。

③ 见第 155 页注②。

④ 见第 69 页注①。

⑤ 原文如此。报纸的名称不能确定。

⑥ 见第 55 页注③。

己的建议中犯错误,那会有人给我们纠正。

参加我们小组工作的有李进、王松^①和周全同志,我希望他们会尽力帮助我们分析很多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不久前从国内来的,而且他们过去都是八路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参加小组工作的还有陈林同志,每一位同志都可以从陈林同志那里得到指导和帮助。

我要预先说明,同志们,我们在小组内不决定任何问题。根据小组搜集到的所有材料、同志们的发言和建议,要给领导^②写一个书面报告。同志们的发言和建议以及小组搜集的所有材料都要附在书面报告的后面。

如果同志们对小组的工作程序没有别的建议,那我们就转入听取同志们的报告。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的建议被采纳。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

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报告我和奇尔科夫已经准备好的材料。

我来报告中国的形势,从四月中国军队在各战场所实行的局部反攻或反击以及此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开始。

四月反攻对于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反攻使我们注意到并明白了中国军队的强弱方面。

日本人占领武汉^③之后,就派其主力去消灭华北和华中的游击队根据地。这样做是基于日本所宣布的“绥靖”政策。日本人在同游击队的作战中,采用了“刺刀加甜饼”的政策。特别是在华北和上海—南京—杭州地区(第四军、八路军的地区),日本人派了大量的讨伐军,并认为其意义不亚于攻占汉口的战役。

① 刘亚楼。

② 见第63号文件。

③ 1938年10月25日。

同时日本人没收了参加抗战的地主、官僚和军官的土地,并将其分给农民。日本人在武汉地区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一措施,其结果是,日本人在两个县收集到了在请愿书上的签名,该请愿书要求中国指挥部撤出中国军队。日本人在一些地区降低了地租和税率。他们利用各种投降分子、汉奸和落后分子,建立了各种“和平”、“友好”等群众性组织。在这些坏分子和傀儡政府的帮助下,印发报纸、传单和告示,号召游击队转到日本人方面。在传单中说,如果游击队中有谁自愿放下武器,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动,还会发给他从事和平劳动的补助或给他安排工作。在一些场合还真出现过游击队投降的情况。日本人以投降者的名义并附他们的照片或游击队员母亲、妻子的照片散发传单,号召游击队员放下武器回家。在传单和号召书上日本人写道,现在转过来获得工作还不晚,如果战争结束,那时候再转过来就晚了。在上海、南京等城市,日本人散发封面上印有八路军、第四军或中共政治部等字样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传播汪精卫的呼吁书和文章以及各种黄色照片,等等。在被占领区,日本人在让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复课,这些学校应该根据在日本人监督下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授课。

当然,在华北的省份,即在河北、山东或安徽省,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已经把够他们一百年发泄的仇恨全都发泄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了。在这里日本人欺骗不了中国人。

然而,众所周知,武汉陷落后所有战场都平静下来,这就使日本人得以把相当多的兵力投入到与游击队的斗争中。日本人后方的游击运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的弱点。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武汉陷落后,确切地说,是在国民党中执委五次全会^①之后,我们把很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支持、援助和广

^① 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举行。

泛发展在被占领区同日本人的游击斗争上。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成立了游击队政治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敌后的工作和居民中的政治工作。这样的委员会应该在各省由省长主持成立,在各县由县长主持成立。在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省份都任命省长,同样在所有的县也任命县长。一些大兵团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或者主动把正规部队的整个营、整个团或整个师调往日军后方进行游击战。同时中国指挥部为了钳制各战场上的日军部队和把他们引出游击队根据地,开始准备在所有战场上同时进行局部反攻。日本人决定赶在正在准备的反攻的前头,于2月和3月在山西、流往南昌的汉水流域、华县等地发动进攻战役,日本人的主要进攻集中在南昌至长沙的第九战区。南昌被日本人占领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国指挥部在各战场实施其4月局部反攻计划,并以此举钳制了敌人的兵力,干扰了敌人重组军队去进攻长沙和宜昌,而主要是,日本人不得不把军队从游击区调往前线。在4月反攻期间,进行832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中国军队死伤53000人,日本人死4300人,伤48000人。人员损失的比例几乎是1:1。中国军队的四月反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国指挥部第一次能在各个战场和敌后同时实施协同作战行动。这说明,中国军队保存了基本力量,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作战经验并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同时还要考虑到,在上海战斗中的人员损失是1:6,甚至是1:8,日本人伤亡很少。

四月进攻的薄弱方面不仅在于,中国军队没有预备队,没有足够的火炮、飞机和其他技术装备,不善于扩大战绩和消灭被围据点里的敌人,或者说,不善于消灭被大量中国军队包围在南昌、安庆和开封的敌军,而且还在于,未能巩固在4月进攻中已经取得的战绩,而日本人却在7月前就恢复了他们在4月所丧失的一切。

尽管4月份在各个战场上实施了进攻,但是这种进攻目标有限,没有形成有力的拳头,中国指挥部不敢使用现有的技术装备、

火炮和坦克,并将其配置在离战场前沿远一些的地方。他们认为,使用技术装备很麻烦,有危险,会失去。战区司令把火炮部署在离前线 20 到 50 公里的地方,在炮兵部队里没有马匹,火炮移动都靠人拉。此外,将军们不肯让自己的全部部队投入战斗,而为了执行命令一般只派出一小部分部队。在四月进攻期间,中央政府的军队表现得不错,特别是汤恩伯将军指挥的第 31 军团,他将自己的两个师调往日军后方进行游击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汤恩伯的部队使日本人遭受了重大损失。南方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军队、开封附近第一战区卫立煌的部队和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部队,也都表现得不错。

5 月各战场比较平静,但反共运动在加强。诸如 4 月的进攻及此前所采取的扩大日军后方游击队的措施和专门游击委员会的成立,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抗日事业中进步的积极的方面在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根据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决议,旨在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第四军的影响和活动的运动在加强。

被任命为河北省省长的鹿钟麟将军,禁止八路军在划给他们的活动区以外的地区组建游击队。他拒不承认八路军在日占区所建立的地方政府和自治。这导致了八路军与在河北日军后方活动的国民党第 69 军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冲突。

在 5 月根据鹿钟麟的命令,八路军一个连被解除了武装,该连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都被处死(绞死),更早还有 20 个共产党员根据他的命令被逮捕和活埋。

这个时期在陕北边区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在甘肃边界同第 80 军部队(中央政府的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他们死 10 人,边区保卫部队死 1 人。在宁夏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他们死 40 人,八路军无人死亡。

同时对八路军的挑衅活动也在加强,例如,四川地方军阀成立一些土匪队伍,他们打着八路军部队的旗号对居民实施抢劫。在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地区,陈仪将军(原第六战区司令)打着与土匪作斗争的旗号,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部队进行斗争。这里就不必说汪精卫的反共和无论如何都要与日本媾和的活动了。关于这一点卡尔斯基同志将作报告。我只想指出,在国民党内领导反共活动的,是以国民党副主席兼教育部长陈立夫为首的中央俱乐部(CC)^①,陈立夫声明说,他“主张抗日到底,但不与共产党人合作”。由陈诚领导的“黄埔”集团^②则从另一种立场出发进行反共活动。他们要求限制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为了抗日可以利用其影响和经验。

伴随着反共活动,还有宋子文在香港通过上海银行家和英国中间人同日本人进行令人怀疑的谈判。有人建议他领导政府并签订和约,条件是日军撤出除华北以外的中国领土。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是在谈判期间宋美龄女士(蒋介石的妻子)几次飞往香港,似乎是去治疗牙齿,并在那里“偶然”见到了宋子文。

我们还知道,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与有田会谈后来到了上海,并在那里会见了克拉克·卡尔(英国驻华大使),好像后者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新的媾和条件。其目的像是在向蒋介石施压,使之成为更好商量的人,英国的银行也在向最近开始摇摆的中国货币施加压力。最后,应该考虑到,鼓浪屿(厦门)、天津所发生的事件^③和在张家口逮捕英国参赞的事件,都是英国和日本之间关系极端恶化的事实。有消息说,五月底在太原召开了日军指挥人员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必须消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的决议。大家知道,6月日军向黄河的芮城渡口发动

① 见第163页注②。

② 见第24页注①。

③ 见《太平洋战争史》,莫斯科1957年版,第2卷,第276—277页。

了攻势,其目的是占领边区。贺龙的120师部队从大同郊区开出,在阎锡山军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日本人同时以相当多的兵力展开战役行动,要包围和消灭蒲州铁路以南、山西南部、河北西部地区的八路军。

日军对八路军的进攻和其他战场的平静,就像达成一种默契:消灭或者削弱八路军的实际力量。而马鸿逵、马步青和马步芳将军们公开发表声明说,日军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对他们来说很大的威胁是八路军,他们应该准备力量对付八路军。在6月日军进攻八路军的时候,回族马氏将军们就询问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将军,八路军真的会向西部撤退吗?我们应该考虑到,西面马氏将军们拥有约2万人的军队,明显是敌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甚至也不排除他们反对蒋介石的可能性,如果日军向西安—兰州方向发动进攻的话。部署在陕甘宁边区西南部的鲁大昌将军的第80军,也敌视八路军。部署在第10战区的蒋鼎文将军的部队,约有16个步兵师,据说,也和第80军拥有同样目的:一方面,在回族将军们发动进攻时反击他们;另一方面,对付边区和八路军。至少第10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将军是敌视共产党的。还有消息说,他从前线蒲州地区抽调很大一部分兵力,调往西安和边区边界。至于说部署在黄河左岸边区以东的阎锡山将军的部队,他们好像是在与八路军指挥部协调行动。对蒋介石怀恨在心的阎锡山,在被撤销东北前线司令官、只留任第2战区司令官职位后,变得对八路军比较友好了。如果说,以前他从太原撤退时,宁愿将大炮沉入黄河,把太原武器仓库里的大量弹药留给日本人,也不给八路军,那么,现在阎锡山试图依靠八路军,向八路军指挥部求援,邀请八路军政工人员到他的部队里来,甚至,据说,他还送给八路军14门大炮。由此可见,陕北边区有来自南面、西面和部分来自东面的对边区怀有敌意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因此,在遭到日本人进攻的情况下,边区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援。在东北方向和东面,即阎锡山部队

方面,不存在威胁,但是也不能特别指望他们的援助。边区有保卫部队和军事学校,共计约有 2.7 万人,其中有武器装备的只有 9500 人。还有大量的自卫队伍,但是他们只装备有冷兵器。八路军部队没有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因为边区只能养活自己。八路军驻扎和活动在同蒲铁路以东。这条铁路被日军占领。因此,八路军和边区被军队的两条战线隔断了:第一条战线是沿着同蒲铁路——被日军占领,第二条线是沿着黄河左岸——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有消息说,在黄河渡口,边区保卫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关系很不好。有时还发生冲突。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双方的通行证或签证,小股部队或个人都不能通行。要进入特区的八路军小股部队,都会被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现在八路军有 4 个师:贺龙的 120 师活动在大同以南,但是现在由于日军对边区的进攻,这个师好像已经调往运城—佳县渡口。有消息说,这个师在阎锡山部队的支援下,于 6 月初打退了日军企图夺取黄河渡口的进攻。林彪的 115 师,现在由聂荣臻指挥,活动在太原西北,第二师驻扎在太原东北。顺便说一句,这个师是不久前由留在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和傀儡政府部队的逃兵组建的。129 师活动在承德地区沿平汉铁路一线。此外,八路军还拥有在自己影响下的大量游击队,其人数约有 15 万,并且其中 7 万直接由八路军指挥。与八路军相邻、在日军后方作战的是鹿钟麟指挥的国民党第 69 军。该军由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旅组成,共有 1 到 1.2 万人。他们活动的地区是河北省。在山东作战的是沈鸿烈将军指挥的第 57、51 和 89 军,总计有 7 个步兵师和一个独立旅,共有 1.5 到 2 万人。八路军与山东军队的关系如何,我这里没有信息,而第 69 军,正如你们所知,是敌视八路军的。为了弄清楚八路军是在何种情况下作战的,就需要了解日军在华总的部署。不算满洲,日军在华共有 32 到 33 个师,约有 70 到 80 万人。其中有 20 个师部署在华北,即陇海铁路以北至平绥铁路之间的地区。在华北的日军主

要沿着铁路干线部署:1. 沿着同蒲铁路;2. 沿着平汉口铁路到开封;3. 沿着津浦铁路。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在华日军的一半以上驻扎在北方,而且在山西省沿着同蒲铁路集中了6个步兵师,有12万多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对付八路军和特区。其余的日军师大致是这样部署的: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部署3个师,在武汉地区部署3个师,在南昌地区部署2个师和1个旅,在广州地区部署2个师和1个旅。大概,在海南岛部署1个旅。日军的部署表明,在华中和华南作战已经不是主要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迫使中华国民政府投降,意思是 中国将华北交给日本,承认满洲国、内蒙古自治和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联盟条约^①。所有关于媾和的调解建议,德国的、英国的建议,还有近卫的12月声明^②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都来自日本人并服从一个计划——巩固日本在整个华北的地位等等。日军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作战,是夺取广州和海南岛计划的继续,这个计划是从海上全面封锁中国。占领广州、海南岛、厦门、汕头,封锁福州和韦州及其他港口,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而且同样也是针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因为这些国家在这里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日本来说,占领华北是首要任务,因为在这里集结了大量日军,1939年日本在华投资5个亿,其中4个亿在华北。由此可以明白,日军曾经并将继续以极大努力来消灭游击运动或使游击运

① 指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在柏林签订的条约和这两个国家为夺取世界统治地位结成的联盟。1937年11月,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共产国际条约。1939至1940年该条约变成了公开的军事联盟。

② 指1938年12月22日的近卫声明,日本首相提出以下条件: 中国和日本及满洲国一起参加建立东亚“新秩序”, 建立各国间的“睦邻关系”, “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和进行经济合作”。这后一个条件旨在加强日本经济在中国的影响。这次近卫还声明要“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将租界地归还给中国”。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正式拒绝了日本的建议。见《太平洋战争史》第二卷,第362—364页。

动的损害降到最小。应该坦率地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八路军得不到弹药供给,蒋介石从来没给八路军发放过一支步枪。子弹供应情况很糟糕,八路军现有的作坊和武器库缺少必要的设备,也没有生产子弹所需要的原料。获取弹药^①的主要来源是敌人。八路军的另一个困难是粮食:八路军不能再像苏维埃运动时期^②那样,没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或者没收他们的贵重物品和钱财。购买粮食,需要向老百姓支付现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获得农民的支持。蒋介石发给八路军的45万墨西哥元军饷,养活4.5万人是不够的,更何况其中25万墨西哥元要用于边区和党务工作的花销。养活军队的资金问题,同弹药问题一样尖锐。

在所有这种以及其他任何险恶的形势下,八路军都能在山西、河北地区,在整个华北继续坚持游击战,哪怕是100年。日本人所推行的任何“绥靖”政策、“甜饼”政策,都无法消除人民群众对日军野蛮行径、对他们焚烧成千上万个村庄和大肆屠杀和平居民的仇恨。华北省份人口超过1亿,这个地区有充足的粮食,老百姓都很爱国并且极其仇恨日军的暴行。这就意味着,这里具有进行长期游击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只要与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得到他们长期的支持。八路军不能向西部运动,在那里它没有什么可做的。八路军也不能在陕北边区建立根据地,那个地方太穷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八路军的部分部队可以渡过黄河,进入四川省北部,或者向北转移,背靠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基本上是我所能通报的关于从4月至7月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关于八路军的情况。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增强了,中国

① 原文如此。

② 从1927年7月至1937年8月。

军队在战场上的巨大损失基本上是地方部队,即各省的军队。蒋介石保存了自己的所谓“猛虎师”^①,他的军队在上海受到较大损失,此后他就未再让他们参加作战行动。很多人常常为此谴责蒋介石,但在中国的条件,可能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以纯中国方式削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现在另一些将军之所以服从他,首先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拥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他还没有让摩托化坦克师投入战斗。他说,为了反攻他需要准备40个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师。可是,据获得的情报,这项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差。

蒋介石拥有哪些力量呢?英国军事顾问赫尔顿·汉森,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蒋介石的军队》^②。他认为,蒋介石拥有198个师,平均每个师有1万人。他的军队的最大弱点是指挥人员落后,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他列举出很多令人信服的真实例子。同时他对中国士兵的坚定性和作战能力作出了客观的肯定的评价。他还指出,现在蒋介石的学校每年可以为军队提供2.7万名年轻的军官。年轻的军官,这是军队最好的干部。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中国有200多个师。各师的人员编制不一样,有的是2万人,或者更多,有的是5000人,或者更少。薄弱环节是武器装备。平均只有50%的士兵装备有步枪,有些部队的装备更少,例如,某师有15700人,而步枪只有2600支,另一个师有23800人,而只有步枪3600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十几个来。但是中央政府的军队装备和训练比较好,这样的部队有53个师。其余的师隶属于各个将军,这些将军都服从蒋介石,在过去两年间这些部队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些都是事实,这是基本的表现,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你们可以再把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加上,将其作为应该能够巩固这个

① 指由蒋介石个人指挥的军队(大约20个师)。

② 文章没有找到。

战线的因素。无论如何,不能把统一战线置入某种理想的模式中,就像我们这里的报刊所作的那样。不能把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硬塞入任何模式。它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把它看作什么样子,并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是想象,发挥其中最强的方面来加强抗日战争。在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一些力量只是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这就是早就与日本人有勾结的马氏回族将军们的那部分力量。据悉,他们拥有20万人和40万人的预备队。据说,他们计划训练预备队达80万人。他们不能装备这些预备队。这些军队和预备队将会反对谁呢?这是个大问题。他们在口头上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承认抗战,而事实上只有马步青派出一个很差的旅到前线,这个旅装备和训练都很差,当该旅到达前线的时候,一半人已经跑掉了。不要忘记,日军总参谋部很早以前就广泛开展回民工作,供养各种回民团体、学校和清真寺,并且培养专门的回民军官干部和从事伊斯兰教工作、研究古兰经等的情报人员。在马氏将军的司令部里及其部队中,毫无疑问,有很早以前就有渗透进来的日本间谍,据说,马氏将军们本人甚至在战争期间,还收到了从包头日本人那里运来的武器。

阎锡山将军的部队尽管也积极参加抗战,但阎锡山本人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他的部队在战争初期就被击溃了。据说,这些部队是最落后的,军官也是最落后的,当然,也是最反动的。为了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部队被打败也许更好。阎锡山原有8、9万人,如今几乎剩下2万人。现在他好像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组建了一些新的部队,拥有3、4万人。阎锡山在战争初期曾经指挥西北战场(第二、八、十战区和第一战区)的所有部队。现在他只指挥第二战区。他特别沮丧和对蒋介石不满。为了组建自己的新部队,他试图取得八路军的支持。在各种重大事态转折中,阎锡山都企图扮演独立的角色,不依靠蒋介石,甚至还会反对他。蒋鼎文(亲日分子)的军队,约有10个师,都怀有反对八路军的情绪,实际

上只是形式上服从蒋介石。川军也是这样,约有8个师。据说,四川的几个新师,已经被调往西康,为的是不上前线。可能,他们与马氏将军们有某种联系,因为四川省长邓锡侯是亲日的。在福建省陈仪的军队有3个师,也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的指挥。其余各将领的军队都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胡宗南、卫立煌、白崇禧、李宗仁、汤恩伯的军队与中央政府的军队一起,都是蒋介石的牢固支柱。这些部队的总数超过了军队的三分之二,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可以坚定地依靠这些军队。

游击运动和游击战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使占领区的日军交通线瘫痪和阻止日本人开采占领区资源的规模。在日军后方和被占领区,实际作战力量现在还不多。第一,这是留下来或被派往日军后方的正规部队,有在河北的鹿钟麟的第69军。它由4个步兵师(每个师有2000到3000人)和2个步兵旅组成。在山东有沈鸿烈将军指挥的第57、51和第89军,共7个步兵师和1个旅。廖磊将军指挥的第7和第48军。中央政府军的4个师,在汉口陷落之后,已被调往后方。它们在湖北省作战,据说,在日军后方作战的共有60个正规师,总人数有12到15万。第二,朱德同志指挥的八路军部队,约有10万人,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有6到8万人。在上海—南京—杭州地区作战的第四军由叶挺指挥,约有5、6万人。总计正规部队加上八路军和第四军约有30万人。所有游击队,除上述外,主要是地方自卫队,基本上是由冷兵器武装的。这样的队伍很多,据说,有100多万人,但他们并不是实际的力量,只能算作是在精神上做好准备的预备队。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并不存在。1938年4月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①作出的关于发展群众运动、加强军

^①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汉口举行。见《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材料》,北京1986年,第2卷。

队中政治工作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决议,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中国共产党曾试图实施这些决议,通过建立群众组织来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但遇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家不信任中国共产党,怕中国共产党影响加强,因此也怕在军队中和在老百姓中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我们的报刊过分地鼓吹中共在发展和扩大群众组织方面的成绩,鼓吹发展游击运动的成绩、八路军、第四军和边区政府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于是造成了这种虚假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实施国民党政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这正是日本人和反动报刊所说的。他们绞尽脑汁,企图证明,国民党“在共产化”,“中国在苏维埃化”,“蒋介石是共产党人的傀儡,周恩来对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等等,日本人散布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恐吓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早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日本报纸《满洲日报》、《日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以及“联合新闻”社及英国的反动报纸、美国的报纸都曾鼓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成绩,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引用国外报刊时说,若是他们都承认红军取得了很大胜利,那就意味着,这些胜利更大,可见我们自己也在鼓吹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胜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同志在其报告中说,中国已经有50万红军,而实际上当时只有1.5到2万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①也说,中共是继联共(布)之后的第二大党,有50万党员。我很难说清楚,当时中共确实有多少党员,但是现在曼努伊尔斯基^②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称有14.8万,这是陈林同志提供的材料,我担心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大。这种做法带来了什么呢?谁从中获得了好处呢?我觉得,一方面,这一切使我们放心了,使苏联的社会与

①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见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10—21日,速记记录,第60页。

论感到高兴,使兄弟党感到高兴,我们都会认为,中国一切都好,成绩巨大,在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做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会被日本人和我们的敌人用来恐吓日本、英国、美国的资本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就用中国红军的胜利来恐吓自己的资产阶级,一年又一年地增加由日本国会投票支持的军事预算。日本人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中国侵略的合理性,到处宣传说,他们是在同共产主义威胁作斗争,他们在保护中国和日本,使之免遭共产主义威胁。

我们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和第四军的胜利、边区的扩大,等等。在处于国民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领导权、争夺对这些组织的影响和建立众多爱国主义组织的性质,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的工作。在江西省存在过40多个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其中有15个是处于中共影响之下。在汉口,国共之间的冲突正是由于解散处于中共影响之下的国民党群众性青年组织而发生的。中共公开承认一些组织是自己的组织,而这些组织被驱散时,它就提出了抗议。这些组织的人员组成、状况和活动,都不能保证使中共免遭各种挑衅,至少无助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关于青年组织问题,我们在这里还将听取专门的通报。

现在请允许我阐述我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向我们提出的那四个问题^①的意见。头两个问题可能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是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说,蒋介石会与日本人作战的。他拥有坚持抗战的现实力量。我认为,蒋介石明白,现在同日本人缔结和约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和平对于中国来说将意味着更加可怕的外部

^① 见第41、63号文件。

战争和内部战争。他现在不会去媾和。蒋介石周围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主要是英国人),都在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削弱与共产党的合作或者镇压共产党。但英国人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同日本人进行彻底的勾结,而日本人还没有在战争中被削弱到去满足英国人可能进行勾结的条件。我想,英国提供的修筑滇缅铁路的贷款和缅甸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提供武器的贸易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人在执行很早以前的计划,将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与其印度领地连接起来。1886年,英国人从中国夺取缅甸的时候,他们还无法实现这个计划,因为法国人比英国人早一年占领了东京^①,从那里修建了由河内到云南的铁路。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十八大^②上所作的分析的鲜明例证。这样说吧,为了从双方获得一份好处,英国人扮演中间人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相反,日本人现在在侵犯英国人的利益,实际上他们进行的战争不仅是反对中国,而且也是在反对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对美国和法国。英国害怕中华民族的胜利,甚至害怕存在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英国既不希望中国失败,也不希望日本帝国主义被消灭。大家知道,英国在帮助中国,但是大家也知道,日本有86%的军事物资是从美国、英国和法国得到的。没有这些物资,日本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因此,日本进行战争是得到英国和美国的默许和同意的。战争将在中国继续下去,因为中国还有力量进行反抗,日本还远没有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形势对远东的慕尼黑是不利的。完全意义上的慕尼黑^③,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英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利益,其投资在战前到达了17亿金元。众所

① 越南北部。

② 联共(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39年3月10—21日在莫斯科举行。

③ 1938年9月29—30日召开了由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参加的有名的慕尼黑协商会议,会议将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法西斯,为欧洲战争开辟了道路。慕尼黑显示了西方国家统治集团与侵略者相勾结的决心。

周知,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投资。此外,中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抗战,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即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加强抗日战争,巩固蒋介石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突出中共的力量、中共的影响,加强为扩大共产党在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和为争夺在国民政府影响之下地区群众组织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在我看来,都不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不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大家知道,在汉口陷落之前,由于争夺群众组织出现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中共六中全会^①纠正了以前犯过的许多错误,但是由于缺乏记录和来自地方的材料,我们不明白,也搞不清楚国共之间摩擦加剧的原因。中共六中全会决议说,应该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这就意味着,以前,即在全会之前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就已经进行过这种工作,如果是这样的活,那就是重犯旧的错误,即1925至1927年的错误,当时在广州的部队中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〇”事变^②。遗憾的是,我们不了解很多事情的实际情况,他们没有很好地向我们通报,而根据报刊很难作出判断。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观点。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进行勾结的条件,那么,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加强抗日的力量。甚至对于在国民党各派之间耍手腕并限制中共活动、影响和积极性的蒋介石本人,我们也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人应该明白和明确地意识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应该执行一种有助于中国和国民政府获得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援助的政策。如果蒋介石完全站到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他

① 中共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

② 指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蒋介石发动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就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因为不仅英、美等国的资本家最怕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内部的其他力量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的都只能是他们中的少数人。这就是说,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必须为蒋介石创造一定的条件,使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和八路军,使蒋介石能够指望八路军和共产党,就像他指望中央政府的军队或自己的“猛虎师”一样。让蒋介石知道,无论八路军还是共产党的影响,都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可靠支柱,是他的基本力量。但是这些力量不应与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力量相对抗。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不相信我们。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原因还隐藏在1925—1927年革命的历史中,隐藏在中共与国民党后来十年斗争的历史中,隐藏在压制我们干部和国民党的一种惯性作用中,隐藏在由于这种惯性和双方的成见现在所犯的一些错误中。鉴于中国目前的紧张局势,消除在中国问题上的有害活动后果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迫切了。从制定共产国际纲领开始并在许多年的实践中,敌人就让托洛茨基分子混了进来。在1925—1927年时期,在我们党内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就在中国唆使国民党同中共决裂。他们提出极左的口号,并进行冒险主义的挑衅活动,从而加速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决裂。我们没有弄清楚,当时还没有揭露出米夫、李立三、张国焘以及几十个其他人的反革命活动的有害后果,现在已经被揭露出来了,而且可能直到现在还有伪装的敌人,就像张国焘之流,他从1928年起就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在1938年7月以

前一直在中共队伍里耍两面派手腕,隐藏着其真实的叛徒面目。

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好更多,以便从历史中找出与中国人民的现时斗争有关系的最迫切的问题,吸取教训和避免重犯错误。

目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必然伴随有取消特区的要求。在各种文章中都指出,中共拥有这个特区,就是想搞封建诸侯国,中共保存它,就像帝国主义分子保存自己的租界地一样。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地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说实话,现在这个地区只是名义上承认中央政府并根据自己的法规行事,甚至有自己的进出境签证、自己的边防队和自己的海关。我觉得,这个地区没有实际力量,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并把注意力分散到对这些地区的行政管理上和解决、协调与国民党政权的无数冲突上。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是现在我觉得,它在起相反的作用,它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停止过提出关于必须取消这个地区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有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其他政治团体。我不必再说托洛茨基分子的挑衅活动和汪精卫围绕这个地区的鼓动宣传。显然,日本人及其代理人正在利用这个地区的存在来进行分裂民族统一战线。我觉得,日本人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地区不具有什么战略意义或经济意义;第二,它的存在本身就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也在削弱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报刊就这个问题写了很多文章,同志们在对中国报刊的简评中将告诉我们,就这个问题都写了些什么。我觉得,民族统一战线支持者提出取消这个地区的理由是相当令人信服的,相反,维护这个地区存在的我们的一些同志提出的理由,是很软弱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认为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和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

问题在巩固与国民党合作方面是有意义的,如果边区在当前确实只会制造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不是在加强,而是削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那么,当然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即使它的存在不违背中国的法律。八路军则是另一回事,它是我们的实际武装力量,它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力量,它在加强中国的抗战。我们需要加强和更好地武装八路军,现在它只武装了35%,国民党军队武装得好一些,甚至回族将军们武装得都比八路军好。如果中共把目前在边区政府和行政部门任职的干部调往八路军,那我们就会给八路军提供大量的干部。八路军的人员应该武装到100%,而不是35%。需要寻求加强八路军的途径,如果能以什么手段通过蒋介石把八路军彻底武装起来,那就更好。由朱德指挥和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在我看来,可以成为中央政府的一支军队,我觉得,在这方面《新华日报》犯了很大的错误。我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反对取消特区的论战中说,中共与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党的不同之处,就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特区,因为她拥有自己的军队。我觉得,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往往是因为我们干部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据一些片断的事实材料判断,过火行为和种种宗派主义举动时有发生。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不仅需要谴责国民党,而且首先需要调查每一次冲突并客观地揭示其原因和肇事者。在发生每一次这样的冲突之后,都发了抗议电。如果能寄来揭示某一方错误的调查材料,那就更好了。

我不知道,周恩来同志在政府里的工作能否提供什么实际的东西?朱德同志则是另一回事,他指挥军队,拥有实际的兵力。至于说周恩来同志,他不可能在政治部指挥一切,他不拥有实际的兵力和权力,而他任国民军政治部副主任的事实引起了关于国民党及其军队被共产化的议论。这一点被反动的报刊和日本的报刊所利用,他们散布各种说法。我们的报刊也总是极力强调说,周恩来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国民军政治部副主任。我认为,中共

应该放弃在政府中的职位,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这不会加强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不利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党的发展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不应该坚持在农民地区和由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扩大和发展党的方针,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会遇到国民党的强烈反对。在这里我们应该坚持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现有组织和加强党的政治影响的方针。在这样的地区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应该建立在孙逸仙三民主义的基础上。现在中共党员约80%是农民,16%是工人。在工业区和日本人占领的大城市,我们的组织要么太薄弱,要么根本没有。

现在,我们应该在工业区和日本人占领的大城市加强和建立坚强的党组织。这应该是党的中心任务。应该向这里派遣党的优秀力量。

除了关于如何战胜敌人、防止和不允许投降以及巩固国共合作的问题外,关于党在被占领区的工作问题,也应该成为中共七大^①的基本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延安就不可能成为组织和领导这项工作的合适的中心。

如果蒋介石向日本人投降,怎样继续进行抗战呢?在这种情况下,党就应该号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和一切忠诚的中国爱国者及国民党群众在各地继续开展对日游击战。

同日本人作斗争的社会基础不应该缩小。党应该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作为一个主要口号。八路军和第四军应该全力开展斗争,将中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加强在日本人和其傀儡政府所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中的工作,特别要加强在伪军中和倾向于投降派的国民党组织中的工作。党应该号召人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和为实现1938年4月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而斗争。

^①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我就讲到这里,但是最后我还要谈两个我忘了讲的问题。

(1)最近,边区和八路军、第四军的驻地来了很多外国记者,甚至还有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所有不懒惰的人都来了,我觉得,我们的同志对某些记者太信任了,特别是对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太信任了。美国武官卡尔逊在特区和八路军各部队游逛了很长时间,我们的同志简直把他当成自己人了,甚至,据说,他还参加了个别战役的作战计划的制订。关于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有材料说,他们与托洛次基分子有联系。布劳德同志在1937年或在1938年已经提醒过。看来,同志们忘掉了在莫斯科进行的诉讼程序,至少看不出从中吸取了教训。不仅武官,而且所有记者、传教士等旅行者往往都是侦探或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不应该忽视一点。

(2)很多记者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各种胜利的夸大,在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怀疑地与日本报刊的夸大相吻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

(莫尔德维诺夫同志讲完后,科甘同志对英国报刊作了简评,张绥山同志对满洲报刊作了简评,卡尔斯基同志对汪精卫的《南华日报》作了简评,希巴诺夫同志对国民党的《大公报》作了简评,斯塔卡诺夫同志对《新华日报》作了简评。这些同志的发言及其简评都单独作了记录)

(报刊简评见第2号和第3号文件夹)^①

全宗514,目录1,卷宗910,第2—32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夹没有找到。

54

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会议上发言的简要记录

1939年7月8日于莫斯科

秘密

周全(毛泽民)同志的发言(简要记录)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同意陈林^①同志所作的评价,他从各个方面斟酌了这些问题,基本上根据中共六中全会^②决议阐述了自己的意见。陈林同志不仅谈了当前的问题,而且也谈了将来的问题。因此我要讲一些更迫切的问题,同时要回答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边区。它的面积从地图上看好好像不大,但是实际上那是一个很大的区域,是个地形复杂的山区。在陕西西部和宁夏东部边境缺水(水井彼此相距约40里),不能驻扎军队。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集结大量武装力量,那么敌人同样也不能。然而,如果敌人不太多的兵力进入这个地区,那么我们就容易将其消灭。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国军队(张学良的军队和南京的军队)就驻扎在这个地区周围,其人数有10万到20万,尽管当时我们还很弱小,但是他们也没能消灭我们。此外,我们甚至计划消灭胡宗南的部队,他的军队在与我们的第一次冲突中就损失了两个团。

① 任弼时。见第47号文件。

② 见第25号文件。

从经济观点看,蒋介石不希望得到这个不能给他带来收入的地区,居民的情绪可以这样来形容:“即使丈夫投敌,妻子也要捍卫自己原来的阵地。”

边区,毫无疑问,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第一,它向全中国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前景。因此,大学生、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区,他们在这里重新安排和组织自己的新生活。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人是怎样工作的。在这个地区我们正在培养成千上万的新干部,在这里有诸如抗大、大学、党校等学校。如果没有边区,那么,干部培养问题就难以解决。

边区在实现民主化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例如,参观过边区的很多人,不论是考察团,还是代表,以及来自各种军队的代表,都承认我们这里的工作安排得很好,有些方面他们视为榜样。在这个意义上,边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那些过去说我们是土匪,只会搞破坏等等的人来说,这特别重要。现在他们在实践中和在生活中确信,他们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

有人说,边区的存在在加剧两党之间的摩擦,也许需要取消它吗?当然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做,如果统一战线因此而更加巩固,我们确实能够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更大的帮助,国民党向我们提供供给方面,党的机关、培养干部学校等生活方面的保证。可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蒋介石本人,而在于汉奸、亲日派,他们正在对我们进行挑衅和指责。显然,如果他们想找到决裂的某种借口,那么,他们难道只会限于这个问题吗?他们会得寸进尺的。汉奸们不仅在我们后方进行挑衅,而且还在敌后进行挑衅。例如,《南华日报》(汪精卫的机关报)就暗示说,敌后存在的游击区是苏维埃地区。

再说,如果取消边区,那么,中共中央、学校、各机关住到哪里去呢?我已经说过,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这里,其中有绅士和官员的孩子们,他们想在我们这里接受教育,因为他们对政府按照

旧的模式建立的学校不满意。实际上,如果我们接受所有来到我们这里的人,那我们的学校就不止几万学生,而是几十万人。因此在培养干部方面,边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八路军从这个地区获得了干部的补充。

我记得,外国新闻记者中没有一个人被剥夺了来这里的会,他们中有间谍,[但是]暂时[他们中谁也]没有说这个地区有什么不好。

至于说在边区建立了监督(签证、通行证)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适用于中国人,而且也适用于外国人。这就是与日本间谍作斗争的措施之一。这种制度也存在于八路军作战的地区。当然,摩擦不是由于这个措施引起的。

举例子来说吧,国民党内各集团之间都有哪些摩擦呢?如于右任因为两个姑娘就遭到了“CC”派^①的人的围攻和羞辱,此事甚至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还有,“CC”派和“黄埔”派^②在兰州的摩擦也是由于为一个女人吃醋而引起的。他们的这件事也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甚至说已具有国家政治意义。这种现象是很可耻的。但是,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这里指出,有一批人专门制造摩擦,就靠此来生活,据说,“他们是靠制造摩擦来领取薪水的”。

保卫黄河河岸的边区边防部队,是合法的部队。它保护着与山西接壤的600里边界。蒋介石发来电报和其他命令时就写:“边区边防部队”……^③

在这个地区共有我军5个团,其中有一个炮兵团,拥有14门火炮(山炮,这些火炮是阎锡山部队撤退时送给我们的)。这几个

① 见第163页注②。

② 原文如此。见第24页注①。

③ 此处缺字。

团的总兵力为1万人。

边区北边有(来自甘肃的)鲁大昌部的一个旅,它专门制造摩擦。这个旅驻扎在榆林附近。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驻扎过高桂滋的一支部队,现在已经调离那里。驻扎在那里的高双成的部队也很坏,但是现在已经变得好多了。

在边区建立了牢固的群众组织、(男人女人都参加的)游击队,居民拥有老式武器。平时他们忙于生产,而战时他们就组织成武装队伍。因此这个地区是比较巩固的。这个地区的面积约有3000到4000平方里。区内有很多高山、深谷、沟壑,沿着黄河走势是巍峨的黄龙山。这里有一条公路,而该地区西部难以通行,所以,即便有数万敌军进入这个地区,也不难将他们消灭。过去在这些地方曾有一些旧军队和土匪队伍活动,几十年来都未能将他们消灭。除了步兵和飞机,无论机械化部队、重型火炮还是坦克都无法在这个地区行动。

我们准备的作为备用的地方,在地形上很适合防御,此外,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粮食,而且这个地区又不与八路军隔绝。要知道,日本人企图越过黄河到我们这边来,但他们遭到了八路军部队从背后的打击。日本人曾三次企图渡河,但每次都遭到了失败。

在边区没有劣绅、旧官吏,没有各种不合法捐税,流通法币^①。我们征收实物税。有时居民自愿交纳超过定额的实物税。他们这样做是有意识的。

例如,有这样的实际情况:许多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参军了,而妇女多数是小脚,本来生产能力会降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生产效率反倒提高了。除此之外,居民根据党关于开垦荒地60万亩和增产粮食作物收成30万担(1担=180公斤)的号召,积极争取完

^① “法币”一种货币的称呼,1935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批准、由中国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

成这一指标,该地区气候允许一年收获两季。所有部队、机关、团体在“厉行节约”的口号下(这意味着不仅是节省开支,而且参加生产),都开始参加生产,帮助农民劳动,动员、组织和领导居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

过去在困难时期,这个地区实行过这样一些措施:所有职员每月都同样地发给 30 戈比^①用于购买衣服和鞋子,发给 60 戈比用于吃饭。夏天发一套夏服,冬天发一套棉衣。稍晚些时候,给负责的工作人员每月发 3 元津贴,而给战士发 1 元津贴。没有纸张,我们就用废报纸、无用的书页两面写字。我们使用蜡纸出版报纸达 1000 份。现在,因为国民政府开始给八路军发津贴,我们就从 45 万元(以前只发给 30 万元)中拿出 20 万元寄给前线的八路军,而剩下到 25 万元留给边区——用于办报纸和支付学校、团体、党的机关等部门的开销。

八路军靠积极支持它的老百姓养活。在山西省,阎锡山军队撤退后,八路军获得了大量粮食,将其分给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想要,八路军的战士就亲自把粮食送到农民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八路军部队打败了日军,重新占领了这个地区,这时候农民们就拿出这些食品送给战士们。另一个例子:农民总是情愿地供给八路军部队饮用水,而不愿意供给其他部队,因为其他部队不付钱,还打骂农民。国民党的军队,当然,很嫉妒我们,很不满意,因为农民支援我们很多,而不支援他们。

在新疆省,开展过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募集到 6 万元。盛世才送给八路军 5 万件毛皮大衣,给了 10 万元,并将大衣从兰州运往前线。从纽约给八路军运来两部救护车。

我们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1)自己的生产。在边区有一个地方(盐池)盛产食盐,每年生产价值 100 万元的食盐。在国民党统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中国的货币单位“分”。

治时期,每年征收 400 万元的税,而我们现在只征收 30 到 40 万元的税。边区还出产珍贵的药材、丰富的煤炭矿藏(无烟煤)和羊羔皮。(延长的)石油,除了满洲之外,占第一位,但是,遗憾的是开采技术很陈旧。生产效率很低。开采的石油只够无线电台和机关用。每年准备生产煤油大约 60 吨,汽油 10 吨。没有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工程师和技术设备。现有生产煤油的机器不好,若是苏联派工程师去那里勘察石油,那是不够的,因为那里没有开采石油的现代化机械设备,所以,如果苏联能够援助我们设备和技术人员,那就好了。

总共没收了地主多少土地,我说不清楚。但是没收土地是在 1931 至 1932 年由驻扎在陕西北部和东北部的第 26 军和第 27 军进行的。在这个地区没有大地主,而一般的地主是有的,而且他们主要把土地作为牧场来使用。整个边区约有人口 100 万,其中纳税人大约有 30 到 40 万,土地税是根据土地的数量进行征收的。总的说来,耕种面积还可以扩大,因为还有很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山地。

三类县的居民情绪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都是好的。还有所谓的一些老区(1931 至 1935 年出现的),有 1935 年后获得的一些新区(县)。在西安事变期间,县的数量扩大了一些,但是统一战线建立之后扩大的数量不大。老区的居民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一般就不再提土地问题,但一部分地主自愿把一部分多余的 land 分给了农民。

共产党的力量

除了陕西的边区、第四军^①和八路军外,截至 1937 年 11 月(2 年前),我们在上海还有 700 名党员。这里的党组织增长得很快。很多人是获释后留在上海工作的。在抗战期间他们都公开活动

^① 见第 25 页注①。

了。上海后撤之后^①党组织毫无疑问增加了。一部分同志参加了游击队,大家知道,很多人成了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有一个时期,上海党组织同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此后工作有了改善。此外,很多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因此,上海党组织现在超过了1000人。

湖南:这里的党组织有很大发展,是最好的组织之一。这项工作不仅在长沙做得很出色,而且在其他地方也都做得很好。他们亦有报纸。特别是在湘南和湘西党的组织都在发展,而在平江、浏阳等县有坚强的群众组织,群众有斗争经验,所以不可能被敌人消灭。

在江西原苏区,党的工作做得很好。两年前在湘鄂皖原苏区有2000多名共产党员,而在瑞金和汀州,不算军队,还有1000名共产党员。

在原粤闽边区,曾有共产党员9000名(其中2000名是武装人员)。现在他们的数量在增加。应该指出,一些原苏区的民众很有经验,他们的水平甚至高于新党员。

武汉:武汉陷落^②之前,党委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全省最有力的党委之一。这里曾经有4000到5000名党员,而在武汉,多数党员是有经验的工人干部。在湖北的南部和北部,有一些地下组织。

四川:这里过去曾经有过一个苏区。在川贵地区曾有游击队,现在有党组织,那里曾留下一部分干部;党组织的工作是不错的,组织是比较坚强的。

陕南: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不大的苏区和一支武装队伍,有过组织得很好的坚强的群众组织。在这个地区,两年前有900名党员。地形是山区,但是陕南面积很大。至少,如果边区转移到这里,这个地区是可以防御的。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8年11月12日上海被占领。

^② 1938年10月25日。

贵州：以前曾经有过群众组织和共产党组织。

广西：党的组织主要在省会。这个省的居民情绪是好的，对待我们的态度也是好的。

关于取消边区的可能性

在取消这个地区是否合适的问题上，我个人同意陈林^①同志的意见。不过，我想，为了保障我们党的组织、教育组织等，如果敌人占领延安，我们可以从延安向西转移，当然，也可以向陕南四川边界转移。但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驻在敌人的后方，因为那将很难领导工作。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现实地观察问题，争取好的，避免坏的，以不给我们造成损失。

关于团结与合作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没有合作，也就不会有抗战，反之也是一样。不过，蒋介石今天仍然坚持抗战的坚定方针。应该考虑到，蒋介石认为自己是民族英雄并且还想戴着这副面具。现在他不会走向投降，因为从业已形成的局势考虑，这对他不利。

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指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八个特点：

1. 全民性的，
2. 长期的(持久的)，
3. 不平衡的，
4. 武力的，
5. 已经具有 15 年斗争经验的，
6. 全民的，但民众暂时还没有组织好的，
7. 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的，
8.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的。这具有重要意义。^②

^① 见第 47 号文件。

^② 见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13—645 页。

在我看来,蒋介石今天还不会走汪精卫所走的道路,因为投降日本——就意味着丧失一切。

在汪精卫逃跑之前,他的追随者马乘风在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向与会者提出了德国—意大利路线,遭到了吴玉章和王明^①的批评。汪精卫在当时还严厉斥责了^②马乘风,说后者的意见不对。当吴玉章站起来向汪精卫发问的时候,汪精卫就跑掉了,因为他害怕人们会打他。在第二次会议上汪精卫和马乘风没有出席,但副主席张伯苓^③骂了他们。

汪精卫曾幻想夺取财政部长职位,以便从内部破坏团结统一。1938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一次有中央银行行长^④参加的会议上,有人向孔祥熙提出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孔祥熙回答说,参战比抗战好。观战比参战好,而不打仗更好。他还说,现在那怕能让他多活一天,那他也满意。此后,孔祥熙的威信动摇了。但是我们知道,蒋介石在其专制时期有一个从来都不反对他的好傀儡孔祥熙。宋子文则相反,他与蒋介石不和。如果继宋子文之后,汪精卫占据这个职位(财政部长),那当然不好。蒋介石并不反对孔祥熙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我们支持孔祥熙,我们反对汪精卫而拥护孔祥熙,于是他就占据了那个职位。这是我们政策的胜利。蒋介石也满意。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对此很不满意,为此汪精卫在去年12月与蒋介石进行过两个小时的谈话,要求改组政府。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第二天,蒋介石向全军各部队发出通电,指出,汪精卫企图与日本人媾和。此后各部队发来电报,纷纷痛斥汪精卫。看到这种情况,汪精卫就逃跑了。这就是汪精卫逃跑的

① 陈绍禹。

② 原文如此。意为:批评了。

③ 张寿春。

④ 宋子文。

真实情况。

《新华日报》^①编辑部从汉口迁到重庆之后，举办过一个晚会，有一些著名人士出席。王明发表了讲话。他主要谈了中共六中全会的决议。国民党代表团中的两个人发言说，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好样的，但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口头说的。我们的同志很谨慎，但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两人。所有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这是对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打击。第二天，《新华日报》没有谴责这两位国民党人，而写道，他们发表了拥护八路军和共产党的讲话，并且为此赞扬了他们。此后这两位国民党人还为他们侮辱中国共产党而来道歉。这就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让步，但是这样的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谩骂。

善于交往也是有意义的。因此洛甫^②写了一篇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不是偶然的。

对国民党的态度应该是尽量避免摩擦，而对汉奸和亲日派就应该给以打击。

应该区别对待每一个问题。

比如说，1939年1、2月在山西省，不知道是谁的部队（可能是蒋介石部队的两个团）总是从背后袭击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注意它们，但是当我们消灭了敌人之后，就转过来对付它们，解除了它们的武装。然后邀请其他一些部队的代表来分析这个问题。后来查明，这两个团是被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了。打击挑衅者，这是对的，但对“CC”（中央俱乐部）派和“黄埔派”不能这样做。

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张慕陶被我们逮捕了，但他没有被枪毙，我们把他交给了政府。可是在西安把他释放了，而后任命他为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书记，但他仍然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

① 见第55页注③。

② 张闻天。

这是顽固派有意这样做的。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我们有力量的，有党、军队和民众，所以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我们不应该大喊大叫，吹嘘我们的成绩。我们党应该发展，民众应该组织起来，军队(第四军、八路军)应该扩大。我不同意李进^①同志的意见——“以摩擦对摩擦”，这当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李进同志本人也不希望这样做。人家和我们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就是因为他们确信，我们是强大的。在福建事变^②期间就是这样，在西安事变期间也是这样，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上也是这样。苏联强大，所以他们要与之结盟。

毛泽东说过：“……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解决政治问题，而需要根据正确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抗战胜利问题，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这种科学的基础。”

我们需要边区，它对我们是有利的。那里的工作不好，应当加以改进。需要集中打击日本间谍，需要让步的时候，我们就让步。

在回答莫尔德维诺夫同志的问题时，周全同志说，他同意李进^③同志关于在边区进行改组和一些改革的建议。但不能与国民党交换地区，因为农民群众将会说，我们没有兑现保卫他们的诺言。马洛夫^④同志的建议是不对的。

例如，在第四军活动的地区，农民要求分地主的土地。我们不得不说服农民作出让步，但是有一些农民说，我们向国民党投降了。在这方面我们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回答斯塔卡诺夫^⑤同志关于“如果国民党不谈边区改组问题，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方便”的问题时，周同志说，当然，

① 林彪。

② 指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第19路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行动。

③ 林彪。

④ 马明方。见第51号文件。

⑤ 陈道南。

不便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中心问题。

谢列金问:战后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

答:在与我们邻近的国民党地区,政治经济生活改善了。在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废除了各种捐税。现在全中国规定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在土地问题上也有进步,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取得的成绩是不一样的。在云南变化比较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影响薄弱。

在靠近前线的地区,由于预见到危险性,地主自己就做出了让步,把土地分给农民。

由于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居民的情绪以及他们对当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哪里有共产党的威望和对它的信任,哪里蒋介石的威信就很高,反之也一样。人民群众明白这种微妙之处。

国民党内的摩擦,当然,在某些地方影响到军事行动,但对军事行动的恶化没有大的影响。他们对此已经习惯了,蒋介石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平息事态,使之不扩大,也就行了。

记录:卡爾斯基^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10,第 160—176 页。

打字稿,原件,师哲亲笔签字。

^① 师哲。

55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9年7月15日^②于莫斯科

秘密

致中共中央

请回答以下问题：

(1)是否收到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③？

(2)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

(3)为学习该书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

(4)对此书有什么评论？

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

在兄弟党那里此书的发行进行得很成功。

陈林^④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年发文)，第 24 页。

俄文手稿。

① 在文件上有季米特洛夫的签字。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③ 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并翻译成中文。见第 62 号文件。

④ 任弼时。

5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①

1939年7月17—30日^②于延安

绝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简报

1. 八路军和第四军参加抗战之后人员增加了六倍,其中一半多拥有步枪。八路军和第四军部队的活动地区如下: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特区,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鄂晋察边区。大部分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山西东南部(包括湖北西南部和河南北部)。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湖北省北部平原地区,大部分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湖北南部平原地区。部分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山东,太行山地区,没有掌握政权的平绥铁路以北和外蒙古以南地区;没有掌握政权的晋西北地区,没有掌握政权的晋西南地区。新四军活动的地区:长江以南,没有掌握政权的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南部;没有掌握政权的长江以北的安徽省北部及河南省东北部。

2. 目前在八路军和第四军中保持了红军的组织结构。国民党在师级以上司令部中只有一个联络参谋。我们的政治委员、政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阅。1939年8月19日。Г. 季米特洛夫。”和“陈林[任弼时]已阅。8月23日。”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8月1日收到文件的。

治部和党组织都保存了下来。指挥人员几乎都是党员,连、营以上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是经过红军学校学习的老干部。其中的工农成分占多数。八路军和第四军中的党员数量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八路军和第四军战士的纪律性和政治觉悟在所有中国军队中占第一位,而且他们很善于进行游击战和做当地居民的政治工作。已建立许多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校。抗日军政大学现有一万名学员,第四军的军校也有1000名学生。

3. 八路军和第四军的抗日斗争简史。日本人占领汉口^①以后,由于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敌人后方比较空虚。这个时期八路军和第四军部署在上面所指出的地区,为的是打击日本人,夺回被日本人侵占的地区并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时期是八路军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军队到处都在迅速扩大,很多地方的政权转到我们手里。地方政权的组成和政策有很多变化。我们的地方党组织迅速地建立起来,并且很快地组织起地方组织和抗日武装队伍。八路军的这种迅速发展也是由下面的情况促成的:日军将其主力集中于对付中国大城市的主要战场,而国民党又没有能力将其主要注意力放在敌人后方,与此同时,八路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在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大大推动了它的发展。日本人占领汉口以后,将其军事行动的重心转到了后方,于是就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进行残酷作战的时期,同时国民党也开始认真关注我们的发展,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了很多困难。根据我们的材料,日本人在华北有15个师,其中9个师用于对付八路军部队,而日军在长江南北对付第四军的有两个师。从去年冬天起,日本人开始进行所谓的扫荡行动。日本人依靠铁路(这些地区的所有铁路都早已被日本人占领),使用飞机、大炮、坦克、骑兵和步兵,进攻有我们八路军活动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日本人修筑碉

^① 1938年10月25日。

堡和架设铁丝网,缓慢地向前推进,并防备我们游击队的进攻。

此外,日本人从消灭城乡居民的方法,转为使用欺骗居民的方法,强行招募中国人补充日本军队和建立他们的游击部队。

“扫荡”开始后,河北和山东的所有平原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留在农村继续进行顽强的游击战。至于说山西省的山区,在东北部我们还有一座城市,而在八路军司令部所在的东南部,敌人调集4个师进攻我们,4个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战斗还在继续。敌人的战斗力比以前弱了。在对我们有利的地形条件下,我们已经能够一次打败和消灭日军部队1000人。这样的胜利已经有过十多次,而小的胜利很多。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在军事技术装备方面落后,我们还没有能力夺回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更不要说去占领我们的铁路了。由于敌人所占领的地域的扩大和我们地域的逐渐缩小,我们部队的人员、粮食、弹药及其他物资的补充就越来越困难。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发给第四军13万元,每月缺少427万元。以前我们从我们所占领的地区获得收入,但是现在由于我们一大部分地域丧失和国民党的缘故,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至于弹药,国民党很少发给我们,此外,运输也很困难(送不到),因此,我们的军队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最低限度的弹药补充,而火炮和新的军事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由于所有这一切,八路军在这个时期已经减少了3至4万人。但是指战员和居民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正竭尽全力努力加强我们的军队,以便今后进行胜利而顽强的斗争。

4.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和第四军的态度。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和第四军的态度在恶化。蒋介石给八路军下达过命令,命令八路军的所有部队都返回山西省去,禁止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和山东省作战。他还不止一次地发布命令,禁止八路军和

第四军干预地方政权事务和募集粮食和资金。

在河北省,国民党国民政府强行从八路军那里收回一些地区和地方政权,结果造成了冲突,并发生了几次武装冲突。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在山东,省政府限定了八路军的活动地区,并解除了八路军游击队的武装。在特区周围摩擦就更多了。国民党派出军队占领特区的一些地方,并包围了八路军部队驻扎的一些城市。而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鼓励和唆使进行反对八路军和第四军的蛊惑宣传。此外,最近蒋介石从地方军队,“即从中央军”中派出部队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让它们与八路军作战,借日本人的进攻或它们的自相残杀使它们消灭。但是阎锡山集团和桂系集团却与八路军和第四军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一切冲突都是由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他不是从支持八路军和第四军对日作战的角度出发,而是尽一切可能限制和削弱八路军和第四军的力量和实力,有时他还采取让双方力量互相削弱和互相消耗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人进攻。所以在这种错误的政策下,我们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态度就很难改善。

5. 我们的作战方针和对你们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作战方针和任务如下:

(1)坚持敌后斗争,坚持平原游击战。如果处境变得很困难,我们的正规部队就撤往山区,留下众多的小股游击队在平原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以便在情况好转的情况下正规部队重新回到平原地区。

(2)在华北和长江以南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我们的军队,巩固抗日根据地,与日本远征军展开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在这些地区大规模地扩大八路军和第四军已经不可能。而发展我们力量的地区要转到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

(3)现在我们在派出大量军事游击干部去一些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可是,由于国民党和其他军队的监视,

我们的发展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在对国民党和政府的态度上,我们是从下列考虑出发的:批评他们的错误政策,坚决反击他们的反共政策和反八路军政策,但是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从自卫原则出发的,不给反共分子提供搞分裂的借口,争取与国民党及地方军队的密切合作,目的是孤立反共分子。

(4)我们将认真注意支援太行山区的骑兵游击队。

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我们对你们有以下要求:

(1)请你们就军事问题作出指示。

(2)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3)请援助我们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在中国国内什么地方也买不到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伤病员,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他们治疗。以前的药品都顺利地收到了。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2(收文 1939 年),第 31—41 页。

打字稿,原件。

57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7月28日于莫斯科

绝密

7月25日寄给你们一个贵重的包裹,林伯渠^①或朱德应在西安收到。请提醒他们,这是给[中共]中央的并要求尽快送给你们。请确认是否收到及收到的数量。^②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1939年发文), 第 29 页。

手稿, 亲笔签字。

① 林祖涵。

② 可能指第 65 号文件。

58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斯大林和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8月1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

7月10日周恩来同志从马背上摔下来,右臂严重骨折。在延安的中俄医生都无法治疗,一般说来,在中国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治好的。我们恳请你们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如果你们认为,暂时由于某种原因这样做绝对不可能,那就请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③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我们等待你们的回答。请尽快告知你们对此问题的意见。^④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43 页。

打字稿, 原件。

-
- ① 在文件上有季米特洛夫的批注“已同普罗斯库罗夫同志交谈过,他答应派飞机送专家去”和“报告已回复。1939年8月3日。Г季[米特洛夫]”
-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8月2日收到文件的。
- ③ 原文如此。
- ④ 见第61号文件。

5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8月2日^①于莫斯科

中共中央

请速将李德^②派到我们这里来。继续把他留在你们那里工作是不合适的。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1939年发文), 第 32 页。
俄文手稿。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② 奥托·布劳恩。

6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8月7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已任命徐杰^③为驻乌鲁木齐全权代表,以取代方林^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了。徐杰是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能力可以提拔他担任此项工作。但是暂时他还不熟悉工作情况,所以我们决定派方林也去乌鲁木齐临时工作一段时间,以便帮助徐杰了解详细工作情况。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2(1939 年收文),第 47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哈列夫同志。1939年8月2日。”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8月8日收到文件的。

③ 陈潭秋。

④ 邓发。

6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8月11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决定在我们这里对周恩来进行治疗。已派医生乘汽车去你们那里把周恩来接到兰州。如果医生断定不能乘汽车到兰州,请速告知,那我们就采取措施派飞机去。但是请你们考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最好是不派飞机去延安。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年发文),第 37 页。

俄文手稿。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62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①

1939年8月18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陈林^③

联共(布)党史的情况是这样：

1. 联共(布)党史的苏联版本寄来前，在中国已经把该书从俄文译成中文。该书已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已在重庆、香港、上海和延安出版，印数为2.5万册。大部分已经售出。第二卷很快就出版。为了向读者作介绍，我们的《解放》^④杂志还刊登了第一卷的两章。在上海还出版了译自俄文的第二卷。

2. 苏联版的样书寄到延安时，第二卷已经印出5000册。苏联版本的3000册运到重庆，不久就已全部售完。你们寄到延安来的1万册，主要已分配给华北和西北各地区，一部分留给延安各机关。

3. 我们党中级干部学习小组。一般县委以上干部都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该书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此外，在延安还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

① 该文件是对任弼时致中共中央电的回复(见第55号文件)。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8月19日收到文件的。

③ 任弼时。

④ 1937年至1941年在延安出版。

(布)党史》学习委员会。在党的报纸和《解放》、《群众》^①等杂志上经常刊登介绍性的文章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必备的材料。我们对于苏联版的译本很满意,尽管某些地方的译文过于欧化。这部书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会起重大作用。现在我们在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扩大该书的学习范围。

4. 据来自重庆的报告说,这部书在同情我们的无党派人士中间也大加赞赏。一些杂志和报纸刊登了对该书的评论^②。我们在重庆的机关报编辑部还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咨询这部书的情况。来自其他地方的报告还没有。

中共中央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2(1939 年收文), 第 54—56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指《群众》周刊, 见第 81 页注①。

② 评论没有找到。

63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 工作结果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

1939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

1939年6至7月间中国的形势——国内外形势急剧地紧张起来。日本人“媾和”的阴谋活动加强了,投降的倾向增大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性也增大了。因此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向小组提出了以下四个问题:

1. 如何制止投降的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
2. 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
3. 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①。
4. 在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成为事实的最坏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战争。

这些问题已作为小组工作^②的基础,小组现在已准备了上报的材料:第1号文件夹^③——小组的报告、发言,情报和谈话记录;第2号文件夹^④——中国政府报刊、共产党报刊和反动报刊上文

① 见第14页注①。

② 见第44、47、48、53、54号文件。

③ 文件夹没有找到。

④ 文件夹没有找到。

章的简介和译文;第3号文件夹^①——英国和日本报刊上部分文章的简介和译文。

上报的这些材料和我在国防人民委员会第五局所看到的情报资料以及来自中共中央的情报,使我们得以对中国的局势作出评价并回答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

A. 对中国局势的评价

—

中国外部形势的特点是,(自南京陷落^②后)日本人越来越图谋与中国缔结“和约”。

近卫关于《东亚新秩序》的12月声明^③和汪精卫要求以这个声明为基础签订和约的1月呼吁书^④,是日本人“媾和”阴谋的最明显表现。众所周知,近卫声明的基本内容可归纳如下:1. 中国承认满洲国;2. 与日本签署反共协定;3. 承认日本在这个协定有效期间(即永远)在指定地点(即华北)有集结其军队的权利;4. 中国承认内蒙古是特殊防共区域;5. “日本可以开发中国的资源,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声明中还说,“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还准备研究取消治外法权和转交租界地这些对中国完全独立具有意义的问题”(见第3号文件夹第2—3页)。汪精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说:“我的和平建议与日本总理大臣近卫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见第3号文件夹第200页)。

① 文件夹没有找到。

② 1937年12月12日。

③ 指1938年12月22日近卫的声明。见《太平洋战争》第2卷,第362—364页。

④ 原文如此。指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的声明。见《太平洋战争》第2卷,第364—367页。

近卫声明包含日本军事计划的基点——占领华北等地。日本的“媾和”建议、日军在中国的部署，也许还有日本政府的整个内外政策，都是符合这种计划的。驻扎在中国(满洲除外)的31到32个日军步兵师中，有20个师集中在华北，即在陇海铁路以北，9个师集中在从上海至汉口的华中地区和南昌地区，其余的驻扎在南方。(最近，据现有的情报，相当多的日军部队在从华中和华北调往满洲。)汪精卫的叛变呼吁书和他组建的所谓联邦傀儡政府也服从这个计划，这个傀儡政府的中心将设在南京或广州，它将把自己的“政权”只扩展到陇海铁路以南，即华北以外的日军占领区。在这个计划中，早在近卫声明发表之前，就有一些外交调停人带着和平建议在日本和蒋介石之间进行斡旋：南京陷落后，有德国大使陶德曼的活动，有意大利人在香港与汪精卫的幕后谈判(1938年10月)；汉口陷落^①后，有英国大使卡尔提出的调停建议，1939年4、5月间，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先生通过中间人上海银行家在香港与日本人进行的谈判也具有同样性质。

汪精卫不仅没有达到使蒋介石投降的目的，而且他自己陷于了完全孤立的境地。汪精卫明显垮台之后发生的事件，如反英运动，古兰苏事件^②，对整个南中国海的封锁，天津冲突和英日在东京的谈判，都是近卫声明的产物。

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纪念发动中国战争两周年的声明中，谈到英日圆桌会议时说：“……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的意义应该是会议的基本思想。日本应该充满决心地行动，扫清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如果英国不能了解日本的主要愿望，如果日本的基本要求不能被接受，那就不得不中断会议。”(见第3号文件第145页)在这个声明中主要注意力放在英国方面，平沼只用几行字

① 1938年10月25日。

② 事件内容不详——译者。

谈了同苏联的关系和蒙古事件^①，他说，蒙古事件具有地方意义，“苏联现在不可能挑动日本进行战争”。

所有的材料和事实都说明，日本军阀企图尽快结束在华战争。为了迫使蒋介石投降，他们想让英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停止对中国的政治支援和财政援助，而主要的，是停止支持中国元，禁止它在外国租界区域流通。

日本军阀甚至把中国元的流通与日军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日本人发行的纸币没有任何保证。居民不接受。日本不可能用外汇支付买粮食的费用。没收中国居民的粮食就会加强游击运动和抗日运动。日本人已经明白，征服中国只用军事手段是不行的，除了这些之外，还会缩小粮食基地。

日本和英国关于英日初步协议^②的相互矛盾的报道，留下了各种解释的空间。然而随之发生的事情：美国与日本贸易条约的解除、英法美关于天津冲突的观点的协调、美法在东京就两国对中国元自由流通等问题的关注所采取的一致行动，等等，导致英日在东京会议上所达成的关于英国承认“中国现状”的初步协议化为乌有，该协议被进步报刊说成是远东慕尼黑的开始。

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下，英国暂时还不会搞远东慕尼黑。

第一，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在中国的利益过于巨大。两年多来，英国一直鼓励在中国展开战争，帮助一方和另一方（日本从美国 and 英国进口 86% 的军用物资），企图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影响。英国现在正在实现其早先的计划——通过铁路干线将长江流域与

① 指 1939 年 5 月至 9 月在蒙古东部的哈勒欣河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苏联和蒙古军队联合粉碎了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本第 6 军。

② 1939 年 7 月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克雷吉—有田协定，该协定实际上批准了日本已经实现的占领并鼓励它继续在华战争和侵略苏联。

其印度领地联系起来。英国现在还在期待交战双方彼此削弱和消耗力量,以便自己“走上舞台”。正如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带着新鲜的力量登台,当然,是‘为了和平’,并将自己的条件强加给已被削弱的参战者”^①。

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日本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力量,也没有被削弱到向英国让步的地步,而相反,由柳川平助将军和桥本欣五郎上佐领导并得到平沼内阁政府支持的日本法西斯反英军事集团,坚持要把英国的势力全部赶出中国。他们认为,现在是达到此目的最合适时机,因为英国正在忙于欧洲事务,不可能派兵来反对日本,正如它不可能实行禁运一样,因为它的殖民地和自治领都对同日本的贸易感兴趣。

第二,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国的顽强抗战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它的力量并没有被粉碎,中国拥有无数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以及由蒋介石领导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蒋介石坚决主张继续抗战到底。现在没有理由怀疑蒋介石在许多文件中向全国和全世界明确表达的立场。

如果说最初,1937年12月5日在陶特曼的调停下,蒋介石曾表现出动摇,这一点汪精卫在其小册子里已作出证实(见第3号文件夹,第7—19页),那么,后来的所有“媾和”建议,都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

1939年4月17日,蒋介石就针对近卫《东亚新秩序》声明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如果把近卫的声明看作是和平条件,那么,在字典里就可以把‘投降’一词划掉,用‘和平’一词取代。”

在回答汪精卫的投降建议时,蒋介石在同一次谈话中还说:“在目前的形势下,绝对排除缔结和约的可能性。”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傀儡和叛徒的任何理论和胡说八道,

^① 见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9年3月10—12日)第13页。

都不能动摇我们全国非同寻常的决心。这些无耻的叛徒在道义上已经用其声明宣布了自己的死刑。如果说还能找到一些想把近卫的声明说成是与中国签订和约的条件而不是奴役中国的条件的人,那么,这些人难道不是汉奸和叛徒?! 那他们是什么人呢?!”(见第1号文件夹,页^①)。

1939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而发表的告中国人民书中说:“对我们来说,最严重的是存在着希望实现敌人的‘以华制华’口号的无耻叛徒。”叛徒们在道义上遭到了全体人民的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那些为了祖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的荣誉的侮辱。毫不夸张地说,所谓争取和平的运动就是争取国家灭亡的运动。如果敌人和叛徒们得以实现他们的计划,那就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灭亡。那就是日本来奴役中国。“半路投降,也就是变节的奴才性媾和的同义词。”蒋介石在另一份对日本人民的呼吁书中说:“中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是三民主义国家。日本军阀怎么能使世界相信,它入侵中国是追求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之目的呢?关于中国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说法纯属日军宣传机器的捏造。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就宣布完全支持三民主义^②。我决心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同侵略者作斗争。日本人民应该明白,中国已经团结起来,它拥有很多有能力的人。现在我是最高首领。但是即便将来是另外一个人或100个人占据我的位置,解放战争还会坚决地继续下去。”(塔斯社重庆7月8日电)

蒋介石对日英初步协定的反应也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他在1939年8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任何困难都不能使中国丧失赢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汪精卫离开我们的队伍出走,加强了我国内部的团结。前线形势的稳定和国内的团结,使我们能够克

^① 原文如此。没有注明页码。

^② 见第25号文件。

服任何困难”。蒋介石写道，“涉及到中国的任何协定，没有我们的承认，都不可能是有效的。中国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停步不前，并且最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己在战斗的时候，外援才会来到。我们满怀不可动摇的革命精神去争取胜利。对我们来说，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要消灭敌人，履行我们的革命使命”。（1939年7月27日《消息报》）

在1939年7月27日的文章中蒋介石写道：“英国不会同日本签订协议。英国知道，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为英国当看门狗的日本了。日本现在是一条想咬自己主人的疯狗。不管英国怎样寻求和平的结局，它对日本的让步都不可能损害中国的利益，或者违反九国公约^①。否则英国不仅会成为日本侵略的帮凶，而且还会损毁九国公约。英国就会扮演日本侵略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并把自己置于同九国公约参加国对立的境地。请问，英国会牺牲在中国长时期形成的地位吗？我们确信，日本在这方面的宣传是不可信的。”（1939年7月28日《消息报》）

有人说，如果来自国外的援助将停止，蒋介石就会投降，或者说，只要英国、法国和美国还援助他，他就会抗战。现在还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援助会停止。然而，即便如此，蒋介石也必将继续抗战。那怕是因为日本人要把他搞掉，因为任何投降活动都阻止不了和无法阻止中国人民抗战，他也会这么做。抗日战争将会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将会变得更加残酷。因为它必然还会伴随着同投降派及卖国贼的内战。现在蒋介石是中国的基马尔^②，是民族英雄，他拥有足够的现实力量和权力来继

① 指关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九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和中国）条约。其目的是反对日本在中国实行垄断统治的要求。该公约实际上规定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开发中国。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

② 这里指穆斯塔法·基马尔——1918至1923年土耳其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者。

续进行这场有绝对胜利机会的战争。尽管国内非常困难,但是国际形势总的看来还是对中国有利,而不是有害。同时,投降依然是解放战争中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就在于中国内部有困难,而主要是在于,在民族统一战线政党内、在国家和军事机关中,以及在国民党领导中心内部都存在着挑衅者和叛徒的活动(这在下面还要讲到)。

至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发生的事件,十分明显,这是日本军阀集团部队的冒险行动,这次行动得到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司令部的支持。他们认为,与中国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需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并对苏联发动战争。该集团为了削弱华中的反英运动,转移积极支持反英运动的平沼内阁的注意力,而且可能是根据希特勒针对莫斯科谈判的直接指示,挑起了蒙古事件。

在中国,这种事件像莫斯科谈判^①一样,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据说,使蒋介石产生了很大希望,受到了鼓舞。

二

在战争的第三年开始,中国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中国丧失了所有最重要的经济区、工业中心、大城市、铁路干线、江河航道和几乎全部南部及东部沿海。丧失的领土面积约有 250 万平方公里。确实,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土地上,在很多地区,有相当多的中国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在作战,但是,总的说来,游击运动还不够发展,目前还不能使日本人的铁路和水路运输线瘫痪,也不能阻止日

^① 指 1937 年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代表进行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于 1938 年 3 月 1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向中国提供 5000 万美元的第一个贷款协议(其中包括在协议签订前提供军事装备的价值)和关于在乌鲁木齐建设飞机装配厂的议定书(1939 年 8 月 11 日签署)。

本人对中国工业城市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对铁、煤等的开发。

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地域是巨大的,它等于 800 万平方公里,但是这片地域除了四川、云南和广东外,基本上没有铁路和水路交通。在华南,云南省是通往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唯一通道,经过这条通道中国还能获得弹药和武器装备。修建通往缅甸的道路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月內从缅甸运进来的东西,每天都在广州从一艘不大的轮船上卸下。现在由于洪水泛滥,货物只能用运输机来转运。

国民政府的运输问题遇到了非常巨大的困难,很可能是在战争环境中无法克服的困难。同时,这实质上成了中国军队的一个主要的战略优势,中国军队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比较长的期限内稳定防御战线,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日军向中国腹地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基本上排除了。在兵力分散和战线拉得过长的情况下,日本人的运输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在广州和汉口陷落后,中国的抗战现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个阶段被认为是最持久和最艰苦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是投降倾向的增长和作为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国共合作的破裂。

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是由中国军事力量薄弱决定的。

据现有情报,现在整个中国军队由 245 个师组成,约有 220 万人,其中只有 74.2 万人装备有步枪,只有 12 个师拥有炮兵营。

在中国军队的组成中有军事委员会的军队或中央政府的军队 53 个师,一般说来,这些师的组织、训练和装备都是比较好的。军事委员会的军队都是忠于蒋介石的部队。这些部队都由蒋介石个人信任的将军指挥,据现有情报,这些将军都是效忠于蒋介石的。这些部队分布在所有战场,在比较重要的方向上。(见附图)有情报说,蒋介石个人的军队约有 20 个师,即所谓的“猛虎师”。这些师在上海战斗中受到重创,此后就没有再参加战斗,得到补充后作为预备队。

军事委员会的军队是蒋介石政权的基础,这是他的现实力量,蒋介石依靠这些力量,迫使地方军队和各将军的军队都服从他的政权。其余军队或者是地方的,即所谓各省的军队,或者是某一将军或某一军阀集团的军队。下面列举一些选择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些部队的组成和武器装备的特点:

师的番号	人数	步枪数量
2	15700	2600
4	12500	2130
13	6300	2800
28	2600	1050
64	10000	3700
88	16000	2800
122	4000	990
133	8500	1000
157	23800	3600

而且这种形形色色的状况并不是什么例外,对于所有这些部队来说,这是普遍现象。

大约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只是在名义上隶属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就是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等回民将军的部队。根据情报,他们有 20 万人和 40 万人的预备队。据说,他们有准备训练 80 万人预备队的计划。他们还无法武装这些预备队。

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政权。在口头上承认抗战,但是他们不参加抗战,也不向中央政府提供任何援助。在整个战争期间,马步青只派往前线一个装备和训练都很差的旅,该旅在到达前线之前就有一半人逃走了。其他的马氏将军根本就没有派出自己的部队。

众所周知,日军总参谋部很早就开展了广泛的回民工作,供养

各种回民社会团体、学校、清真寺，培养研究古兰经的专门回民军官干部，等等。在马氏将军的司令部及其军队里，早就有潜人的日本特务，据说，马氏将军们自己从包头得到了日本人运送来的武器。6月马步芳说，“日本人没有威胁我们，我们应该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

阎锡山将军的部队虽然也积极地参加抗战，但是阎锡山本人在各种重大事变过程中都企图扮演不依靠蒋介石，甚至反对蒋介石的独立角色。他的旧军，有8、9万人，是最落后的军队，当然有最落后和最反动的军官，在抗战一开始就被打败了。对于民族统一战线来说，这些军队被打败甚至更好些。阎锡山在撤出太原的时候，宁愿将大炮沉入黄河，而在太原把很多武器和弹药留给日本人，但不肯给八路军。据说，现在阎锡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组建了新的部队3、4万人，他的旧军只剩下2到2.5万人。

蒋鼎文(保守主义者，被亲日派和顽固派包围)的军队，大约有10个师，对八路军怀有敌对情绪，只是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同样，据现有情报，川军将近8个师已经被调往西康省。可能，他们与马氏将军们有联系，因为四川省省长邓锡侯是亲日的。福建省陈仪将军(亲日分子)的3个师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由胡宗南、卫立煌、白崇禧、李宗仁、汤恩伯等将军指挥的其余军队，与中央政府军一起，现在是蒋介石的可靠支柱。其总人数超过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二，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可以依靠的军队。

拥有实际力量(即自己的军队)的这些将军都支持和服从蒋介石以及在抗战过去的两年间，在中国将军们的不同军队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一实际情况，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的，可能也是主要的表现。还要加上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以想象得到的政治基础的国共合作。但是，恰恰是这种国共合作，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破裂的危险之中，这在当前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薄弱的环节。这个环节的破裂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直至内战和

向日本人投降。为了预防破裂和投降,首先,就必须对中国的形势有个正确的评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个正确的评价。不能将其硬塞入任何模式。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地看待它,并发展其中最强的方面,以便加强抗日战争。

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国民党和国家领袖蒋介石的独裁所体现的国民党专政。这个事实为国民党官方文件所承认,并出自孙逸仙关于革命政权三个时期的学说:1. 军事时期——1925至1927年;2. 教育或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实行专政,并使人民“准备”向立宪时期过渡;3. 立宪时期。国民党承认,现在这个时期是从专政向立宪过渡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承认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但是反对一党专政,并且提出了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两党平等的原则。在党的报刊上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宣传了“共同领导和共同负责”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开展了群众运动,犯了一系列宗派主义的错误,试图垄断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并将自己的群众组织同国民党对立起来。中国共产党不是在国民党现有的群众团体、工会等组织中做工作,而是到处着手建立许多有“流浪学生团”、“蚁社”等最奇妙名称的各种组织,这些名称常常不为群众所理解,有时甚至使群众感到恐惧,而最害怕的还是国民党。仅在中国东南部,就有各种名称的青年群众性组织约100个,其中50个是受共产党影响和领导的。(见第2号文件夹,第158页。)一开始,国民党企图将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并把领导权抓到自己的手里,但最终遭到共产党人和群众组织其他领导人的反对。最后所有这些群众组织都被取缔了。国民党建立了“孙逸仙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没有加入这个青年团,而是不顾禁令继续半合法存在。在汉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恰恰

是由于解散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而发生的。在《新华日报》上中共承认被解散的组织是自己的组织并发起了抗议运动。从现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组织的组成、状况和活动,都未能使共产党免遭各种挑衅,至少无助于巩固国共合作。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从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就是不正确的。早在193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洛甫^①在由安德里阿诺夫^②同志所记录的谈话中就说过:“尽管成立了军事动员委员会,该委员会担负着监督群众运动的任务,但实际上,在诸如长沙、汉口等城市,建立某种实际监督,国民党是做不到的。群众运动在避开国民党进行,不跟随它的口号,而是跟随我们的口号。实际上针对我们的报刊检查几乎也不存在。仅在一个汉口就有40到60家报纸在刊登关于我们的消息。在全中国有200多家报纸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革命运动浪潮发展得很迅猛,国民党成了尾巴。”事实上,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变成了建立或自发出现许多各种组织。这些组织的领导权,既没有被国民党掌握,也没有被共产党掌握。(见《1937至1938年中国青年运动》简评,第2号文件夹,第136—179页。)

中共的报刊过分夸大自己在发展和扩大群众组织方面的成绩,夸大开展游击队运动的成绩,特别是八路军和第四军在这方面的成绩,以及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边区各级政府的成绩,说他们控制着具有数千万人口的广阔区域。这些地区和八路军吸引了几乎所有中国报刊(除了政府和国民党的《大公报》)和外国报刊的注意,其中包括日本的报刊。这些地区,特别是陕北地区有各种“旅游者”、基督教使团、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甚至波兰人和意大利人

① 张闻天。

② 见第13号文件。

争先恐后地来参观访问。到过那里的有英国武官和美国副武官,以及一大群持怀疑态度的记者,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记者,对此他们特别感谢过去的苏区和中国红军,他们夸大了苏区和红军的成绩。在这以前世界并不了解这些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开创了这种议论的先河,对中国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取得的胜利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至少是有害的,而我认为挑衅性的夸大报道。这与日本报刊就此问题所进行的议论令人怀疑的完全一致。当时在外国报刊上,而后1935年在苏联的报刊上将中国红军的人数夸大到50万,而实际上那时只有35到40万。

当前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这类记者只是简单地重复这种老式的挑衅手法。所有报刊都掀起了关于八路军取得无数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的广大边区方面取得成绩的议论。这类记者在边区总是受到很好的接待,甚至与他们中的某些人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谈,而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这样的记者,已经被认为是自己人了。大家还知道,美国副武官卡尔森几乎访问了八路军所有部队,据说,他表现得很红,为此他好像被撤了职。据已经掌握的情报,他甚至参加过八路军部队作战计划的制订。下面这些情况是斯克林尼克同志告诉我的,他本人曾两次访问陕北边区和八路军。据他报告,朱德同志在与他谈话时说:“如果能像报纸上经常报道的那样,哪怕是4个月对日进行一次这样的战役,那我就感到很幸运了。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弹药。在进攻的时候每个战士只发给5发子弹。”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夸大八路军胜利和千方百计讨好我们同志的“记者们”,比我们更了解八路军的真实困难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困难。他们就地直接观察和了解情况,而我们却得不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全面定期通报,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一年来,除了电报,没有收到一份通报材料。据日本报刊判断,甚至一些报纸的编辑部都比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更了解中共的领导人,因

为根本就没有干部通报。(见《塔北新报?》^①简评。第2号文件夹,第82—94页。)

苏联报刊,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杂志^②和所有共产党的报刊,无论在苏维埃运动时期,还是现在,很遗憾,都当了这种有害议论的尾巴。它们也夸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和不存在的成绩。为了证明,它们通常引用外国的报刊,其中包括日本的报刊,正像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报刊“不得不承认”,或者“对中共的胜利不能沉默不语”,等等。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报刊的这种方针是由米夫之类的对手授意和操纵的,那么,他们被揭露后,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出版社和编辑部迄今还在按习惯论述这些问题。由报刊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这正是日本人和反动报刊,其中包括汪精卫的报刊,现在所报道的。(见《南华日报》简评,第2号文件夹,第56—91、82—94页。)他们绞尽脑汁试图证明,国民党正在共产化,中国正在苏维埃化,蒋介石是共产党人的傀儡,周恩来对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日本人及其代理人所散布的东西。

日本军阀用中国红军的胜利来恐吓日本的资产阶级,一年又一年地增加由日本议会投票批准的军事预算。现在他们以反对共产主义危险的必要性来为其侵略中国的行为做辩护,声称他们是在保护中国和日本,使之免遭共产主义的威胁。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确实像他们所描写的那样在增长,如果它在不断地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新区,如果它的武装力量——第四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像报刊所报道的那样已经超过了100万,如果国民党和蒋介石确实在共产化,那么,不仅日本的、英国的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

① 原文如此。报纸名称不详。

②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刊物,1919—1943年用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出版。

府,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都会为日本军阀“祝福”,不仅会为日本武装力量的胜利祈祷,而且还会真正帮助日本人来镇压中国的反抗。

遗憾的是,中共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巨大。报刊上对这些成绩的议论大大超过了这些成绩本身。共产党的影响及其组织的增长,主要是在中国北方,更确切地说,是在陕北边区非常有限的区域。这里有731个基层组织,其中有中共党员3万,79%是农民,16%是工人。党靠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已经不可能。陈林^①同志也认为,党在这里发展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经用尽。这个地区对于党依靠自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大批学生、爱国青年来发展自己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这里培养了大量党的干部和爱国的干部。在军事学院^②同时学习的达1万人,学员中27%是文盲,每500人编一个学习班,经过培训的教员和教科书都不够。在党校,学员达500人,其中也有25%是文盲。为领导干部还办了一所能容纳200人的业余马列主义学校。决定今年从中国各省为军政大学招收学员,但是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青年和学生都来不了了。国民党当局不让青年去边区,他们或者被送往国民党建立的学校,或者被逮捕。在八路军及其活动地区,党的组织也在发展。在八路军中党员占15%—20%,有党员1.5万到2万,加上八路军活动地区的党员,约有3万。第四军约有1万名党员。根据洛甫1938年2月报告的材料,在原华中华南苏区,老的党组织已经恢复,有1万名党员,但这基本上也是农民地区。在工业区和大城市,早在战争开始之前,由于遭到一系列的破坏和叛徒出卖,[中共]中央上海局已经落入暗探局之手,党的组织几乎被彻底摧毁。随着战争的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上

① 任弼时。

② 指抗日军政大学。

海失守^①之前那里约有 1000 名党员。在汉口,失守之前约有 4000 名党员。在长沙市建有坚强的党组织。其他城市没有消息。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材料,截至 1938 年 4 月共有 8 万名党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②上提供的中共党员有 14.8 万的信息,是根据陈林同志的估计,在这个期间组织应该有了发展。这些材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主要是依靠几个极其有限的农民地区。在工业中心和城市中党的组织极其薄弱,或者根本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在战前党在工会中失去了影响力,在战时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太薄弱。

由此可见,中共在战时建立的群众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如果不在这方面存在不少冒险主义,那么至少可以说,工作是不认真的。这些组织被轻易地瓦解了,就像轻易地很快建立起来一样。大家知道,在日军后方的边区,即按照陕北边区模式建立的游击队根据地,情况也不像所报道的那样。轰动一时的、拥有民主政府和 1000 万到 1200 万居民的晋察冀边区,实际上被消灭了。有报道说,这样的地区建立了很多。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感到欢欣鼓舞,也使其敌人和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的临时同盟者感到不安。这特别吓坏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使他们得以在国民党五中全会^③上通过旨在限制共产党在游击区的影响的决议。在中央和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的游击委员会,从其计划和任务来看,这些委员会是国民党的一大进步,然而现在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旨在遏制八路军和第四军影响的扩大,这在一系列场合导致了与八路军部队的武装冲突。

① 1937 年 11 月 12 日。

② 见·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39 年 3 月 10—12 日,速记记录,第 60 页。

③ 见第 143 页注②。

陕北边区作为中华民国的模范地区,实际上不可能是这种样子,尽管它由陕西、甘肃、宁夏三个省的 29 个县组成。在这些县中只有 2 个县拥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完全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5 个县拥有并列的两套行政管理机构——两个县长:一个是国民党的县长,他拥有自己的宪兵队,只拥有管理县城的权力;另一个县长是共产党的,他拥有管理全县的实际权力。而 22 个县是混合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员夺取了县的十分之一土地,那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以共产党员为首的县级管理机构,而那十分之九的土地仍然由国民党的县长来管理。实际上这 22 个县就变成了 44 个县,而整个这个边区是由分散的各个部分组成。在我们所记录的一次谈话中,原陕北边区政府的一位成员马洛夫^①同志向我们通报了这些材料,他说:“如果说在第一类县中,国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摩擦,那么在第二类县中,就经常发生各种摩擦,而在第三类县中,摩擦就更多了。第三类县中的摩擦常常发展成为武装冲突。国民党的县长有时派人去共产党管理的地区收缴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就把国民党的官员赶出自己的地区。由于这个原因就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在第三类县中国共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见第 1 号文件夹,第 103 页)

还必须指出,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由于边区地域的扩展在这个地区就发生过武装冲突。为进出边区需要由八路军驻西安、兰州、长沙、重庆等城市的办事处签发专门通行证。这个地区的政府并没有被批准,其存在是不合法的。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行政区划分为省、专区、县和区。根据这个理由,中国报刊上正在开展一个旨在取消这个地区的运动,而这个地区几乎被那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持敌视态度的部队包围。在国民党于 1938 年 5 月出版的一个秘密小册子中说,“必须取消陕北特区的封建割据。政府

^① 马明方,见第 51 号文件。

可以保障各个在野党的合法存在。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以此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政党地位的党。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反对在中国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也不能说,他们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新华日报》所引用的旨在为特区的存在作辩护的理由,是缺少说服力的。我们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陈林、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于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里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

众所周知,早在汉口失守之前,由于处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的群众组织被取缔和在一系列地区中共遭到部分迫害,就出现了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现在这种危险不但没有消除,而且从1939年5、6月起更加加重了。中共六中全会纠正了犯过的许多错误,但并没有消除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在六中全会决议^①中说,应该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看来,这意味着,在六中全会之前曾经进行过这种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重犯1925至1927年间犯过的老错误,当时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中和在国民党内就建立了地下支部,这些支部在“三二〇”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不重要,实际上这次事件为一年后的上海事变(1927年4月12日)和1927年7月的武汉决裂^②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中全会,通过了一些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影响扩大的决议。这次全会拒绝了中共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目前的国际和

① 见第25号文件。

② 见《中国现代史》,1917—1927年,第236—239,286—289页等。

国内形势下,国民党的这个决定,客观地看,是正确的。蒋介石应该实行一种有助于中国和国民政府获得英国、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援助的政策。如果蒋介石站在完全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上,或者站在以某种形式使国民党与共产党相融合的立场上,那就不可能加强中国的团结及其抗战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国民党内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抗战的力量,而且相反,会削弱中国抗战的力量,因为这会引起国内外的反应,因为不仅英美等国的资本家最害怕这一点,而且加人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国内的其他力量也不想看到这一点。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许多将军都准备参加、正在参加和将要参加抗战。然而,如果让他们作出选择: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摇摆不定。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但至少他们中的少数人会选择共产党人。这就意味着,国民党的政策和共产党的政策都应该避免提出在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反映国民党多数人和蒋介石意见的《大公报》,对中共很忠实地阐述了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和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见对《大公报》的简评)^①。

由陈立夫领导的“CC”派^②中的顽固派,在全会上用与日本人斗争到底的词句做掩饰,达到了与中共决裂的目的,而在全会之后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诽谤,并且不断地制造各种摩擦和武装冲突。所有有名的冲突和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以及反共的小册子和通告,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顽固派的阴谋。国民党的这类通告中就有这样的指示:“将中共的领导干部引诱到自己方面来,收买中层工作人员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对下层群众则用镇压手段

① 简评没有找到。

② 见第163页注②。

进行恐吓”^①。

1939年6月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声明说：“为了国家，我应该反对中国共产党。我与你们心是相通的，但是理智告诉我，为了民族我需要压制你们的积极性。”

迄今为止一直不同于“CC”派及各种顽固派的陈诚将军，坚持认为，有必要利用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和借鉴共产党人的积极经验，但在1939年6月25日却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是煽动者的政党，必须抛弃进行合作的任何幻想”。

这些声明对于我们来说是严重的警告：可能对中共会有更加广泛的挑衅活动，对中共的活动国民党会采取更加坚决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②同志在1939年6月14日《救国日报》^③社论中向国民党提出的问题，无助于扭转业已形成的局面，并在错误地引导中国共产党人^④。王明同志写道：“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想继续解放战争，而另一方面想反共，幻想可以同时进行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这些人，当然只能是幻想者和空想者。我们真诚地对这些幻想者和坚持这种信念的人说，他们需要仔细地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请他们仔细斟酌自己的实际力量，请他们仔细想一想这样一些问题：你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同时进行既反日又反共的斗争？难道你们忘记了十年内战的痛苦经历和教训？是联合共产党人抗日呢，还是反共向日本投降？”

这些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你们想进行解放战争和建设国家，那就必须与共产党联合；谁想反共，他最后就

① 见第45号文件。

② 陈绍禹。

③ 《救国日报》，由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创办的报纸，1935至1938年在巴黎出版，1938至1939年在纽约出版。

④ 对此句有批注“结论完全出人预料，不是从整个叙述中得出的。”

会走上投降和背叛的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见[19]39年8月5日的第254号电讯稿)^①

说在反共喧嚣的背后隐藏着投降的倾向,这是正确的;说叛徒和日本代理人以反共词句作掩饰,力求削弱中国的力量,分裂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中国走向投降——这也是正确的。

但是,王明同志提出的头两个问题带有对一些人的威胁和挑衅,这些人指出,即便国民党继续进行抗战,共产党人也准备恢复内战。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在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作出明确选择。这是在提出根本错误的问题,会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加速投降,因为在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选择“没有中间道路”^②。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投降的危险仍然是抗战第二阶段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就在于中国内部有困难,而主要是在于,在民族统一战线政党内、在国家和军事机构中及在国民党领导中心中存在挑衅分子和叛变分子的活动。

B. 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

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

第一,当蒋介石继续抗战时,共产党人就应该千方百计加强他们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影响。即便蒋介石在国民党各种派别之间耍手腕,以及为了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他将继续实行限制共产党人活动、影响和积极性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应该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蒋介石到底。除此之外,中共还应该揭露那些真正的投降分子和叛徒,他们以反共的词句和行为作掩饰,

^① 电讯稿没有找到。

^② 对此段有批注,“关于取消的模糊建议。”

并在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挑动分裂。

第二,只要国民党还站在抗战的立场上,中共就应该根据对中国内外形势的评估,坚决改进自己的工作,消除与国民党的摩擦和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中共的一切力量和影响都应该服从基本的任务——保证中国在这场正义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根据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口号来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员应该在现有的群众组织中工作,支持国民党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为了实现群众运动统一的原则,中共应该把在它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与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合并在一起。停止夸大或过分强调中共的力量和影响。

第三,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一致进行坚决的斗争,蒋介石是公认的民族领袖,当前他体现了中国在正义的抗日战争中的团结一致,要争取使全国的一切力量真正地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

第四,消除陕甘宁边区现存双重政权的不正常局面,对它们进行改组,使它们的存在不违背国家现有法律。

第五,必须在欧洲、美洲和东方各国组织广泛地声援和帮助中国的运动;在装卸日本物资的所有港口组织抵制日货的运动;组织码头工人罢工。

第六,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用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干部培训工作,使党的工作不再花蒋介石发给八路军军费的一分钱(现在供给八路军的军费45万元,其中有25万元用于党的工作和供养陕北边区的行政机关)。根据最近的材料,蒋介石发给八路军的军费60万元,发给第四军的军费13万元

二

如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及国共合作?

第一,承认国共长期合作的必要性,不仅在抗战时期,而且在

战胜日本之后也需要合作,中共不应该把扩大自己的影响同国民党的影响对立起来。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一切群众工作都应该以孙逸仙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在这里中共应主要进行旨在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的党内工作;有组织地巩固现有的组织和加强党的政治影响,不提出在这些地区扩大党组织的任务,因为这样做会遇到国民党的反对,也不会有助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

第二,减少党在农民地区的发展。提出在日本人占领的工业区和城市巩固和建立党的坚强组织的中心任务。应该把党的最好力量调到那里去。延安不可能成为组织和领导这项工作的合适的中心,因此,必须建立中共中央海外局和相应的地下机关。组建一所专门学校,或者一些学校来培养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为这所学校配备经过严格考验的党员干部。中共应该为实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纲领性决议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斗争。

三

如何加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

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实际力量。它和第四军一起增强了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力量。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由朱德指挥并在中共政治领导下的八路军,应该成为中央政府军中的一支军队,并得到蒋介石的全面支持。必须按这一系统争取使八路军组成人员武装到100%,而不是35%。应该这样提出问题,使蒋介石相信中共和八路军,使蒋介石在抗战中能指望八路军和中共,就像指望中央政府的军队和自己的“猛虎师”一样。蒋介石应该了解和相信,由中共实行政治领导的八路军,是他在抗战中和建设新国家中的最可靠的支柱。现在八路军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是在武器装备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财政方面。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八路军不

能像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①那样,再去没收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资产。购买粮食,八路军必须付钱给农民,否则就不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据一些材料说,今年7月八路军甚至没有购买小米(八路军指战员的主要食物)所需要的资金^②。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

四

如果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将成为事实,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号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和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及国民党群众在各处继续同日本人展开游击战。

同日本人作斗争的社会基础不应该缩小。党应该提出一个主要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和第四军应该全力开展斗争,把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在日本人和傀儡政府所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中国傀儡军队和倾向投降派的国民党组织中加强自己的工作。党应该号召人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和1938年4月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而斗争。

特别是:1.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向中共七大提出,但是在七大召开之前,必须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

为此目的,为了直接作出通报和研究干部方面的一些问题,必

① 这个时期是从1927年7月到1937年8月底。

② 见第42、52号文件。

须紧急邀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施平^①同志来莫斯科。安排他们来莫斯科应考虑到,使他们最多在一个月内就能返回延安。

2. 在七大上必然会提出李德^②的作用问题,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同志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说,1932到1935年间,大家都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但是他同博古^③实行了这样一条路线,使大量党的干部和三分之二的红军有生力量被消灭了。毛泽民认为,只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李德、博古等人才没有受到惩罚。

七大召开之前,必须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并作出决定。

3. 必须相应地作出指示,改变苏联报刊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必须停止使用一些术语,特别是那些把中共同国民党对立起来或者夸大中共、八路军和第四军胜利,以及造成所谓国民党共产化等虚假概念的术语。

附录:1. 关于战区和中国军队的略图及说明——7页。

2. 1939年8月5日电讯稿。

3. 第1号文件夹:中国小组会议材料——239页。

4. 第2号文件夹:中国报刊简介——205页。

5. 第3号文件夹:日本和英国报刊文章简介及译文——150页。

6.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关于书报检查的指示。

① 陈云。

② 奥托·布劳恩。

③ 秦邦宪。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 (莫尔德维诺夫)

全宗 495, 目录 74, 卷宗 295, 第 7—40 页。

科瓦廖夫修改过的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64

毛泽民关于中共党员人数的书面报告

1939年8月20日于莫斯科

绝密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1. 陕甘宁特区：

有21个县委员会，1360个支部，共有近3万名党员。

2. 八路军^①：共有近3万名党员。

3. 其他省份：

(1)陕西省有2000名党员。

(2)湘鄂赣边区有2000名党员。

(3)在赣南，在澄州、瑞金县共有1000名党员。

(4)湖南省有400名党员。

(5)河南省有900名党员。

(6)上海有700名党员。

(7)福建和广东有9000名党员。

(8)华北和山西有5000名党员。

(9)甘肃省有2050名党员。

总共有83050名党员。

^① 见第14页注①、第15号文件。

注^①：

1. 湖北、四川、贵州和广东省的党组织不久前才恢复，所以这些省的党员人数还不清楚。云南省还没有开展组织工作。

2. 重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②刚开始建立党的组织。目前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都计算在闽粤、湘鄂赣、赣南及其他党组织内了。例如，闽粤党组织中的 9000 名党员现在基本上都充实到第四军和过去由张鼎丞指挥的红军部队中去了。

3. 在甘肃党组织的 2050 名党员中，约有 50 名党员在兰州市，而其他都在甘肃东部地区和其他军队里。

4. 最近党组织的增长基本上是靠吸收学生入党。例如，在陕西党组织的所有党员中，工人只占 7%，即在西安地区工作的工人。在过去的苏维埃地区，党组织的社会成分基本是农民。

5. 党感到干部缺乏，因为：第一，那些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只会进行土地革命，而如果把他们调去做统一战线工作，那就需要对他们进行重新培训。第二，那些现在或过去在所谓的白区即大城市工作的党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没有在这些地区工作的经验。党现在感到干部奇缺，不过现在正在积极培养干部。

6. 目前这个统计是不全的，是根据地方工作报告编写的，同时：

(1)这个数字只统计到 1937 年冬季，而某些[材料]只统计到秋季；

(2)陕甘宁特区和八路军中党组织的党员人数，是根据截至 1937 年冬季的实际材料统计的；

(3)在湖北、四川和广东等省的党组织刚刚恢复和发展，因此

① 文件注释。

② 见第 25 页注①、第 15 号文件。

其党员数量不会超过统计的数字。

周全(毛泽民)

又及：译者注：

周全同志在与莫尔德维诺夫的私下谈话中说，这些材料是他在离开延安前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得到的，并且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他被告知，如果在共产国际有某位负责人员问到他这个问题时，他可以提供这些材料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材料。

翻译：张绥山^①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296，第 100—102 页。

打字稿，原件，译者亲笔签字。

^① 曾秀夫。

65

普罗斯库洛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9年8月22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的人^②通过林伯渠^③将钱交给了亲密的朋友们。林伯渠认为,钱数无疑是不够的。

(普罗斯库洛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07,第 11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标注:“送苏哈洛夫同志。1939年8月26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何人不详。

③ 林祖涵。

66

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9年9月8日^②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同志

关于单独较为有效地给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第四军^③提供医疗援助的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认为,通过红十字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④系统提出大规模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问题是适时的。

通过这个系统可以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医院,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运输。还可以沿我们感兴趣的路线在西安、延安及其他地点设立红十字会分会。

这种像样的有组织的援助,看来会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社会团体的支持。

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把中共干部转运到莫斯科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波诺马廖夫同志。本着这种精神起草一封给联共(布)中央(马林科夫同志)的信。1939年9月28日。Г 季米特洛夫。”1939年12月31日的批注——辨认不清。

② 日期是根据收文印章上的日期注明的。

③ 见第14页注①,第25页注①。

④ 见第86号文件。

治疗的必要性。在乌鲁木齐地区,除了医院还可以为受伤的官兵建立一所体面的康复疗养院,在那里也可以为我们的干部做些简单的治疗。

实际上,我们认为,最初阶段需要 15 到 20 名医务工作者、4 至 5 辆救护车,至少一架急救飞机和一两位能领导这项事业的有毅力的政工人员。

(陈林^①)

(莫尔德维诺夫)

全宗 495,目录 74,卷宗 305,第 20—21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任弼时。

6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9月8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战争已经在欧洲开始^③，请向我们指出，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法国、波兰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持什么立场。请向我们指出，欧洲的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什么影响。我们收到很少关于国际形势的通报。请作出总的指示并经常发给我们通报^④。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2(1939 年收文)，第 62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曼伊努尔斯基同志和陈林[任弼时]同志阅。[19]39年9月10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9月10日收到文件的。

③ 指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④ 见第68号文件。

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9年9月8日^②于莫斯科

致中国^③

目前的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参战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有罪过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不会支持这场战争,更不要说共产党了。资产阶级进行这场战争,不是像张伯伦及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所保证的那样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国际无产阶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保卫拒绝苏联援助并正在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法西斯波兰^④。

各国共产党曾为反对慕尼黑分子进行过斗争,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真正的反法西斯阵线,可是,法国和英国的

① 此文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即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而发出的指示,1939年9月9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第485—6号记录)。1939年9月8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签发。(见《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94年版,第1册(到1941年6月22日),第88—90页)。

② 日期是根据发文印章上的日期注明的。

③ 考虑到各国的特点,类似内容的电报也发给了世界各国共产党。

④ 波兰政府不仅拒绝苏联的援助,而且甚至在1939年夏天德波关系紧张时都不同意让苏联军队进入它的领土,以便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情况下加强它的边界。

资产阶级,为了进行掠夺性的战争,排斥了苏联。

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把国家分成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做法,现在失去了以前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策略。所有各参战国共产党在当前这个阶段的策略,就是反对战争,揭露它的帝国主义性质,凡有共产党议员的地方,都要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并向民众说明,战争除了给他们带来负担和破产外,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在中立国家要揭露政府为了自己的国家而保持中立,但却支持在别的国家进行战争以牟取暴利,就像美国政府对日本和中国所做的那样。在各地,共产党都应该转入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政策。

与这些方针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必须立即纠正自己的政治路线。

主席团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 年发文),第 42 页。

打字稿,原件。

6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9月21日于莫斯科

绝密

9月20日给你们寄去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包裹^①，林伯渠或朱德应在西安亲自接收。

请预先提醒他们，这是寄给中共中央的，并要求尽快送给你们。

请尽快确认是否收到。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 年发文)，第 45 页。

手稿，亲笔签字。

^① 关于第一个重要包裹，见第 57 号文件。

7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9年10月3日于莫斯科

绝密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由于您的关心和协助，还在1937年就打着^①盛世才督办的名义，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现在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

为了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设立了以下各班：炮兵班、航空兵班、坦克兵班及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

根据方林^②和徐杰^③同志的报告，该校学生在两年的学习期间已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最近6、7个月以来，由于缺乏军事技术装备（缺少新型飞机、坦克、汽车等）和军事教员，大大妨碍了今后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技术装备和教员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他们就不能继续学习了，这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就不可能作为军事专家（飞行员、坦克手）来使用。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我们有以下建议：

1. 为使在乌鲁木齐学习的这批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和完成学业，需要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给他们提供几架各

① 原文如此。

② 邓发。

③ 陈潭秋。

种型号的飞机、几辆坦克、五六部汽车、一名火炮方面的教员、一名坦克方面的教员)的派遣问题。

2. 如果从政治上考虑不便给他们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那就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送到苏联莫斯科或阿拉木图地区,在那里成立一所能够接收 200 名学生继续学习的专门军事学校或军事培训班。

如果您同意第二点,那就需要通过我们和组织部派一些同志来,为该校招生。

考虑到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重要性和不宜中断这些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的学习,我们请您彻底解决和落实这个问题。

(周恩来)

(陈林^①)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909, 第 17—18 页。

打字稿, 原件。

^① 任弼时。

7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0月8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党中央

9月19日给周恩来做了手术。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48页。
俄文手稿。

^① 发报日期。

72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10月12日^②于延安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我们打算于明年1月15日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③。请您就所有问题给我们作出指示并及时让周恩来和陈林回到我们这里来。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1939年收文),第64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文件上有批注：“告诉陈林[任弼时]同志和周恩来同志。[19]39年10月14日。Г. 季米特洛夫。”
-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10月14日收到文件的。
- ③ 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73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

1939年11月10日^①于莫斯科

中共中央

致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在1939年10月21日的《每日先驱报》^②上发表了挑衅性的谈话。毛泽东似乎对他说了以下一些话：

“现在处于共产党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在行政方面独立于蒋介石政府。在消灭国民党独裁和取代它建立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机构之前，中国不可能完全统一。”

必须揭露这种挑衅^③。如果毛泽东发表了谈话，请把他的确切谈话内容告诉我们。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1939 年发文)，第 54 页及其背面。
俄文手稿。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② 《每日先驱报》——日报，自 1892 年至今在芝加哥出版。

③ 见第 77 号文件。

74

莫尔德维诺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9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

就埃德加·斯诺在1939年10月21日《每日先驱报》上关于毛泽东同志公开的政治声明^②的报道,我与周恩来及陈林^③同志进行了交谈。他们认为,这个报道是挑衅性的。

周恩来同志同意电报草稿并请补充一句:埃德加·斯诺的这个报道会被用于挑衅目的。他还请中共中央电告,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发表了什么样的谈话。

莫尔德维诺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1042,第7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编号卷宗——外国新闻记者在中国”。

② 见第73号文件。

③ 任弼时。

7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1月15日^①于莫斯科

绝密

你们要的新闻纸60吨,我们只能小批量地运送到哈密,或最远运送到兰州。

请告之,你们是否能够顺利地将这些纸转运到你们那里。

只有在得到你们的肯定答复之后,我们才会将纸发送到上述地点。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55页。

手稿,亲笔签字。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明明的。

76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1月16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我们通过纽约为你们的报刊拍发了电讯。请告,你们是否经常收到这种信息,你们是怎样利用的。

季米特洛夫

全宗 495, 目录 184, 卷宗 3(1939 年发文), 第 5 页。

俄文手稿。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明注的。

7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①

1939年11月21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埃德加·斯诺发表的谈话^③未经毛泽东审阅,根据您和我们驻香港同志的报告可以看出,那次谈话的内容完全是谎言和挑衅。我们正在采取必要措施分析^④他的阴谋。此外,我们已经给我们驻乌鲁木齐和香港的同志们及同情者发去指示,让他们同斯诺断绝一切联系。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2(1939 年收文),第 73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陈林[任弼时]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阅。[19]39年11月22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文件是在1939年11月21日。

③ 见第73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应为:揭露。

78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①

1939年11月26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周恩来

后方机关^③的开支每月就有50万中国元。所有现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今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1939年收文),第75页。

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陈林[任弼时]阅(以便转告周恩来)。Г. 季米特洛夫”,“送苏哈列夫同志。[19]39年11月28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是在1939年11月28日收到文件的。

③ 指党组织的机关。

7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7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为庆祝斯大林同志诞辰60周年,请让我们不晚于12月18日收到毛泽东撰写的以《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独立的朋友》为题的短文^①和朱德撰写的以《中国战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为题的短文。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61页。

俄文手稿。

^① 见毛泽东著《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3卷,第187—191页。

8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7日^①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周〕恩来还在治疗。治疗将于12月底结束。最早我们只能于〔1940年〕1月中旬动身。请告，可否将代表大会^②推迟到3月份。请告国民党六中全会^③结果。

周恩来
陈林^④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63页。
俄文手稿。

-
- ① 文件上标注的日期。
② 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③ 1939年11月12日至20日在重庆举行。
④ 任弼时。

81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9年12月15日^②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诞辰60周年,请寄贺电来。

周恩来、陈林^③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64页。
俄文手稿。

① 1939年12月17日季米特洛夫看过此文件。

②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③ 任弼时。

82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①

1939年12月15日^②于延安

绝密

致〔周〕恩来和陈林

你们的电报收悉^③。鉴于等待恩来康复和他参加代表大会，我们可以把代表大会^④推迟到3月或4月召开。

中共中央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2(1939年收文)，第79页。

打字稿，原件。

-
- ① 1939年12月19日季米特洛夫和陈林〔任弼时〕看过此文件。
② 发报日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文件是在1939年12月16日。
③ 见第81、82号文件。
④ 指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83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①

1939年12月21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季米特洛夫同志

据我们工作人员^②从延安发来的报告,目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前线约有3.5万名伤病员,无医无药。

(普罗斯库罗夫)

全宗495,目录74,卷宗307,第147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苏哈列夫同志阅。1939年12月25日。Г. 季米特洛夫。”

② 何人不详。

84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①

(摘录)

1939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

1. 统一战线的形式及其特点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矛盾的发展中。因为统一战线的进步,使着抗战继续坚持,使国民政府的政策有若干进步,但当着统一战线坏转,就会使分裂与投降的危险加大。有时因为抗战继续,摩擦到一定限度,又会缓和起来。有时因为统一战线发展,又使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不安起来,而发生新的摩擦。这就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常处在一种复杂的曲折的变化过程中,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然而总的方向也还有一些进步。这样,就

① 由于报告篇幅太长,略去了第一部分“中日战争新阶段”,在这部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中国在抗战第二阶段的国内外形势、制造远东“慕尼黑”企图及其本质和危险、国内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各种看法。这些问题中的某些内容在所公布的周恩来报告的其余部分中有所反映(见全宗495,目录18,卷宗1309,第1—5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40年1月17—19日会议听取了报告。见第90号文件。(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保存有此报告的俄文稿和中文稿,经对照得知,俄文稿系译自中文稿,略有增加字句。这里是按中文稿文本发表,俄文稿中增加的字句,加括弧作出说明——译者。)

使这次统一战线已经继续了三年。

这次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共同纲领,也没有各党的联合组织,就是说在法律上中国的统一战线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含的范围和内容又极广泛。在抗日战线上,中国各阶级的分子都参加了,而工农群众又贡献得最大,但得权的统治者仍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参政会中,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可以与当权的国民党共同议事,这似乎具有民族联盟和国会的性质,但它只是建议机关,各党派不能算作合法的。

国共两党负责人员可以相互接洽,但国民党可以在各地逮捕共产党员,甚至于不承认中国有共产党。各地方政府已经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但许多地方仍然还保有相当独立的权力。

各地方军队连八路军新四军在内,都已统一于蒋介石的指挥,但国民党一方面竟欲使之全体国民党化,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容其保有各自的系统。

抗战建国纲领^①本可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国民党必使之成为国民党纲领,然后令全国遵守。这种包含各阶级各党派各地方各军队的统一战线,虽无法定形式,却有实际的内容。然而正因其广泛,内容便甚复杂。国民党最重形式,同时亦常承认已成之事实,故于统一战线宁愿迁就许多事实,而不愿假以名义。所以情况好时,统一战线可以因事实的存在而发展;情况坏时,又可因不合法而受到许多打击。这正是中国的军人政治官僚政治的特色,统一战线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可是不管怎样,事实上,统一战线总是存在着和发展着的,而且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正为中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没有这,

^① 指在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见《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484—488页。

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可能,抗战的发动和坚持也不可能。因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也就值得一说。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大概的情形如下:

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这是它的优点。因为目前中国民族矛盾大过阶级矛盾,故全民族易于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国民党的阶级政策,是禁止和压迫工农斗争,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亦不妥,这就妨碍民族阵线的扩大,易于使上层阶级趋向妥协。

第二,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这就是说中国统一战线有现成的三民主义政策作政治纲领,这是它的优点。但它的弱点也就在三民主义本身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目前国民党多不用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而用戴季陶修正的三民主义^①),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易为一党政治所利用,并且国民党常将三民主义用作压服其他党派的武器,而不看成是团结全国的政治基础。

第三,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有军队,许多地方势力亦有军队,国共两党能够重新合作,是这种军事力量作了保障。在抗战中,国民党及各地方的武力,如果进步,共产党武力发展,如果影响得好,可以促进统一战线进步,而且会有决定的作用。否则便有分裂危险。

第四,是有 15 年经验的。在好的方面是国共两党军队及全国谁都不愿随便分裂;但另一方面,也因历史的痕迹和成见,容易怀疑对立,落后的更易受人挑拨。

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时也是不平等的。这一方面故可使统一战线进步很慢,但另一方面,好的地方也可影响坏的地方,共产党及其力量在局部的发展,国民党有时还能容忍。

① 戴季陶同意孙逸仙的前两个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认为这两个主义反映了全民利益。他反对共产党人对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的解释,认为他们的解释会导致穷人去反对富人。

第六,是长期性的,统一战线是保证抗战的,但抗战期中并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生变化,所以统一战线是要在长期中求进步,同时也会遇到危险。

第七,是大多数民众尚未组织的,遂使广大民众虽参加了抗战,但尚不能给统一战线以有力的组织基础,而游击战区及边区的民众组织,亦只偏于一隅,然同时却给了各方以分工分区去组织民众的可能。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过去因为国际和平阵线的运动和发展曾给了中国统一战线不少的影响和推动。现在国际形势变了,一方面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和积极,国际反共协定^①的破产,自更可给中国统一战线以助力,但国际反苏联的新结合,尤其是英法的挑拨^②,也不会不给中国以影响。

因为这样,中国的统一战线,就更加处在矛盾的发展中了。

2. 国民党与国内阶级变化

国民党代表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并凭借其优势之兵力,统治着中国最大部分。这种形势,抗战以后,在上层不但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更统一化了;但在下层,在地方,在前线,却已生长着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们研究抗战以来中国阶级力量的结合与变化,以及因此而生的党与政权军队问题要从两方面看,若从上层从表面来看,则掌握全国政权的,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而且中央政府中还高坐着银行买办、投机分子。军队将领中,还有一些高倡反共的将军。尤其代表他们的国民党,在党部机关中充满了“党衙门”、“党老爷”,要么就是“特务机关”(国民党人自道)。在党员中,抗战后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更减少了(所谓 180 万党员,军队中 100 万是通令加入的,地方 80 万,已减少了 30 多万)。在工作

^① 见第 211 页注^①。

^② 反苏挑拨,可能是指英法于 1939 年策划的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

中,不仅与共产党摩擦,并且与其自己,与其地方政府,与其自己的军队摩擦。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其团章,其总团的组织,直等于军事组织的集中营。这些是黑暗的一面。然而我们应该从另一方面看出一些进步。广大的民众参加了军队,参加了战地服务,参加了临时工役,这不能不影响了军队的成份、军官的态度,而抗战的本身也锻炼中国军官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认识,因此前线军队常常违反国民党自己的规定而自动地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甚至发展人民武装。这就使军队本身也有了进步。在中央,有些国民党元老是有进步的,虽然他们没有实权,没有组织,但对全国尚有影响。在地方,许多抗战的省份,因为战争的教训,使地方当局(主要的是军人)自己规定动员法令,组织民众,发展生产,引用进步分子、青年干部,增进工作效能,因此地方政权中的成份,就不能不有些改变,而参加了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乡村保甲的领导中,也有不少农民担任。特别在敌区,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及旧时的官吏跑了不少,所以广大乡村的政权,一般的多是其中留下的进步分子及工农小资产阶级分子担任,而民众的组织和武装也就比较发展。并且在地方政权及军队比较更带独立性的地方(如山西、安徽、浙江、广东、广西、四川等)多半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上并不是党而且还遵从国民党的组织,但实际上,已经起了一些代替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的一派的作用。但究竟因为是地方的组织,所以国民党常来干涉,甚至禁止。在这些进步现象中,进步的军事将领差不多起了上层的领导作用,因此在中央抗战的将领也就常常形成与政府中官僚买办及党部的对立,以影响蒋介石,而推动着抗战前进。同时黑暗的一面,也因为抗战的环境,口头上有时不得不主张进步。站在这一切矛盾之上的便是蒋介石,他操纵着这矛盾,统一这矛盾,有时又发展这矛盾,于是便形成今天蒋介石统治下的抗战局面。这就成为中国政治之一大特点。

因是,若包含到政权下层、前线军队及地方势力的进步,广义

的国民党可说是在开始发展,阶级基础也在扩大,参加了不少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地方退出了一些动摇的资产阶级分子,代之以较进步的分子。不过这些较进步势力还很分散,还很脆弱,还多未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而狭义的国民党部,又时常借其合法地位,加这种进步以摧残。蒋介石虽不满意这个狭义的国民党,但对这种广义的发展,也还不敢信任。因此,他曾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代替国民党包容各方。惟三民主义青年团开始即拒绝各党派参加,并以“复兴社”^①组织为领导骨干,于是使较进步的势力都很难参加。直至现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只在某些地方有了些群众加入。不过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蒋介石与陈诚另外还办了三个战时干部训练团,收容的学生大概到4万人,这是一个够庞大的青年训练机关。

很显然的,两年半的抗战洪流,使着中国各阶级的结合要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动摇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及一部分失望的小资产阶级,迟早是要退出抗战阵线的,留下进步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与广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全国范围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客观历史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拥护这种变化。但国民党中的落后分子妨碍这种变化,他要庇护动摇分子,使之与顽固分子勾结起来,以反共为契机,造成国内的分裂,以走向投降。要避免这种分裂与投降的危险,使统一战线在阶级结合新的变化中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单靠中国共产党及其周围群众的拥护是不够的,必须使国民党进步,尤其要使之与全国范围内那些较进步的势力结合起来。

3. 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政策

国民党虽在广义的范围内,有了些较进步的努力,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对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政策,仍决定着国民党今天

^① 见第24页注^②。

的发展路线。

什么是蒋介石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政策呢？

第一，他联合苏联，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第二，他联合中国共产党，但是要溶化共产党的（其言论见附件二关于外交问题之演说中^①）。

第三，他需要群众，但是统治群众的。

这种矛盾的思想和政策，因为抗战存在，所以逆流发展到一定限度，便会暂时停止，但根本的矛盾却决不会取消。他这种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在落后的国民党部中，便发展成为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压制群众的行动，以破坏统一战线；在较进步的分子中，虽然发展了他好的一面，但也不免要怀疑苏联，防备共产党，限制共产党，与统治群众。

并且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原则上始终不愿意承认国共合作，而只认为是共产主义投降了三民主义。对全民族的团结，只认为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服从，而不愿承认这是统一战线的发动。在思想上更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之点强调起来，以反对共产主义，以统治全国思想，于是三民主义中的复古的反动的成份遂被利用起来，造成一些倒退的言论。然而，究因为是在抗战之中，中国统治阶级需要帮助，如果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他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又成为不可变性，有时他也肯迁就事实，容忍事实的存在。但是中国统治阶级，又怕事实的发展对他的威胁加大，有时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他有权力否认，他有可能拖延，他仍是不愿意公开承认，仍然企图设法取消的。这样，就使在统一战线中许多实际问题，特别如陕甘宁边区的存在、八路军的扩大和军饷的增加、共产党员参加河北山西的政权、共产党员的释放，共产党部在某些省区的公开等等，国民党忽而承认，忽而又取消。特别是因

^① 文件没有找到。

为共产党军队,事实上已经存在无法取消,故对于共产党公开及参加政权事,更加抓紧,不肯轻易承认。其他关于国内民主抗日自由等等问题,国民党亦常持同一态度。

所以中国的统一战线,虽已存在了三年,对国民党的赞助极大,但国民党是常常站在被动方面的。特别是国共关系,更是在极复杂极微妙的关系中发展的。

4. 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向坚持着下列几个原则:

- (1)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
- (2)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 (3)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
- (4)国民党的进步、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巩固和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

(5)坚持长期抗战,反对投降分裂。

(6)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彻底实现而斗争。

在上述的原则下,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路线是:

(1)坚持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对汪逆汉奸托匪及一切暗藏的投降分子的斗争,以肃清抗战中的败类和动摇,以巩固统一战线。

(2)帮助友党友军进步,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共产党组织,并帮助其中较进步分子、较进步势力的发展,以压倒顽固与落后分子。

(3)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胜利,坚持我党在战区在边区的主要发展,并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友军。

(4)坚持国内民主与改善民生,争取抗战自由及国民大会的民主,并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及游击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动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以推动全国。

(5)组织工农群众,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地方上一切有民族意识的人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

(6)反对全国倒退的现象,进行与顽固分子的斗争——在思想上批评,在行动上抗议,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同志话)^①,不过这种犯人仍是自卫的性质,希望促其觉悟。

(7)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宣传一切进步思想,以反对目前复古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

(8)极力地争取一切国际的同情和外援,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任何出卖中国帮助日寇挑拨中苏关系的行动。

5. 中共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我党在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自从抗战以来一向遵守三个原则:

- (1)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
- (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政权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 (3)承认抗战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施政方针。

根据上述原则,我党今天对蒋介石的态度和关系,基本上是在援助他的立场上,经常地向其建议,并经过他的左右进步分子,特别是抗战将领及国民党进步的元老来影响他,使之坚持抗战趋向进步,反对落后的顽固的分子,以改善国共关系,促进统一战线中许多问题的解决。当着蒋介石对我党实行一些无理要求和横蛮压迫时,我们则采取适当的方法坚决拒绝他,从旁批评他,并设法使其觉悟,趋向好转。这种情形在几次较严重的场合中(如对坚持持久抗战,保卫武汉,发展游击战争,反对主和,我们都有建议,如

^① 见《毛泽东选集》北京1967年版第270、306页。

对要求两党合并,进攻边区,河北冲突,平江惨案等^①,我们都有抗议),都尚能收得实效。但也有些问题,因为蒋极不愿意解决,所以只好拖延起来,以待时机。

我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关系,则站在使国民党进步的立场上,推动和赞助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特别在国民党中有地位的元老、抗战将领及地方上较进步的势力,使之积极起来,主持正义,扩大国民党范围,反对国民党部的落后及其特务机关的作用。对国民党每一进步的措施,我党均赞助之。我党均号召和领导群众参加,对国民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我党常采取善意的批评,以促其反省。但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加入它的群众组织是拒绝的,对共产党的善意批评,也常认为是破坏其领导地位而加以禁止的。

我党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则采取争取与批评的态度,争取其进步使之允许青年群众加入,变成团结全国青年的组织,批评其团章统治群众,限制群众,反共倒退。对青年团总团部的落后领导及某些特务机关的倾向,(我们所持方针则是)使广大青年及在青年团内(表现出的)不满情绪,争取各种机会发表,以影响蒋及青年团,取得某种程度的进步。

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我们多经过参政会,向其作各种建议。参政会所包含的上层分子极广,中共代表的意见,又极为人所注意,最近蒋介石又自兼议长,因此我们对参政会一般的是采取积极态度,以此为宣传机关,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其起民族联盟的作用。我党在参政会的各种建议,除掉关系于党派问题者外,大都得

^① 指国民党反动派策划的一系列反共挑衅行动,对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及陕甘宁边区,史称第一次反共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国民党袭击了新四军在湖南平江县的联络站,造成了国共关系的紧张。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莫斯科1974年版第323页。

到通过。不过参政会的一切决议,因为孔祥熙的行政院及全国官僚制度的影响,许多都被搁在一边,未能实行。对于政府的错误,我们除在报纸上作善意的批评外,亦曾联合参政会中及地方上较进步的一部分人,主张改革行政机构,以求政治进步。然而因为中央政府中,英美财团买办是站在主要的地位,所以要改换他们比任何机关都难。

国民党认为保甲制度是它政权的下层基础。但在抗战之中,保甲的领导已经起了如前所说的变动,因此我党对保甲制度,一般的都采取积极参加的态度,并争取保甲长的领导落在真正农民的手中,一方面好积极地拥护各种抗战的动员,另一方面好使之能保护地方民众利益。这种工作在战区某些地方已经收到了成效。

6. 中共对各地方及各党派的关系

我党对各地方当局关系一般的可分为下列数类:

- (1)与我们有确定的合作关系的,如山西及部分的冀鲁豫。
- (2)与我们军队有关系的,如安徽、江苏、河南及琼崖。
- (3)与我们关系较好的,如广西。浙江、广东、绥远及福建之一部。
- (4)与我们关系较远的,如川滇黔等省。
- (5)与我们有严重摩擦的,如陕甘及冀鲁之一部。
- (6)与我们关系极坏的,如赣鄂湘宁青等省。

我们对各地方关系基本上是扶助其进步努力,以扩大团结,以影响中央,对地方上落后当局,特别是反共当局,依照我们在当地的力量与实际情况,给予可能的批评、抗议或打击。而在工作上更因各地情形不同,大致分为巩固好的关系,着重我党我军在游击区的发展,特别是华北、华中;在某些落后地方,则暂谨慎其发展,并严密其组织。

现在中国除国共两党外,尚有其他一些小的党派,大致如下:

(1)国家青年党、国家社会党^①，都是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集团，青年党仅有几个党员，国家社会党只有一些教授及政府官吏，并且最近还有一部分人公开地跑到汪精卫方面去。

(2)第三党^②，是一小部小资产阶级集团，其中有一些是大革命脱离的共产党员，他们常常附和我党的主张，而标榜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

(3)救国会派^③，大多是一群同情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抗战前，他们为响应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起了很大的赞助作用，现在亦经常拥护我党的主张。国民党认为他们是我党的外围。他们并没有形成的政治组织，但在文化界中却占着很大的势力，在青年中也极有影响。

(4)教育派^④，这是长江流域教育界人士及讲究农村教育的人的一群，他们算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倾向于抗战民主的分子。

(5)欧美派——这是一群倾向欧美的留学生，政治倾向主要的是接近英美，但也有一小部分接近德国的，他们大概都组织在国联同志会中或留学各国的同学会当中。

对于上列这些小的党派，我党的态度是联合其进步的，反对其落后的，特别帮助救国会派，以扩大统一战线及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7. 一些具体问题

两党合作形成——这个问题在三年中经过多次的接洽，迄未

① 见第 56 页注②③。

② 见第 56 页注①。

③ 指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见第 10 页注①。

④ 指中华职教社。

得到解决。蒋的思想根本在吞并共产党,他屡次提出国共两党合并,而故意说明这不是取消共产党,并且合并的党还可加入共产国际。这当然不能接受。国民党则根本不愿承认共产党为合法为对等的党,故拒绝一切形式的对等合作。即在华北共产党力量大的地方,国民党地方党部与共产党采取联合委员会或联合会议的办法,国民党中央亦不予批准。我党所提之三种合作形式,第一种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仍保留自己的党籍,这是国民党万难接受的;第二种为国共两党成立共同委员会,在现在亦尚无此种可能,只在个别地方,可以争取事实上的实现;第三种维持目前关系,即双方在不拘形式上互相来往接洽,大致这种情形在重庆在某些省份的上层可以渐渐实行,但大多数地方还谈不上,因国民党不到事实逼迫它非做不可的时候,它还是不愿意做的。

中共的发展问题——这是国民党及许多地方势力最不放心问题。国民党基本只是想取消共产党的,但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所以蒋介石又提出溶化共产党的说法,这仍然是取消主义。在实际上,他们则提出限制与停止共产党发展的两种办法,想将共产党活动地区缩小,或将共产党绝种。当我党六中全会提出中共不在国民党内发展时,蒋介石曾一时有国共两党分区领导、分区发展的说法,但以后并未再提。许多地方势力也很担心共产党在他们的地域内发展,所以限制共产党发展和分区发展的主张,连地方上较进步的势力也都赞成。因此,在某些较进步的省份,共产党上层分子可以与之进行统一战线,但当地共产党部则不能公开。特别在某些友军中,我党在内发展的问题还未解决,更增加他们的恐惧。

中共参加政权问题——我党一向声明现在不参加中央政权,但在中央军事机关,我们有人参加工作,在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地区,我们有人参加政权(晋察冀边区及河北专员区),并要求参加政权(如对河北察哈尔省政府),在战区的各县,我们党员有公开做县长的,边区则更成为一个方面的地方政权。有些进步将领,曾主张

共产党应参加战时政府或国防机构。因此我党参加政权的路线，似应由军事可政治，由战区到内地，由地方到中央。

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大会既定明年召集，则关于民主选举原则成为主要的争点。我党在这一问题上，首先要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大概的情形有可能先从边区及八路军所在的地区开始。

陕甘宁边区问题——这是一个很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来在西安事变后，蒋已承认苏区改作边区，并曾规定 18 县的范围，抗战后蒋介石曾下过手令，给行政院令宣布此事，但因为国民党部及西北地方当局的反对，竟拖延至今未得解决，使边区似合法而又非法，给全国对于团结增加许多怀疑。在这个交涉中间，国民党陕甘宁政府故意委派一些县长到边区各县，于是便发生两个县长的现象；又在边区周围，派些顽固专员，驻扎一些保安队，专造摩擦，于是边区纠纷不断发生，最后更闹到武装进攻。蒋介石知道如不反共，边区问题迟早要解决的，但他总想借着拖延，缩小一些省份，插进一些国民党员，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则想将边区分割成各省的专员区，各归他们的省政府管辖，以破坏我党在边区的统一领导。

我党解决边区问题的意见是：

1. 依照原定的 18 个县(在陕西 12 县，在甘肃 5 县，在宁夏 1 县，见附图^①)划为陕甘宁边区等于一省，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执行中央一切抗战法令，边区政府人员由共产党推荐。

2. 沿黄河之另外 5 县及其他两县各一部分(见附图^②)，仍划为八路军的警备区(原为蒋在抗战后规定的)，以便与河东部队联络(国民党想收回警备区，造成包围边区的形势)。

3. 上述两项地区，均由八路军派兵留守，担任防卫。

4. 边区地方行政归边区政府主持，以前陕甘两省政府派去之

① 附图没有找到。

② 附图没有找到。

县长和保安队应撤回或改组。

5. 边区应该视同各省一样,不受任何歧视和苛待。

为什么边区要保有这一相当独立的系统呢?这不仅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且在抗战的现阶段,也必须保有这一边区,使之保卫中共的领导,巩固八路军的后方,并推动全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只要全国真正的民主实现,则边区正如中共所声明,将失掉它单独存在的意义。边区的实在状况,好或坏都不如所传之甚。边区现在的面积,尚没有达到整个 18 县,人口则只 568675 人。生产除农产品外,尚有极少量的煤油、煤炭、铁、羊毛及较大的盐场。在边区中,大部分土地是分配给了农民的。现在有些地主富农回来,因为荒地多均量给以土地自种。在边区土地关系中,地主有的土地只占 0.2%。政治方面,已实行全民的选举,在边区议会中,议员的成份:工人占 15%,农民占 30%,士兵占 5%,革命的知识分子占 38%,商人占 4%,其他占 8%,边区政府由议会中选出。在作战的动员方面,三年中壮丁入伍的达 29861 人,已占全人口 5%。今年民众武装有 87940 人,占全人口 15%。粮食动员在去年达到 15955 石,在生产方面,最近三年边区开荒 1549740 亩,因修水利而增加 8010 亩,今年度羊由 570501 头增到 1012786 头,牛由 116903 头增到 137194 头,驴骡由 77600 头增到 97789 头。合作社有 243 个,社员 72424 人。工人工资较革命前增加 15%到 30%。城镇商业有相当发展。政府财政在国民党政府时是接受补助的地方,现在捐税减轻,已能做到自给。教育方面,除我中央直接办的许多学校外,地方上小学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 13%,去年春小学有 800 所,18000 人,但占学龄儿童只 18%,成绩尚差。社会补助教育较发达。边区虽做了这些工作,但缺点仍然很多,特别是边区的民主,因为旧时苏区的关系,执行得很不够(此处俄文稿加:因为习惯在一党专政条件下工作,不习惯新的情况),建设与行政制度的建立方面,也还很差,这都不能令人满意。

河北问题——在太原^①冀南相继失守之后，河北方面，国民党军队完全退出，日寇在各县都组织了统治政权，并组织伪军担任守备。我八路军依靠五台山脉太行山脉，东向发展游击战争，不(到)半年的功夫，冀东冀南豫北及鲁西北许多县份都为我恢复，并发动当地民众参加游击队，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日寇于是退保各铁路线，我八路军的游击支队，一直伸到冀东热河及平津附近。这时候阎锡山因为五台山区域及冀察各一部约 50 个县都为我八路军恢复，且远处敌后，遂划为晋察冀边区，并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决定恢复河北省政府政权，派鹿钟麟前往主持，并说定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但鹿到河北后，硬要撤换晋察冀边区已经建立的省以下的冀中冀南两个行政区，改委一些县长，我们及民众予以拒绝，纠纷乃起。鹿在河北本无军队，到后竟收编土匪、大刀会、红枪会及伪军，扰乱地方秩序，致与地方游击队时常发生冲突。国民党中顽固分子，又从中挑拨，特别是河北民团首领张荫梧大唱反共，遂造成更多之摩擦。今年更发生张荫梧向我八路军及冀中部队几次进攻的武装冲突，日寇因此乘虚进攻，鹿张等又都不战而退，于是河北问题愈严重。但蒋介石坚持取消两个行政区域，国民党中复兴社又暗助张荫梧，致使纠纷拖延很久不得解决。最近闻张荫梧已被撤换，问题或较缓和。

我们对河北问题的解决意见是：

1. 河北省政府改组，八路军及中共党员有参加河北各级政府之权。
2. 八路军既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冀察战区作战主责(现时该战区总司令则为鹿钟麟)。
3. 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应有中共代表及民众代表参加。
4. 原则上应允许冀中冀南两行政区的存在，但名义可更改。

^① 1937年11月8日。

5. 河北省县及专员区,应均设立民意机关。
6. 河北省政府应颁布施政纲领。
7. 国共两党应各派代表在河北组织共同委员会,商决一切。

八路军及新四军问题——八路军在华北作战和发展的区域,遍及河北、山西(只晋西南没有八路军)、山东、豫北及察绥各一部,并因武汉失守^①前后,敌后空虚,更发展到豫东、皖北、苏北(见附图^②),致引起国民党很大不安,而山东、河南、安徽驻扎的友军,亦多向我提出抗议。其实我之发展大多为友军未到之区,但他们却认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于是所谓八路军问题亦起。一般人大都认为八路军作战要划定区域,规定任务,否则便易与友军发生摩擦。蒋的态度,认为八路军不应随便发展,自由行动,而应服从命令,故对八路军在山东及其以南的行动,常不予承认,但当着打了胜仗时,他也予以嘉奖,并令其他军队联络。抗战后各军都扩大了,八路军论功更应扩大,蒋也曾许以扩大成三军,并增加军饷,但他都以此为交换条件,欲限制我作战地区与发展。本来划定作战地区我可接受,惟必须有足够补给足够发展的范围。因为蒋所给的军饷无论如何都不会够用,军火补充也极少(抗战后只发过120支轻机关枪),非有一个相当大的范围不可。

蒋及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内部组织系统及政治生活,抗战后尚从未干涉过,只派几个联络参谋探听一些消息。对八路军在华北的群众工作、党的发展,虽想干涉,但多因处在敌后,只能派些特务人员及反共武装进行破坏。

惟对新四军则因其力量并不大,地区不同,便想侵入其系统,限制其发展,干涉其活动,至少要想将其变成国共两党中间的一个部队。然而新四军虽小,因为其领导坚强,干部都是久经游击战斗

① 1938年10月25日。

② 附图没有找到。

的,故其在江南敌人密布的极小占领区域内,仍能游击自如,成为南京附近及沪宁线上(见附图^①)一支中心的作战部队。对地方政权都能遵守国民党的系统,对群众运动亦依照各省政府的法令,本身的发展也能在军饷规定的范围内设法,作战的任务及游击的范围,一般的都依照上级国民党军事机关的规定执行,这一切都使蒋及国民党虽欲干涉,一时尚无从借口,他们的企图也就未能实现。然正因为此,新四军的发展和活动,也就要较八路军小得很多,而工作的困难也就加大。

三、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

1. 党的巩固问题

中共自抗战后,党的发展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区域上都增长得很大。在这发展中,党的本身的许多问题也就提到更重要的地位。

第一,在党的组织方面,因为目前中国的环境极其复杂,极多变化,故下列几个问题也跟着复杂和变化:

(1)关于组织形式——在目前,中国党的组织大概可分五种。第一种,在陕甘宁边区是采取公开的形式。但因为已同国民党及其他方面人员来往,而边区已实行了民主普选制,便不能像从前苏区一党政治的样子,故在党的内部组织上,更多的采取秘密方式。第二种,在八路军及新四军是采取半公开的形式。因为军队要常与友军来往,尤其新四军,更经常与友军接触,故他们党的组织,已不能像从前红军一样,一切党的组织和工作,都由政治部公开执行,而改为党的领导是公开的,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则改由党委秘密进行。第三种,在抗日游击区是采取公开的而又秘密的形式。因为当游击区有了我党军队,并成为根据地时,一般的,党是采取公

^① 附图没有找到。

开号召,公开发展的形式。但估计到游击区域有时会被敌人侵入,我党军队亦有时移动,故党的组织又须保存一部分秘密基础,准备适时地转入地下党状态,以便继续工作。第四种,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一般的是采取秘密的形式。为避免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摧残,我党在国民党区域,除掉少数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党员必须公开者外,一般的党的组织及党员的面目,都力求保持秘密。第五种,在日寇占领的区域,特别是大城市,是采取绝对秘密的形式。因为这五种形式的复杂和变化,各地党部在适应各种情况,实行各种不同的规定时,常常做得不好,致影响党受损失,或阻碍发展和巩固。

(2)关于组织分布——自抗战后,党的组织已渐渐向着全中国发展。其分布情形大概除满洲隔断及西藏青海没有组织外,各省都有了我党的组织。其中以华北五省占的县份最多,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分布得最普遍,在国民党区域则分布得不很平衡,有的在旧的苏区农村易于发展,有的在较进步的地方易于普遍,而在国民党势力较集中且顽固的地方,都通常的难有大发展,且为着保持秘密起见,也都采取慎重方针。在分布中最大的缺点是工业城市及铁路、矿山、轮船中发展得不够,只上海、香港、重庆、天津及跑外洋的轮船中较有多的发展。

(3)关于组织系统——因为中国的地区大,交通不好,情形复杂,党的组织系统在这两年多也有了许多变动,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有待七次大会修改党章时重新规定。

大概经常的系统分为中央—省区—地方—县市—区镇—支部六级。现时中央之外,特设华北、中原、南方、东南四个中央局分管各省区,而中央直辖边区及西北各省。省区一级有36个党委。地方(或名特委)以下无整个统计,大概一个省区,大的六七个地委,小的有两三个,亦有没有这一级的。一个省区包含的县委多的到70个,少的也有在10个以内的。支部照平均数算,总在3万上下。

第二,在党员方面,这两年多的发展较抗战前几乎达到七倍,在今年6、7月所得的统计已达到498115人。其中华北最多,有23.3万人,国民党区域次之,有108880人,八路军新四军又次之,约10万人,边区及中央直属为56235人(细数见另表^①)。

在党员的成份上,全国尚无整个统计,一般地说,农民成份占极大多数,工人成份很少,不会超过10%。单据华北大部分的统计,党员中贫农占60%以上,中农占20%,工人占10%,知识分子及其他占10%,可见农民的成份极多,而中农占的比例也大。只在上海这样地方,工人成份才占43%,再加上店员则占到67%。在党员的发展上,很多地方都是公开发展的,在华北,在边区,在军队中是如此,在国民党区域也有不少地方,或依靠着旧的苏区的关系,或运用公开的路线发展的,因此,便有“拉夫”的毛病,异己的分子遂易混入。在党的生活上,一般地说,支部的作用不大。除军队及老的支部外,积极的党员多半由其自我发展,而对不积极的党员,支部的推动和检举也常不够。故中共党员数量虽这样大,然不论从成份上,从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上,从党的生活上,都离巩固的程度很远。这是党的本身最迫切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在干部方面,也因为党的发展快,党员增加多,而发生新干部多、中上级干部不够用的现象。照中共中央组织部不完全(统计)的材料,省区委一级的干部,十年以上党籍的干部占50%,其成份:工人占20%,农民占10%,知识分子占70%;地委一级干部五年以上的占大半,其成份:工人占10%,农民占10%,知识分子占80%;县委一级,二年上下党龄占多数,其成份:工人占10%,农民占30%,知识分子占60%;区委一级,党龄多在一年以上,其成份:工人占20%,农民占60%,知识分子占20%。由此可见,县区两级干部,除边区外,大多是抗战后的新党员,而省区及地委两级

^① 另表没有找到。

干部,现在也渐渐吸收新的成份。且党在全国工作所需要的干部数目已经不是几百几千,而是几万。同时在党的旧的干部的党籍恢复上,也还有很不慎重的现象,因此干部的统计、审查、挑选、分配和提拔,便成为目前党的工作中之最中心的一环。

第四,在教育方面,这两年来,已引起中共很大的注意。在中央直接办的学校中,属于党的性质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组织部训练班、边区党校四种,人数收到 3847 人,已毕业的 2500 人;属于群众性质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等校,收到 39959 人(半途送往前方训练的未算入),内中党员占 20419 人。这就是说在最近两年内,在中央有近 4000 名党的干部、2 万名以上的党员经过中央直接训练。在地方上,大概华北从县委起以上,国民党区域从地委起以上,均办有训练班或党校,而在八路军新四军及某些地区,又办有群众性质受党领导的学校。据华北统计,省区党委干部 30%,地委 50%,县级 70%,区级 80%,均受过训练。在所有的训练中,除少数党的学校外,最大的部分是偏重于短期,抗战教育的意义大过经常教育的意义。在这上头,影响很大,收效不少。但其中最大的缺点都是教员不够,教材不够,教育的经常性和计划性不够。尤其严重的是党内关于马列主义及新党员的教育不够。许多新党员对党的认识甚差,党对他们缺乏适当的训练材料及训练方法。马列主义的书籍亦缺乏普遍的课本供给中下级干部及一般党员。而联共党史到中国后,除少数部分外,也还没有规定出全党研究它的办法和程序——这是教育工作中最大的一个缺点。

第五,在领导方面,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巩固。最近三年多,中共中央在领导反张国焘主义及其背叛的斗争中,不仅巩固了党中央的领导及八路军的一致,并且从反对其左倾的民族分裂直到反对其右倾的阶级投降的斗争中,也教育了全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共中央及其代表,对于日寇、汉奸、托匪的挑衅和挑拨,

对于国民党顽固分子反共产主义及溶化共产党的企图,都给了适当的揭发和打击,以坚定全党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从没有像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团结一致了。各级领导也有不少成绩。有的颇能适合游击战区的需要,迅速地将党发展起来,组织起广大群众,发动游击参加抗战(如华北及鄂豫皖、闽粤边、琼崖各省区)。有的颇能适应当地情况,将党的组织加以改变,使之不遭破坏并能保存发展(如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区)。但也有因不善改变,致党遭受损失者,如湖南、江西。更有因党内混入许多叛徒,致领导机关成问题,如贵州地委者。党中央已决定予以解散,重新发展。因此目前党的各级领导的一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为要保证这个一致和严密,更需要加紧进行党内反对各种倾向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忽视理论忽视秘密工作等倾向。

总结以上各项,党的巩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不论从党员的成份改善上、质量提高上看,不论从党的组织严密上、组织单位分小上、发展应注意到工业区域上看,不论从干部的审查、挑选、分配和提拔上看,不论从马列主义的教育加强上看,不论从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上、党内进行反倾向的斗争上看,巩固党都是目前中共本身的主要口号。

2. 八路军与新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胜利,是保证党的胜利的杠杆。

八路军在合编时的人数大概有5万人,到今年开始,发展达6倍。经过今年反敌人扫荡的不断战斗,加以河北大水经费困难,至6月遂减到24万多人(详数见另表^①)。现在因山东方面有些发展,数目或又增加。

新四军去年春集中时,只有4000多人,至今年8月,已发展到

^① 另表没有找到。

3万余人(详数见另表^①)。

八路军在抗战两年的战斗中,发展了华北五省及豫东苏北一带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地。据其在抗战二周年纪念时的统计,大小战斗共经过2689次,俘虏日军385人、伪军9615人,缴获步枪20670支、轻机枪384挺、重机枪78挺、山炮24门、飞机3架。我之伤亡3万多人,敌之伤亡约7万多人(详数见另表^②)。

新四军经过近两年的战斗,亦在长江南北创立了两个敌后根据地,尤其在江南之芜湖、南京、镇江狭小地区内,公路河川纵横其间,虽经敌多次扫荡,始终未退。据其抗战第一年的对内统计,大小战斗共经过344次,俘虏日伪828人,缴获步枪1747支、轻重机枪54挺,我之伤亡约1000人,敌之伤亡约3000多人。

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周围,都发展有许多游击支队及民众自卫的武装组织。在华北,约有30多万脱离生产与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游击队。在新四军方面,则有四五千脱离生产的游击队。

在华南,我们还有几处独立发展的游击队。

在八路军发展的游击区域中,一般的都是由军队的领导和干部帮助地方党建立了当地的抗日政权,组织了广大民众并发展了党。新四军方面,则更连地方党都是由军队的领导发展起来的,不过在政权方面,则采取了恢复国民党领导的政权的办法。

不论在八路军(还是)新四军中,他们的军政干部,大都是党的最强的干部,故游击区域一切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与八路军新四军分不开的。党在军队中的发展经常保持30%以上的比例,现时八路军党员约9万人,新四军约1万人。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补充,经常是由抗日大学及各部队的随营学校中供给,或由下级提

① 另表没有找到。

② 另表没有找到。

升。外来的投奔分子,不经过战斗和训练的考验,一般的是不能担任各级军事首长及政工人员的。军队中的制度、生活、战斗作风及政治工作,仍保持原来红军的优良传统。参加的战士成份都是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工作系统仍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仍负有党的权力。只在新四军因为环境关系,政治部的编制是采取国民党规定的形式。这一切就保障着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的一致性、巩固性和纯洁性。也正因为这样,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便成为大家注意的问题。不过在八路军新四军中间,也存在一些弱点,特别是因为新的成份加多,战斗频繁,军队本身的继续巩固,有些地方不够,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对于游击战争的训练,而军队质量的提高,即在干部中间也差得很。由游击部队向着正规部队建设的进度也慢得很。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

3. 党在敌占区域中的工作

这一工作可分两项来看:一项是在游击区域的工作,一项是在敌占大城市中的工作。前者是与我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开展有联系的,后者是与我党秘密工作和工人运动联系着的。在游击战争方面,我们已将敌所占领的省区,分为20个以上的游击区(见附图^①),内中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胶东、鲁南、江南、皖东各游击区,差不多已成为我党在敌后较持久的根据地。其一切工作,不仅从建立敌后反攻阵地的论点出发,并且还须从保障统一战线巩固的观点出发。所以我党现在以最大的注意力、最多的干部去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这些区域。在组织群众方面,凡有我党及军队所在的游击区域,一般的都组织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等团体。大概在华北都冠以各种救国会的名称;在华中、华南,则多为各种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民众武装则多为自卫队、模范

^① 附图没有找到。

自卫队及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组织。单在晋察冀边区便有 50 万人。

在政权方面,大概在摧毁日伪政权之后,都经过各级动员委员会的形式,然后实行民选,成立县区乡的三级民主政权,各级均有议会及民选政府。单在晋察冀边区 56 个县当中,已经有 8000 个乡村政府完全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但这种情形只能在我党占有领导地位的地方才能实现。而在其他游击区域,则只能采取参加政权或协助政权的办法。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大概在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地区,我们尽量做到对工人增加工资,对农民减租减息,对一切贫民及商人减免一切苛捐杂税。其办法如晋察冀减租 25%,减息 1 分,工资增加 9%—30%。如新四军在江南便以仲裁者的地位劝地主做到减租减息,影响当地政府,废除某些苛杂。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及农村建设,大概在晋察冀、晋冀豫两个区域进行得比较多一些,其他则或开始状态,或因地区不固未能进行。

在敌占的大城市中,从游击区域方面,我们也曾派了一些人去进行工作。不过那些工作多半属于军事侦察和破坏性质的,很少在那里建立长期秘密的准备工作。只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才有独立的党的工作;武汉、广州的工作都还没有恢复起来。上海因为环境较天津好些,故它的工作不仅在许多工厂中、企业中、学校中、文化机关中并还在周围的乡村及外县中,建立一些党及群众工作的基础。然而就全般说,我们对敌占的大城市中工作是注意得不够。

4. 党的群众工作

党的群众工作一般地说的不平衡的,尤其在群众组织方面,我们的基础尚不宽广,而以在工人中为甚。因此努力争取我们活动的机会,参加一切有群众性的组织,发展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以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注重民众的动员及工人的组织,是我党目前群众工作的方针。

为适应统一战线情况,党的群众工作是以动员参加抗战为主要任务,同时为谋群众本身的利益,党也尽量利用时机争取实现。

国民党部对群众工作及群众组织的态度,一般的都是采取包办和统治的办法。群众很少有阶级的及职业的组织。即在抗敌的组织中,一经查出有共产分子非开除其本人,即全部组织被取消。因此,我党虽拥护群众中的统一战线,并主张加入统一的组织,但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经过一些过程。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群众组织,须先发展一些群众组织。有些地方国民党根本不许群众组织存在,我们便须设法使其在某种形式下能够存在。有些地方国民党根本不愿与进步的群众组织统一,更不允许它们参加它领导的组织,我们便须先发展本身的组织,而继续地求其统一。有些地方在某种或几种形式下,尚可有一些群众组织,则我们便不应急求统一,反致暴露。故我们现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方式,多采取分散而不集中的原则,利用各种各式的形式内容和方法,以求适合环境,公开发展。有时宁愿重复,不急求统一。有时宁愿隔开,不急求打通。工作则宁愿持久,不求速成。

大致在国民党区域,我党在民众动员方面有些工作成绩。在山西阎锡山领导下的各种动员组织,我党均能参加,在群众中影响亦大。在浙江,在安徽,在广东,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的一部分,我党也能隐蔽地参加某些动员组织,在群众中发展影响。这些动员组织,有的是政府中的动员委员会,有的是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敌后援会,而最多的还是在民众中,在军队中,在地方政府中的服务团、工作团、政治工作队、宣传队等等组织。

民众武装组织大概多为保甲壮丁队等。这些组织的成份,保甲壮丁队多为工农贫民,而服务团、工作团等则多为青年学生及部分工人店员。这些组织,除保甲壮丁外,在湖南、四川、云贵较少,西北尤少,我们参加活动的也少。

在工人运动上,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人生活的流动及其成份的

变动,给现时中国职工运动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党在这个工作中极大的弱点,致使成绩甚微。一般地说,中国工人阶级,现时并无整个的阶级组织,就连过去几个大的产业工会,如铁路、邮务、海员,也因战事关系,弄得分散或者名存实亡了。唯在山西阎锡山领导下,尚有山西省总工会、铁路总工会、煤矿工会、纱厂工会及各县工会、各区工会。总工会会员有 19 万多人。煤铁工人、手工业工人占多数,次为雇工,产业工人最少。在这些组织中,我党均参加并能领导,影响亦大。其他如边区,如各游击区,我党所领导的工人组织,都偏在乡村,只在上海、香港、四川、浙江、昆明等城市工人中及香港海员中较有相当工作。不过这些城市工人的组织,仍极零散,且只能用附属组织的名义,如读书会、联谊会、乐群社等出现,而联合的组织更加没有。

在边区我们有 4.2 万会员的边区总工会。在晋察冀,在河北,在山东,我们都领导有工人救国会的组织,并且在各区都组织了工会联合会或职工联合会。在江南游击区域,我们以工人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了不少乡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大概除我们领导的边区及游击区外,在山西,在浙江的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与生活有若干改善,而在全国范围说,则很少改善,并且有些政府经营的工业,还采取了军事管理的制度。只是全国工业合作社,对其所属的工人生活,要比较有些改善。

5. 党在青年与妇女中的工作

抗战前,党在国民党区域的青年运动中心是在北平。那里是经过 1935 年的学生反日斗争^①,在党领导下,有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队)的组织,代替了过去秘密的共产青年团,而公开在学生中起了反日中坚的作用。到七七事变,它在平津已发展了 1000 多队员,抗战后他们便散布到全国,成为今日许多地方青年

^① 指 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

运动的领导干部。那时在上海,还有陶行知创造的小先生组织,我们也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及工人店员在里面工作。抗战后,他们就发展成为许多战地服务团及各种文艺工作队、孩子剧团等。也就在那个时期,我党中央根据少共国际决定的原则^①,便取消了那个有名无实(除陕北苏区外)之秘密的共产青年团,而决定先在全国组织各种形式的民族青年团体,然后再求统一。抗战后,西北首先有青年救国会的联合组织,其中陕甘宁边区有了168023个会员,陕西与甘肃东部有了3万多会员。在华北,阎锡山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多数是青年)及民先队、青救会都在发展。在南方,许多青年抗战团体都在风起云涌地产生。当时青救会、民先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都曾经企图使自己成为全国青年的组织,但均未能实现。原因是由于全国情形复杂,而国民党统治青年的政策尤为严密。故不久从封闭武汉三个青年团体起,南方及西北许多地方的青年团体都跟着受了摧残。蒋介石本想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来网罗全国青年,我们也曾加以赞助,但因其团章的限制及其领导机关的顽固,也不能做到吸收广大青年。于是青年在抗战第二阶段,便发生一种苦闷的现象。党目前在青年中的工作情形,华北以青救会为主体,在七个游击区中,共组织了90.2万会员,内中有一部分是儿童。山西阎锡山领导的牺盟会及民族革命战争先锋队,我们均号召青年参加。西北除边区外,青年组织已转入变形与分散的状态。在广东,有我们影响下的抗日先锋队,岭东抗先队、青年群众等组织,包括5300多人。在浙江、四川、安徽以及江西、河南、湖北一部分,有各种各式的青年组织,有的是军队和政府领导,有的是参战组织,有的是青年自己的团体,我们都号召青年参加。不过一般的都是学生,有少数工人店员。只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是全国性的,有500—600会员,它包含各党派报纸的通信记者,或为在我

^① 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1985年版,第513—516页。

党影响下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党现在领导全国青年工作的为中央及各级青年运动委员会。青年群众团体则暂以西北青救联合会及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为对外号召。

党对青年干部工作的训练,特办有青年训练班。两年中,先后训练有1万人。目前尚有700学生在受训练。

因为抗战关系,中国妇女解放也跟着民族解放而前进了一步。中国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边区游击区域的民主选举是不分男女的,单在晋冀察边区便有1454个妇女当选为村副,在国民参政会及各省市参议会都有妇女代表。游击区域的民众自卫武装,有许多妇女参加,有些地方还有妇女游击队、妇女营。后方的壮丁队,也有妇女单独训练。前线参战,许多劳动妇女担任担架队、运输队、慰劳队。后方劳动,有许多妇女替补了男子出征的缺额。我陕甘宁边区,在十个县的统计中,便有妇女单独开荒的土地3.5万亩,学会手纺的妇女便有7000人。中国妇女的组织性也增长了。现在有全国性的妇女团体三个:一个是妇女慰劳会,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一个是新生活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后两种组织,均属统一战线的性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公开承认这个组织是容纳各党派的,并且这两种组织,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都有它们所承认的合法的分会。因此这两种分会便向着妇女群众运动发展。我党妇女干部及其影响的妇女群众在各地都参加了这种运动,帮助它们募集钱财,输运慰劳品,抢救儿童,训育儿童。妇女群众的组织,在陕甘宁边区,有各界妇女联合会,有19万以上会员;在华北各游击区,有妇女救国会,单在晋察冀边区便有35万会员,在晋东南晋西北共有16万会员。在国民党区域,各种战地服务团、工作队、政工队、宣传队等等,都是男女学生男女工人一道组织。

另外也有少数的单独妇女工作队。党在这些地方的妇女工作,也跟着青年工作同时并进,不过以知识分子妇女占多数,女工

农妇中的工作还差。党对于妇女运动的领导,在中央及各级都有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干部,在新的党员中也产生不少。党为更有计划地训练大批妇女干部,在延安开办女子大学,现在学生有550人,党员占40%。

6.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除上述的党的教育部分外,党的一般宣传鼓动工作,特在此地分别说明。大概自抗战以来,党之宣传鼓动的动员,在群众中所开展的局面及其影响,要比其他工作来得广泛。

第一,在报纸方面,公开以党的名义出版的有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三日刊)、新华日报华北版(两日刊)及抗战报(在晋察冀的为两日刊,在江南的为五日刊)五种。新华日报为全国性党报,在武汉直接销三万多,那时广州、西安、重庆,甚至上海都有翻印版;现在重庆销两万多,成都、桂林、香港三处有翻印版,西安翻印已被禁止。新华日报销量未能大增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交通困难,另一方面则为纸价昂贵,每增一份,贴本甚多。读者对新华日报的通信极为踊跃,在武汉时每天都收到几十封信,但报纸对于通信网的组织及其注意都很不够。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主要销行于边区。新华日报华北版专在华北推销,许多友军及地方政权、群众团体都购阅此报。晋察冀抗敌报在该边区内销行1.2万份。江南抗敌报为新四军出版,供给江南游击区域的军民阅读。各地方日报在党领导下的有六七种,在党影响下的更多于此数。单上海在过去我领导的日报两家,影响下的日报三家,现在因为汪逆捣乱,已有两家不能出版。

第二,在杂志方面,公开的以党的名义出版的,在延安有六种,在重庆一种,在华北则较多。八路军出两种杂志,新四军出一种。各地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杂志,在武汉未失前,几乎各大城市都有,现在数目虽减少,但主要的城市(除兰州、西安、长沙、贵阳外)也还有一两种。

第三,党的宣传鼓动书籍,在延安及在武汉,在重庆,在华北都出版得很多,各地翻印的也很多。有些书籍在抗战中的销路几乎压倒一切。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及论新阶段,单在上海便各销行了10万部上下。

第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译印的也不少。联共党史在苏联的译本到中国后,两个月内便销行一万多册;而在中国的另一译本,在重庆、香港、上海及各地的销行亦在一万以上。大概关于马列主义及社会科学的书籍,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最能销行。尽管国民党部在许多地方查禁这类书籍,但销行的数目总较其他书籍为多。

第五,宣传鼓动的组织,在我党领导下影响下的也较其他性质的组织为多。大概关于抗战宣传的组织,特别是戏剧队、歌咏队以及漫画电影等等,在各地最易发展,最易受前线军队及民众欢迎,国民党部也很难完全禁止。党在这方面,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各种文艺思想的领导上,也给了很大影响。这一工作是党在内战时,上海工作经过全部破坏以后,所保存的唯一阵地,当时与华北的青年运动,成为党在国民党区域推动统一战线的两支力量。现在便发展成为全国文艺的领导力量,国民党在这方面,是瞠乎其后的。不但这样,我们在这方面统一战线的工作,也较其他方面为好,国民党中参加文艺运动的人物也较能合作一些,并组织有多种全国性的文艺团体。

第六,抗战后,国民党军人以及各地方当局都需要吸收青年参加抗战工作,加以延安训练青年的影响,于是各地办训练班之风大盛。而蒋介石在武汉亦曾集中数千军官,分期施行训练;在湖北又集中数千干部,分期施行游击战争的教育。政治部陈诚,更在西北、东南及中央,主办三个战时干部训练团,吸收数万青年,以与我们竞争。我们在这方面,一面力争参加受训,另一面则争取机会参加教育,以扩大我们的宣传。大概经过统一战线,我们在许多训练

班,甚至蒋陈办的军官训练团都取得教育机会,特别是关于抗战主张、统一战线及游击战争诸问题,最易受人欢迎,发生影响。

7. 瓦解敌军的工作

日寇在侵华战争的初期,利用其武断宣传及其武士道的传统,哄骗得一般士兵拼命作战,故每当与我交锋之际,虽陷入我军重围,也常因怕我才残杀而拼命抵抗,非至死尽不止。加以当时阵地战多,进退其慢,致敌人死伤虽大,但被我活俘者极少。而我方当时对待俘虏,除八路军新四军外,也很少有优待办法。蒋介石虽有严令禁杀俘虏,但下级官兵,尤其是被敌人残害之居民,确很难做到。同时敌人当被俘时,也常有自戕或与我们格斗因而被杀的事。直到徐州会战前后,各军才开始注意优待俘虏,但上述事情仍不时发生,而瓦解敌军之工作又做得少。因此自开战迄今,日军被活俘的不过两千人上下,其中八路军俘虏的占 385 人,新四军俘虏的占 31 人。日军因反战而来我军者,虽多次,但究属少数。大致在战争初期,日军作战尚多拼命,等到战争久了,伤亡既多又无法回国,而新来者更多年纪大的,日寇的欺骗逐渐被揭穿,我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消息又渐渐传播过去,于是日军士气渐衰,打仗也不如从前之拼命,缴枪被俘者遂较容易。现在厌战想回家的可说在日本士兵中占绝大多数,但觉悟到反战与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还占少数,这就需要中国和日本共产党方面进行更多的瓦解日寇军队的工作。目前中国方面,我党瓦解敌军的工作,尚只限于宣传,一般的对敌喊话,在敌后及敌人经过地区散布宣传品,及放回俘虏,还有成绩,但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派遣人员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可说没有。只在伪军中则瓦解工作做得较好,所以叛敌反正的事也常见。在国民党军队中,对日军的宣传不很普遍,大概靠高级政治部编印宣传品,送达前方张贴,或由飞机散发。只在第五、第九两战区,有朝鲜义勇队的组织,在江南第三战区有台湾义勇队组织担任宣传与优待俘虏的工作。宣传品中最受日本兵欢迎的是通行证

(证中述明持此证的日本兵可到处受中国军民优待不杀)。训练俘虏的工作,在桂林、重庆、延安及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均有组织,但因训练未尽得法成绩尚少。

8. 反叛徒奸细及破坏者的斗争

在与日寇进行长期战争及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条件下,我党对各种各色的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斗争的责任也加重了。这种分子,主要的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党的叛徒。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直到张国焘叛党^①为止,我党叛徒之跑往国民党方面者,为数颇多,并且其中大多数都做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警犬、帮凶,专门担任破坏共产党,捕杀共产党员的工作。抗战后,他们中除少数做抗战工作外,大多数仍继续担任反共的特务工作。他们在各地破坏共产党,逮捕共产党员,比一般的国民党顽固分子还要积极,而数量也多。他们常说:“共产党得势,他们将无立足之地”,所以仇视共产党更甚。另外还有一些叛徒在抗战后,曾企图或者曾经混入党内,想从中进行破坏工作,已被党所发现。

第二类是奸细。一般的奸细都是被日寇派遣来破坏中国抗战营垒,特别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其中人物多是汉奸特探,而最狞恶的一类要算托匪。他们的数量虽少,但他们不少的人已取得国民党中相当位置,而且办法最狞恶,容易蒙蔽某一些人。不过他们有一共同点,即在任何地方都是反共的先锋,而且常常从理论方面帮助顽固分子的反动主张。托匪中也还有另外一部分,以公开面目出现的,大概都在敌占的城市及香港起侦探和工贼的作用。自然还有暗藏托匪混入党内的事,更值得党之严重注意。

第三类是破坏者。大概他们都是来自国民党方面,或者混入我党内军队内进行侦察破坏,或者在各地与我党员及军队中的人

^① 1938年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接近,刺探消息,勾引或收买我们党中军中不坚定的分子,更有制造谣言,进行挑拨,故意纠纷的。还有一些其他帝国主义的侦探也常企图接近我们,进行某些侦察挑拨。

中共党员在上述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不仅要在战场上与敌人对垒,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阶级立场,在党内进行无情的反倾向斗争,而且还要与那些暗中的敌人、暗藏的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肃清的工作。这里就需要最坚强的党、最坚强的军队,更需要最有警觉性的共产党员。而这种警觉性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扬,才能保证党之反叛徒、反奸细、反破坏者的斗争得到完满的胜利。

四、党的第七次大会及其准备工作

1. 大会代表选举、会期与日程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①决议案上曾规定召集。后来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屡遭破坏,而苏维埃区域因被“围剿”关系又互相隔断,以致一直迁延下来。直至1937年底党中央正式规定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准备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王明同志为书记发表通知进行准备工作。两年来又因战争关系,许多工作都未得照预计进行,直至今年下半年,始在各地召集省区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全国代表人数,规定500人外加候补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中原各省区代表在7、8月中多已选出,大会会期原定1940年1月,现决定延期至3、4月,等候共产国际指示。

大会的日程,预定为中央报告,讨论通过决议和选举,中央报告之主要项目为:

^①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

政治报告——毛泽东

组织报告——王明

军事报告——朱德

职工运动报告——刘少奇

修改党章报告——洛甫

审查委员会报告——陈潭秋

其他为统一战线(周恩来)、八路军(彭德怀)、新四军(项英)、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高岗)、参政会(博古)、党报(凯丰)、干部问题(陈云)、政权工作(林伯渠)、政治工作(王稼祥)、锄奸工作(康生)、少数民族问题(邓发)、农民问题(陈林)、青年问题(冯文彬)、妇女问题(邓颖超)等,或作副报告或作演说均未定。

2. 六大至七大期中党的政治路线及中央工作的总结

这一问题,在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虽曾提出,但因目前工作紧张,中央既未对此问题发出材料,全党也未引起讨论。现在所可说的,只是几个主要问题,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已有决议给了估计的,这可作共产国际给中共指示时的参考。

第一,在这六大至七大期中,中共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国际第六次、第七次两次世界代表大会^①所规定的总的路线走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开于1928年6月^②,它所决定的总路线是完全遵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③的方针和指示的,而这个决议案便是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签名的联共(布)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其关于国际状况与共产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原文如此。应为:6月18日至7月11日。

③ 指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国际任务及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两个提纲上,都同样指出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争取群众的基本口号。中国党在其六次代表大会后,便依照这个总路线将党发育起来,成为完全统一的坚固的党,领导着农民土地革命,建立起并领导着中国苏维埃政权和中国工农红军,并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农群众斗争。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不仅久已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并且正在侵入中国内地,为着号召共同反对中国全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更指示中国党要努力去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中国党在这一指示的路线下,便发起了并建立了全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发动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发展了党,扩大了党所领导的军队。显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获得的成绩,是完全从执行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所规定的总路线中得来的。

第二,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对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共产国际也常常给以估计。由中共六次大会开后直到中国革命新高潮开始时候止(1928—1930),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中指出:“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其思想的发展道路上,以及在其队伍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事业中,都达到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指示,特别对其在中东路事件时的活动表示赞扬。当时中共揭破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此处俄文稿加:和沙文主义欺骗),提出了“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进行了斗争去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反对“武装保护苏联”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反革命宣传,并驱逐了他们出党。可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共中央在个别问题上也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如对富农问题,对国民党工会及黄色工会问题,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军阀战争性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均作出过决议或予以纠正。

接着从1930年到1931年初为止,正是中国党同左的李立三主义以及右的反革命的罗章龙派进行斗争,来建立和巩固党的正

确的政治领导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其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1931年8月)中,给了这个时期以整个估计,它指出:“在这个时候(指1930年夏季——报告人注)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一部分领导者都拿出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来与列宁主义的路线相对立。这条路线是企图用冒险的盲动主义来代替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不肯进行群众工作,不肯进行真正解决革命任务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1930年10月——报告人注)……对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采取了骑墙的调和态度,这就是帮助了右的取消派和分裂派,即反革命的陈独秀主义走狗(罗章龙)向中国共产党路线进攻。应该满意地指出:那个时候在党的内部发展了一种健全的趋势,去克服当时一部分领导者的动摇。”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第四次扩大会议(1931年1月——报告人注)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及对这种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更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行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选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

再接着从四中全会后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前夜(1931—1935),这是中国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同时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很多地方取得胜利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对这个时期的中共领导曾给了这样的估计:

“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上新选出来的政治局的领导之下,在

最近几年来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它无论在夺取和巩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方面,在党的队伍团结一致并继续布尔什维克化方面,都有了很大成绩。”(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1935年7月出版的《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前夜的共产国际》文集)

最后,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后直到现在(1935—1939),正是中国党发起和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历史时期,同时也正是中国党更加团结更加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1938年7月^①给中国党的指示中曾“认为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因此达到国共两党新的合作的建立,使民族力量团结起来和日本侵略力量作斗争”。

第三,从中共六大大会到现在,中国党自己在其中央全会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曾给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工作及领导的成绩或错误作出检讨和决议。特别是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给中国党的领导指出了如前所述的新的成绩;1933年1月(原文如此,应为1935年1月——译者)在遵义召开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给了当时党中央一部分领导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以适当的纠正;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更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号召的反帝统一战线表示了诚意的接受,实行了政策的转变;而1938年10月^②扩大的六中全会更是对于共产国际同年7月的指示及全党在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决议。

自然,这一切材料还不能包括中共六大至七大之12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党的工作的全部总结。但是最重要的政治路线及中央领导,都可以说从这些材料中得到了主要的线索和明确的概念来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8年6月11日。见第23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9月29日至11月6日。

做总结的根据了。

3. 修改党章问题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现在有许多地方因环境改变须加增改,故党中央决定的七次大会提出修改党章,党中央下面已成立修改党章准备委员会从事起草。

现在陈林同志提出拟修改之原则数条,请求共产国际给以指示。

4. 选举党的领导机关问题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共 23 人,候补 13 人。当时第一次中央全会^①决定政治局委员 7 人,候补政治局委员 7 人,书记处书记 5 人,无总书记制,只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兼书记处主席 1 人。1930 年 10 月^②,中共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 7 人,候补中央委员 8 人。1931 年 1 月,中共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 2 人,候补中央委员 2 人。1934 年 1 月,五中全会^③补选中央委员 6 人,候补中央委员 7 人。1938 年,六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 3 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计先后遇害者 14 人,病故的 2 人,被开除中委的 2 人,先后被开除党籍和自己脱离党的 26 人,现有 27 人,内正式 20 人,候补 7 人。政治局现有委员 15 人,内正式 11 人,候补 4 人。书记处现有书记 7 人(名单另附^④,以上许多数目系就记忆所及写出,不能说毫无出入——报告人注)。

七次代表大会在改选中央委员时,为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开展,名额将增加,总书记制中央也拟提出恢复。唯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书记处名额究以多少为宜?也请国际给以原则上的指示。

① 1928 年 7 月 21 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原文如此。应为 1930 年 9 月。

③ 指 1934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在瑞金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④ 名单没有找到。

周恩来

1939年12月29日

报告人附注：

此次报告完全是秘密性质，一切附件附表只送给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阅，不另分送。

全宗 495，目录 18，卷宗 1309，第 60—132 页。

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

8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12月31日于莫斯科^①

致中共中央

请向我们紧急通报阎锡山军队好像在11月发生起义的情况及其原因和性质。^②据说西北战区司令部认为起义的发动者是朱德。还请告知目前阎锡山与八路军的关系如何。

季米特洛夫

全宗495,目录184,卷宗3(1939年发文),第69页。

俄文亲笔签字。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注明的。

② 见第88号文件。

86

古利亚耶夫和莫尔德维诺夫关于 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给 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①

1939年12月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

已吸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执委会主席格列博夫同志和彼得·科拉罗夫同志参加研究通过红十字会系统广泛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问题。

在他们的参与下制定了组建、装备和经营两所有400和200张床位的医院的初步预算。专业设备支出预算为1709000卢布。两所医院一个月的经营支出是296564卢布，一年的支出是3498768卢布。此外，使用两架救护飞机的费用是686000卢布，而装备和经营两所医院的总支出是5265768卢布。

除上述两所医院外，还设想(在新疆)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建一所150到200个床位的疗养院。

经营这个疗养院的支出预算为1783043卢布。装备电疗室和水疗室的支出为100000卢布，总共为1882043卢布，而这是在找到现成场所的情况下。如果找不到这种场所，预计建设开支将达

^① 文件上有批注：“将书面报告送联共(布)中央安德烈耶夫同志。1939年12月31日。Г. 季米特洛夫。”见第89号文件。

2300000 卢布,而疗养院总支出为 4182043 卢布。

上述三个项目总支出为 9500000 卢布。

两座医院的选址预定在兰州和西安以西地区,而疗养院在新疆乌鲁木齐或哈密某地^①。

两所医院和疗养院的服务人员编制预定为 429 人,其中行政领导和政工人员 25 人,医生 23 人,护士长 16 人,护士 689 人,后者基本上可以在当地挑选,所有其余技术人员也一样。根据科拉罗夫同志的设想,医务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吸收美国等国在西班牙工作过并表现较好的人员参加。在西班牙工作过的医生中有 4 至 5 人在莫斯科。行政政工人员和部分医生应从苏联人中挑选。

资金问题,根据组织援助和援助规模问题的原则解决办法,可以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系统或者通过苏联人民委员会解决。因为红十字会执委会从 1938 年 12 月 3 日起就是预算机构了。

根据皮克同志的意见,少量外汇资金和部分设备可以通过援助中国的国际组织,主要是美国的国际组织取得。

这些措施的具体实施应由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执委会通过下列措施来进行:

1. 派遣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执委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可由彼得·科拉罗夫同志率领。

2. 在新疆准备建疗养院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同督办盛世才在乌鲁木齐解决,而准备建两所医院的工作,代表团应取得蒋介石或其代表的批准。

3. 为医院和疗养院挑选干部的工作由红十字会执委会进行,事先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协商。

^① 见第 115 号文件。

这个问题首先应由红十字会执委会在苏维埃机关正式提出。
执委会主席格列博夫同志的信件附上。

附：上述信件和 18 页初步预算。^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 古利亚耶夫
高级顾问 莫尔德维诺夫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909, 第 19—2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① 格列博夫的预算附件和信件没有找到。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1.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第179（A）号记录（摘录）（1937年8月10日）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199（A）号记录（1937年10月3日）
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204（B）号记录（1937年10月10日）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书记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937年10月10日）
6. 王明和康生给斯大林的信（1937年10月21日）
7. 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谈话的简要记录（1937年11月11日）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1937年11月15日）
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216（A）号记录（摘录）（1937年9月21日）
10. [中共]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1937年12月12日）
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6号记录（摘录）（1937年12月12日）
12. 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代表参加国防委员会一事给

- 斯大林的信（1938年1月9日）
13.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
 14. 安德里阿诺夫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2月2日）
 15. 安德里阿诺夫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1938年2月3日）
 1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王稼祥和邓发的电报（1938年2月4日）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8年3月23日）
 18. 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8日）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22号记录（摘录）（1938年5月17日）
 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第24（A）号记录（1938年6月11日）
 21.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1938年6月11日）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通过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
 24.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8年11月5日）
 25. 关于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1938年11月6日）
 26.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中国西部）总领

- 事馆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12月9日）
27. 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负责人奥夫季延科谈话记录（1938年12月21日）
 28. 季米特洛夫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39年1月8日）
 29. 邓发和斯克沃尔佐夫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5日）
 30.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13日）
 31.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3月17日）
 32.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27日）
 33. 邓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3月28日）
 34.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4月2日）
 3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4月7日）
 36.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5月7日）
 37.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5月17日）
 38.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5月21日）
 39. 季米特洛夫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5月21日）
 40.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5月21日）
 41. 古利亚耶夫给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报告（1939年5月23日）
 42.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5月25日）
 4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6月4日）
 44. 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1939年6月5日）
 45. 小李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6月24日）
 46.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

- 电报（1939年6月25日）
47.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第二号记录（摘录）（1939年7月5日）
 48. 林彪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7月5日）
 4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7月5日）
 5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7月6日）
 51. 林彪与马明方的谈话记录（1939年7月6日）
 52.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7月7日）
 53. 中国小组会议第1号记录（1939年7月8日）
 54. 毛泽民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上发言的简要记录（1939年7月8日）
 55. 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7月15日）
 5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9年7月17—30日）
 57.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7月28日）
 58. 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8月1日）
 5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8月2日）
 60.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8月7日）
 6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8月11日）
 62.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1939年8月18日）
 63.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19日）
 64. 毛泽民关于中共党员人数的书面报告（1939年8月20日）

65. 普罗斯库洛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8月22日）
66. 任弼时和莫尔德维诺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9月8日）
6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9月8日）
6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9月8日）
6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9月21日）
7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10月3日）
71.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0月8日）
72.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10月12日）
73.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39年11月10日）
74. 莫尔德维诺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11月13日）
7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76.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1月16日）
77.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39年11月21日）
78.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1939年11月26日）
79.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7日）
80.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7日）
81. 周恩来和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

15日)

82. 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电报(1939年12月15日)

83. 普罗斯库罗夫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9年12月21日)

84.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摘录)(1939年12月29日)

85. 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2月31日)

86. 古利亚耶夫和莫尔德维诺夫关于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1939年12月)

封底